

2019

年度
概览

- 01 | 2019年第1期 [主题] 可感城市：新城市科学下的人本城市设计
- 21 | 2019年第2期 [主题] 非正规经济下的城市发展与规划响应
- 43 | 2019年第3期 [主题] 社会—生态实践研究
- 69 | 2019年第4期 [主题] 国际视野下现代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
- 89 | 2019年第5期 [主题] 多尺度与跨学科：可步行城市的理论研究与测度方法
- 112 | 2019年第6期 [主题] 日常都市主义：面向美好生活的城市发展范式

INDEX of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Articles

《国际城市规划》集萃

文章目录 摘要 关键词 精华版

《国际城市规划》编辑部

《国际城市规划》相关信息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主办单位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主 编 王 凯

副 主 编 陈 明 孙志涛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 立 于涛方 王 兰 王兴平 王红扬 王缉宪 王 德 龙 瀛 吕 斌 刘 健 孙施文
孙 晖 李志刚 李和平 杨贵庆 杨家文 吴志强 冷 红 沈 青 张 兵 张丽君 张京祥
张庭伟 张 勤 林文棋 林 坚 卓 健 罗震东 周江评 周 俭 郑德高 赵万民 赵星烁
袁 媛 夏 青 柴彦威 徐 江 徐 苗 唐 燕 崔功豪 韩笋生 谭纵波 颜文涛

编辑部主任 孙志涛（兼）

编 辑 部 许玫 王枫 张祎娴 顾春雪 秦奕

编 务 徐荔鑫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10 号东楼 E320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86-10-58323806 / 58323803

查 稿 86-10-58323835

发 行 86-10-58323820

电子邮箱 upi@vip.163.com

网 址 <http://www.upi-planning.org>

总 发 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订 阅 全国各地邮局 / 本刊官网

邮发代号 82-363

期刊价格 38.00 元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11-5583/TU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673-9493

本刊微信公众号



《〈国际城市规划〉集萃》编辑出版：《国际城市规划》编辑部

责任编辑：顾春雪 孙志涛

集册时间：2020 年 9 月

2019年第1期文章目录

特稿

申明锐, 张京祥 / 政府主导型乡村建设中的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与可持续乡村治理

本期主题 可感城市: 新城市科学下的人本城市设计

何宛余, 李春, 聂广洋, 杨良崧, 王楚裕 / 深度学习在城市感知的应用可能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图像判别分析

叶宇, 张昭希, 张啸虎, 曾伟 / 人本尺度的街道空间品质测度

——结合街景数据和新分析技术的大规模、高精度评价框架

钮心毅, 吴莞姝, 李萌 / 基于LBS定位数据的建成环境对街道活力的影响及其时空特征研究

徐磊青, 孟若希, 黄舒晴, 陈箐 / 疗愈导向的街道设计: 基于VR实验的探索

张灵珠, 晴安蓝 / 三维空间网络分析在高密度城市中心区步行系统中的应用

——以香港中环地区为例

沈尧 / 动态的空间句法——面向高频城市的组构分析框架

城乡研究

赖世刚, 汪礼国 / 城市增长边界能有效控制城市蔓延吗? 理论解释与实证分析

王洋, 于立 / 历史环境的情感意义与历史城市的保护

杨欢, 何青松 / 美国地方郡县城乡用地分类体系的发展特征及其经验启示

张延吉 / 城市建成环境对慢性病影响的实证研究进展与启示

薄力之 / 城市建设强度分区分管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龙茂乾, 孟晓晨, 李贵才 / 国外高速铁路经济、空间影响研究进展综述

葛天阳, 后文君, 阳建强 / 步行优先指导下的英国城市中心区发展

规划研究

李文静, 翟国方, 顾福妹, 陈泽武 / 日本福祉型避难场所建设对我国老龄化背景下避难场所规划建设
的启示

吴怡沁, 田莉 / 健康影响评估导向下的城市总体规划: 以美国洪堡县总体规划为例

文萍, 赵鹏军 / 存量用地背景下填充式开发研究综述

实践综述

赵捷, 彭正洪, 李志刚 / 当代英国住房建设评估的经验与借鉴



2019年 第1期

政府主导型乡村建设中的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与可持续乡村治理

申明锐 张京祥

摘要：在多重惠农政策的支持下，挟裹着多级政府大量财政投入的乡村规划与项目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能，深刻地改变了乡村治理的利益格局。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热过后，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浮出水面，可持续乡村治理成为一个难题。本文以南京市江宁区汤家家村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深入剖析村庄建设与运营过程中公共产品的供给和使用机制，并揭示在政府资金撤离后，村集体在保持村庄可持续运营方面面临的难题。文章认为，自上而下的项目投入和自下而上的乡村商品化，使得乡村中的持份者享用着高品质的乡村公共产品，并具有稳定的消费需求。但强势且短期的政府投入没有触及“乡村公共产品付费”这一核心制度设计，使得该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成疑。未来可持续的乡村治理路径设计，应当发挥政府资金的触媒作用，更依赖本地社区内在的自我营建力量，从而建立起供需对接的乡村公共产品体系。

关键词：乡村规划；公共产品；政府项目；乡村治理；可持续发展

引文格式：申明锐，张京祥. 政府主导型乡村建设中的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与可持续乡村治理[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1): 1-7. DOI: 10.22217/upi.2018.090.

在多重惠农政策的支持下，挟裹着多级政府大量财政投入的乡村规划和项目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能，深刻改变了乡村治理的利益格局。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热过后，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浮出水面，可持续乡村治理成为一个难题。

笔者长期关注乡村规划与治理问题，我们的最新研究《政府主导型乡村建设中的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与可持续乡村治理》分析了南京汤家家这一典型案例，超越了对政府项目投入下乡建设成就的描述，从乡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对缺乏常态运行机制的乡村建设可持续性提出了质疑。文章运用 Ostrom 的公共产品理论框架，深入剖析了村庄建设、运营过程中公共产品的供给和使用机制，并揭示了在政府资金撤离后，村集体在保持村庄可持续运营面临的难题。

汤家家案例来源于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三所张川所长及其团队自 2012 年开始在南京市江宁区东郊汤山街道开展的一项乡村规划设计，后续相关的社区营造和研究工作持续至今。藉此实践契机，我们的乡村研究与规划设计彼此同步，笔者因此有机会充分了解和参与规划全过程。

在由政府牵头的众多美丽乡村建设中，汤家家算是比较依赖市场、村民力量进行建设的典范。乡村建成环境的改善作为一个触媒，去活化乡村社区的家园感、认同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政府

资金的带动显著激发了本地和外来居民的创业精神，政府也在尝试从初期强力驱动者的角色向后期的居中调停者转变。

然而，该案例也暴露出乡村公共产品供给领域中的可持续治理问题。政府推动投入的乡村项目往往重短期的建设成效，缺乏后期可持续制度设计的耐心。政府过度介入乡村建设和治理事务，反而会从根本上破坏乡村公共服务交易机制的形成，让政府背上无限的责任。在汤家家，村民和商户实际享受着类似城市中的公共产品，但是缺乏一个与城市相仿的公共财政汲取机制以供养这些公共产品。在村庄打造过程中，政府不计成本地提供了无偿公共品，但原有的低水平但稳态的乡村公共产品交易制度在强势的政府建设项目植入后被打破。更糟糕的是，政府对于乡村建设与治理的制度“破而不立”，政府在撤出前并没有意识或者足够的耐心来建立好相应的乡村公共服务交易机制。乡村在今后的发展中，谁来为乡村公共产品买单？——商户、集体、村民，抑或社区集体最近正在积极招商引资的“总包企业”？乡村的可持续治理成疑。

为了彰显温泉村的特色，规划师在广场的两侧分别设置了公共温泉池，每天早晚两个时间段准时放水，免费开放，当地村民和外来市民特别欢迎。到了晚上，大家边泡脚边活动，彼此交换着很多村内村外的信息，这里就是一个社群之间的大聚会。

一位村民的讲述很具有代表性：“我们现在很为汤家家自豪。晚上我们在这边泡脚，一些跳广场舞的也过来，我们跟着后面打拍子！还有些南京的老太太早上也来这边泡，我们经常聊聊。她们先在汤山菜场买个菜，过来泡泡脚玩玩，再免费公交回去，正好给孙子做中饭！”在村民晚上在公共空间活动的间隙，社区工作人员也会不失时机地深入到人群中为政府项目做一些动员工作：“我们的工作怎么样啊？如果觉得不错，要支持我们的工作啊！”

政府项目带动下的乡村建设，体现了城市公共产品与乡村共有物制度之间的张力。汤家家虽是个案，但恰恰代表了沿海发达地区将城市发展思路快速移植到乡村中的普遍做法，充分体现了政府强势主导的色彩。政府在乡村建设项目中，不仅复制了城市重大项目建设中的临时指挥部模式，还带来了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将强制纳税的城市公共产品模式植入原有的乡村公共池塘资源上面。在城市中，公共服务由政府提供，政府有强制的征税权来确保公共服务交易的完成。但在乡村建设中，政府提供了大量先期的公共产品投入，但村庄的真正业主是村民集体，这种公共产品提供主体与消费主

体之间的不匹配导致乡村公共产品缺乏明确的付费主体。实际上，乡村治理领域并非白纸一张，原有乡村公共品的提供与运营是具有一套自我调节的管理体制的，例如传统的宗族血亲，亦或“三提五统”之前的农村税费机制，都在让乡村的公共产品在一定的水平上运行（尽管是较低水平）。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及市场对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时，曾经有这样非常形象的比喻——“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者面包师傅的仁慈之心，而是他们的自利之心；我们不要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语，而要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语；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要说对他们有利”。

汤家家中可持续公共产品的提供，已经不是简单的政府业绩工程，而是对商户和村民利益攸关的事业。这一案例一方面具备自身禀赋区位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对于众多城乡互动中的郊区乡村而言，具备相当的前瞻性和典型性。在城市化、商品化的促动下，众多乡村已经不再是传统内生的封闭社区，而是对各种城市要素打开了大门。未来面向可持续乡村治理，需要紧密围绕公共产品付费机制设计，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

深度学习在城市感知的应用可能——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图像判别分析

何宛余 李春 聂广洋 杨良崧 王楚裕

摘要：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重点，机器学习近年衍生出了各式各样的智能化应用，例如图像判别、语音助手和智能翻译等。尤其是图像判别技术已在各行业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城市领域也不例外，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深度学习的卷积神经网络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也使得训练计算机判别建筑风格、城市肌理等城市特征的准确率大幅提升。本研究立足于深度学习图像判别技术，探索卷积神经网络在城市感知方面的应用。鉴于直接利用现成开源的带标签图像数据集训练个性化图像判别模型可能带来局限性和误差，本研究探索了从收集数据到自定义训练数据集，到搭建满足特定需求的图像判别模型的整体流程，并通过三个实验案例：城市风貌分析、城市问题侦测和城市肌理评估，阐明深度学习在城市感知和城市规划中的应用可能性及潜力。

关键词：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卷积神经网络；图像判别；城市感知

引文格式：何宛余，李春，聂广洋，等. 深度学习在城市感知的应用可能——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图像判别分析[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1): 8-17. DOI: 10.22217/upi.2018.514.

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重点，机器学习近年衍生出各式各样的智能化应用，例如图像判别、语

音助手和智能翻译等。尤其是基于深度学习架构的图像判别技术已在各行业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实

践，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深度学习的卷积神经网络（CNN）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些成就使得深度学习跳出原来狭小的学术圈子，一跃成为大众传媒的焦点，并激发了其他学科、领域和公众对其的想象力。

对于城市学科而言，深度学习技术也有着巨大的应用潜力及可观的发展前景。传统上城市根据较为静态的规范或导则来进行规划和管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及城市系统的日益复杂，不仅导致了管理多层次公共系统和城市资源的成本指数性地增加，也暴露了自 20 世纪起建立的规划范式难以适应城市现今的更新变化速度。在这样的背景下，探索并设计一个智能的城市感知计算模型具有重要意义。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使得训练计算机判别建筑风格、城市肌理等城市特征的准确率大幅提升。本研究立足于深度学习图像判别技术，探索 CNN 在城市感知方面的应用。

国际上已有不少运用图像判别模型分析城市问题的案例，但它们多数采用国外现有的城市图像数据集进行模型训练；而国内城市由于拥有独特的风貌，直接运用国外现成开源的带标签图像数据集将难以获得理想的准确度。另外，现有图像数据集所自带的标签类型有限，难以拓展其他判别类型的应用。因此，本研究试图自行收集数据、构建训练数据集，并搭建三个可适应国内应用场景的城市图像判别模型。应用场景包括城市风貌分析、城市问题侦测和城市肌理评估。以下案例包含了 2018 年小库科技在同济大学“数字未来”工作坊中与学员的部分共同成果。

案例一以建筑立面照片作为分析城市风貌的要素。在建立好判别模型后，研究人员在上海黄浦区外滩选取其中 6 个街区的建筑立面图像数据作为模型测试输入。分类结果为西方古典和现代幕墙立面两大类。最后将建筑风格的判断结果与地图结合进行可视化显示。结果显示建筑风格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地的发展历史吻合。据此可以假设上海

建筑立面能反映其发展历程。

城市问题的一个重要观测因素是商业活力指数。案例二考虑从街道层级的建筑立面图像数据来分析街道的商业活力或消极度。倘若将图像数据集的时间跨度拉长，就可以看到整体城市的活力变化和潜在的危机范围，帮助城市规划者聚焦城市的问题区域。

城市用地分类对于城市区域规划、地产建设、商用许可和基础设施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城市的用地分类反映在城市肌理上。对于缺乏足够的经济、技术基础来整合城市用地数据的城市或国家而言，通过建立卫星图或遥感图像判别模型来研究城市肌理将更为经济，从而为未来城市空间结构规划提供参考依据。据此，案例三以中国城市卫星图像为数据源训练判别模型，尝试对若干种城市肌理进行分类（高密度片区、中等密度片区、低密度片区、公共建筑、交通、旧城区）。

上述案例的测试（应用）结果均展现出不俗的准确率，预示着自定义图像识别模型在分析评估城市方面存在着较高可行性。训练好后的模型对新图像输入的判别时间在毫秒级别，体现出其相比传统的人力分析具有极高的效率优势。未来探索的关注点可能将集中在数据集类型的完善、提高判别准确率、判别模型与其他应用算法的结合等等。

机器学习能从海量数据中自主“学习”规律、模式的能力日趋完善，这需归功于硬件、数据和算法的支持。硬件上，GPU 等相关技术的发展使得训练大规模神经网络及运行大型算法的效率大幅提高。数据方面，在现今的大数据时代，城市相关的数据规模与日俱增，为机器学习提供充足的学习材料。在算法方面，深度学习能自主地从训练数据中构建由简至繁的概念体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对人为特征定义等的依赖。CNN 作为深度学习下最有效的计算机视觉技术之一，在城市图像数据分析方面具有巨大潜力，有望成为城市决策管理者在分析、侦测和评估方面的得力助手。

人本尺度的街道空间品质测度——结合街景数据和新分析技术的大规模、高精度评价框架

叶宇 张昭希 张啸虎 曾伟

摘要：本研究针对城市微更新的实际需求，结合街景数据和新分析技术提出了面向人本尺度的街道空间品质测度操作框架。研究以上海杨浦区和虹口区为案例，基于街景图像数据，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对街道空间要素进行提取，进而使用神经网络算法训练评价模型，构建大规模且精细度高的街道场所品质测度。与此同时，通过叠加 sDNA 的空间网络可达性分析结果，建立以“品质评价”与“可达性分析”为维度的评价矩阵，找出分析区域中“具有更新潜力的街道”，为城市微更新提供精细化技术支持。

关键词：空间品质；可达性；机器学习；人本视角；街景数据；街道

引文格式：叶宇，张昭希，张啸虎，等. 人本尺度的街道空间品质测度——结合街景数据和新分析技术的大规模、高精度评价框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1): 18-27. DOI: 10.22217/upi.2018.490.

伴随中国城市发展从高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的转变，推动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建设是我国整体建成环境步入人性化、精细化发展阶段的必然需求。在此背景下，提升人本尺度的空间品质也日渐成为当前实践关注的重点之一。但以往的空间品质评价受制于技术和数据的限制，大多局限于主观经验支撑下的小规模分析，难以高效、精准地满足日益提升的大规模街道空间品质评价需求。

人对街道空间品质的感知和人在街道中的行为活动是人与街道产生联系的两种主要方式。因此，本研究针对街道品质要素与街区路网组构特征这两个视角开展研究，运用新技术和新数据建立科学的操作框架，定量测度街道空间品质高低和街道的行为活动水平，这一兼具大规模和高精度的街道品质评价方法有望为精细化的城市设计管控提供支撑。

研究围绕上海市杨浦区和虹口区 20 个街道办的 4 000 多条街道展开。一方面基于街景图像(SVI)数据，运用机器学习算法提取街道空间要素，进而使用神经网络算法训练评价模型，构建大规模且精细度高的街道场所品质测度；另一方面运用 sDNA 分析街道网络组构特征，建立以“品质评价”和“可达性分析”为维度的评价矩阵。这一叠合分析可将街道段划分成四大类：可达性高/品质高；可达性低/品质高；可达性高/品质低；可达性低/品质低，从而对街道现状问题进行评估，解决城市微更新的需求，对街道环境的提升提供精准策略支撑。

在街道空间品质评价的具体操作上，我们基于经典城市设计理论的回顾选取了六个具有可操作

性的空间特征要素，包括街道绿化率、天空可见度、建筑界面、街道围合感、步行空间、道路机动化程度、多样性等。随后在杨浦区和虹口区所有路段上以平均 40 米的采样间距选取了 57 863 个采样点，共抓取了 11 万余张街景图片，运用 SegNet 算法实现对于大量街景图片中关键空间特征的提取和测度。与此同时，我们同步搜集了相对小样本的街景打分结果，用人工神经网络分析(ANN)训练评价模型，最终实现对于整个分析区域中街道空间品质的大规模、高精度、自动化评价。相关评价结果以《上海街道设计导则》中所提到的高品质街道段为参考进行了校核，发现机器计算出的街道品质高低与专家经验判断基本一致，从而验证了相关评价模型的有效性。品质评分高的街道较多集中在五角场街道、四平路街道、控江路街道和曲阳路街道。校园周边街道的整体品质评分较高，而黄浦江沿岸区域的环境品质普遍有待提升。在街道可达性评价的具体操作上，我们基于 sDNA 分析，依据普遍采用的 800 米步行出行半径计算，结果显示新江湾居住区、五角场商圈、上海音乐谷、同济大学校园以及部分新村具有较好的步行可达性。

后续的叠合分析中，以杨浦区与虹口区步行可达性的中位值为界，以全上海品质空间测度结果的中位值为界，对评价矩阵进行划分。结果如下：(1) 品质高可达性高：此类街道环境品质和步行可达性评分较高，具有较好的空间潜力。如杨浦区较多集中在五角场、国定路、政修路附近；新江湾体育场附近；同济大学，密云路附近；邯郸路、运光路附近等。虹口区较多集中在曲阳路、西宝兴路、四川

北路附近等。(2) 品质高可达性低：此类街道较多集中在老里弄住宅和老新村周边，如长白新村街道、延吉新村街道等。(3) 品质低可达性高：此类街道具有较好的步行可达性，日常被较多市民使用而品质不高，应在街道微更新和相关导控中集中关注，该类街道主要集中在新建区域（如新江湾城区域），新建区域与老住区的交接处等。(4) 品质低可达性低：这一类型也是在微更新中需要加以注意的一类街道，其在可达性和空间品质上均需要提高，较多集中在黄浦江沿岸的平凉路街道、定海路街道以及新江湾城街道西侧中。对比四种类型街道的空间特征均值，对杨浦区和虹口区街道来说，建筑界面和机动化程度大体一致，天空可见度、街道绿化率、多样性和步行道空间差别较大。在区域街道更新改

造中，可依据上述判定的优先级来逐次开展，通过提高街道绿化率、加强空间围合度、多样性提升空间品质。

以人为本一直是城市规划的核心关注所在，但过去由于技术和数据的限制，难以实现大规模分析范围与人本尺度分析精度共存。本研究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开放数据且高效、快捷的空间品质量化测度框架，兼顾大规模分析和精细化测度，并对各条街道进行空间品质测度和可视化展示，这是以往专家主观经验判断所难以实现的。本研究的突破性在于助推人本导向规划与城市设计实践落地的有力探索，可以高效、快速、科学地实现问题导向下的城市分析，助力于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分析的科学化。

基于 LBS 定位数据的建成环境对街道活力的影响及其时空特征研究

钮心毅 吴莞姝 李萌

摘要：以上海市南京西路为案例，使用移动互联网“位置服务”定位数据，以街道上人群轨迹点密度表示人群活动强度，生成了街道活力量化测度指标。随后选用空间滞后模型测算建成环境对街道活力影响的时间、空间特征，分别构建了五个分时段模型，测度功能混合、小街段、老建筑、密度、交通和场地设计 5 组 15 个建成环境指标对街道活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各个建成环境指标对街道活力影响时空特征各不相同。其中，影响南京西路街道活力最显著的指标是地铁站出入口和沿街商业业态多样性。在这两个因素之外，规划设计理论关注的外部空间设计、街段长度、人行道宽度、商业界面连续性等也具有较强的显著性。街道两侧建筑功能混合、老建筑占比等会促进街道活力的观点，在当前南京西路环境中并不成立。本研究可为存量规划背景下南京西路以及类似高密度建成环境的商业街道更新设计提供理论支持和优化方向。

关键词：街道设计；街道活力；建成环境；LBS 定位数据；空间滞后模型；南京西路

引文格式：钮心毅，吴莞姝，李萌. 基于 LBS 定位数据的建成环境对街道活力的影响及其时空特征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1): 28-37. DOI: 10.22217/upi.2018.495.

街道活力是规划设计理论与实践长期关注的议题。当前很多城市进入了以城市更新为主的存量规划阶段，在街道空间更新设计中更加重视营造街道活力。要落实促进街道活力的设计策略，就要明晰影响街道活力的因素及其作用机理。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出现，可以使用感知人群活动的新数据源进行较长时间维度或大范围、精细化地观测街道活力，观测多个尺度下，相当数量的使用者在街道连续时空中的行为，这为更

好地量化分析建成环境对街道活力影响提供了可能。基于位置服务（LBS: Location Based Service）定位数据在空间定位精度上的优势，更适合量化测算街道空间内的步行、停放等活动，更能直接反映活力。本研究使用 TalkingData 用户匿名地理位置数据，该数据同时记录了时间和空间位置信息，空间定位为 GPS 精度。

在日常生活中，街道空间内的停留或缓慢步行的人群使用手机进行阅读、社交、导航、购物等移

动互联网服务，已成为相当普遍的行为。因此，该数据可在精细尺度下反映居民在街道上的停驻和步行情况。

本研究以上海市南京西路为案例，选取2017年3月出现在南京西路中段内所有轨迹点，合计163051个用户在街道上留下了387810个时空轨迹点。以街道上人群轨迹点密度表示人群活动强度，生成了街道活力量化测度指标：活动强度和稳定性。将南京西路划分为38个街段空间单元，使用空间滞后模型（SLM: Spatial Lag Model）进行回归分析，分5个时间段：全天（0—23点）、早上（7—9点）、白天（10—16点）、傍晚（17—19点）和晚上（20—22点），将居民活动强度作为因变量，将功能混合程度、小街段占比、老建筑占比、建筑密度、交通和场地设计共5组、15个建成环境指标作为自变量，构建5个分时段的模型进行计算。

计算结果显示，5个模型R²均较高，表明空间滞后模型拟合程度较好，可以揭示建成环境与街道活力的相关性。5个模型的空间权重矩阵系数为负且显著性较高，在空间区位和功能相似的情况下，建成环境较好的街段单元具有更高的街道活力。从总体空间特征来看，建成环境要素对街道活力有显著影响作用。

对5组15个指标进行比较，南京西路的建成环境对街道活力影响的主导因素是沿街商业业态

多样性、沿街商业面积率、地铁出入口、外部活动空间面积率、街段长度、人行道宽度。上述指标在5个模型中均与街道活力显著相关，其中前4个是显著正相关，后2个是显著负相关。在5个模型中，地铁站出入口、沿街商业业态多样性两个指标的相关系数均最大。在时间维度上，沿街商业业态多样性、沿街商业面积率、地铁出入口、外部活动空间面积率、街段长度、人行道宽度等指标都出现了相同规律，在早上、晚上的相关性相对较低，白天和傍晚的相关性较高。其中，地铁站出入口、沿街商业业态多样性两个指标更具有明显的时间特征。

此外，研究发现基于西方城市观察得到的街道两侧建筑功能混合程度、老建筑占比等会促进街道活力的观点，在当前的南京西路并不成立。规划设计理论中一些关于街道活力的传统观点并不是普适成立的。

基于建成环境对街道活力影响的时空特征分析，本文提出了促进南京西路街道活力的设计策略。首先，提升沿街商业业态的多样性及街道活力比增加沿街商业面积更加有效；其次，重视地铁站出入口空间衔接设计可提升街道活力；其次，对于高强度开发的中心城区，增强街道活力未必要从提高周边街区建筑功能混合或提高开发强度等方面入手；最后，外部空间设计是维持全时段持续街道活力的有效措施。

疗愈导向的街道设计：基于VR实验的探索

徐磊青 孟若希 黄舒晴 陈箜

摘要：本文以两个VR实验对城市环境的疗愈性进行了研究。第一个VR实验采用沉浸感极好的虚幻4建模，虚拟了道路和绿地两种不同的城市环境。皮电数据表明绿地比道路景观有更好的疗愈性。第二个实验以绿视率和街道界面的不同水平建构了街道模型，以HTC的头盔展示虚拟环境。实验结果表明绿视率和街道界面都对街道的疗愈性有显著影响。论文最后总结了绿视率和街道界面对街道疗愈的影响，并以城市更新为背景，论述了疗愈性街道的设计策略。

关键词：城市更新；健康街道；疗愈环境；恢复性环境；VR；绿视率；街道界面

引文格式：徐磊青，孟若希，黄舒晴，等. 疗愈导向的街道设计：基于VR实验的探索[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1): 38-45. DOI: 10.22217/upi.2018.496.

三维空间网络分析在高密度城市中心区步行系统中的应用——以香港中环地区为例

张灵珠 晴安蓝

摘要：本文结合地理信息系统与空间设计网络分析软件，以香港中环地区的多层次步行体系为例，分析三维建成环境的空间网络，测度高密度多层次建成环境空间和人的活动分布之间的关系。对室外步行网络模型与室内+室外步行网络模型比较表明，完整的室内外三维模型不仅有助于提升空间网络分析的可视化，其分析得到的穿行度指标与城市空间活力之间的关系也更加精确，有助于城市设计师解码人本尺度的空间认知与行为。

关键词：三维建成环境；空间设计网络分析；人本尺度；高密度；步行网络；城市设计；香港

引文格式：张灵珠，晴安蓝. 三维空间网络分析在密度城市中心区步行系统中的应用——以香港中环地区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1): 46-53. DOI: 10.22217/upi.2018.513.

香港作为集极端地形和气候、特殊体制和发展历史以及城市创新为一体的独特城市，其城市开发高度聚集于维港两岸的都会区及沿轨道和公路网络发展的多个新市镇。另外，与大多数大城市地铁线网的较大环形+放射支线的形态相比，香港的地铁网络布局亦十分独特，其支线是主要的组成部分，而几乎所有的支线都汇合到中环—香港站、金钟站、尖沙咀—九龙站等少数“核心站点”。毫无疑问，香港是一个拥挤的城市。分析香港如何应对空间局限性，了解其极端布局与拥挤的关系，将为高密度城市的空间发展布局与经济活动提供一定的启示，符合城市设计导控“以人为本”的转型需求。

新数据环境和各种新技术方法为精细尺度下的城市形态测度提供了可能，近年来，奥克兰、墨尔本、上海、香港等城市开始绘制城市中心区的步行系统，步行网络的重要性逐步体现。鉴于香港独特的城市形态，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利用三维步行网络连接高密度建成环境，绘制了详细的室外和室内步行网络，其中室外步行网络覆盖了大部分建成区。

针对中环—香港站地区地下、地面和空中相联系、公共与私有相结合的多层次复杂步行系统，绘制地铁站各出入口 800 m 范围内所有与地下通道，

或通过二层步行系统相连的建筑物内公共步行路径，合并到室外步行网络上，形成完整的室内+室外三维步行网络模型。

研究结合 ArcGIS 平台和三维视角的空间设计网络分析软件 sDNA+, 引入新的测算方法——复合距离 (hybrid distance) 度量法，比较了道路中心线模型、室外步行模型，以及室内+室外三维步行网络模型的活动潜力分布。结果表明，传统的道路中心线或室外步行网络模型对于分析高度层叠化区域的步行潜力是不足够的。二维的室外详细步行网络显现了中环地区步行体系中的第一层级，即地面层；室内外三维步行网络可同时反映中环步行体系的第一与第二层级，即地面街道与步行天桥两个体系，体现了在复杂的三维步行空间环境中建立完整室内外模型的重要性。

研究一方面提供了三维空间网络分析的新方法，提升了空间分析的可视化；另一方面，有了完整的室内+室外三维步行网络模型，对其分析得到的穿行度指标与城市空间活力之间的关系也更加精确，有助于城市设计师解读建筑与城市空间中的认知行为；此外，“角度一米制”复合的全新度量方式，为空间结构关系的度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动态的空间句法——面向高频城市的组构分析框架

沈尧

摘要：当今的数字社会发展促使我们开始关注更加高频的城市现象，并可以寻找这些现象的空间逻辑以提高未来规划设计的动态效应。空间句法是城市设计过程中一种对于城市空间结构的认知方法，在过去 20 年

被广泛应用于西方城市设计的研究与实践，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作为一种经典的描述性模型，传统的空间句法模型很难应对规划设计实践中面临的动态性社会问题。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在新的数据条件下研究城市空间组构动态效应的方法框架。通过将轨迹数据与传统组构分析的方法框架相结合，提出新的组构中心性概念——时空共现强度，并介绍了相关的指标来量化人们时空行为在不同时段的几何属性及其模式，以探索动态的城市组构分析理论与方法。本文所提出的动态的空间句法框架暗示着从一种静态的、只关注物理空间的城市组构研究向一种动态的、更关注人的行为空间的城市组构研究转变的趋势，揭示了充分利用当前数据环境并将城市设计作为一种动态城市空间功能性提升的有效手段在未来城市设计中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时空动态；空间句法；行动轨迹；共现强度；机动性；高频城市

引文格式：沈尧. 动态的空间句法——面向高频城市的组构分析框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1): 54-63. DOI: 10.22217/upi.2018.511.

随着信息通信以及数字技术的发展，我们赖以生活的城市以及其承载的内容正在越发高速地运转和传递，社会生活的内容和频率随之丰富和提高，我们观察城市活动的方式也因此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在新的数据环境下，各种大规模、高精度的时空数据不断涌现，我们分析和解读城市建成环境的视角也在重构：从一种整体性的低频视角转向一种饱含丰富异质性信息的高频视角。事实上，所谓的高频视角不仅是一种新视角，更是一种更真实的视角，一种更接近人日常生活频率的视角，可以从一分、一秒推至一日、一周、一月等较大周期。我们传统的审视城市的视角则通常是一种低频视角，通常是一年、十年甚至若干世纪等长周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理解高频城市背景下的城市运行机制才是以人为本地理解真实城市的一种基本视角，它作为现实城市的一种“数字孪生”的镜像，将充分补足我们传统的基于低频城市的认识。

城市组构研究（configurational research）的发展构建了一系列认识、度量与分析城市建成空间形态的理论与技术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空间句法研究——已经成为新城市科学的重要部分。空间句法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空间组构即为现实社会的“物质”镜像，其催生同时限制着各种社会经济联系的形成与重塑。支持这一论断的一项重要实证基础是存在于空间中心性与整体人流极差分布之间的稳健关系。在现实中人们不断通过感知可见的人流的分布来解读物质空间的中心性，进而在其影响下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各项选择，并最终影响

了涌现的整体趋势。因此，空间句法通常能够快速地在低频城市背景下的物质空间结构与社会经济表现的整体布局之间的关系，进而指导相关空间干预策略的调整。

由于缺乏有效的测度手段和理论支持，传统的空间句法对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变化之中所暗含的空间逻辑的测度一直受到很大限制。

首先，时空大数据中饱含的关于人流的时空动态信息正在挑战传统空间句法对人流分布描述的实证价值。时空大数据使得我们可以细致描绘人们的行为，从而直观地获得关于城市人流的分布信息，似乎运用传统空间句法这一描述性模型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正在被挑战。

其次，精细化的时空数据中所蕴含的行为时空差异在传统空间句法中被过度简化，且缺乏必要的与之相关的理论构建。时空数据能够准确揭示人们行为的动态变化，然而在传统空间句法理论中，城市组构一般被认为是影响总体（aggregated）人流形态极差形态的关键，而对于它是如何影响自然人流的瞬时变化的，以及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稳健的相关性却缺乏有效的研究。

再次，时空数据中包含的与行为主体相关的异质化信息在以“自然人”为理论前提的空间句法理论与方法论中暂时缺位。传统空间句法模型关注的是人们的群体行为而非个体行为，或者说，它关注的是人们的聚集效应而非个体分异。没能阐释和度量城市组构对于不同类型公共空间使用者的效用，以反映更深层的城市形态的社会价值。因此，新的

数据环境虽然带来了从高频角度认识现实城市的契机并明确地表征了未来城市设计的人本需求，然而我们赖以分析城市形态的理论与手段，包括空间句法理论与方法论，似乎还在遵循一种低频的角度。如何借鉴已有的空间句法理论与方法框架，回应这些在新数据条件下传统描述性组构分析所面临的困境，使其具备更加广阔的、面向高频城市的应用前景，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建成环境中的面对面的共现现象与人们的出行密切相关，而后者则受到联系距离衰减效应以及空间引力的影响。这不仅与交通地理学的许多研究契合，也与上文所述的空间句法的论点一致。在空间句法理论中，城市组构的拓扑距离衰减效应被组构的近邻性所反映，空间引力则体现在受到城市组构影响的城市的功能布局形态中。此外，时间维度也是现实环境中共现现象的重要前提，它反映了共现的强度与持续时间。因此，可以将物理环境中的时空共现现象的决定因素总结为三方面：空间的组构距离、时间距离与行为主体的社会距离。本文将充分整合这三种距离，并基于涌现的时空轨迹数据与城市形态数据测度城市组构的动态中心性结构。

较之传统的空间句法模型，本文提出的时空空间潜力模型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它关注的不仅是空间组构，还包括其影响下的行为组构，具有明显的时空动态特征。其次，传统空间句法关注的是城市演进过程中的稳态，而本文提出的模型能够妥善兼顾二者的关系，即在动态中发现稳态，同时发现稳态涌现的条件和复杂性。在数据支持方面，时空共现潜力模型结合了空间网络与时空行为数据，并提出了以对社会互动潜力的测度代替纯粹空间网络中心性指标来表征组构动态效应的途径。此外，时空共现模型的相关结果表明其分布不仅受空间组构的影响，也受功能布局等因素布局的影响。而在方法论方面，传统空间句法模型主要是描述性预

测，而本文提出的模型可以充分利用当前迅速发展的数据挖掘与空间分析手段。最后，传统空间句法模型是基于较低频的城市视角，本文提出的方法则是面向高频城市并可以通过对高频组构效应的稳态发掘来补充传统低频视角的不足。

本文提出的方法提供了一种方式来指导高频城市背景下的形态规划设计。它具备空间句法研究的优势，一方面它是基于矢量的空间模型，不受可变研究单元问题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对于局部的形态变化非常敏感，使其在充分表征数据分析结果精确性的同时，保留规划师对于空间干预的主动权。

假设本文所提的方法可作为支持高频城市设计的一种途径，那么在构建这样一种方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窥见高频城市设计较之传统城市设计的一些特点，厘清这些特点将有助于我们未来规划具有兼顾动态效应的城市形态。

首先，高频城市设计需要支持新的、高频的城市要素。在空间句法的出行经济模型中，高频人流轨迹同时受到较低频的空间形态与较高频的功能布局的影响，这意味着城市功能布局，或者说活动的形态设计，以及其与城市形态的关系是支持高频城市效能的一个重要部分。其次，在高频城市中涌现的动态的城市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界定，特别是不同社会现象的变异性（variability）与规律性（regularity），以帮助建立评价高频城市设计效用的可能途径。此外，面向高频城市的规划设计绝不是对于传统城市设计的批判和抛弃，相反，高频城市设计事实上应是多频视角协同，因此需要更加妥善地处理超短期的、高频规划目标与长期规划目标之间的关系，以及后者是如何在前者当中涌现的。因此，通往高频城市设计需要在规划设计中寻找可以操作的高频城市要素，更加明确与之相关的动态城市问题，并确定超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之间的关系。

城市增长边界能有效控制城市蔓延吗？理论解释与实证分析

赖世刚 汪礼国

摘要：城市增长边界对于规范城市发展的效果并无定论。本文基于财产权的观点，从理论和概念两方面解释为什么城市增长边界会导致而非抑制城市蔓延。研究以台北市信义区为案例，进一步解释城市增长边界

的政策效率。根据航测地形图及指标计算进行定量比较分析,结果显示,不同于我们的预测,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信义区在两次规划时期(1945—1991年)内的城市扩张发生在城市增长边界之外。但我们仍认为一个成功的土地控制手段应该考虑开发商的行为和反应,以控制城市蔓延。

关键词: 城市增长边界; 财产权; 城市蔓延

引文格式: 赖世刚, 汪礼国. 城市增长边界能有效控制城市蔓延吗? 理论解释与实证分析[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1): 64-70. DOI: 10.22217/upi.2017.570.

本文首先从理论出发,以财产经济学方法解释城市的发展为什么是蔓延的;并以台北市为例,研究城市规划到底是限制了城市的发展,还是促成了城市的蔓延。

城市发展用地的变化跟城市总体规划之间的关联性是什么?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少,所以我们不太了解到底城市总体规划对城市建设用地的变化产生什么样的作用。研究的目的是想从概念分析的角度,从实证的角度探讨 UGBs 政策到底对城市范围的界定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土地开发是城市形成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每栋房子都是开发的成果,土地开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包括建筑、土木、中介、法律……非常复杂的过程。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有两项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是资讯,另外一个就是财产权。财产权分成所谓的法定财产权和经济财产权。打个比方,比如我的一辆自行车被小偷偷走了,那么自行车的法定财产权是属于我的,但是经济财产权此时属于小偷。所以经济财产权是指消费、使用所获资产的收入的权利。

根据以上对财产权的分析,任何经济上的交易,财产权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划分清楚的。任何的产品都不可能完全了解透彻之后再定价和交易,因此任何交易都包含不确定性。土地也是一样,土地特性非常复杂,因此在交易过程中,会因为资讯的不完全性,即对于所交易的资产特性不够了解,造成额外的交易成本。所以,有些资产就会流入公共领域,其不属于买卖任何一方,而买卖双方交易过程中会争夺这部分财产权。

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是一个假想的土地的市场,横轴代表土地数量,纵轴代表价格,有供给线 S 和需求线 D (图 1)。在均衡的情况下,当我们设定一个 UCB 政策的时候,就好比是在纵轴

上设立一条限制线,使得成交量为 Q_c , 成交价格为 P_c ,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土地供应者,其愿意支付的较低价 P_1 与实际支付的较高价 P_c 之间的差异,就是交易中的财产权的流失在公共领域的部分(地主赚到了这一份)。开发商如果从另外的地方,比如郊区,寻找成本更低的土地进行交易,就能少损失这部分。所以,从这个简单的图可以推测,UGBs 设置了垂直线的限制以后,开发商为了争夺 P_c 到 P_1 之间的财产权差距,会放弃 UGBs 内的开发机会,而去寻求 UGBs 之外,土地成本较低的开发机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UGBs 的设置反而会造成都市的蔓延,这是我们的一个推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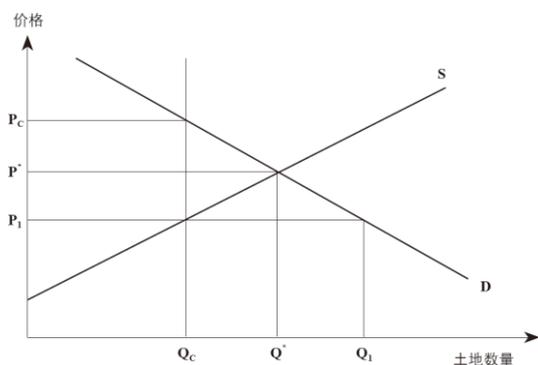


图 1 UGBs 控制下的土地供需影响图

文章接下来以台北市信义区为例作了一个验证,研究 1956—1991 这 35 年间规划政策对城市扩张的影响。将这一发展时期划分为两个阶段,比对 UGBs 界线内外土地开发的差异。实证研究的结论是 UGBs 这种管制方式在台北市仍是有效的,至少对于信义区 1956—1991 年间而言,城市增长仍在可控制范围内。然而,由于数据获取有限,许多问题仍有待讨论。实际开发行为与主要计划管制的内容息息相关,如 UGBs 内的土地混合使用程度、UGBs 外的管制法令等等,皆会造成开发者财产权处理行为与反应的差异,因此后续可针对此部分进行研究。

历史环境的情感意义与历史城市的保护

王洋 于立

摘要：当代历史城市保护的研究与实践对历史环境的情感意义缺乏关注。文章通过回顾地方依恋研究中有关人与历史环境的情感连结的研究，就环境的历史属性在地方认同和文化归属方面对于人们的情感意义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以此为基础讨论历史城市保护在回应这一情感意义方面可以获得的启示，包括提升公共参与，挑战保护范式，实现保护的经济价值和管理历史城市景观的变化四个方面；同时讨论了人—地情感与中国城市保护实践相结合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以及愿景。

关键词：历史环境；情感；地方依恋；历史城市保护

引文格式：王洋, 于立. 历史环境的情感意义与历史城市的保护[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1): 71-75. DOI: 10.22217/upi.2016.411.

美国地方郡县城乡用地分类体系的发展特征及其经验启示

杨欢 何青松

摘要：在城乡统筹的背景下，构建覆盖城乡全域的用地分类体系对统筹城乡空间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在梳理美国城乡用地分类体系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以北卡罗来纳州德罕姆县和奥兰治县为例，分析美国地方郡县城乡用地分类体系的构成特征及主要做法，最终挖掘其对我国的启示意义，引导我国城乡空间统筹健康发展。

关键词：美国；地方郡县；用地分类体系；发展特征；经验

引文格式：杨欢, 何青松. 美国地方郡县城乡用地分类体系的发展特征及其经验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1): 76-81. DOI: 10.22217/upi.2016.545.

早在 1920 年，哈兰德·巴塞洛缪（Harland Bartholomew）就试图构建美国城市土地分类系统。1959 年，加顿伯格发表《多维土地利用分类体系》一文，尝试从可见维度（如场地开发特征、建筑类型、活动类型）和潜藏维度（如经济功能、活动特征）两方面识别不同土地利用维度的分类体系。1965 年美国联邦公路管理局和住房部公布《土地利用编码手册》，从所有权类型、住宅用途的结构类型和农作物类型三个维度对土地利用进行分类。2000 年美国规划协会公布第一版《土地分类标准》（LBCS: Land-based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从活动、功能、结构一类型、场地开发特征和所有权五个维度对土地利用进行分类，该分类标准满足区域发展、大都市规划、地方州市、郡县政府等不同空间尺度的使用需求。

为协调资源环境和地区发展之间的矛盾，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德汉姆郡制定了覆盖郡域的综合规

划，将城乡空间分为乡村发展层、郊区发展层、城市发展层、紧凑邻里发展层及中心发展层等五大政策层；娱乐及开敞空间、农业用地、居住用地、商业用地、办公用地、机构用地、科研及科研附属用地、工业用地和设计区域等九大用地分类。德罕姆郡对城乡空间发展采用“空间政策分区+用地功能划分”的管控模式，将分区政策与土地利用类型及区划开发类型衔接起来，确保政策的空间引导和落实。

奥兰治郡根据土地/坡度、水文、植物和动物、人口密度等因子将城乡空间分为已发展地区、过渡地区、社区地区、乡村地区以及保护地区等五个基本类型。其中过渡地区分为 10 年过渡地区、20 年过渡地区和商业性活动过渡地区等五大类；乡村地区分为乡村缓冲区和乡村居住区等七大类。奥兰治郡高度重视城乡过渡地带及城乡用地动态发展，充分考虑用地混合利用及空间功能的动态转变，对过

过渡地区及乡村地区用地类型进行精确划定，引导居住、商业、农业等活动的有序开展。

美国地方郡县在城乡用地类型划分体系呈现出“分区政策限定管控、统筹城乡用地分类、土地动态弹性发展”等特征。从实践案例来看，德罕姆郡和奥兰治郡均采用了“分区政策限定+用地类型控制”的空间管控体系，首先对空间进行功能分区，之后在明确分区限定政策的基础上，确定分区可允许的用地类型及开发密度指标。在城乡空间政策分区和用地类型管控时，高度重视城乡过渡地带及乡村地区土地使用情况，同时对乡村地区的复杂性进行了深入考虑，对其内部居住、工业、必要商业、开敞空间等进行统筹规划，真正实现了覆盖城乡的用地分类体系。美国城乡用地分类体系具有刚性限制边界和弹性选择的双重特征，高度重视快速变化地区，如奥兰治划定 10 年过渡地区及商业性活动

过渡地区等。同时积极倡导混合用地策略，为土地开发提供了弹性选择机会。

为推进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应弱化我国城乡用地分类的二元特征，加快建立城乡全域用地分类体系，为城乡空间统筹发展提供统一基准。逐步改变我国城乡规划的计划性特征，增强对城乡动态用地的关注，尤其是城乡结合部及乡村缓冲区等快速变化地区。同时重视用地结构重组及空间功能转变等动态变化，有效引导城乡空间优化重组。此外借鉴美国地方郡县的实践经验，我国可提高城乡管控政策的法律效力，采用“分区政策限定、用地功能引导、开发建设控制”多层连续管制体系，推动管控政策的空间化发展。此外应加快城乡空间数据库的建设，解除城乡空间统计的行政枷锁，为城乡空间发展提供统一基准。

城市建成环境对慢性病影响的实证研究进展与启示

张延吉

摘要：在慢性疾病已成为严峻社会问题的当下，建设健康城市为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学科的再合作提供了契机，而厘清城市建成环境对慢性病的影响则是科学规划的前提。大量既有的西方文献表明，城市规划完全有能力通过各类环境要素的优化，达到增加体力活动、促进合理膳食、抑制慢性疾病，以及提升健康水平的政策目标。本文重点围绕量化城市建成环境、建构影响路径框架、克服自选择机制等问题进行评述，为我国开展该领域的实证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健康城市；体力活动；建成环境；慢性病；自选择

引文格式：张延吉. 城市建成环境对慢性病影响的实证研究进展与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1): 82-88. DOI: 10.22217/upi.2016.502.

城市建设强度分区管控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薄力之

摘要：早在 19 世纪末，国际上就有城市开展了强度分区的相关实践，并积累了经验。其中，纽约、东京、新加坡、香港四个城市的建设强度分区管控方法既具有共性又各具特点，适应了当时当地的气候条件、土地所有制、管控习惯以及法律体系；同时随着社会、经济背景的变化，历经若干修正调整而逐步趋于稳定。虽然它们的方法各异，很难直接引入，但是从外部环境、价值导向、具体手段三个方面的结合而言，对国内城市开展强度分区工作会有一定启示。

关键词：建设强度管控；强度分区；容积率；特别意图区；修正规则；地块指标

引文格式：薄力之. 城市建设强度分区管控的国际经验及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1): 89-98. DOI: 10.22217/upi.2016.519.

以容积率为核心指标的建设强度管控是城市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 在高速城市化时期往往成为矛盾频发的难点。早在 19 世纪末, 国际上就有城市开展了强度分区的相关实践, 并积累了经验。其中, 纽约、东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四个城市的建设强度分区管控方法既具有共性又各具特点, 适应了当时当地的气候条件、土地所有制、管控习惯以及法律体系; 同时随着社会、经济背景的变化, 历经若干修正调整而逐步趋于稳定。虽然它们的方法各异, 很难直接引入, 但是从外部环境、价值导向、具体手段三个方面的结合而言, 对国内城市开展强度分区工作会有一定启示。

纽约区划对于建设强度的基准分区与土地用途分区一致, 即不同用途的用地要对应不同的建设强度。土地用途首先分为三大类, 分别是居住、商业和工业。考虑到开发强度等特别控制要求, 再细分为小类, 比如, 居住用途分为 10 种、商业用途分为 8 种、工业用途分为 3 种, 其中有些小类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进一步变化。以居住用地为例, 根据密度的不同, 分为 R1—R10, 以针对性地控制从郊区拥有大草坪的独栋住宅, 到曼哈顿的高层公寓等各类居住用地。在基准强度分区的基础上, 纽约采用了容积率奖励、开发权转移等弹性措施, 对特别意图区的开发强度进行特别控制和引导, 以实施历史保护、城市设计和其他规划意图。

与纽约类似, 东京的强度分区与土地用途分类也是基本对应的。东京《都市计划法》将城市化促进地域划定为 12 种用地类型, 规定每种用地类型的容积率和建筑密度。为了促进城市更新, 部分区域(都市再生特别区)以合理有效地利用土地为目的, 可以采用不受现有容积率、高度等规定限制的, 拥有较高自由度的新型城市规划制度。

新加坡的住宅开发强度是通过人口密度、每公顷的居住人数来计算的, 容积率等于人口密度乘以系数。“开发指导规划”规定住宅发展所允许的毛容积率, 基准强度共分为 6 级。此外, 城市中心地区的商业、办公和旅馆建筑的容积率还受其他因素影响, 可以采取“基准加奖励”的方式。奖励容积率与基地规模和至 MRT 站点距离相关。

香港将开发强度控制与用地分类相挂钩, 住宅用地包括甲、乙、丙、丁、戊和乡村式开发六类。同时在都会区、新市镇、乡郊地区等三个区域进一步划分密度管制分区, 不同分区都有各自的上限规定。容积率指标不是由全市层面的建筑量分配得出, 而是采用可接受强度法, 以轨道交通承载力水平为主要依据, 综合考虑区位条件、环境限制、公共设施、居民承受力等因素得出。

从纽约、东京、新加坡、香港这四个案例城市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出, 强度分区是城市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经多年演进已经较为成熟。与之相比, 国内城市的强度分区仍在探索之中(如深圳、上海、武汉等), 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 也暴露出了较多问题; 目前仍修编频繁, 远未达到稳定状态。国际经验的比较有利于为国内城市提供借鉴。首先, 强度管控必须符合当时当地的独特环境, 例如适合甲地某一历史时期的政策、方法, 未必就能够适应乙地的另一个历史阶段; 其次, 基于城市发展的总体思路, 会有不同的价值导向, 不同价值导向细化为不同的目标体系, 又进一步体现为不同的政策手段; 最后, 分区管控的方法、手段包含多个组成部分, 其中部分手段已经在国内有所实践, 一些新的手段在经过尝试后也可以引入, 多种手段相互组合, 发挥出更显著的功效。

境外高速铁路经济、空间影响研究进展综述

龙茂乾 孟晓晨 李贵才

摘要：自 1964 年日本新干线开通以来, 特别是欧洲法、意、德、西、英等国陆续建设高速铁路以后, 国外

学者们对高速铁路的经济和空间影响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成果。本文梳理国外主要的高速铁路经济、空间影响研究,评析了研究内容、方法和视角,归纳了主要结论,最后提出国外高铁经济、空间研究对未来我国高铁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 高速铁路; 经济效应; 空间效应; 文献综述

引文格式: 龙茂乾, 孟晓晨, 李贵才. 国外高速铁路经济、空间影响研究进展综述[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1): 99-107. DOI: 10.22217/upi.2016.547.

自 1964 年日本新干线开通以来,高速铁路开启了世界铁路史上的一场革命。在新干线的刺激下,欧洲各国陆续建成高速铁路,中国后来居上。可以说,高速铁路建设是我国近年来经济社会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2017 年,我国高铁以占全国铁路营业里程 19.8% 的份额,承担了全国 56.8% 的铁路客运量。高铁带来前所未有的时空压缩,正深刻影响着我国社会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

1990 年代以来,国外关于高铁对城市与区域经济、空间影响的研究不断深化,研究范式不断丰富,呈现多地区、多视角、多层次、理论与实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体系。本文梳理近年来国外高速铁路经济、空间影响的相关研究,总结研究视角、方法和主要结论,并为国内高铁经济、空间研究提供参考。

经济效应方面,梳理了高铁对人口、区域经济、产业发展和客运市场四方面的影响。高铁对人口增长的影响较为复杂,相关研究较少。学者们越来越接受这样一种观点:高铁建设只是区域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不是充分条件,高铁不一定带来区域和城市的经济增长。同时,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开通高铁的区域比未开通高铁的区域经济表现更好。高铁对航空影响较大,在 1~3 小时的旅行时间范围内,高铁显现出较明显的竞争优势。

空间效应方面,结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尺度。欧洲尺度上,高铁网络建设使得原来居于主导地位的大城市变得更易到达,而原来处于欧洲大陆

边缘的地区距离中心也比以往更近,但总体上并没有改善欧洲空间不均衡的局面,甚至会变得更加极化。

在国家和区域尺度上,学者们倾向于认为开通高铁会使国家或区域内更加极化,但也有研究表明未来会变得相对均衡。高铁为不同位置的城市带来不同的机遇与挑战。中间城市、大都市区核心城市与大都市区的郊区城市这三类城市被较多关注,案例和实证分析较丰富。在城市内部尺度上,高铁一般被视为城市发展或再开发的催化剂,但高铁站的影响范围是有限的。高铁站能否发挥预期的作用,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区位、本地交通的接驳、旅客联运能力及当地的政治经济环境等。

近年来,随着研究条件的成熟,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独立或与国外学者合作研究中国高铁的经济、空间影响,但国内相关研究仍相对欠缺。未来,我国高速铁路的经济、空间影响研究需要从理论体系构建、案例分析、内容深化等方面进一步加强,需要引入新方法、新视角和新手段,并通过多学科交叉深入判别高速铁路的实际效应。

本研究提出三方面的建议:一是探究高速铁路在全国、区域和城市等不同尺度上空间影响的特征、规律和机理;二是选择典型线路、城市、区域对高铁经济、产业、人口效应进行谨慎研究;三是从理论角度,研究高铁对区域与城市发展、产业转移与升级、区域分工与合作、家庭及企业区位迁移、土地利用等方面的影响。

步行优先指导下的英国城市中心区发展

葛天阳 后文君 阳建强

摘要: 分析了英国多个城市中心区的空间演变及现状,发现其充分体现了步行优先的指导思想。第一,城市中心区内过去的主要车行道路如今多已演化成为步行道。第二,城市中心区内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规模

较大的地面步行体系。第三，城市中心区形成了基于步行尺度的人车分流交通结构。第四，在道路细节设计中优先考虑步行。第五，在建筑设计中优先考虑中心区整体步行体系。第六，建设丰富详细的步行信息基础设施。相比之下，在我国，步行优先的理念尚未得到重视，以步行优先为理念的城市中心区建设也显不足。城市建设重点向存量优化的转型是我国城市中心区实践步行优先建设理念的契机。

关键词：步行优先；城市中心区；英国；城市更新；道路设计

引文格式：葛天阳，后文君，阳建强. 步行优先指导下的英国城市中心区发展[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1): 108-118. DOI: 10.22217/upi.2016.382.

我国城市已经由快速发展阶段进入品质提升阶段。步行优先的理念对城市中心区的品质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对英国多个城市中心区的更新历程和现状特征进行研究，可以发现，步行优先理念贯穿了其城市中心区的更新历程，体现在各个方面。

在整体结构方面，英国城市中心区发展之初，多呈十字路网结构，城市中心位于主要道路相交处。然而，这一结构在步行优先理念的推动下，已产生明显变化。第一，城市中心区内，车行交通让位于步行，主要道路逐渐步行化。在步行优先思想的指导下，英国城市中心区内的主要车行道路大多演化成步行道路和以步行为主的限行道。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中心区，原车行道的道路空间并没有消失或被建筑侵占，而是仍然连续存在，仅仅是被人为地界定为步行道路，并加以步行化改造。第二，步行街持续增多，逐步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心区地面步行体系。城市中心区的步行街逐步增长，目前，英国城市中心区的步行体系具有规模大、体系化、地面为主的特点。第三，以步行区为核心的中心区人车分流结构逐步形成。在中心区的核心地段，步行道和限行道逐年增长，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成体系

的步行体系；在中心区外围，形成了全围合或半围合的交通环路，将过境交通疏散到核心地段以外；在中心区核心地段的步行区与外围的交通环之间，是由城市支路构成的过渡区，它具有一定的抗干扰和人车转换功能。

在细部设计方面，英国城市中心区步行优先的理念也体现得十分明显。第一，道路细节设计优先考虑步行。优先保证地面步行通道的面积，而非为了车行通畅而牺牲步行面积。减小车行道宽度，设置行人过街等待区域，而非减小步行道宽度，增加汽车过街等待区域。通过减小转弯半径等手段，减慢汽车速度，保证行人安全。第二，建筑设计中优先考虑中心区整体步行体系。建筑设计把完善中心区步行体系作为重点考虑内容，进行室内外一体的步行体系设计，而不局限于建筑单体范围之内。第三，丰富详细的步行信息基础设施。如建设城市步行信息中心、发放免费的中心区步行地图，街头地图等配套设施。

中英两国城市中心区在功能、区位、历史及交通问题等方面具有许多相似之处。英国城市中心区的更新建设实践充分体现了步行优先的理念，对我国城市中心区的更新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日本福祉型避难场所建设对我国老龄化背景下避难场所规划建设启示

李文静 翟国方 顾福妹 陈泽武

摘要：针对我国在避难场所规划过程中对避难弱者的避难需求考虑不足的问题，以日本福祉型避难场所为例，梳理其规划流程，总结其建设、启用与管理的经验。在日本避难场所体系中，福祉型避难场所独立设置，从老年人等避难弱者的需求出发进行规划，其相关建设标准和配套设施等更为完备，并且注重日常维护与管理。本文旨在结合我国避难场所发展现状和老龄化不断加剧的社会背景，通过借鉴日本福祉型避难场所建设经验，为我国避难场所规划建设提供一些启示。

关键词：福祉型避难场所；老龄化；避难场所规划；防灾；日本

引文格式：李文静，翟国方，顾福妹，等. 日本福祉型避难场所建设对我国老龄化背景下避难场所规划建设的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1): 119-126. DOI: 10.22217/upi.2017.138.

健康影响评估导向下的城市总体规划：以美国洪堡县总体规划为例

吴怡沁 田莉

摘要：健康影响评估作为改善公共健康的工具，近年来在许多欧美国家被纳入各个领域，包括城乡规划领域，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经验。文章首先介绍了健康影响评估工具的起源和发展及其实施程序，其次详细介绍了美国洪堡县总体规划中健康影响评估的具体实施过程和结果，最后就我国城乡规划领域如何引入健康影响评估工具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健康影响评估；城乡规划；公共健康；总体规划；健康影响因子

引文格式：吴怡沁，田莉. 健康影响评估导向下的城市总体规划：以美国洪堡县总体规划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1): 127-133. DOI: 10.22217/upi.2017.066.

近年来，公共健康和城乡规划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日益受到关注，在规划实践中纳入健康影响评估工具逐步成为新兴趋势。它为规划师提供了预判规划潜在健康影响的方法，同时能够使决策者和居民都可以从健康角度参与规划过程，了解其潜在影响并提出相关建议，开展公众参与。

1979年，我国确立环境影响评价（EIA: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制度，EIA的范围主要集中于对水环境、空气、声环境、生态、环境风险的影响预测评价，环评实践中还未开展健康影响评价内容。2008年2月，国家环保部发布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人体健康（征求意见稿）》。2018年1月，在国务院发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背景下，环保部发布了《国家环境保护环境与健康工作办法（试行）》，以加强环境健康风险管理，推动保障公众健康理念融入环境保护政策。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的健康影响评价在制度、内容、方法、人员及实践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

文章首先介绍了健康影响评估工具的起源、发展以及主要内容：健康影响评估工具最初由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衍生而来，欧洲学者开始探索其理论框架，之后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得到不同领域的实践。健康影响评估在内容上涵盖疾病、教育、就业、人口、生态环境等方面，在实施程序上包括筛选、界定范围、

评估、建议、报告和监控评价六个阶段。在健康影响评估程序中，每个阶段都应当有详细的工作内容和研究结论，例如在界定范围过程中，需要通过流程图研究政策、规划与公共健康之间的联系。

文章介绍了美国洪堡县总体规划中健康影响评估的具体实施过程和结果：在美国洪堡县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当地政府要求公共健康科一同参与，加入“健康影响评估环节”，分别对三个规划方案进行健康方面的评价。评价涉及六个方面，包括车辆行驶距离，通勤距离，居住范围内的小学、公园、医疗设施比例等35个评价因子。每一个评价因子的选择都基于文献、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健康差异分析结果，以获取该因子与居民健康相关的证据。此次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洪堡县未来发展的空间方向，通过对比三个备选方案的健康影响结果，最终选择其一。

文章最后就我国城乡规划领域如何引入健康影响评估工具提出了相关建议：（1）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应考虑我国城乡发展的现实问题，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健康影响评估指标体系；（2）应由规划部门联合公共卫生部门联合设计一套规范的健康影响评估程序，使社会各方都能参与评估；（3）可以在总体规划编制中引入健康影响评估程序，强化公共卫生部门在规划编制过程中的作用，编制健康影响评估专项规划。

存量用地背景下填充式开发研究综述

文萍 赵鹏军

摘要：存量用地将成为我国未来城镇建设的主要用地来源。东部沿海地区一些发展较为成熟的城市已经开始提出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挖潜的用地政策。但总体来看，目前的实践和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土地供给层面，存量用地上的开发建设由于刚刚起步，相关研究较少。本文对城镇化较成熟的发达国家在存量用地上进行的填充式开发的实践与研究进行了系统回顾，覆盖了政策兴起、类型界定、潜力评估、实施障碍、实施结果、影响评价等全过程，对国内存量土地再开发研究进展进行了分析，可为我国城市填充式开发的开展与研究提供参照与借鉴。

关键词：填充式开发；存量用地；城市更新；潜力评估；实施评价

引文格式：文萍, 赵鹏军. 存量用地背景下填充式开发研究综述[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1): 134-140. DOI: 10.22217/upi.2016.137.

2012—2016年间，笔者在北京大学城乡规划与交通研究中心师从赵鹏军研究员攻读博士学位，完成学位论文《居住型填充式开发对居民出行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本篇《存量用地背景下填充式开发研究综述》。“填充式开发”（infill development）虽然是一个非常形象而便于顾名思义的词，但在当时乃至当下，对国内规划学界和业界都不算一个常见的概念。从开题到答辩的各个环节，经常会有来自各界的专家学者，尤其是规划行业的从业者，提问为什么是“填充式开发”？它与“城市更新”等我们更熟悉的概念有什么区别？每一次提问都促使笔者进一步思考“填充式开发”这一概念的意涵所在。

正如文中所述，填充式开发是从土地开发和利用的现状角度提出的，在既有建成区范围内进行开发，才有所谓的“填充”。从这个角度看，“填充式开发”与大家熟悉的“城市更新”在很多情况下确实指代同样的对象。但概念的不同却体现了话语体系及其背后一整套价值观、方法论和关注点的不同。填充式开发在主观层面更侧重于从城市整体角度对用地进行整合，提高用地效率和城市整体运行效能；而城市更新则更关注对具体城市斑块的改造和活化，以达到提高地块价值或提升街区活力等更具体而局部的目标。整体和局部辩证统一，引入不同的概念，其实是希望各自的使用者能够从自己熟悉领域以外的视角和价值观切入问题，从而更便于相互理解，并在实践工作中相互贯通。

正是基于土地利用这个出发点，在进行国内回

顾时，对接的更多是当时国土口和规划口都很关注的存量用地再开发（如今国土资源管理和城乡规划管理职能已经在国家治理架构层面整合到自然资源部，正体现了规划行业需要更多整体空间效能的思维意识）。国土口对建设用地的使用效率有长期持久的关注，规划口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更多源于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在市、区等层面可用地资源紧张的问题（不仅仅是建设用地指标的紧张，更是物理意义上的可开发空间的紧张）。尽管目前国内大多数城市实际上仍然在寻求外延式增量扩张，但“存量规划”、建设用地“零增长”等理念已经在北京、上海、深圳等标杆城市规划的引领下获得了业界的普遍认同。不论是客观空间上的无地可用，还是在城市增长边界、城市绿带、生态控制线等政策限制下的难以扩张，填充式开发，作为存量用地开发的国际通用提法，都将是未来城市开发建设的重要类型。

本文对填充式开发从政策兴起背景、概念和类型界定、开发潜力评估、实施障碍与对策、实施结果与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梳理，既涵盖了规划操作流程的相关环节，也包括了实施结果和影响的评价。尽管现代城市规划诞生于试图解决公共安全和卫生等方面的实际问题，规划教育和实践中却更多关注于规划的理念与技术方法，而对实施的结果及延伸影响考虑相对欠缺。笔者从在规划院一线工作的朋友那里了解到，规划实施评估已经成为一类重要的业务类型。近年来规划行业在现实需求推动和从业者主动思考转型中获得了长足发展，对于多少

有些旁观者意味的研究者而言，感到备受鼓舞。

由于有意求全，文章在具体内容上难免偏颇甚至出现错误，2016年定稿后相关研究与实践的新进

展也未跟踪纳入，对此笔者深表歉意并恳请读者指正。

当代英国住房建设评估的经验与借鉴

赵捷 彭正洪 李志刚

摘要：进入新时代，作为推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供给侧”，中国住房建设的发展速度迅猛，规模巨大，成就显著。在改善人民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出现了供需失衡、结构不尽合理、居民负担重等多方面问题。为实现住房供求关系优化、推动住房市场可持续发展、提高居民住房可负担力，对我国住房建设工作开展科学评估与优化成为亟待深入开展的重要工作。本文系统回顾了英国住房建设评估的发展历程，剖析其住房建设评估工作的背景、内容与实效；同时结合对于典型住房建设评估模型的分析，揭示其住房建设评估工作的运行特征与机制；总结其评估经验对于我国住房建设及规划的启示，以此为我国住房建设评估及相关决策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住房建设评估；规划决策；模型；英国；住房供需平衡

引文格式：赵捷，彭正洪，李志刚. 当代英国住房建设评估的经验与借鉴[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1): 141-147. DOI: 10.22217/upi.2017.528.

作为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供给侧”，我国住房建设总量的不断增长并未能充分满足居民日益增长住房需求，而是出现了分配不均、供需失衡、结构不尽合理、居民负担重等各方面问题。本文借鉴英国住房建设的评估方法，分析涉及住房建设、住房供给、居住需求和居民可负担力等各方面因素对住房市场的影响的模拟及预测，解析围绕住房市场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评估和预测其未来住房供给的类型、规模和空间布局的理论与方法，以此为我国住房建设的评估、预测和优化提供科学参考和借鉴。

事实上，英国的住房建设评估工作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2010年以前，英国的住房建设评估主要围绕从总量上限制住房用地的供给问题，采用比例分配法设定各区域住房建设数量。由于无法实现住房供需关系的精准耦合，大城市中心区房价上涨、建筑密度提升、绿地比例减少，对住房建设的指引效应不尽理想。2010年后，英国制定了《住房评估实施指南》（Practice Guidance on Assessment of Housing），涵盖一系列关键指标及辅助数据，如人口规模（出生、死亡、迁移、核心家庭比例），核心

家庭增长率，土地价格，房价（房租），可负担力，发展速度（土地批租许可），空房率，住房拥挤度及无房情况等。国家仅阶段性考核住房建设规划目标的实施成效，督查住房建设与需求水平在不同层面的耦合程度。地方规划改变单纯强调供给规模的做法，在住房建设评估中更多考察市场和环境要素的相互作用机制，明确其供需变化受参与其中的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周期性的调整行为影响，在评估框架中增加参与住房建设的作用主体，构建了更加复杂的互动网络，实现了供需关系在住房市场、城市空间、人居环境等方面的精准耦合，为有效解决住房问题提供了重要支撑。

经过长期演变，目前实用性最强，使用范围最广的模型是“社区和地方政府可负担力模型”（CLG affordability model）和“次级区域集聚模型”（sub-regional model）。

可负担力模型从宏观层面评估了全英九大分区的住宅供需关系和居民可负担力，通过整合房价、收入、移民规模、家庭规模和就业率等各类因素间的相互作用，测算各行政区居民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抵押贷款偿还率、迁入—迁出移民规模，从而

预测新建住房规模和规划住房建设水平对可负担力的影响，“自上而下”地对住宅建设的供需关系予以评估。

次级区域集聚模型则从中微观层面重新划定了全英住宅建设分区的地理边界，形成了 102 个全新的“住房市场单元”（HMA），并依托人口相关变量、经济变量、规划变量、复合环境变量，以及个人变量展开住房建设评估。该模型重视跨越住房市场单元区域边界的迁移变量变化，以及住房政策和居住环境改变；强调在不同阶段运用不同经济模型

展开模拟，同时适度增加住房需求弹性系数，以及居民对次级区域内土地和空间的依赖指数。

英国住房建设评估有助于实现更加高效的城市住房建设，增强规划政策的实施性，科学引导了城市可持续发展。面对目前错综复杂的住房问题，我国应积极探索科学有效的住房建设评估，发展具有本土化和适用性的住房建设评估理论与模型，将住房建设评估与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制度和规划体系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人居追求。

2019年第2期文章目录

本期主题 非正规经济下的城市发展与规划响应

徐苗, 陈宇琳, 玛莎·陈 / 非正规经济下的城市空间发展: 全球趋势与地方规划应对

威尼·穆西贾, 阿纳斯塔西娅·卢卡图-塞德里斯, 著; 陈瑞, 译 / 非正规美国城市:

深化对非正规城市主义的理解

比什·桑亚尔, 著; 陈宇琳, 译 / 发展中国家非正规住房市场的政策反思

卡洛琳·斯金纳, 凡妮莎·沃尔森, 著; 甘欣悦, 译 / 发展中国家城市的非正规经济

——挑战规划的窠臼

徐苗, 陈瑞, 杨碧波 / 中国大城市非正规就业职住空间失配及其规划问题初探

陈宇琳 / 中国大城市非正规住房与社区营造: 类型、机制与应对

黄耿志, 薛德升, 徐孔丹, 杨燕珊, 陈昆仑 / 中国大城市非正规公共空间治理

——对城市流动摊贩空间疏导模式的后现代反思

城乡研究

李明焯, 亚历克斯·马格尔哈斯 / 从城市非正规性视角解读里约热内卢贫民窟的发展历程与治理经验

沈忱, 张纯, 夏海山, 程志华 / 大都市圈职住空间关系与就业可达性: 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

贾宜如, 张泽, 苗丝雨, 肖扬 / 全球城市的可负担住房政策分析及对上海的启示

规划研究

吴菁 / 尺度重构下的国外首都特大城市地区空间规划分析

田颖, 耿慧志 / 英国空间规划体系各层级衔接问题探讨——以大伦敦地区规划实践为例

汪越, 谭纵波 / 英国近现代规划体系发展历程回顾及启示——基于土地开发权视角

翁阳, 汪坚强, 郑善文 / 我国内地规划申诉制度建设探讨——基于香港的经验

史北祥, 杨俊宴 / 基于GIS平台的大尺度空间形态分析方法

——以特大城市中心区高度、密度和强度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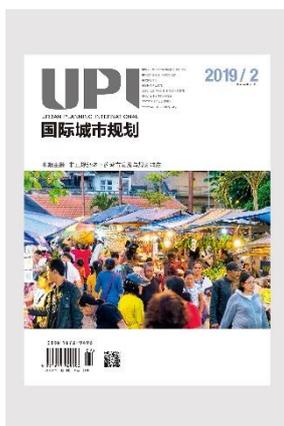
刘泉 / 三维界面视角下建筑退让道路红线方式解读

实践综述

卓想 / 在地活化策略研究——以台北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城市更新为例

罗朝璇, 童昕, 黄婧娴 / 城市“零废弃”运动: 瑞典马尔默经验借鉴

王晓静, 张玉坤, 张睿 / 国外城市内部空间与都市农业的整合设计实践及思考



2019年 第2期

非正规经济下的城市空间发展：全球趋势与地方规划应对

徐苗 陈宇琳 玛莎·陈

摘要：作为本期专辑的序论，本文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篇立足于全球视野，首先概述了城市经济体系中持续快速增长的非正规经济和就业的规模与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国家与地区差异及其在城市空间上的反映，尤其是中国的特殊性；进而从理论基础与政策实践等方面分析了传统城市规划应对城市非正规经济发展的局限与问题。下篇则具体介绍了本专辑收录的6篇文章，其中3篇来自外国学者的文章是关于国际上对非正规性研究的最新进展，分别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非正规城市发展与管治、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住房改善，以及城市规划之于非正规经济与空间管治的误区与局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另外3篇来自中国学者的文章则分别从非正规就业群体的职住空间失配、非正规住房与社区营造、公共空间的非正规使用与管治等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大城市非正规经济下的空间规划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关键词：非正规经济与就业；城市空间发展；全球趋势；地方应对；城市规划与管治

引文格式：徐苗, 陈宇琳, 玛莎·陈. 非正规经济下的城市空间发展：全球趋势与地方规划应对[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2): 1-6. DOI: 10.22217/upi.2019.073.

根据西方城市的发展经验，一些学者曾经提出了“假城市化”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人口增长过快导致的与工业化或就业增长速度的不协调将引发社会动荡。但几十年的发展事实表明，该观点是基于发达国家普遍的正规就业背景，严重忽略了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近几十年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的快速发展，以及占非农就业 50%~75%的非正规就业对就业人口的吸纳作用。在我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非正规就业创造了大量的隐形就业岗位，有效吸纳了大规模涌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大量下岗工人以及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年轻人，为进城农民工提供了重要的进入劳动力市场、建立社会联系的入口，有效推进了农民工的市民化，维护和推动了稳定的城市化进程。此外，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中的非正规经济发展现象则被视为在信息产业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深、更广的社会转型：一方面，引领经济发展的信息与技术产业以高成本的去制度化方式攫取巨大利润；另一方面，低利润企业和低收入群体则采取低成本的非正规化途径提高适应能力。

这些发展现状和趋势显然与此前诸多关于城市非正规性发展的信息有所出入，例如城市的非正规发展主要指向显性的非正规居住区的营造，城市

的非正规发展主要存在于经济和工业发展落后的地区等。更为重要的是，在非正规经济已被视为大都市城市化进程的普遍性存在的今天，现有的城市空间布局是否适应其发展，是否有助于拓展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就业机会与生存空间，是所有的城市研究者、规划师、城市设计、城市管理部门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以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发展为基础的传统城市规划所未能回应的，也是未来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重要方向。目前的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对城市非正规经济发展的空间数据的缺失、规划和管治理论的空白、相关公共政策的忽略，正是本期专辑的源起。

作为本专辑的序论，本文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篇立足于全球视野，首先概述了城市经济体系中持续快速增长的非正规经济和就业的规模与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国家与地区差异及其在城市空间上的反映，尤其是中国的特殊性；进而从理论基础与政策实践等方面分析了传统城市规划在应对城市非正规经济发展的局限与问题。下篇则具体介绍了本刊收录的六篇文章。希望通过本期文章的鉴外与观内，提出面临的问题，总结已有的经验，讨论可发展的路径与方法，抛砖引玉，激发更多的思考与探索。

非正规美国城市：深化对非正规城市主义的理解

威尼·穆西贾 阿纳斯塔西娅·卢卡图-塞德里斯 著 陈瑞 译

摘要：本文来源于我们 2014 年出版的著作——《非正规美国城市：超越快餐车与计时工》（*The Informal American City: Beyond Taco Trucks and Day Labor*）中的前言与结论部分。该著作审视了美国城市生活中的“非正规变革”。我们通过一系列案例研究，从经验和理论两个层面探讨了（美国城市）非正规现象的增长，而这种现象通常被视为更多地存在于发展中国家而非工业化国家。尽管一直以来非正规城市主义被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视为边缘甚至是犯罪行为而不加考虑，但是我们通过包括洛杉矶、萨克拉门托、西雅图、波特兰、菲尼克斯、堪萨斯、亚特兰大和纽约在内的一系列案例研究，对这一狭隘的观念提出了质疑。令人惊讶的是，尽管非正规城市主义出现迅猛，规划与城市设计领域的学术文献却甚少提及。因此，我们希望可以抛开传统的观点，审视在美国不同环境与城市中非正规活动的出现、增长与活力。我们倾向于采取更加复杂的方法去认知、理解和处理非正规活动，而非仅仅浪漫化地去赞扬它；我们也将争取对非正规性及其环境有一个明确的空间理解，并讨论规划者、政策制定者、城市设计者和社区应如何应对这种新出现的、蕴含着机会与挑战的城市景观。美国城市中的非正规活动普遍且多样。其中的大多数活动在本质上并非犯罪，也超出了经济上的谋生范畴。虽然非正规性通常与移民相联系，但是非正规活动广泛地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团体、多样的城市环境和全国不同的地理区域中。正规与非正规活动可能时而冲突、时而交叠或相互依存。非正规活动的案例研究帮助揭示了非正规性的逻辑、潜在合理性，以及非正规活动与城市和法规中更大的政治经济（活动）之间的结构性联系。这些案例通过非正规活动中潜在的获益者与失意者间的联系，展示了这类活动的矛盾本质。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关于非正规性的迷思和错误观念。迷思之一是非正规性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部分，且仅仅出现在发达国家城市中极度贫困和边缘化的社区。然而，不同类型城市的非正规性已经清晰地出现在了发达国家城市的中产阶级和富裕的邻里。第二种迷思认为正规和非正规的活动与环境之间是泾渭分明的，然而在一些城市的正规与非正规环境之间，我们并未发现明显的分界线。第三种迷思是非正规性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和短暂的构造，而非正规活动的空间广泛性与时间延续性所展现出的恰恰相反。最后，非正规活动总是被视为一种美德，或是一种消极的现象，这种认识掩盖了非正规活动并非同质的，而是依赖于具体的背景和环境的现实。在对非正规城市主义的挑战与机遇作出回应之前，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与其坚持这些迷思，不如深化对于非正规城市主义的理解，并仔细思考它们的社会和物质背景。

关键词：非正规性；非正规城市主义；美国；误解；空间理解

引文格式：威尼·穆西贾，阿纳斯塔西娅·卢卡图-塞德里斯. 非正规美国城市：深化对非正规城市主义的理解[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2): 7-14,30. DOI: 10.22217/upi.2018.552.

人们通常认为非正规经济活动只会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中，与贫困和生存经济相伴相生。本文的作者威尼·穆西贾等人通过他们对美国多个大城市的实地调查和研究告诉我们：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中也存在着计时工、流动摊贩、自建公寓等形形色色的非正规性经济活动。

正规经济活动并没有如一些古典经济学家所判断的那样，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经济的发展而消

失殆尽，反而在全球范围持续发展，出现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和社会中，其特征包括：

（1）非正规性并非仅仅与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的贫困人群相联系，而是存在于更加广泛的城市环境和社会阶层中；

（2）非正规经济活动与正规经济活动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互相依存；

（3）大部分非正规经济活动并非暂时现象，而

同样是具有合理性动机的行为。

因此，不应当以非黑即白的“二分法”来解读和应对城市的非正规经济活动；城市的管理者、规划者和设计师也不应陷入支持管制和反对管制的不休争论的泥淖，因为现实已经变得更加复杂，需要因势而谋。

作者进而指出，城市非正规性既牵扯到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有潜在的获益方或受损方；同时也与正规性的管制、市场和治理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改良主义可能是一种更加合适和实用的方法，它要求在战略性地加强某些管制和放松某些管制之间仔细权衡。同时，规划者和决策者应该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架起桥梁，针对非正规经济活动的具体表现，公正、创造性地使用管理、规划和设计工具。

以美国城市的公共空间管理为例，作者提出了几种应对策略：

(1) 设计和建造支持性的公共基础设施能够

大大减少参与非正规经济活动的人遇到的困难，降低非正规经济活动给公共空间带来的负外部效应；

(2) 为非正规经济活动寻找可利用空间和适合的管理制度尤为重要，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空间利益的冲突；

(3) 创造出具有柔性边界的空间，以同时容纳非正规活动与正规活动；

(4) 相关的规划和管理政策应当在社区层面制定，仔细衡量社区对待非正规经济活动问题的价值观念和影响机制，以确保政策有效。

整体来说，对非正规性活动的理解和实践干预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努力。由于非正规性活动横跨南北半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非正规性的研究者和行动家们应当在这一话题上相互交流，开展更加精细的调查，以充分把握不同非正规性活动的细致差别。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空间政策，以减少非正规性带来的冲突并提高相关从业者的生活能力。

发展中国家非正规住房市场的政策反思

比什·桑亚尔 著 陈宇琳 译

摘要：本文通过评述学者和实践者基于来自巴西、印度和中国的实证经验，对城市非正规住房市场的关键性问题进行探讨。首先介绍了世界银行进行项目研究时政策制定者对非正规住房的观点，其次对就地升级、提供私有产权和贫民窟再开发三种主要政策干预的效果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为达到更好的非正规住房市场干预效果有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非正规住房；房地产市场；政策；发展中国家；贫民窟

引文格式：比什·桑亚尔. 发展中国家非正规住房市场的政策反思[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2): 15-22. DOI: 10.22217/upi.2018.551.

城中村改造一直是我国大城市治理的一大难点。2017年《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方案》的出台，以及近年来深圳等地开展的城中村改造实践，让人们看到城中村可持续发展的新契机。如何在我国现行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下，让城中村成为流动人口合理合法的安居之所？这不仅是一个物质空间环境的规划设计问题，还涉及更为综合的土地制度和房地产经济等多方面问题。以巴西和印度为表的南美和东亚发展中国家，在贫民窟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尽管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我国

存在较大差异，但其政策经验值得借鉴。

本文译自2016年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的《贫民窟：非正规住房市场如何运转》的第11章。《贫民窟》一书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尤金尼·伯奇（Eugenie L. Birch）教授、牛津大学博士后莎哈娜·查特拉杰（Shahana Chattaraj）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苏珊·瓦克泰（Susan M. Wachter）教授共同主编。全书从比较、人类学和公共政策三个视角，对发展中国家贫民窟治理案例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进行了总结。传统观点认为，贫民窟是游离于正规住房市场和国家管

治之外的，但本书通过非正规性视角的分析发现，非正规住房是深深植根于由地方政府和市场力量共同参与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的。作者认为，非正规—正规的二分法虽然有用，但却是错误的，公共政策干预的结果并不一定要让房地产从非正规走向正规，而应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由房地产、住房和劳动力市场共同构成的混合系统”。

作为本书的最后一章，麻省理工学院比什·桑亚尔（Bish Sanyal）教授基于全书对巴西、印度和中国的实证经验，对非正规住房市场的政策进行了系统评述和批判性反思。首先，文章介绍了人们对非正规住房认识的演变过程。贫民窟从过去政府清理的对象发展成为今天的非正规住房市场，约翰·特纳（John Turner）功不可没。特纳认为，应对住房短缺问题，政府虽然资源很多，但做得很少，而贫民则相反，虽然没什么资源，却自发进行了很多尝试。

其次，文章对就地升级、提供私有产权和再开发三种代表性的非正规住房政策的效果进行了评价。

（1）就地升级成本相对较低，但对公共机构的经济吸引力不高，并且面临因维护不足而环境持续恶化的问题；（2）赋予非正规居住区居民私有产权，在理论上有助于增加城市税收、重振城市经济，但在实际操作中需要解决产权边界划定等问题；（3）贫民区再开发在城市经济状况较好的情况下似乎是多赢的解决办法，但现实结果却不尽然，而且存在分配不公和绅士化等问题。

最后，文章提出为达到更好的非正规住房市场干预效果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1）需要加强对城市贫民住房偏好的研究；（2）深入分析正规化的综合影响；（3）并对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等政策实施主体的职能进行系统研究。

发展中国家城市的非正规经济——挑战规划的窠臼

卡洛琳·斯金纳 凡妮莎·沃尔森 著 甘欣悦 译

摘要：在发展中国家城市，非正规经济是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关于如何通过政策支持非正规经济的研究集中在经济政策领域而很少涉及城市规划领域。在规划管控作为限制和边缘化非正规经济活动的核心手段的背景下，从空间规划角度重新理解非正规经济尤为重要。文章首先通过数据阐述非正规经济的规模、种类和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然后阐述当前针对非正规经济的一系列政策和理论所处立场的差异。第三部分通过案例，阐述一些发展中国家地区正在通过政策和规划策略转型为非正规就业者提供合适的生存环境，包括公共空间中的基础设施、家庭作坊，以及拾荒者组织。文章最后提出规划从业者面对非正规经济时，需要改进规划方法，以及当前相关研究面临的挑战——在规划实践仍然以管控为主的今天，应对非正规性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正日益脱节。

关键词：非正规经济；规划；非正规性；发展研究；发展中国家

引文格式：卡洛琳·斯金纳，凡妮莎·沃尔森. 发展中国家城市的非正规经济——挑战规划的窠臼[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2): 23-30. DOI: 10.22217/upi.2018.548.

在发展中国家城市，非正规经济是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数非农就业人口处于非正规经济之中，尽管他们的个人收入通常较低，然而他们对当地 GDP 的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反映出非正规就业在许多国家是经济的核心而不是边缘。

鉴于非正规经济的规模和贡献，城市非正规经济已经成为一个需要探索的研究领域。建立在发展研究领域之上的政策立场强调对非正规就业的规

范化和正规化，与城市和规划理论领域对非正规性的概念化形成鲜明对比，认为非正规性不是从正规性中分离出来的，而必须把非正规性看作统领城市转型的组织逻辑或者是规范的系统，是政府的一种战术和策略，以保持一种“非管制的”、在政治上可以操控的空间。这些理论的进展指出了非正规性在城市政治经济中具有高度嵌入的作用。但是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城市政策和规划法规和实践仍然严

重偏向对于非正规经济的控制和清除，这些实践与该领域的理论进步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脱节。因此，认识到城市非正规经济的重要性和持续性要求规划做出与以往不同的响应，以适应非正规经济活动和支持非正规就业者的生存环境。

通过印度、南非、秘鲁、哥伦比亚、巴西等国的案例，作者列举了一系列积极应对并支持非正规经济的规划实践。首先，在保障商贩有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的前提下，城市规划需要在街头摊贩如何使用公共空间这一议题中进行规划创新。基于土地使用分区的规划是基于单一的使用类别，这种模式假设商业和其他用途可以正式分配给特定的地块。混合的、灵活的土地使用和不拘一格的管理手段在规划方案中通常缺失。此外，街头商贩的工作时间、租用空间的支付能力、对基础设施的要求、交易货物的性质，对空间的需求和使用模式通常在一天、一周和一年内都不断变化，因此需要创新的规划方

法以适应这种灵活性。第二，在承认贫困家庭有权利在自己的住房中从事制造和商业活动的前提下，在贫民窟改造工作中融入住房的经济功能，通过基础设施提升改善居家就业者的收入和就业模式。第三，通过正确的扶持和管理，保障贫困人口通过非正规经济获取食物的食品安全。例如，在非正规商贩经营的公共场所和市场，由商贩和政府合作，提供服务和设施以确保卫生的销售环境，包括原材料清洁用水，易于维护的厕所，市场清洁喷剂和排污系统。第四，在国家支持拾荒者正规化和鼓励合作的前提下，政府和拾荒者合作社合作建立垃圾分类和处理的设施，提供设备、工作空间和技术培训，以及将垃圾收集、运输和循环回收等工作纳入城市废品回收和垃圾处理系统。最后，在非正规就业者，规划师和政府之间建立参与式规划的机制，使得管控与包容性规划方法之间达到必要的平衡。

中国大城市非正规就业职住空间失配及其规划问题初探

徐苗 陈瑞 杨碧波

摘要：非正规就业对国民经济、城镇就业的增长和城镇化进程有着巨大的推动和稳定作用，而城市规划实践与研究却并未给予非正规就业充分的关注，非正规就业与正规就业的模糊使得针对城市低收入人群的规划政策产生了偏离与盲区。本文采用抽样实证调查的方法探讨非正规就业者的职住空间特征以及规划政策对其通勤状况产生的影响。首先阐述了职住空间失配理论在非正规就业这一视角上的缺失；其次对非正规就业者的居住空间与就业空间分布进行理论回顾；最后，本文以低收入人群集中的两处保障房社区为例，利用 ArcGIS 平台对其中的非正规就业者搬迁前后的职住关系与通勤特征进行描述和分析。本文认为，非正规就业者相较于正规就业者通勤距离和时间均较短，高度依赖公共交通，表现出接近就业中心的职住偏好，而搬迁后非正规就业者通勤状况恶化，呈现出“空间失配”特征。实证结果表明在制定规划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非正规就业者的职住关系特征与行为偏好，并运用相关的规划工具展开积极干预。上述结论有助于认知非正规就业者在职住偏好及决策上的特殊性和反思现有影响非正规就业者规划政策的局限与不足。

关键词：非正规就业；保障房；城市规划干预；空间失配；职住关系

引文格式：徐苗，陈瑞，杨碧波. 中国大城市非正规就业职住空间失配及其规划问题初探[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2): 31-39. DOI: 10.22217/upi.2019.049.

非正规就业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增长和城镇化进程有着巨大的推动和稳定作用，但相关的城市规划实践与研究对非正规经济和就业却未能给予充

分的关注和针对性的研究，这使得研究和解决某些城市问题的相关成果和政策建议失焦，比如大城市的职住空间失配问题。

由于研究对象群体构成和职住决策机制的复杂化，城市内部不同群体的就业和居住的区位选择发生了改变，并在更广阔的地理区位内重新配置，导致职住空间失配的原因并不一定是职住资源的地理空间分离，也有可能是由于就业市场的选择性歧视、个体流动性不足，或城市公共交通政策失衡等因素。因而不少学者倾向于用“职住比”的方法，或是采取加权了就业者空间能动性的“就业可达性”指标来衡量职住空间特征。总体而言，个体在考虑可支配资源后对居住与就业空间的偏好组合才是空间失配问题的本质核心。传统上，职住空间失配研究主要聚焦于正规就业的数据，职住空间失配研究的主要目标对象是低收入等弱势群体；而在各类非正规经济统计与研究中发现，非正规就业是低收入人群的主要就业渠道和收入来源之一。因此，非正规就业视角的缺失，使相当大量的低收入人群的职住空间失配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与重视。

本文的研究即以低收入人群集中的两处保障房社区为实证案例，利用 ArcGIS 平台对其中的非正规就业者进行了调查，并对其搬迁前后的职住关系与通勤特征进行描述和分析。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居民比例十分惊人：除去占调研总人数 15.8% 的退休和失业人群外，半数以上（62.6%）的居民从事非正规就业，而只有 37.4% 的居民从事正规工作，前者接近后者的两倍，并且就

业种类多元，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

调查表明，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这部分低收入非正规就业者相较于正规就业者的通勤距离和时间均较短，但工作时间较长，且高度依赖公共交通。由于 70% 以上的就业点向内环以内的市级商圈和次级商业中心聚集，搬迁后职住匹配模式从就业者自适应的分散化匹配格局向居住空间聚集的单一中心格局转变，普遍存在通勤状况恶化、更换工作岗位或失业等“空间失配特征”。以轨道交通为主的城市公共交通资源的提升，使得搬迁前后通勤时间的增幅小于通勤距离的增幅，显示出公共交通提高了整体流动性，对职住失配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但非正规就业者的工作地点沿着轨道交通分布，反而显示出轨道交通在非正规就业可达性方面作用有限。

从城市规划所关注的建成环境视角来看，影响保障房社区非正规就业群体职住匹配模式变化的原因在于三个方面：（1）保障房区位规模与选址；（2）保障房社区周边的土地利用模式；以及（3）公共交通资源供给。其中，前两者影响就业岗位供给，后者影响就业者的空间能动性。相关的规划政策与措施应该从这三个方面着手，优化职住空间匹配模式，提高低收入人群对非正规就业岗位的可达性。

中国大城市非正规住房与社区营造：类型、机制与应对

陈宇琳

摘要：中国大城市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十分多元的非正规现象。以往对非正规居住空间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城中村，本文试图从更为综合的社区视角，对包括住房、服务设施和公共空间的非正规社区空间进行研究，以丰富对非正规性理论与实践的认识，并为理解非正规经济提供社区日常生活的视角。首先，基于对中外非正规居住现象的比较，提出“准入—使用—运行”的分析框架，并从政府职能和市民需求结合的角度，阐释非正规居住现象产生的原因。其次，对计划经济时代以来的传统街区、商品房社区和流动人口社区三类典型社区的非正规现象及其特征进行解读。最后，提出非正规居住和社区营造的规划治理对策。

关键词：城市非正规性；非正规经济；社区营造；住房；公共服务；公共空间；大城市；治理

引文格式：陈宇琳. 中国大城市非正规住房与社区营造：类型、机制与应对[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2): 40-46. DOI: 10.22217/upi.2019.052.

当代中国之于非正规空间，既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一方面，中国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用地迅速扩张，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城市景观剧烈变迁，为非正规空间提供了很大的生存空间，非正规空间的正效应也得以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大量非正规空间及其复杂的权属关系，给城市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简单取缔很难奏效，而弥补非正规空间的正向功能又需要支付高昂的成本。面对纷繁复杂的非正规居住现象，本文在以往城中村研究的基础上，从更为综合的社区视角，对包括住房、服务设施和公共空间的非正规社区空间进行研究，以丰富对非正规性理论与实践的认识，并为理解非正规经济提供社区日常生活的视角。

首先，通过对中外非正规居住现象的比较，提出“准入—使用—运行”分析框架。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多元复杂的社区形态本底，以及政府在治理非正规空间过程中的权威性，使得分析中国非正规居住现象需要采用更为系统性的思路，为此提出“准入—使用—运行”的综合分析框架。基于这一框架，从政府职能和市民需求结合的角度，揭示了正规性与非正规性之间矛盾而复杂的关联，并指出非正规居住现象的根源在于政府正规化的管制体系与百姓实用主义的生存策略之间的不匹配。

其次，对计划经济时代以来的传统街区、商品

房社区和流动人口社区三类中国大城市典型社区的非正规现象及其特征进行解读。

(1) 在传统街区，由于住房紧张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建标准过低，居民和单位通过“非正规建造”的方式，灵活地解决了住房和社区服务短缺的问题；

(2) 在商品房小区，虽然私人居住空间有显著提升，但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常常缺位，人们通过对城市消极空间的“非正规利用”，弥补了现有社区功能的不足，并给社区增添活力；

(3) 在流动人口社区，城中村等住房类型通过“非正规管理”，提供了一种高密度、低成本、功能复合的解决方案，极大地拓展了流动人口的居住空间。

最后，提出非正规居住和社区营造的规划治理对策。(1) 需要认识到非正规现象的常态化，通过制度化的建设而不是运动式的做法加以应对；需要认识到非正规现象的阶段性和阶段性，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明确努力方向和工作时序；需要认识到非正规现象的灵活性和创造性，采取包容的态度，给予非正规性一定的发展空间。(2) 建议采取纳入政府监管、设置合理标准、推行基层自治等规划对策，在“准入”的保障性与可获得性之间、“使用”的品质与可负担性之间，以及“运行”的秩序与活力之间寻求平衡。

中国大城市非正规公共空间治理——对城市流动摊贩空间疏导模式的后现代反思

黄耿志 薛德升 徐孔丹 杨燕珊 陈昆仑

摘要：如何协调现代性/正规性与非正规性的矛盾是 21 世纪城市规划面临的一个挑战。本文通过分析广州流动摊贩疏导区治理的性质和矛盾，提出“合理正规化”的问题。研究认为，疏导区是一种基于空间操作的正规化机制，它以空间固定为基础，通过施加一套源于正规经济的管理措施来改造和管控非正规性。然而，疏导区的“正规本位主义”忽视了非正规经济嵌入现实实践的自然特性和优势，使其面临潜在的可持续性危机。这个危机隐含于疏导区四个正规化要素与流动摊贩特性之间的矛盾，表现在区位固定与流动性、租金缴纳与低成本、合同约定与灵活性、产品管制与自主性等方面的紧张关系。广州案例表明了协调既定的现代空间秩序与非正规的公共空间使用之关系的复杂性，带来的启示是对非正规的规划响应不应只是简单地将源于正规经济的既定规范施加于非正规，而应充分考虑非正规自身特性、需求和规律。这或许需要规划师突破现代规划框架，发展应对流动性、灵活性等表征后现代性特征的规划理论和方法。

关键词：城市非正规性；公共空间；流动摊贩；正规化；后现代主义

引文格式：黄耿志，薛德升，徐孔丹，等. 中国大城市非正规公共空间治理——对城市流动摊贩空间疏导模式的后现代反思[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2): 47-55. DOI: 10.22217/upi.2019.015.

流动摊贩作为城市非正规经济的主要组成，对增加就业、缓解贫困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一直是联合国人居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关注的非正规就业群体。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许多城市多采取“一禁了之”的摊贩治理政策，不仅未能达到取缔的效果，反而在实际管理中诱发很多矛盾。李克强总理曾在 2017 年 4 月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批评了这种治理观，指出一禁了之是一种懒政行为。从世界范围看，简单的取缔也遭到许多批评，已逐渐被弱化或者弃用。在这种背景下，如何以更积极、更有效的方式来治理摊贩，成为城市管理者 and 规划师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文通过对广州摊贩疏导区政策与案例的实证研究，目的是为更好地应对摊贩和城市非正规性提供理论思考和政策启示。在广州，疏导区是将流动摊贩转移和固定至划定的地方进行集中管理的一种治理模式，包括交通空间型、城市社区型、城中村型和商区型疏导区四种类型。

从现代主义的视角看，疏导区是功能分区思想在非正规经济治理中的体现，有助于维护公共空间秩序，达到对城市非正规性的有效管控。但基于后现代主义视角的审视，我们发现疏导区也是一种基于空间操作的正规化机制，它以空间固定为基础，通过施加一套源于正规经济的管理措施来治理非正规性。因此，疏导区体现了以正规经济为参照系对待非正规经济的“正规本位主义”，强调以固定、规范的正规性来改造流动、灵活的非正规性。

在分析疏导区的设置原则、空间布局和实施效果的基础上，我们着重考察了这种“正规本位主义”

治理思维如何使疏导区面临潜在的可持续性危机。通过分析疏导区的四个正规化要素与流动商贩属性之间的矛盾揭示了这一危机，具体表现在疏导区的区位固定、租金缴纳、合同约定、产品管制与流动摊贩的流动性、低成本、灵活性、自主性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体现了协调既定的现代公共空间秩序与非正规公共空间使用之关系的复杂性和难度。我们认为，要建设一个更加包容的城市，如何协调同步增长的现代性/正规性与非正规性之间的矛盾是 21 世纪城市规划面临的一个挑战。

广州疏导区实践对城市规划如何更好地应对非正规性有何启示？福柯在总结经济和人口的治理术时提出了善治（good governance）理念，其基本原理就是尊重被治理对象的自然过程或属性。著名人类学家斯科特在其具有广泛影响的关于现代主义发展如何带来灾难性后果的著作中同样强调这种治理思想，他将自然过程或嵌入现实世界的实践知识称为米提斯（mētis），指出许多发展规划的失败源于对米提斯的无知或忽视。广州疏导区面临的矛盾根本上是因为忽视了流动商贩经济领域的米提斯，即忽视了摊贩嵌入现实实践的特性，抑制了对其生存具有积极作用的优势。

广州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是：对城市非正规性的政策响应，不应只是简单地将源于正规经济的既定规范和规则施加于非正规；而应采取一种充分考虑非正规自身特性、需求和运作规律的“合适的正规化”理念，一种更加精细的规划思路。这或许需要规划师突破现代性的规划框架，发展出应对非正规性、流动性、灵活性的规划理论和方法。

从城市非正规性视角解读里约热内卢贫民窟的发展历程与治理经验

李明焯 亚历克斯·马格尔哈斯

摘要：本文从城市非正规性的角度对里约热内卢贫民窟的发展历程与政策演变进行梳理，进而分析了该地区在贫民窟治理方面的经验。总的来说，里约对贫民窟的政策从最初的消极无视，到强制拆除迁移，再到原地更新升级，正逐步向公平化和人性化的方向演变。尽管由于经济衰退、政治腐败，目前的治理政策陷入了低效的困境，但里约的案例体现了城市政府寻求城市非正规性在空间与制度层面合理定位的历程，在

贫民窟的原地升级、制度包容以及“软发展”等方面，为我国城市应对和治理“城中村”等非正规性住房问题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城市非正规性；贫民窟；更新；包容性；软发展；里约热内卢

引文格式：李明焯，亚历克斯·马格尔哈斯. 从城市非正规性视角解读里约热内卢贫民窟的发展历程与治理经验[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2): 56-63. DOI: 10.22217/upi.2017.203.

一些里约热内卢的朋友曾告诉我，尽管他们在当地生活多年，但从未走进贫民窟，并好心地告诫我不要接近这些危险地带。可见，贫民窟这种“非正规”（informal）住房形式与所谓“正规城市”的隔阂之深。

通过老师、记者朋友和无政府组织的帮助，两年前我有幸走进了位于里约热内卢的罗西尼亚（Rocinha）、圣塔马尔塔（Santa Marta）、维奇高（Vidigal）、马亥（Maré）等贫民窟调研，并和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的亚历克斯一同完成了这篇文章。

“非正规性”是相对于“正规性”而言的，指在城市中一系列不受官方机构管制乃至非法的活动与行为，包括非正规经营、非正规聚居、非正规土地和住房交易等。2000年以来，学术界倡导打破城市正规性与非正规性的二元对立关系：“城市活动是在正规与非正规的连续性中展开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难以找到正规与非正规或者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清晰界限。”

里约的贫民窟问题始于20世纪初，至2010年，贫民窟居民数量占里约城市人口的22.3%。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内，里约对贫民窟的政策从最初的消极无视，到强制拆除迁移，再到原地更新升级，正逐步向公平化和人性化的方向演变。由于经济衰退、政治腐败，目前的治理政策陷入了低效的困境。然而，里约的贫民窟治理不能被简单视为失败案例，而是体现了城市政府在寻求城市非正规性在空间和制度层面合理定位的探索过程，具体呈现出三方面的趋势。

（1）贫民窟原地更新与升级——从“整合”到

“连接”。自1990年代开始，保留和原地升级成为里约贫民窟治理的主要手段。这种改造方式放弃了将贫民窟“整合”到正规城市中的理想，提出“连接”城市非正规性与正规性。实践证明，城市非正规性如同其背后的城市弱势群体一样，无法被真正“消灭”，而只是被转移到另一个空间。“连接”是指通过空间上的连通带来人流物流的通畅，从而改善贫民窟居民的出行条件，增加他们的学习、就业机会。

（2）制度层面的包容——重审产权规范，包容草根组织。理论上，规范产权是在制度层面治理贫民窟的重要方式。但里约的实践表明，规范产权后贫民窟居民需要缴纳土地税、水电费，往往陷入更深的贫困，甚至被排挤出居住地。因此，赋予居民正规产权并收缴土地税和服务费的前提条件，是为贫民窟居民提供与正规城市街区同等质量的公共服务和安全环境；同时政府有必要根据居民的家庭收入情况减免费用。另外，里约的草根组织十分活跃，对贫民窟更新起到了积极作用。

（3）强化“软发展”，弱化“硬治理”。自2008年里约启动“警察平定组织”计划以来，到2014年共有37支“警察平定组织”进驻里约贫民窟，用武装力量清除毒品交易，并在贫民窟内设立警点对社区进行24小时巡逻。然而，该政策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居民被随意搜身和入户检查，失去了人身自由。尽管武力是打击非法行为的必要手段，但是从长期来看，以教育、文化、经济扶助为主导的“软发展”是缓解贫民窟社会矛盾、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的重要方式。

大都市圈职住空间关系与就业可达性：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

沈忱 张纯 夏海山 程志华

摘要：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大都市圈职住空间不断分离，使得职住空间关系和就业可达性的话题越发受到

决策者和政策研究者的关注。其中，交通基础设施作为连接居住和就业功能的重要纽带，被认为是在既有职住空间格局基础上提升就业可达性的重要手段。本文探讨城市职住空间格局的形成及变化规律，以及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对改善就业可达性的影响。国际案例研究表明，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来说，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更加直接地影响着他们的就业选择和生活成本，增加其投入能明显提升就业率。相对于北美传统的职住空间分离模型，中国城市职住空间关系因快速居住郊区化、新城与开发区建设等而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郊区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薄弱可能将弱势群体置于更不利的境地。因此，在不同文化背景和发展阶段下，交通基础设施对于改善职住失衡局面的作用有所差异。恰当的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可以在既有城市职住格局的基础上提升就业可达性，平衡和优化职住空间关系，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和生活状态，从而产生更加深远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关键词：职住空间关系；就业可达性；交通基础设施；大都市圈；低收入群体；职住平衡；职住空间错位
引文格式：沈忱，张纯，夏海山，等. 大都市圈职住空间关系与就业可达性：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2): 64-69. DOI: 10.22217/upi.2017.241.

解决问题的良方，通常在问题本身之外。在 21 世纪交通问题成为全球范围内大都市圈面临的共同挑战。虽然理想的状态是职住平衡，然而事实上无论在中国还是国际上其他城市，都面临着大都市圈职住空间的不断分离。通常，如果简单地将城市与交通基础设施的关系理解为“水和面”，采取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方法，通常会导致无法控制的“一团堵死”。如果城市规划之初就形成了职住空间严重分离的格局，后期则很难通过交通本身的优化策略来彻底解决城市拥堵问题。区别于“快刀斩乱麻”的西医式疗法，想要彻底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可能要从城市和交通的机理关系出发，从中医调理的思路审视城市与交通的关系，从职住空间关系入手寻求破解交通问题的良方。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大城市职住空间不断分离，使得职住空间关系和就业可达性的话题越发受到决策者和政策研究者的关注。而随着交通系统的不断更新，城市的职住空间关系早已不仅仅受城市本身影响，新的交通方式和日益发达的交通网络将城市职住关系推向了新的领域，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开始逐渐意识到，职住空间平衡的城市能够支持大都市圈的交通顺畅；反之，如果城市在规划之初就形成了职住空间严重分离的格局，那么，不断优化的交通系统只是将原本拥堵的区域置换到其他区域，并没有从根本上应对城市交通的问题。因此，如果从城市本身来看，正是职住空间关系、就业可

达性与交通基础设施之间形成的紧密关联，应该成为研究城市交通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交通基础设施作为联系城市居住和就业功能的桥梁，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新建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和改善已有设施，可以提高城市的就业水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不仅影响职住空间格局本身，可能同时也能改善城市的交通问题。

本文选取了美国波士顿和洛杉矶的案例。波士顿是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最大城市之一，是典型的高密度城市，居住在城市中心区的群体具有明显的就业优势，其平均就业可达性远远高于居住在郊区公共交通不发达地区的群体。因此，对于居住在城市不同区域的群体来说，影响就业可达性的因素可能是不同的：在城市中心，影响就业可达性的主要是经济因素与就业岗位的数量和区位；而郊区则更多受到交通方式的影响。而位于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是典型的低密度城市。通关案例研究发现，地理距离本身并不会限制低收入群体的出行，限制他们出行的是公共交通设施的便捷程度。洛杉矶的公共交通并不发达，因此也加剧了洛杉矶的就业和居住郊区化的趋势，而城市中心区和郊区之间的职住失衡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缓解。

美国城市大多将交通基础设施布局在市中心，线路集中且覆盖范围有限。很多情况下，即便有公共交通基础设施，人们依旧愿意选择私家车出行，

因此，职住失衡问题很大程度是由于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或错位造成的。而在不断建设交通基础设施的中国城市，尤其是公交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北上广深等城市，日益严重的职住失衡更多是因为建设公交基础设施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严重的职住失衡，仅仅增加公交线路并不解决城市格局的错位。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城市，自“职住失衡假说”提出半个世纪以来，职住空间关系已逐渐发展得复杂多样。理论上，职住平衡只能单纯地体现工作地与居住地的空间距离和关系，很难衡量出就业与居住之间的复杂联系；而就业可达性的概念不仅能够准确反映出就业地本身是否已经具有较好的可达性，更能体现出从某一地点到达不同位置的就业机

会的便利程度。同时，居住与就业区位之间的空间关系越来越多样化，单一的职住比（JHB）已经很难完全呈现出二者之间的关系。当城市面对不同的发展阶段，公交基础设施对低收入者就业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已有的城市空间格局，交通基础设施究竟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将成为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展望未来中国大都市圈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传统的静态城市规划已经不能满足快速发展、动态变化中的城市的多元和复杂需求。平衡城市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之间的关系，将在城市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内在机理出发调理城市与交通之间的不匹配、构建合理和可持续的城市职住空间关系，或许成为未来破解大都市圈交通问题的有益之方。

全球城市的可负担住房政策分析及对上海的启示

贾宜如 张泽 苗丝雨 肖扬

摘要：全球化进入新阶段，人才流动性增强，社会空间极化加剧，全球城市面临相似的住房危机：住房需求增加，房价租金上涨，收入极化加剧，包括中等收入者在内的居民住房负担加重。为了提升城市竞争力和维护社会稳定，许多全球城市重新将“可负担住房”作为住房政策的核心，对迈向全球城市的上海具有借鉴意义。本文基于全球城市理论，关注全球城市如何调整可负担住房政策来应对住房和发展问题；梳理伦敦、纽约和新加坡的可负担住房政策，通过比较分析政策类型和政策得失，总结全球城市可负担住房政策相似的发展趋势和不同的制度条件，以此来评价现阶段上海市保障性住房政策，并根据上海市的制度条件提出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全球城市；可负担住房政策；比较分析；上海；伦敦；纽约；新加坡

引文格式：贾宜如，张泽，苗丝雨，等. 全球城市的可负担住房政策分析及对上海的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2): 70-77. DOI: 10.22217/upi.2016.428.

在人才流动性增强和社会空间极化的全球背景下，住房危机对于全球城市不仅是社会问题，更是发展问题。全球化进入以知识流和人才流主导的新阶段，全球城市竞争的关键是吸引高技术高水平人才以保持地方经济发展和文化活力。然而，在全球城市多数人收入的增长速度远慢于房价的增长速度，越发难以负担的高昂房价和租金成为外来移民留驻全球城市的阻碍。包含大量中等收入者的城市发展中坚力量往往被排除在传统的可负担住房体系之外，但事实上无力负担适当通勤距离内的住

房，他们变成了全球城市住房体系中的“夹心层”。

随着在全球地位的提升，上海也面临相似的住房问题：土地供应减量，住房资源紧张，房价租金高；同时城市发展需要提升人口素质，避免人才流失，缓解住房的贫富差距和空间隔离。

我们发现近年来以伦敦、纽约等为代表的全球城市在不断调整可负担住房政策，除了传统的以促进混合居住和缓解社会隔离为目标，也开始解决公共服务部门和高技能高水平工作者的住房问题。借鉴“老牌”全球城市的经验，对上海提升城市竞争

力，维护社会稳定，营造包容的城市宜居环境具有深远意义。

本文基于全球城市理论，比较分析伦敦、纽约和新加坡如何调整可负担住房政策来缓解社会矛盾和保持发展活力，为上海市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发展提出针对性建议。

在简要梳理三个全球城市政策背景和政策内容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包含政策类型（供给侧、需求侧、和规划法规），政策得失，发展趋势，和制度背景四方面的比较框架。比较研究不仅是描述事实，更要探究政策背后的制度因素。

研究发现，近年来上述三个全球城市的可负担住房政策具有相似的发展趋势：让申请者逐步获得住房所有权和扩展目标人群，更加惠及中等收入者、公共服务行业工作者和外来高技术高水平人才；避免集中安置可负担住房，而是推广混合居住社区，以缓解社会隔离。

研究进一步分析三个城市不同的制度环境如何导致了政策类型和实施结果的差异，发现即使都处于市场经济主导的背景下，土地属性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可负担住房的建设主体、政府的角色和干预手段，政府的干预力度以及规划法规和住房政策结合的程度则进一步影响政策的结果。伦敦和纽约的土地非国有，可负担住房的建设主体是政府之外的第三方机构和开发商。伦敦政府干预力度更大，规划管理和可负担住房政策结合更紧密，配建

可负担住房是获得规划许可的必要条件，政策成效相对明显。纽约则更依赖市场，政府干预力度小，政策强制性较差，成效也相对较差。这两个城市可负担住房建设的参与主体也较为多元，包括开发商、房地产金融机构、非营利组织等。多机构参与减轻了政府负担，但也导致政策实施效率较低。新加坡土地大部分归国家和公共拥有，政府是建设主体，采用集权化的高效管理模式，充分利用土地批租和规划管理调控，可负担住房的覆盖率最高，但也耗费了政府大量的人力物力。

目前上海的保障性住房政策已开始关注人才住房和社会公平的问题，包括增加租赁房建设，推行人才购房补贴等，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是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例如，产权过渡的政策相对缺乏，户籍制度约束保障性住房供给，保障性住房大多集中在郊区和中心城外围，公共配套设施落后等。借鉴其他全球城市的经验需要基于上海自身的制度环境。在城市土地国家所有的前提下，上海保障性住房政策以实物补贴为主，地方政府主导建设，与规划土地政策缺乏有机结合，市场激励机制较差。

我们为上海市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发展提出以下建议：放宽保障性住房申请的户籍限制；采用灵活的政策工具使“夹心层”人群在其经济实力范围内逐步获得住房产权；避免保障性住宅过度集中和郊区化，通过规划土地相关政策促进可负担住房原地配建和混合居住社区。

尺度重构下的国外首都特大城市地区空间规划分析

吴骞

摘要：尼尔·布伦纳批判性思考了“去地域化”理论的不足，提出了强调“再地域化”的“尺度重构”理论，他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以1970年石油危机为分界线，全球相对固定的空间社会地域结构被不断地“创造”“调整”或“转型”，以适应与承载新的发展环境，从而产生不同的特征。基于此，本文以大伦敦规划、巴黎大区规划、东京首都圈基本计划、首尔首都圈重组规划为例，比较分析国外典型首都特大城市地区空间规划的发展演进，并提出三大共同趋势，即权力下放的主体转变与协作导向，区域竞争力导向的多元发展议题与多中心分散集聚的区域空间布局。同时，本文初步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空间规划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尺度重构；首都特大城市地区；空间规划；区域协作；多中心分散集聚

引文格式：吴骞. 尺度重构下的国外首都特大城市地区空间规划分析[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2): 78-85. DOI: 10.22217/upi.2017.594.

尼尔·布伦纳 (Neil Brenner) 批判性思考了“去地域化”理论的不足, 提出了强调“再地域化”的“尺度重构”理论, 他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 以 1970 年石油危机为分界线, 全球相对固定的空间社会地域结构被不断地“创造”、“调整”和“转型”, 以适应与承载新的发展环境, 从而产生了不同的特征。基于此, 本文以大伦敦规划、巴黎大区规划、东京首都圈基本计划、首尔首都圈重组规划为例, 以 1970 年石油危机为分界线, 分析国外首都特大城市地区空间规划的发展演进特征, 提出了三大共同趋势, 即权力下放的主体转变与协作导向, 区域竞争力导向的多元发展议题与多中心分散集聚的区域空间布局。同时, 本文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空间规划进行了展望。

“尺度重构”理论下的国家权力转移首先影响到了首都特大城市地区空间规划的编制机制。在大伦敦和巴黎大区, 空间规划的编制权在 1970 年左右从国家层面转移到了区域层面, 分别建立了大伦敦议会和巴黎大区议会作为编制主体, 并发展为现在的大伦敦当局 (GLA) 和巴黎大区政府。在东京和韩国, 虽然编制权力仍属于国家政府, 但国家政府逐步开始注重与地方政府的沟通以及规划实施的地方府际协作。在这样的背景下, 规划内容也逐步从“限制”和“控制”走向了“战略引导”发展, 强制控制性条款和措辞减少, 战略引导性条款和措辞增加, 给予了地方更多的决策空间, 并从“目标导向”的计划分配走向了“问题导向”的协作治理转变。

“尺度重构”所带来的区域协作与全球协作, 改变了“诸侯经济”式的城市间过度竞争, 并在环境恶化、贫富差距加大等全球挑战下, 使得各城市之间开始以区域公共问题为导向, 基于更多元的价值取向而共同努力。在规划上体现为从“增长导向”的规划议题走向了圈层转型、包容发展、可持续发

展等“多元导向”的规划议题。

“尺度重构”理论的国家权力下放背景下, 区域发展有了更高的自由度, 而加之全球化、信息化带来的“时空压缩”潜力, 区域层面的城市化将向更大空间范围扩展, 并按不同距离的圈层进行再集聚, 从而促进了区域多中心城市布局的出现。同时, 大伦敦、巴黎大区、东京首都圈与首尔首都圈都在其空间规划中, 出于集约发展、中心辐射、地区带动的目的, 进一步强化规制了“多中心”发展格局。

在京津冀地区, 空间规划编制机制是“国家主导”的模式, 其集中决策的属性在工作效率上相对于单纯的区域主导有明显的优势, 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 为避免结构性改革带来的巨大波动, 本文认为“国家引领、区域协作”的东京模式在近期更值得借鉴。面对政绩竞争所带来的协作阻碍, 以及协作可能催生的博弈成本和风险, 需要设置互惠 (针对府际)、互信 (针对府际)、互通 (针对市场) 三方面的措施。

京津冀在后奥运时代虽然经历了一系列区域协作探索, 但京津两强极化, 生态、住房问题交织等“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仍然明显。就此, 京津冀的空间规划也可采用多中心的空间发展模式, 合理利用平衡与极化两种模式进行分散聚集。在多中心发展过程中, 功能疏散成为一大难点也是关键, 我国以疏散“低端功能”为主的措施经多年实践验证, 不能作为长远之计。借鉴国际经验, 成功的首都功能疏解首先在理念上需要认识到周边城市并不是中心城市的附属; 同时, 借助当今发达的通信交通技术, 外迁部分国家行政功能和一些不会明显依赖实体空间聚集带来的规模效应的功能。一方面, 政府起到“带头作用”; 另一方面, 真正意义上带动周边城市发展。当然, 外围承接功能的城市, 也需要主动发挥比较优势, 进行功能配置。

英国空间规划体系各层级衔接问题探讨——以大伦敦地区规划实践为例

田颖 耿慧志

摘要: 如何落实我国城市规划体制改革是城市规划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英国各级规划内容的分析, 发现英国空间规划主要通过行政体系层层对应、目标细化和过程把控的方法完成各级空间规划之间的衔

接。在深入解析大伦敦地区空间规划之间的衔接后，为我国城乡规划体制改革提出三条建议：一是简化规划编制内容和审批程序；二是清晰划分各级规划编制任务；三是加强“自上而下”的目标分解和“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

关键词：规划衔接；英国规划体系；大伦敦地区空间规划；规划实践

引文格式：田颖，耿慧志. 英国空间规划体系各层级衔接问题探讨——以大伦敦地区规划实践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2): 86-93. DOI: 10.22217/upi.2017.251.

我国与空间相关的规划数量庞大并涉及多个部门，从中央到地方各个行政层级的需要也各不相同，究竟该如何协调这其中的矛盾已经越来越受到规划从业者的重视。笔者通过深入解析英国空间规划的编制内容以及各层级之间衔接方法，试图为我国规划体系改革提供有益的策略。

英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联合王国（国体），君主立宪制与民主代议制的议会相互协调，“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配给相应的独立部门。规划事务由行政部门全权负责。英格兰的行政体制主要分为国家、区域、地方三个等级，因而有对应的三个层级的空间规划，并且其规划特点也与各级行政单位有密切对应。通过目标细化和过程把控两种方式，将国家层面的策略要求落实到地方。上层规划制定总目标，下层规划层层细化，既可以保证全国策略的统一，又能体现地方特色。并且通过制定详细的审批程序，保证规划的落实，从而将各层级的空间规划组成一个衔接完善的体系。

为了更好地了解英国各级空间规划的衔接情况，笔者以大伦敦地区的规划即《大伦敦空间发展战略》（the S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London）为例，详细解析其规划内容，如何与国家级规划对接，以及如何落实到最小的行政单位（自治市）。伦敦市长编制伦敦规划时，需要考虑国家规划文件的要求，伦敦规划中的所有政策与国家政策要保持一致，才能通过社区和地方政府部门的批准。而伦敦市和各自治市的地方规划和社区规划中的“城市愿景”，如具体的住房建设、碳排放指标、开敞空间、废物处理等内容的制定都是以《大伦敦空间发展战略》为指引。此外，还以年度监控报告的形式反馈

规划实施效果，动态监控。

英国国土面积仅为我国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大伦敦面积 1 579 km²，相当于我国一个较小的县级市（我国县级行政区平均面积 3 300 km² 左右）。伦敦下属自治市的大小相当于我国乡镇这一行政单位的面积。因而我国从国家到地方的空间规划统筹难度将会更大，衔接将会更加复杂。结合我国自身的尝试以及对英国规划体系的研究，在编制内容、审批程序、目标落实方式和公众参与等各个方面，英国的经验仍有可参考之处。

（1）简化规划编制内容和审批程序，提高规划效率。考虑国家各部门之间协调，制定全国层面的规划文件，统一编制原则。在简化审批程序方面，应提高审批效率，不能出现规划未审批已过期的情况。

（2）清晰划分各级规划的编制任务，避免规划编制内容过多重复。明确每级规划编制重点，国家和省级规划没有必要编制详细的空间指导内容，而应从目标性和原则性出发，这样更有利于下位规划的衔接。地方层面的规划则应从实施层面出发，涉及空间布局、设施分配、项目落实等，更加接地气、符合地方特色。

（3）加强“自上而下”的目标分解和“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英国将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全国的规划目标，我国的各层级规划也应紧跟国家大战略，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注入城市规划中，将目标导向型规划作为未来规划编制的重要模式。并且加强规划的公共参与，运用更多先进、便利的方式提高公众的规划参与度，例如规划网页平台、微信公众号、电视宣传等。

英国近现代规划体系发展历程回顾及启示——基于土地开发权视角

汪越 谭纵波

摘要：土地开发权近年来受到学界广泛讨论，被认为是土地权利体系中的核心，也是城乡空间规划进行资源配置的本质对象。历史上，英国 1947 年《城乡规划法》正式提出了土地开发权的概念，并奠定了英国规划体系的制度基础。基于文献研究，以土地开发权为线索，溯源英国近代城市规划的诞生和发展，回顾现代规划体系建构和演变的历程：从应对市场失灵对私人土地开发权的消极限制，到开发权国有化后的积极控制，再到应对政府失灵将发展权交还社区并与社会共享。进而从中思考和剖析城市规划的本源价值及其在发展演变中的传承和变革，并试图提炼英国经验对中国实践问题的启示。

关键词：土地开发权；城乡规划体系；近现代；市场失灵；英国

引文格式：汪越，谭纵波. 英国近现代规划体系发展历程回顾及启示——基于土地开发权视角[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2): 94-100,135. DOI: 10.22217/upi.2017.492.

这篇文章成文于 2017 年，是对本人正在完成的博士论文英国部分进行的概括。国内研究英国规划体系的成果非常丰硕，视角也非常多元，而本文缘何选取土地开发权作为切入点呢？

一方面，土地开发权最早正式出现在 1947 年英国《城乡规划法》，为英国现代规划体系奠定了基础。但另一方面，尽管土地开发权近年来受到了国内学界的广泛讨论，但主流文献除提及上述历史事实外，对土地开发权提出的背景、发展和演变过程，尤其是与规划体系的呼应关系并没有做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在研究土地开发权是什么，为什么如此关键，以及如何通过规划体系进行分配之前，有必要深入地回到历史情境下去还原和揭示其来龙去脉，以便更科学、更准确地展开学术讨论。

正是基于此，笔者梳理了大量已有的文献资料，以土地开发权为线索，将英国近现代规划体系的演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应对市场失灵对私人土地开发权的消极限制，这一阶段包含众所周知的公共卫生、住房和规划领域的立法演进过程，但是本文希望揭示的是这一过程背后的深层原因——公共卫生和住房等表象问题是私人土地开发市场失灵导致的，即负外部性不断积累和公共品供给不足；社会对于政府出手干预土地开发的期望不断提高，才催生了规划立法和技术工具。但由于开发权的私有，开发利益补偿和社会还原的机制不健全，导致这一时期的规划工具还只是消极被动的个体开发管制，更大范围、更多内容的规划管控难以实现。

第二阶段则是从 1947 年的《城乡规划法》开始，英国借助该法剥离了土地的所有权和开发权，试图在保持土地私有的前提下，将开发权收归国有，以实现之后绝大多数开发建设都必须向政府申请规划许可的目的。这一制度设计的核心在于政府试图通过占有土地开发权并以其在土地开发市场中的垄断性话语权为规划的实施背书，从而建立起积极有效的规划管控体系，对土地开发进行干预、引导和控制。但是，在有着自由市场传统、法制健全的英国，国家干预的扩张并非一帆风顺，从土地开发金的几起几落就可以观察到。政府和市场的博弈是这一历史阶段的主题。

第三阶段从 1990 年开始，规划体系暴露出效率低下、过度干预、规划层级结构过于复杂、内容繁冗等问题，难以面对市场变化，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浪潮和地方主义推进，规划改革的核心是将土地开发权交还所在的基层社区，由空间范围较地方政府更小的基层社区通过更多元的社会参与自行编制规划，配置土地开发权并分享收益以支撑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更加直接和高效地供给公共产品，管控土地开发的正负外部性。

以土地开发权的视角观察英国近现代规划体系的演变，可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在当前产权制度下作为政府行为的规划对市场行为实施干预的边界。“政府掌管一切”和“放任市场行为”存在同样的风险和弊端，如何在当前重构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过程中平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用，值得进一步深思。以土地为载体的自然资源转变为自然

资产的关键前提是产权的明晰化,在我国自然资源全民所有的基本前提下,讨论与所有权分离的开发权如何明晰化,如何通过各类空间规划进行配置,如何在市场经济下进行转移交易等等,就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本文篇幅所限,很多细节无法展开,但是还原历史图景的目的是抛砖引玉,以期引起更多的学术讨论。

我国内地规划申诉制度建设探讨——基于香港的经验

翁阳 汪坚强 郑善文

摘要:近年来,我国城市建设正经历着从增量扩展到存量发展、市民社会兴起等诸多变化,城市开发中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日益显现,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变得更加频繁、多样和复杂,各利益主体依法解决规划纠纷、实现权利救济的诉求正成为我国规划管理体系完善中必须正视的问题。我国香港的市场经济比较成熟,规划制度相对先进,其规划申诉制度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操作框架和实施体系。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香港相应制度建设的经验,结合我国规划权利救济体系的现状和问题,提出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发展建议,以推动相关制度的完善。

关键词: 规划申诉制度; 权利救济; 香港; 空间权益; 公众参与; 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

引文格式: 翁阳,汪坚强,郑善文. 我国内地规划申诉制度建设探讨——基于香港的经验[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2): 101-110. DOI: 10.22217/upi.2017.433.

近年来,我国城市建设正经历着从增量扩张到存量发展、市民社会兴起等诸多变化,城市开发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日益显现,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变得越来越频繁和复杂。图1是内地各省规划类诉讼案件数量的逐年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规划纠纷日益频繁,以及公众依法维权的诉求愈发强烈。进一步,笔者对个别典型案件进行了剖析,发现:并非在所有情况下,合理的空间权益受到侵害时都能获得有效救济,如刊登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11期)的《念泗三村28幢楼居民35人诉扬州市规划局行政许可行为侵权案》(详见全文2.2)。这激发了笔者开展本研究的兴趣,我国内地规划权利救济体系中是否存在一些制度性的

缺陷?应该如何应对?以何种方式应对?

诚然,在内地现行的规划管理体系中,由于规划申诉制度建设还比较滞后,致使公众在空间权益受到侵害时并没有通畅的救济渠道,一些利益矛盾难以调和,公众利益也屡遭损害,具体表现为:(1)在规划编制和审批阶段,已有的公众参与制度由于程序安排不足导致公众意见的效力无法保障,利益冲突的协调容易被忽视等问题,使得公众实现维权和救济的效果较差;(2)在规划实施阶段,《城乡规划法》中并未具体规定规划许可证或规划处罚决定书等有关事项的权利及其可诉的条件,目前公众在实施救济时只能参照一般意义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制度,而规划工作的专业性与特殊性使得上述制度在解决规划纠纷、实现空间权益维护方面存在明显缺陷——不能满足规划权利救济对渐变高效、广泛适用与独立公正的并时需求;(3)此外,内地规划信息公开不完整阻滞了已有制度效用的发挥。为此,亟待加强规划申诉制度的建设,更好地保障公众利益。

香港规划制度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制度体系,对内地现代规划制度的建设有



图1 内地各省近年公开的规划类诉讼案件数量变化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统计所得

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规划管理制度完善的过程中，香港逐步厘清了政府与规划的关系，构建了规划申诉制度，使规划既受命于政府，又对政府产生制衡，实现权力自身的管控约束。以香港大学黎伟聪教授为主的一批学者对香港的规划申诉制度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和分析，但多集中在适用于香港现阶段社会经济水平的、较为完备的制度形态，笔者在此基础上，结合对香港几版重要的《城市规划条例》和附加条例的梳理和解读，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香港相关制度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变迁历程，并对各阶段的制度框架、存在问题和进步之处进行了分析，

显然，这对内地相应制度进行阶段性、渐进式的改革与完善具有更好的借鉴意义。

基于对我国规划权利救济体系的问题分析和对香港规划申诉制度的介绍，本文提出如下改进建议：（1）在规划编制与审批阶段，借鉴香港规划申述制度（representation），完善内地公众参与制度，并考虑“过渡政策，逐步靠拢”的发展模式；（2）在规划实施阶段，借鉴香港规划复核与上诉制度（review, appeal），基于现行的行政复议框架构建该阶段的规划申诉制度；（3）学习香港，严格执行规划信息公开制度，作为必要的配套制度。

基于 GIS 平台的大尺度空间形态分析方法——以特大城市中心区高度、密度和强度为例

史北祥 杨俊宴

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公共设施集聚程度不断增加，使得城市出现尺度巨大化和空间复杂化的变化趋势。针对这一现象，借助 GIS 数据处理与空间分析的功能，提出了以 GIS 平台为基础的大尺度城市空间形态的分析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基础数据分析、等值线分析、空间高度拟合分析、空间波动分析、聚类分析及核密度分析等。通过这些技术方法可以更为清晰有效地反映大尺度空间高度、密度和强度的变化规律，并有助于更为深入地掌握大尺度城市空间形态特征。此外，GIS 作为一个开放平台，还有助于空间形态与人流、业态等数据的耦合关系的研究。

关键词：大尺度城市空间形态；GIS 平台；空间分析；技术方法；城市中心区

引文格式：史北祥，杨俊宴. 基于 GIS 平台的大尺度空间形态分析方法——以特大城市中心区高度、密度和强度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2): 111-117. DOI: 10.22217/upi.2017.115.

在对亚洲及我国特大城市的研究中发现，由于区域乃至全球生产要素的集聚，使得特大城市中心区公共设施的集聚等级和规模不断提升、扩展，城市中心区出现了尺度巨大化、空间复杂化的变化趋势。相关研究表明，国际上区域级中心区用地规模在 6 km² 以上，全球核心级中心区用地规模已经达到 60 km² 以上（东京都心中心区用地规模已达 68.4 km²）。在此基础上，传统的基于人体尺度的空间形态研究方法已经难以满足研究对象的需求，存在尺度感知、数据处理、分析方法等方面的种种困难，亟待建立一套大尺度城市空间形态的分析研究方法。

在大尺度的城市空间及地理空间的分析中，GIS 已经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技术方法，多用来对空

间形态进行评价与控制，对空间形态的演变进行分析，对道路空间形态进行研究，以及对数据进行分析与表现等。但这些技术方法较少深入到以建筑单体为基本单元的空间形态的分析层面。本文以亚洲特大城市中心区作为对象，尝试以建筑作为基本的空间单元，以 GIS 作为技术平台，探索大尺度空间形态最基本的高度、密度和强度的分析研究方法。

将基础数据导入 GIS 系统后，可以进行便捷的统计、分析与计算，包括根据不同属性特征的分类统计、根据数据自身特点的自然断裂点分类统计等，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心区的基本形态特征。除了这些基本的数据统计分析，借助 GIS 系统的属性连接、计算等功能，还可以便捷地计算出中心区各街区的平均高度、建筑密度、

容积率等形态指标，并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统计分析，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问题。

在空间形态的研究中，计算高度、密度和容积率指标并不困难，但这些指标在空间中的分布规律和特征的分析却相对困难。本文运用了 GIS 的等值线分析、聚类分析、核密度分析等自带工具，既可以对大尺度空间数据的基本分布规律进行分析，能够较为直接、直观地找出空间中的高密度、高强度、高高度的“硬核”，以及低密度、低强度、低高度的“阴影区”。基于此，即可更为清晰地把握大尺度空间的形态及其空间结构特征。此外，借助 GIS 的空间波动分析方法，可以更为精准地发现大尺度空间中高度的变化位置及变化程度，为进一步的形态解

析及变化动因的研究提供支撑；空间高度拟合分析则可以较为直观地以三维的方式生成空间内建筑高度的整体形态效果，从而可以更为准确地抓住空间形态的分布与结构特征，如东京都心中心区的中心统领圈层递减的形态特征、新加坡海湾—乌节中心区中心塌陷式的形态特征等。

由于 GIS 的兼容性及适用性较广，具有同时处理多源数据的能力，又是一个开放式的技术平台，可与空间相关的大数据进行对接，也为进一步对空间形态的关联性研究，如与城市业态、能耗、人流等大数据的关联与耦合分析，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撑。

三维界面视角下建筑退让道路红线方式解读

刘泉

摘要：结合国内外城市规划设计管理的相关技术标准与设计导则的案例分析，对建筑退让的方式进行解读，总结为整体退让和分段退让两类，包括刚性退让、侧向关联弹性退让、正向关联弹性退让、底层界面退让、上段分段退让和纵向分段退让等六种主要方式，分析其适用条件和技术特点。提出作为构建整体街道空间环境的重要要素，建筑退让道路红线不仅仅涉及沿街建筑单体与道路红线之间的单一空间联系，更涉及街道沿线垂直、水平、侧向等不同维度空间界面的协调关系及街道整体良好的比例尺度，对街道整体空间特色塑造和功能利用组织具有重要影响。沿街建筑退让控制应该对街道三维界面视角下的多种需求进行思考，以使这一区域发挥更加综合的功效。

关键词：建筑退让；道路红线；建筑贴线；街道界面；城市规划管理

引文格式：刘泉. 三维界面视角下建筑退让道路红线方式解读[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2): 118-125. DOI: 10.22217/upi.2016.536.

在我国的城市规划管理实践中，通常以道路红线为基准，控制建筑退让街道的间距与形式。建筑退让道路红线间距控制的基础是市政设施预留、防灾、道路扩建等必要的工程性需求，但作为街道的组成部分，沿街建筑如何退让道路受到街道整体功能组织和空间控制要求的制约，反之也对街道空间塑造以及功能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

长期以来，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控制建筑退让道路红线最小退让间距的方法，能够满足城市一般建设区建筑退让的基本空间需求，但对于城市商业中心区、逐步更新的旧城区或者是中小城市具有

居民自建自改条件的特定区域则不一定能一体适用。

通过对国内外案例进行总结，可以发现不同城市从街道三维空间塑造的角度出发，考虑沿街建筑与街道的整体尺度、街道宽度、界面功能以及相邻建筑的空间关系，形成了丰富多样的退让管理方法，被应用在城市规划技术标准和城市设计导则等不同技术文件中。对这些退让方式进行总结和梳理，可以为未来的规划设计管理提供借鉴与参考。

1 建筑退让道路红线的方式

建筑退让道路红线的方法可以总结为六种主要方式。

(1) 刚性退让是指建筑整体从道路红线向后退让, 形成最小退让间距刚性要求的方式, 以保障市政管线接驳、防灾救灾、防止噪音干扰、预留步行交通集散、进行景观营造等基本功能, 是我国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常用的方法。

(2) 侧向关联弹性退让是指参照建筑相邻两侧的建筑退让现状, 形成相协调的退让区间范围。这种方式的目的是取得沿街建筑空间布局的相对整齐, 既保障了街景的协调, 也具有一定灵活性, 适合居住区或市郊, 特别是业主自行建设、渐次改造的独户住宅建设区域, 如美国的辛辛那提。

(3) 正向关联弹性退让是指不以道路红线为参照, 而是依据建筑与道路红线内的中线或边线等其他要素的关系, 提出退让间距以满足特定功能要求的方法。建筑与道路红线的间距关系则是相对和弹性的, 较适合在条件复杂、渐次改造更新的老城区进行应用, 如日本龟山市和加拿大多伦多市。

(4) 底层界面退让是指建筑形成连续底商界面的情况下, 为了提供防风避雨的建筑遮挡、更加舒适的步行环境而进行底层界面缩进的退让方式, 适合城市中心地区和商业街区, 如东京和广州。

(5) 上段分段退让是指依据通风、采光及街道比例等城市设计原因, 建筑上段形成阶梯状分段退让的形式, 如纽约和上海等。

(6) 纵向分段退让是指沿街建筑沿纵向形成不同的区段和层次, 分别控制退让间距及形式的退

让方式, 这种方式适合与贴线率结合使用, 对不贴线的那部分建筑进行规划控制, 如多伦多。

2 建筑退让方式的利用方法特征

上述分析中退让方式的总结并不穷尽, 但能反映出建筑退让的基本方法及其意图与内涵。可以发现, 在具体的规划管理中, 对不同建筑退让方式的利用方法体现出多样性、综合性和针对性的特征。

首先, 退让方式的多样反映了街道三维界面整体视角和不同方向空间管理的多种需求, 说明了建筑退让多少距离所承载的不仅仅是单纯的工程性要求, 而是具有整体提升街道空间品质、活化街道功能的重要支撑作用。

其次, 退让方式主要包括六种类型, 但不同城市具体的退让管理实践往往不仅采用其中一种方法, 而是会综合采用几种方法, 这说明在街道三维界面的整体框架下, 上述多种需求对建筑退让方式的影响并不是单一存在, 而是综合叠加的。

最后, 不同退让方式不仅关注的重点不同, 其适用的区位条件也有所差异。因此, 如何退让需要针对不同区域、不同条件做出适宜的规划管理选择。

总体上, 由于不同退让方式本身适用条件的差异性, 这些方法如何在具体的规划管理中发挥作用, 需要结合国内不同类型和规模城镇的实际情况进行规划实践尝试和检验, 以便通过不断修正, 促进建筑退让管理在提升街道空间环境的工作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在地活化策略研究——以台北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城市更新为例

卓想

摘要: 作为台北传统老城区的宝藏岩, 面临建筑年久失修、山地安全隐患、内部交通不畅、新店溪水污染以及城市低收入人群大量集聚等现实问题, 亟待新一轮的城市更新。如何在宝藏岩老城区维持原有社会邻里网络结构的前提下, 完善老城区基础设施, 营造丰富多样的公共活动空间并且振兴区域经济发展来实现城市更新, 是宝藏岩国际艺术村面临的核心问题。本文以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城市更新为例, 系统剖析其在政策扶持推行、居民拆迁安置、社区在地营造、运营团队管理、法律制度建设等方面的策略, 解读其“在地活化”更新过程, 并以此为基础, 提出针对大陆老城区在制度创新、政策推动、空间设计、运营管理等四个层面的具体建议。

关键词: 台北宝藏岩; 在地活化; 策略; 老城区; 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

引文格式: 卓想. 在地活化策略研究——以台北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城市更新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2): 126-135. DOI: 10.22217/upi.2016.314.

老城区传统的街巷肌理、空间尺度、建筑风貌和生活习俗，承载着城市发展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内涵，是城市不可分离的有机组成部分。伴随着城市功能布局、产业结构的转型优化，传统的大规模扩张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被集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方式所取代。作为城市重要组成部分的老城区，在未来的发展中，将成为带动城市经济腾飞的驱动器，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老城区城市更新活化项目。

作为台北最成功的在地活化城市更新项目，台北宝藏岩国际艺术村面对建筑年久失修、山地安全隐患、内部交通不畅、新店溪水污染以及城市低收入人群大量集聚等现实问题，在维持原有社会邻里网络结构的前提下，优化完善老城区基础设施，营

造丰富多样的公共活动空间并且振兴区域经济发展来实现城市更新。加之，城市和文化的同宗同源，台北宝藏岩国际艺术村的更新经验值得借鉴。

文章以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城市更新为例，系统剖析其在政策扶持推行、居民拆迁安置、社区在地营造、运营团队管理、法律制度建设方面的策略，解读其“在地活化”更新过程，并以此为基础，提出针对大陆老城区在制度创新、政策推动、空间设计、运营管理等四个层面的具体建议：制度创新层面，传承有序的发展战略目标；政策推动层面，以人为本，完善“人的保存”机制；空间设计层面，发展小组团、街区式的空间组织形式；运营管理层面，完善后期运营管理，引导多元组织参与。

城市“零废弃”运动：瑞典马尔默经验借鉴

罗朝璇 童昕 黄婧娴

摘要：城市“零废弃”运动是近年来兴起的、旨在通过促进废物的减量化和循环利用，重建可持续并且有活力的社区环境的系列努力。本文以瑞典马尔默市的两个不同阶层聚居的城市更新社区“西港 Bo01”和“奥格斯滕堡生态城”为例，介绍不同层级的相关主体在这一运动中，从规划有助于社区居民开展垃圾分类的行为空间、建设针对不同废物流的循环处理公共设施，以及重新界定废物管理责任的划分机制几个方面入手，逐步深入推进循环经济系统转型的过程。结论针对我国目前城市循环经济体系建设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就新技术的适用性、城市废物管理系统变革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三方面总结借鉴马尔默的经验。

关键词：“零废弃”运动；循环利用；城市废物管理系统；生产者责任延伸制；马尔默

引文格式：罗朝璇，童昕，黄婧娴. 城市“零废弃”运动：瑞典马尔默经验借鉴[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2): 136-141. DOI: 10.22217/upi.2018.153.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废弃物大国之一，随着建设生态文明被列为我国发展千年大计，如何处理快速增加的废弃物、改善环境资源困境成了我国城市发展必须解决的难题。不久前，上海人大会议高票通过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积极推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资源循环利用，以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减塑行动”“旧衣回收”等环保公益活动也越来越多，“零废弃”的概念开始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

实际上在欧洲，“零废弃”理念从1990年代就开始逐渐获得城市管理者的关注，许多城市加入到

零废弃运动的网络之中。虽然国情与环境不同，但其经验与模式对于我国城市废弃物管理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意义。笔者利用在瑞典访学的机会，采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对瑞典南部城市马尔默的零废弃城市战略的发展路径进行了实地探索，从社区、城市尺度两个层面对零废弃战略的要素进行系统分析，并探讨了在传统市政系统下纳入生产者责任延伸（EPR: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制度的必要性。

在社区层面，瑞典通过有效的设施建设，以及行为规范和文化意识的建构，促使居民采取对环境

负责任的态度进行正确的垃圾分类。

在城市层面,采取公私合作(PPP: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形式,由政府主导,成立机构负责废弃物管理。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鼓励私营企业、民营资本参与,提高了废弃物管理公共服务的效率,实现废弃物的充分利用。

文章通过对瑞典较为完善的废弃物管理策略的经验分析给我国当下的废弃物管理系统提供了一些新思路:

技术革新是各个领域寻求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废弃物回收处理亦然,但完全依赖技术发展无法解决问题。

推行垃圾分类遇到阻碍的原因经常被归结为

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低,但马尔默奥古斯滕生态城的案例却表明长期教育并不是实现垃圾在源头分类回收不可缺少的要素。除了公众教育和宣传,城市和社区尺度的空间规划与设施完善对改变消费者的行为非常重要。

我国城市废弃物管理系统需要从政策保障、设计策略到服务管理各个方面进行系统的改变,以使社区尺度的分类活动与城市尺度的基础设施和管理系统有效衔接。

解决废弃物的问题的根本在于改变现有的价值体系,从终端概念的废弃物管理转变为资源管理,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对中国实现“零废弃”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国外城市内部空间与都市农业的整合设计实践及思考

王晓静 张玉坤 张睿

摘要: 概述中外都市农业在城市中的发展,认识都市农业对现代城市的重要贡献,强调城市内部空间发展都市农业有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分析当前国外城市内部空间与农业整合设计的案例,包括其设计策略、整合方式及技术手段,指出当今西方国家在整合农业过程中更加注重低碳环保性、现代技术性、城市艺术性以及务实创新性。结合我国城市化发展现状,探讨在城市地区发展都市农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思考中西方差异,对我国城市内都市农业的推进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

关键词: 都市农业; 贡献; 城市内部空间; 整合设计; 城市可持续发展

引文格式: 王晓静, 张玉坤, 张睿. 国外城市内部空间与都市农业的整合设计实践及思考[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2): 142-148. DOI: 10.22217/upi.2017.562.

2019年第3期文章目录

本期主题 社会—生态实践研究

颜文涛 / 生态实践的逻辑

象伟宁, 著; 王涛, 黄磊, 汪辉, 译 / 生态实践学:

——一个以社会—生态实践为研究对象的新学术领域

沈清基, 慈海, 孟海星 / 高品质生态实践: 核心特征解析及达成路径探讨

王昕皓 / 如何应用“防患于未然原则”于社会—生态实践?

袁兴中, 杜春兰, 袁嘉, 王晓锋, 熊森, 黄亚洲, 刘杨靖, 高磊 / 自然与人的协同共生之舞

——三峡库区汉丰湖消落带生态系统设计与生态实践

颜文涛, 邹锦 / 趋向水环境保护的城市小流域土地利用生态化

——生态实践路径、空间规划策略与开发断面模式

城乡研究

刘凌波, 彭正洪, 吴昊 / 基于H/T断裂点法的POI自然城市规模等级测度

郭璐 / 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西方研究述评

曹阳, 甄峰, 席广亮 / 大数据支撑的智慧化城市治理: 国际经验与中国策略

周恺, 董丹梨, 潘兰英 / 城市的正义: 西方“社会公正”思想的意识形态根源

范冬阳, 刘健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乡村复兴与重构

规划研究

刘悄然, 赵鸣, 徐放 / “胡同”空间形态对住区开放的借鉴意义

周广坤, 庄晴 / 纽约滨水区域综合评估体系研究及借鉴意义

丁国胜, 黄叶琨, 曾可晶 / 健康影响评估及其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探讨

——以旧金山市东部邻里社区为例

文超祥, 何彦东, 朱查松 / 日本利益衡量理论对我国城乡规划实施制度的启示

阎凯, 沈清基 / 香港郊野公园阶段特征与管制机制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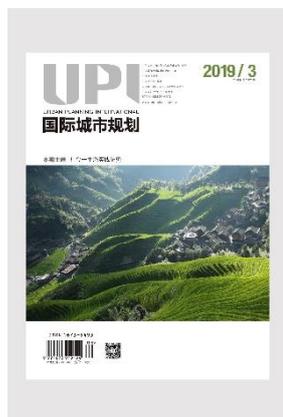
实践综述

姜涛, 姜梅 / 台北市城市设计制度构建经验与启示

专题研究

吕圣东, 陈静 / 国外视觉景观规划设计方法比较

郭璇, 崔燕宇 / 英格兰历史地区评估方法



2019年 第3期

生态实践的逻辑

颜文涛

摘要：以生态实践为研究对象，可以更好地认知和理解生态实践的基本规律，为成功的生态实践指引方向。本文从生态实践的本体论视角，界定了生态实践概念和内涵，提出了生态实践具有的系统有机性、场境依赖性、社会多样性、空间匹配性、时间联接性、要素协变性等六个特征。生态实践的逻辑强调实践主体和实践对象的统一性，总结出生态实践逻辑的五个基本法则：整体律、适境律、容错律、适应律、反馈律。五个基本法则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并避免错误的实践行动。根据知识来源将生态实践知识划分为生态科学知识、地方默会知识、实践动机知识、程序性知识等四类，构建了知识类型→问题诊断→目标制定→规划控制→实施管理→反馈调节→知识更新的生态实践框架体系。

关键词：生态实践；内涵与特征；逻辑法则；生态实践知识体系；生态实践框架

引文格式：颜文涛. 生态实践的逻辑[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3): 1-8. DOI: 10.22217/upi.2019.140.

由于以生态实践为研究对象的缺失，导致了生态实践的两类误区，直接并严重地影响到生态实践的质量，使得善境的营造举步维艰，而且对以实践为主的相关专业学科（如风景园林、城乡规划和建筑学）的教育和学术研究，带来了众多困惑并造成了持续的影响。这一具有全球普遍性的现象，在快速城市化的中国尤为明显。

1 生态实践的两类误区

第一类是基于科学逻辑的生态实践。科学研究者以旁观者而不是直接参与者的身份，按照科学的逻辑推导实践的逻辑，按照科学的逻辑精心修饰后的生态实践，往往成为展示相关知识和适用工具的最佳示范和实验场景。至于实践者能不能用这样的知识和工具？用了以后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不能或达不到预期效果应如何诊断原因并做调整？等等，诸多关键问题则少有关注。或者更准确地说，在科学或应用科学范式下，从事“客观”但却很少不是雾里看花或盲人摸象的研究，由于根本无法真正地解答这些问题，会选择无可奈何的回避，或者勉为其难地做些“合理”但却往往是似是而非的解释。

第二类是工程导向下的生态实践。以若干个离散的生态工程构成的生态实践，通常由工程技术人员（规划师、设计师和工程师等）构成的实践主体，由于不太关注（或无法有效关注）实践系统的运转机制，特别是受到实践对象的同一性、实践方式的统一性、实践投入产出效率的高效性、实践原理的普适性等现代科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工程技术人员

通常将单一视角的、有适用条件和假设前提的生态知识，直接地、不加转换地应用于具体生态实践场景中。

2 生态实践的概念、特征与类型

生态实践的广义概念是指“是以生态学原理为依据，以生态环境的整体性规律为内在制约，以人地协调发展为价值目标和人的适度需求为根本动力的物质性实践”。生态实践的狭义概念是指“人类为自身生存和发展营造安全与和谐的社会—生态环境（即‘善境’）的社会活动”，包含了生态规划与实施、设计与营造、管理与反馈等方面内容。

生态实践具有六个基本特征：（1）系统有机性。（2）场（语）境依赖性。（3）社会多样性。（4）空间匹配性。（5）时间联接性。（6）要素协变性。

按照实践对象可以将生态实践划分为七类：（1）建设开发类生态实践。（2）保护保育类生态实践。（3）绿色经济类生态实践。（4）社会文化类生态实践。（5）修复更新类生态实践。（6）污染治理类生态实践。（7）自然灾害管理实践。

3 生态实践的逻辑法则

逻辑法则一：整体律。生态实践强调实践主体和实践对象的统一，只有将主客体置于整体的叙事性框架下才能体现。实践系统具有趋异（多样化）共生的性能，可以形成相互依赖的功能或结构。

逻辑法则二：适境律。适境律也可称为匹配律，体现了场（语）境依赖性、空间匹配性、时间联接性等特征，是实践过程的人（社会）—事（行动）—物（环境）—知（知识）的时空匹配性。

逻辑法则三：容错律。针对实践过程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全可控性，承认实践过程中技术或方法可能出错，但需留出可调节改正的空间和时间。要求实践系统可以容忍这种技术错误，提供技术试错或纠错的机会。

逻辑法则四：适应律。由于外部环境变化是客观存在的，对实践系统难以完全控制和难以达到精确目标。实践系统须具有适应变化并具有原功能或形成更好状态的性能。

逻辑法则五：反馈律。监测并反馈系统状态是调节系统状态的前提，基于技术和社会的状态监测和反馈，有助于维持实践系统在动态稳定域内的期望功能。

4 生态实践的框架体系

生态实践是多目标引导下持续的整体行动过程，是一个不断试错并及时反馈调节的渐进过程。由生态规划与实施、设计与营造、管理与反馈等构成了生态实践全过程。针对生态实践过程构建的“知识类型→问题诊断→目标制定→规划控制→实施管理→反馈调节→知识更新”生态实践框架体系，所有环节均为了通过某类（系统的、空间的、社会的、技术的）形式的创造，提升整体感知和共生体验水平，更好地促进作为生命共同体的社会——生态系统的和谐繁荣和永续生存。

5 生态实践的知识体系

依据知识来源可以将生态实践知识分为四类：

（1）生态科学知识：关于实践对象的认知知识；（2）地方默会知识：关于实践主体的经验感知、宗教信仰和社会习俗等；（3）实践动机知识：关于集体行动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的知识；（4）程序性知识：关于实践步骤、实践规范和实践路径设置等知识。生态实践通常需要关注确定性因果关系的控制和概率性因果关系的引导，分析生态实践知识和实践对象的匹配程度，评估实践主体的行动需求、实施可能性以及实践行动相对目标的贡献度。

6 生态实践的理想图景：感知共生

趋异共生是进化的终极图景，多样性可以有效提升系统活力，避免争夺有限资源进行残酷竞争的方式。成功的生态实践需要深刻理解人与自然的互惠共生关系，巧妙地选择生态知识和激励机制，寻求科学理性和实践主体价值的平衡。需要培育生态实践主体特别是决策主体的五类能力：（1）理解力：深刻理解终极目标和行动关系的能力；（2）适应力：理解规则并依据变化进行调节适应的能力；（3）感知力：对具体情境的问题—结果的感知能力；（4）选择力：权衡竞争或冲突目标并作出选择的能力；（5）平衡力：平衡科学理性决策与道德情感选择的能力。实践主体特别是决策者须具备社会组织技巧，重视构建支持社会学习和环境感知的社会网络，在不同时空尺度上形成可感知的共生结构体系，构成生态实践的理想图景。

7 结语

生态实践将受到实践对象客观条件和实践主体的科学知识水平的制约，还受到实践主体宗教信仰、道德伦理、社会契约或行为习惯、地方默会知识、社会组织形式、生产生活方式、工程技术和制作工艺等因素的影响。基于技术理性主义的传统实践逻辑，往往通过选择局部的、普适性知识，解决整体的、特殊性的实践问题，没有关注实践对象和实践主体的统一性，是导致生态实践失败的重要原因。

随着实践主体更新、社会需求和认知水平的提高，每阶段生态实践目标和内容均有差异，生态实践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以实践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探索，可以帮助规划设计师理解成功的实践应该遵循的基本法则，深刻理解社会组织形式和适宜的知识对实践的作用和意义，将对以实践为主的相关学科（风景园林、城乡规划和建筑学等）的教育和学术研究带来全新的视角。

生态实践学：一个以社会——生态实践为研究对象的新学术领域

象伟宁 著 王涛 黄磊 汪辉 译

摘要：本文首次提出将生态实践学（ecopracticology）作为一个自成体系的新学术领域。为此，笔者详细界

定了生态实践学的研究对象、知识体系和认知方式，并论证了其理论独立性。生态实践学聚焦于社会—生态实践的认识与实践，并致力于其知识体系的系统化、理论化。同时，生态实践学既是独立领域又作为“黏合剂”而存在，其学术价值也体现在与其他学术领域的相互依存性上。在科学和人文的多重分支学科领域中，生态实践学凭借广泛的知识视角，深入探索社会—生态实践的本质，不仅服务于相关学科的实践，而且有助于深化其理论研究和教育教学。尤其是，生态实践学将致力于填补社会—生态实践中的理论与实践的鸿沟。最后，本文介绍了生态实践学的支撑期刊《社会—生态实践研究》(SEPR: SocioEcological Practice Research)，并对生态实践学的开拓者表达了敬意,对后继者表示了劝勉。

关键词：生态实践学；生态实践学者；社会—生态实践；社会—生态实践研究；理论与实践的鸿沟

引文格式：象伟宁. 生态实践学：一个以社会—生态实践为研究对象的新学术领域[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3): 9-15. DOI: 10.22217/upi.2019.145.

文章首次提出将生态实践学 (ecopracticology) 作为一个自成体系的新学术领域。为此，详细界定了生态实践学的研究对象、知识体系和认知方式，并论证了其理论独立性。

笔者于 2018 年 7 月 2 日在桂林理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及 ecopracticology (生态实践学)，这是笔者首创的一个中文术语的英文翻译。“生态实践学”一词由生态 (ecological)、实践 (practice) 和学 (study, knowledge) 三部分组成，字面意思是“生态实践的学问与知识”。Ecopracticology 一词是在同一标准下创造的，涵盖了 eco (生态)、practice (实践，能动的人类行为) 和 ology (学，系统性研究) 三个方面。可见，“生态实践学”一词并非直接源于实践在生态学中的深入，而是介乎于“生态”与“学”之间。

生态实践学是对社会—生态实践及其后续知识体系的研究。它能够作为一个独立学术领域得益于：(1) 将社会—生态实践定为研究对象；(2) 致力于构建社会—生态实践的知识体系；(3) 实用的认知方式。

生态实践学聚焦于社会—生态实践的认识与实践，并致力于其知识体系的系统化、理论化。社会—生态实践是一种人类行为和社会过程，可涵盖人类行为和社会过程的六个不同但又相互交织的类别——规划、设计、建设、恢复 (restoration)、保护和管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社会—生态实践

既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系统 (a system of systems)，又是一个与其他系统相关联的系统 (a system among systems)。除自然系统外，它还与人类社会的其他社会系统有机联系着。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生态实践者们就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原错性 (original flaw) 和非理性 (wickedness) 的泥潭，必须谨慎地通过反复试错 (trial and error) 和渐进焗补 (evolutionary tinkering) 的方式加以应对。

诚然，生态实践学的理论本质是聚焦“特定” (extremes) 的特殊性理论，而不是关于“普适” (averages) 的一般性理论。但后者在生态实践学中同样被接受，因为它可以作为前者知识体系的补充，可以更明确地指明社会—生态实践的真正意义。

生态实践学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独立领域，得益于与其他相关研究领域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在科学和人文的多重分支学科领域中，生态实践学凭借广泛的知识视角，深入探索社会—生态实践的本质，不仅服务于相关学科的实践，而且有助于深化其理论研究和教育教学。尤其是，生态实践学将致力于填补社会—生态实践中的理论—实践鸿沟。

最后，文章介绍了生态实践学的支撑期刊——《社会—生态实践研究》(Socio-Ecological Practice Research)，并对生态实践学的开拓者表达了敬意，对后继者表示了劝勉。

高品质生态实践:核心特征解析及达成路径探讨

沈清基 慈海 孟海星

摘要:“品质”与“生态实践”为当今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然而目前尚缺乏“高品质生态实践”的系统性研究。本文在对“生态实践”概念进行文献梳理及学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实践”及“生态实践品质”的概念界定;在对国内外近50个优秀生态实践案例进行多方面梳理解析的基础上,归纳提炼出高品质生态实践的10个核心特征;并从逻辑路径、研究路径、方法路径三个角度对达成高品质生态实践的步骤展开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生态实践;生态实践特征;生态实践品质;高品质生态实践;生态实践解析;逻辑路径;研究路径;方法路径

引文格式:沈清基,慈海,孟海星.高品质生态实践:核心特征解析及达成路径探讨[J].国际城市规划,2019(3):16-29. DOI: 10.22217/upi.2019.150.

1 为什么要研究这一议题?

国内外学术界均将“品质”作为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国外比较重视对“良品”(好的品质, good character)与“劣品”(差的品质, vice character)的研究。国内近年来较为热衷的“品质生活”“品质环境”“品质城市”“品质规划”,实际上都漏了“高”,是将“品质生活”“品质环境”“品质城市”“品质规划”与“高品质生活”“高品质环境”“高品质城市”“高品质规划”加以等同。

“生态实践”尽管给人褒义的感觉,但实际上是一个中性词。生态实践主体具有“寻求”各类实践活动的良好结果的主观意愿,但是,主观目标与意愿的生态性不能保证过程与客观的生态性,更不能保证结果的生态性。生态实践既可以具有高品质,也完全可能呈现低品质。目前,存在着较多的以“生态”为目标而实际生态绩效、生态品质远未臻完善甚至产生负面生态绩效的例子,说明对“高品质生态实践”进行研究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2 研究思路是怎样的?

文献梳理—学理分析—核心概念界定及关系分析—案例分析—“高品质生态实践”核心特征归纳提炼—达成“高品质生态实践”目标的逻辑路径、研究路径、方法路径。

3 “生态实践品质”与“高品质生态实践”有何差异?

两者有很明显的差异。“生态实践品质”是指由价值、理念、方法、逻辑、行为等综合因素决定的生态实践所实现的物质功能、经济功能、社会功能、文化功能、生态功能、精神功能等方面的各类综合

作用和表现,以及所产生的各种内、外部效应的总和。“生态实践品质”是中性词,而“高品质生态实践”是指生态实践具有多方面的较高的质量和品位,发挥了积极的综合功能和作用,产生了积极的效果。“高品质生态实践”是褒义词。

4 “高品质生态实践”有哪些核心特征?

通过对将近50个国内外生态实践案例的梳理、分析、归纳、解析,笔者提出了“高品质生态实践”的十个特征,或称之为积极性属性。具体包括:生态性、智慧性、多效能性、转化(优)性、人文性、历史传承性、公众参与、韧性、生态+艺术、高水平人力资本。

5 “高品质生态实践”有哪些达成路径?

包括逻辑路径、研究路径、方法路径。在逻辑路径上借鉴全面质量管理思想,笔者将达成高品质生态实践的逻辑路径表达为PDCA四个阶段:P指Plan(计划),D指Do(执行),C指Check(检查),A指Act(处理)。在研究路径上,笔者提出了基于生态—智慧—人文的高品质生态实践技术路线,认为高品质生态实践的核心要素包括生态、智慧与人文三个方面,其中生态(性)表明生态实践应在遵循生态环境演进规律的基础上展开,智慧性描述了高品质生态实践的创新—科学性,人文(性)则指代了生态实践的出发点与归宿。在方法路径上,笔者提出了从目标、措施、技术、环境、文化与社会参与等六个方面达成高品质生态实践的一般性原则方法。

如何应用“防患于未然原则”于社会——生态实践？

王昕皓

摘要：社会—生态实践研究旨在支持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社会实践，包括政策和法规的制定。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充满很多不确定因素。有些变化是人们有意而为的，如改善生活环境，而有些变化是不希望发生的，如犯罪事件增多。当这些变化对生命财产或正常生活造成严重危害时，我们就称之为灾害。伴随最近两百多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越来越多的人口集中在城市。自1970年代以来，由于人口、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很多学者和决策机构提倡将“防患于未然原则”作为制定公共政策的指导方针。虽然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制定政策时遵循防患于未然原则，但反对和质疑的也不在少数。回顾有关防患于未然原则及其应用的争论可以看出，双方其实对该原则的概念并无异议，但在面对潜在的危害时，就该原则对决策的指导功能的评价却大相径庭。究其原因，争论的主要症结在于双方都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以说服对方。可是，防患于未然原则的兴起正是因为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不确定性，因此要求这一原则能给决策者提供具体指南本来就是不成立的。那么，对于这个在缺乏精准科学知识支持下必须做出决策的非理性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近年来兴起的生态智慧和韧性思维可以为在社会—生态实践中应用防患于未然原则提供必要的支持。生态智慧作为智慧的一种，追求的是基于知识、经验和道德规范构建生态和谐的社会生态系统的功能。韧性思维促使我们关注发展以外的系统特性，承认对系统有威胁的灾害总会发生而且其发生的时间、地点、规模、频率等都是不确定或不可预测的。因此系统必须具备随时应对突如其来的灾害袭击、保障系统功能持续的能力。目前有关防患于未然原则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把趋利避害分开考虑，将趋利看作私人行为而将避害看作公共行为。本文意在通过提倡生态智慧与韧性思维的结合，使每个人都愿意担当起“审慎避害”的责任和义务。如果我们在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必须做决策时都以实现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为目的，减少人类诱发的灾害，就可以恰当地应用防患于未然原则提高社会生态系统的质量和韧性。

关键词：防患于未然；不确定性；韧性；生态智慧；变化

引文格式：王昕皓. 如何应用“防患于未然原则”于社会—生态实践? [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3): 30-36. DOI: 10.22217/upi.2019.166.

自然与人的协同共生之舞——三峡库区汉丰湖消落带生态系统设计与生态实践

袁兴中 杜春兰 袁嘉 王晓锋 熊森 黄亚洲 刘杨靖 高磊

摘要：三峡水库蓄水后水位季节性波动给消落带来了极大的环境胁迫，包括对水库自然环境的不利影响和对库区移民生存质量的影响。本文以三峡库区重庆开州区汉丰湖为例，基于协同进化、协同共生及水敏性设计等生态学原理，针对汉丰湖水位变化特点，将汉丰湖消落带作为一个整体生态系统，进行了消落带生态修复设计及工程实践。9年的观测研究表明，人与自然合作进行的汉丰湖消落带生态系统设计及营建，发挥了地表径流水质净化、生物多样性保育、稳定湖岸、美化景观等多种生态服务功能。不同水位时期优美的消落带及滨湖景观，为开州城区居民提供了良好的休闲、观赏、游憩场所，这个移民城市的人居环境质量得到了不断优化和改善。由于充分吸纳了原住民对消落带及滨水空间的良好意愿，使得消落带生态修复及景观优化这一生态实践活动融入开州城区这个社会大系统中，成为社会系统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实现了人与自然协同共生之舞的目标。

关键词：消落带；生态系统设计；生态实践；协同共生；汉丰湖；三峡库区

引文格式：袁兴中，杜春兰，袁嘉，等. 自然与人的协同共生之舞——三峡库区汉丰湖消落带生态系统设计与生态实践[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3): 37-44. DOI: 10.22217/upi.2019.143.

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畅游武汉长江之后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留下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壮丽诗句。2010年10月26日，三峡工程蓄水到175 m，高峡平湖梦想成为现实。175 m蓄水后，由于防洪、清淤及航运等需求，三峡工程实行“蓄清排浑”的运行方式，夏季低水位运行（145 m），冬季高水位运行（175 m），在145—175 m高程的库区两岸，形成涨落幅度达30 m、面积达348.9 km²的消落带。这是一个沧桑巨变！在三峡水库消落带及其邻近区域，人地矛盾突出，科学与社会的冲突异常剧烈。如何重建三峡水库消落带这一新河岸系统的协同共生关系，是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及关键技术问题。

自2003年三峡水库首次蓄水以来，我们一直在三峡库区进行持续不断的观察和研究。消落带形成前，很多人都在忧虑什么样的植物能耐受长时间的冬季水淹？冬季水淹之后，夏季消落带出露时，会不会成为不毛之地？夏季消落带出露季节，正是三峡库区的高温酷暑季节，如何使消落带景观变得更加优美？在前期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我们选择位于三峡库区腹心区域的重庆开州区汉丰湖消落带，进行相关研究和恢复治理的生态实践。开州区消落带面积大、类型多、生态环境问题复杂。三峡水库蓄水后，在开州区形成了周长385.46 km、面积55.47 km²的消落带。开州城区人口有35万人口，消落带与人居环境交互影响。2009年开州区政府在城区下游4.5 km处的乌杨村开始修建水位调节坝，坝高178 m。当水位调节坝下闸蓄水时，将水位消涨幅度由30 m降至4.72 m，形成独具特色的“城市内湖”——汉丰湖。汉丰湖是典型的双重水位变化，即冬季三峡水库高水位运行时，汉丰湖水位维持在175 m；夏季当三峡坝前水位消落到145 m时，水位调节坝下闸蓄水，汉丰湖水位保持在170.28 m。这是一个典型的动态水位变化。我们希望通过生态修复及景观优化设计和实践，重建健康、稳定的汉丰湖

消落带生态系统。

1 目标

重点针对环汉丰湖消落带及滨水空间，从2010年开始，进行了汉丰湖消落带生态系统结构、功能、过程的整体设计和生态实践。目标是：发挥消落带作为水陆动态界面的污染净化、库岸稳定、生物多样性保育、景观美化等功能，全面优化和提升消落带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2 一个持续不断的生态系统设计实验

汉丰湖消落带的生态修复及景观优化，将湖周山地第一层山脊、面山汇水区域、城市、滨水空间、消落带、湖泊水体作为整体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要素，进行“山水林田湖草城”生命共同体设计。在这个生态系统设计中，最关键的要素是作为水陆界面的消落带及滨水空间。按照这一界面的组成和环境特点，设计和实践分别包括湖岸、湖湾、入湖支流河口的消落带。

（1）适应水位变化的多功能生态湖岸设计

建设景观基塘：借鉴“桑基鱼塘”传统农业文化遗产和中国乡村多塘系统生态智慧，自2011年起，从汉丰湖石龙船大桥南岸至芙蓉坝、石龙船大桥北岸至头道河段，设计并实施了景观基塘系统，栽种了适应于季节性水位变动、具有环境净化、景观美化等功能的湿地植物，形成汉丰湖水陆界面的一道生态屏障。

构建多带多功能缓冲系统：在汉丰湖北岸乌杨坝，设计并实施了“170 m以下消落带自然恢复草本植被带 + 170—175 m消落带复合林泽带 + 175—176 m临水高草草本带 + 176—180 m复合混交植被带”多带多功能缓冲系统，充分考虑其固岸护岸、景观优化、环境净化，以及作为鸟类、鱼类和昆虫等野生生物生境等多种生态功能。

营建环湖小微湿地群：在汉丰湖南岸从游泳馆至水位调节坝，在海拔175—178 m的滨水空间设计并营建环湖小微湿地群，包括雨水花园、青蛙塘、蜻蜓塘、生物沟、生物洼地等。

（2）生态湖湾设计

2011年起，在汉丰湖南岸芙蓉坝湖湾海拔160—180 m区域，设计和建设“环湖小微湿地+林泽—基塘复合系统”，从消落带以上的滨水空间，至消落带下部，形成一个多功能的多维湿地系统。

（3）入湖支流河口生态设计

对汉丰湖所有入湖支流河口，进行以河口湿地为主的生态系统设计。自2011年以来，对汉丰湖北岸较大的支流头道河入湖河口，进行了以“多塘湿地系统+消落带护岸植被+河口景观基塘”为主的生态系统设计和营建。

3 协同共生之舞—设计成果展示

自2010年开始汉丰湖消落带生态系统设计及生态实践以来，自然与人的协同共生之舞，展示了动人舞姿，结出了一批硕果。

美丽的“树坚强”：筛选出了一批耐冬季深水淹没和季节性水位变化的消落带适生植物物种，池杉、落雨杉、乌桕、秋华柳等耐水淹乔灌木，经历多年水淹考验，夏季绿野遍地，秋季水中五彩缤纷，存活状况良好，它们是真正的“树坚强”。

净污染、美景观：汉丰湖消落带景观基塘系统、环湖小微湿地、湖湾多维湿地、生态河口设计与建设，不仅提供了景观优化功能，同时在汉丰湖与城市地表径流污染源之间构建了一道拦截屏障，有效

削减了入湖污染负荷。

野生生物的天堂：汉丰湖消落带植物群落结构稳定，生物多样性提升效果明显。目前观察到130多种鸟类，发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天鹅、鸳鸯等珍稀水鸟，汉丰湖已成为三峡库区乃至长江上游重要的水鸟越冬地。

移民新城人民的幸福生活：持续多年的汉丰湖消落带生态修复及景观优化生态实践，使得这个移民新城的人居环境质量得到了不断优化和改善。汉丰湖不同水位时期优美的消落带及滨湖景观，为开州移民新城的居民提供了良好的休闲、观赏、游憩场所。由于充分吸纳了原住民对消落带及滨水空间的良好意愿，使得消落带生态修复及景观优化这一生态实践活动融入到了开州城区这个社会大系统中，成为社会系统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实现了人与自然协同共生之舞的目标。

富有生态智慧的汉丰湖消落带生态系统设计及营建，创新性地构建了大型水库城镇段消落带生态修复与景观优化技术体系，为大型湖库消落带生态修复及滨水空间景观优化提供了可推广、可复制的技术方法及生态实践模式，拓展和创新了逆境生态设计和景观生态修复理论。汉丰湖消落带生态系统设计和生态实践，是人与自然协同共生之舞的结果。

趋向水环境保护的城市小流域土地利用生态化——生态实践路径、空间规划策略与开发断面模式

颜文涛 邹锦

摘要：解析城市小流域土地利用与河流水环境的相互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土地利用规划与水环境管理的内在关联，为趋向水环境保护的城市土地利用生态规划提供科学依据。通过梳理前人实证性研究的相关结论，本文总结凝练小流域土地利用和水环境相互关系的规律性认知；探讨水环境管理目标对土地利用的约束和引导；提出整合水环境管理目标的城市小流域生态实践路径；从城市小流域的土地利用规模控制、类型引导和形态布局三个方面，提出提升水环境绩效的空间规划策略；针对强约束、中等约束、弱约束等三种不同约束类型的城市小流域，采用断面梯度分析法，提出从河源到河口纵向梯度的三种典型的城市小流域开发断面概念模式。探索将量化水环境目标转译为空间规划策略，可为改善城市河流水环境质量提供空间框架，有助于采用规划手段有效地应对城市水环境问题。

关键词：城市小流域；水环境绩效；生态实践路径；空间规划策略；开发断面模式

引文格式：颜文涛，邹锦. 趋向水环境保护的城市小流域土地利用生态化——生态实践路径、空间规划策

探讨水环境管理目标对土地利用的约束和引导, 将量化水环境目标转译为空间规划策略, 探索基于反馈调节的城市小流域生态实践路径, 形成水环境导向下的城市小流域生态断面分区模式, 为大都市区小流域水环境管理提供综合框架。本文是针对特定类型生态实践方法和路径的探索。

1 小流域土地利用对河流水环境的影响规律认知

小流域土地利用规模对河流水环境的影响效应: 不透水表面率在 20%~80%之间, 小流域的径流总量将快速增长, 20%不透水表面率可能是径流迅速增加的阈值。国际相关研究表明, 当小流域不透水表面率在 10%以内, 能有效维持河流水环境的健康状态; 当小流域不透水表面率在 10%~30%, 河流水环境的健康状态将受到影响; 当小流域不透水表面率超过 30%, 河流水环境的健康状态将会退化。国内相关研究表明, 当城市建设用地比例达到 20%~30%, 该小流域的河流水环境退化严重。

小流域土地利用类型对河流水环境的影响效应: 各类用地年均污染负荷输出系数不同, 由于各个小流域的土壤条件、水文地质条件、地理形态、植被条件、河流形态结构等存在差异, 不同区域的城市用地的非点源污染负荷输出系数有一定差异。通过采用各类用地的年均污染负荷输出参数, 初步估算土地利用方案的污染负荷输出总量, 可以帮助规划师确定规划发展后的潜在水环境影响区域, 为调整优化规划方案并确定空间环境管制提供基本依据。

小流域土地利用形态对河流水环境的影响效应: 小流域各类用地越分散(斑块密度和边界密度大, 景观破碎化程度大)的情况下, 河流水体有机污染和营养物质浓度可能越高。小流域内城市建设用地的破碎化, 可能导致更高的水环境污染, COD、BOD 水质指标对建设用地破碎化程度较敏感。建设用地与水域邻接边界密度越大, 可能导致 TP(总磷)浓度越高。但是 TN(总氮)对城市建设用地形态结构基本不敏感。非建设用地的破碎化和形态简单化, 将导致更高的 COD、BOD 和 TP 浓度。具有相对聚集和形态复杂的非建设用地, 有利于维持更好的小

流域水环境质量。

2 城市河流水环境对小流域土地利用的控制与引导

城市河流水环境质量对城市建设用地的影响和约束: 水量充足稳定并达到 II 类水质的水环境条件, 适合自然保护区或饮用水源保护区等水环境功能, 该类小流域应该严格保护, 可以布置较低密度的居住用地。达到 III 类水质的水环境条件, 适合饮用水源或景观娱乐等水环境功能, 该类小流域可以布置适度规模的居住用地、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和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不宜布置二、三类工业用地。水量充足稳定和达到 IV 类或 V 类水质的水环境条件, 适合景观娱乐或工业用水等水环境功能。该类小流域的土地利用约束强度中等偏弱, 可以布置规模较大的各类建设用地。

城市河流水环境对小流域非建设用地的功能引导: 以自然保护和饮用水源为水环境主导功能的城市河流, 具有内在适宜的综合价值, 应该引导该类小流域维持完整的生态系统结构, 维护或修复良好的自然覆被。以景观娱乐为主导功能的城市河流, 需要适度限制该类小流域上游水源涵养区的开发活动, 强调最大程度降低对自然过程的干预, 生态空间结构需要考虑能够支撑自然水文过程。以工业用地和农业用水为主导功能的城市河流, 需要维持水体的净化功能和保持水域的水环境容量, 修复关键的生态系统结构控制土壤侵蚀。以泄洪排水为主导功能的城市河流, 重点提升非建设用地的洪涝调节服务能力。该类河流所在的小流域应该保存蓄滞洪区的自然特性, 通过自然调节过程减缓洪涝强度。

3 整合水环境目标的城市小流域生态实践路径

提出了“增长需求→服务供应→反馈调节”三路反馈调节控制方法。从实践全过程回应水环境目标的需求, 主动响应了水环境功能和水质目标, 从水环境与土地利用的内在关联性, 将土地利用规划和控制作为水环境的管理工具, 通过权衡选择后提出相应的措施。将水环境质量标准、可接受的污染负荷分布以及水环境的地方感和美学价值转换为小流域人口增长和土地开发容量, 制定与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一致的水环境质量标准 and 主导功能, 确定

合理的土地利用模式。将量化的环境管理目标引入土地利用规划，从生态实践的整体视角提供水环境管理的实施框架。

4 趋向水环境保护的城市小流域土地利用生态化策略

策略一：规模控制策略，确定“应该开发多少”。根据城市规划区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基于人口和经济增长率，考虑建设用地现状规模，初步确定城市规划区增长规模。

策略二：类型引导策略，确定“开发什么”。依据土地利用的类型效应原理，引导建设用地类型和水环境敏感区的生态服务功能，提出与水环境功能和水质目标相容的土地利用原则。

策略三：形态布局策略，确定“在何处开发”。依据土地利用的形态效应原理，强调支持自然水文过程的非建设用地紧凑布局结构，形成相对聚集和形态复杂的非建设用地布局结构，构建建设用地与非建设用地空间的有机耦合关系。

5 水环境导向下的城市小流域生态断面分区模式

强约束小流域生态断面分区概念模式：为了确保这类小流域的水域功能正常发挥，基于规模效应阈值原理，小流域的不透水面积率应控制在10%以内（建设用地比例控制在15%左右）。从上游河源至下游河口，可以基于次小流域将强约束小流域空

间分为环境敏感区、休闲游憩区、低密度居住型社区、河口景观区等五类生态断面分区。

中等约束小流域生态断面分区概念模式：针对这类小流域的水域功能，基于规模效应阈值原理，小流域的不透水面积率应控制在10%~20%左右（建设用地比例控制在15%~35%左右）。从上游河源至下游河口，基于次小流域将中等约束小流域空间分为休闲游憩区、低密度居住型社区、中密度混合社区、高密度混合社区、河口景观区等五类生态断面分区。

弱约束小流域生态断面分区概念模式：为了确保这类小流域的最低水域功能正常发挥（避免黑臭等水环境恶化现象），基于规模效应阈值原理，小流域不透水面积率应控制在20%~30%左右（建设用地比例控制在40%~60%左右）。该类水域功能的小流域空间可以承载较高强度的开发建设活动。以景观娱乐为主导功能的小流域，从上游河源至下游河口，基于次小流域将弱约束小流域空间分为休闲游憩区、低密度居住型社区、高密度混合社区、中央商务型社区、中密度混合社区等五类生态断面分区。

对以排水泄洪为主导功能的小流域，可以将该小流域空间分为低密度居住型社区、中密度混合社区、工业型社区、生产服务区等四类生态断面分区。

基于 H/T 断裂点法的 POI 自然城市规模等级测度

刘凌波 彭正洪 吴昊

摘要：城市规模等级及边界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城市研究的重要内容，但仅凭传统的人口与经济规模统计数据通常无法精准界定，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引入灯光遥感、手机信令、道路交叉口以及基于位置的社会网络（LBSN）等新数据界定城市边界，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测度城市规模，可仍然存在数据表征性不强和缺乏分级标准两个问题，因此有学者通过 H/T 断裂点法来进行城市规模等级划分及边界界定。研究以反映丰富经济活动的兴趣点（POI）为数据，构建不规则三角网格（TIN），引入 H/T 断裂点法分级方法，对中国大陆城市的自然城市规模进行了测度和等级划分。通过与传统社会经济数据、开放数据的对比，以 POITIN 城市刻画方法和 H/T 断裂点法生成的自然城市边界反映了相对真实的聚居规模，遵循了位序—规模的齐普夫（Zipf）分布规律，为具有长尾序列和分形结构的城市规模自然分级提供了科学方法。研究验证了该方法在自然城市规模测度和分级中具备推广性，在精度及真实数据获取性方面有较大优势，对城市边界划定和规模分级有重要的研究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大数据；自然城市；长尾法则；位序—规模；H/T 断裂点法；不规则三角网格

引文格式：刘凌波，彭正洪，吴昊. 基于 H/T 断裂点法的 POI 自然城市规模等级测度[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3): 56-64. DOI: 10.22217/upi.2017.090.

1 问题的提出

Hey, 朋友, 你几线的? 每年总有媒体推出一、二、三、四乃至十八线城市的界定。这类关于城市地位、发展机遇、房产保值率的白皮书总是能吸引大众的热烈讨论。在周边人群津津乐道眼花缭乱的城市排名时, 城市研究者总会思考与此有关的关键科学问题: 如何科学界定城市规模, 以及如何划定其等级。

2 自然城市

美国经济学家蒂伯特(Charles Tiebout)曾指出人们会“用脚投票”(voting by foot / vote by foot)。人的聚集强度反映了城市的真实规模。由人类活动强度自然划定的城市也可称为自然城市。

3 研究切入

在传统城市研究中, GDP、人口等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常被用于界定城市规模, 但其时效性和准确度不足。随着大数据环境的日益成熟, 灯光遥感、人工覆盖、道路网络以及社交网络位置(LBSN)等数据亦被用于界定城市建成区边界与规模。北京城市实验室(BCL)曾开放了以上述数据划定的不同城市边界, 但不同数据划定的边界差异较大。城市规模的界定仍需要选择比较、选择和验证数据和相应的模型方法。

4 数据选择

城市系统具有复杂性, 人口分布密度并不均匀, 谁又能知道人口密度的高低呢? 我们猜测可能路边摊老板或者小吃店老板可能更清楚。因为开小吃店的老板可能知道哪里人多, 哪家店隔壁还能再开一家。换句话说, 某区域人口密度越高, 开设的餐饮店越多。志愿者地理信息(VGI: Volunteer Geographic Information)和兴趣点(POI: Points of Interests)记录了成千上万家餐饮店老板所掌握的人流强度信息, 是一种反映了城市复杂性和自下而上的人类活动的数据。

5 模型方法

本研究采用瑞典耶夫勒大学(University of Gävle)江斌教授(Bin Jiang)提出的TIN-H/T方法。首先利用POI构建三角形不规则网络(TIN: Triangular Irregular Network)作为城市人口分布基本地理单元; 其次, 利用H/T断裂点法(Heat/Tail breaks, 也被称为“掐头去尾法”)对具有长尾特性的数据进行自动迭代自动分级, 基于Zipf验证后提取第一级基本单元作为自然城市区域; 最后, 基于所提取的全国城市自然城市区域以H/T断裂点法进行自动分级。

20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西方研究述评

郭璐

摘要: 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是西方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20 世纪中叶后这一研究走向系统和深入, 其主要领域包括: 关注普遍特征的城市形态通史研究、进行多样化与跨学科探索的个案城市研究, 以及从特定角度出发的城市形态形成机理研究。这些研究的比较性研究视野、现代科学方法和独特的文献选取途径对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但其研究立足点与材料获取范围的局限性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综合来说, 全球史视野下的“在地”研究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古代城市形态; 西方研究; 在地性; 全球视野; 比较研究; 城市史

引文格式：郭璐. 20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西方研究述评[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3): 65-70, 117. DOI: 10.22217/upi.2017.110.

中国古代城市形态是西方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20 世纪中叶之后，开始走向综合、系统的科学研究。这主要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学者费正清为代表的综合性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的兴起，二战后城市重建和扩张的高潮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城市形态研究的热情。

1 对普遍特征的持续追求：城市形态通史研究

这类研究的共同目标是：梳理发展脉络，发现中国古代城市形态区别于西方 / 欧洲城市的普遍特征。相关研究延续几十年，研究材料（尤其是考古材料）日益丰富、充实；研究主题也从早期对形态的概括性描述，逐步发展到对演进模式与规律的挖掘。但是其共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在研究方法上，与西方古代城市的多方面比较是学者们长期以来秉持的重要研究路径；在研究结论上，具有明显的连续性，若干早期形成的基本观点在不同时期的研究中被反复强调，包括：（1）城市形态的同一性和连续性；（2）大尺度；（3）有城墙的方形城郭；（4）突出的政治性；（5）明显的中轴线；（6）《考工记》王城模式，等等。

2 多样化与跨学科的探索：个案城市或地区的城市形态

这类研究的主要目标在于以小见大，揭示中国古代城市形态某一方面或某一时期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通史研究强调一致性、同一性的反思。就其发展趋势而言，研究对象由都城逐渐扩展到地方城市，由单纯的物质形态研究扩展到物质形态与社会生活的互动；研究方法由文献方法和考古方法的结合，逐渐发展到数字技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等的融入；研究材料也相应地走向综合、多元；但就现有研究而言，仍比较明显地集中在数个名都、名城上。

一类研究聚焦于城市物质形态，运用调研、文

献、考古等材料，复原城市形态，研究空间特征，包括：（1）长安、洛阳、北京等著名都城作为皇权、政治控制下的典型城市形态；（2）苏州等江南城市作为“唐宋城市变革”的典例；（3）对特定城市形态要素的精细化和定量化分析。

另一类研究则关注城市物质形态和社会生活的互动，提高了城市形态研究的精度、深度和广度。20 世纪晚期以来，伴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此类研究大量涌现，主要集中在（1）明清社会（商品）经济变迁中的城市发展；（2）边疆地区的“非中国”城市传统。

3 特定角度的深入挖掘：城市形态形成机理研究

除了对城市具体形态的探讨，还有一类研究试图挖掘物质形态的形成机理与动因，这些研究或多或少都带有一层神秘性乃至宗教性的面纱，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以下两个主题。（1）对堪舆（风水）的研究。早在 1872 年出版的《汉语词汇手册》即列举“风水使用的名词”；乔瑟芬·李约瑟（Joseph Needham）、王斯福（Stephan D. R. Feuchtwang）等进一步探索了堪舆术的知识系统与技术支撑；还有学者将一些经典的风水类古籍翻译为英文。（2）对中国城市与宇宙模式关系的研究。

4 评价与反思

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研究深刻影响了中国本土学术的发展，积极与消极影响并存。就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研究而言，城市牢固地附着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具有明确的“在地性”（locality），本土学者在研究材料占有、宏观脉络把握等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与此同时，西方学者的研究也具有自身的创造性和启发性：多学科史料和方法的运用、全球史和比较研究的视野、从单纯的物质形态研究走向内在机理的研究趋向，等等。全球视野下的“在地”研究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大数据支撑的智慧化城市治理：国际经验与中国策略

曹阳 甄峰 席广亮

摘要：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城市各社会群体间利益格局不断分化，公共事务不断增加，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面临着转型与变革。智慧城市建设推动了大数据技术的迅速发展，通过采集、整合城市各类要素运行数据，动态监测城市发展现状，为城市治理过程中决策制定与部门协作提供数据与技术支撑。本文

在梳理我国当前城市治理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选取了芝加哥、新加坡与纽约这三个大数据应用的代表性城市作为借鉴案例，重点从城市运行动态监测、城市发展情景预测以及城市多主体协同共治三个核心方面分析其实际应用模式与方法。在此基础上，将国外成熟的经验模式与我国自身发展现状相结合，重点提出了大数据支撑下智慧化城市治理的创新模式与具体应用架构，并深入阐述了大数据在掌握城市运行现状、辅助城市治理决策、监督城市治理过程以及拓展公众参与渠道四个方面的结合应用思路，以期为我国智慧化城市治理的实践工作提供理论指导与方法借鉴。

关键词：大数据；城市治理；经验借鉴；应用模式；策略研究

引文格式：曹阳, 甄峰, 席广亮. 大数据支撑的智慧化城市治理：国际经验与中国策略[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3): 71-77. DOI: 10.22217/upi.2018.101.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规模与人口急速扩张，不同社会群体间利益格局分化导致矛盾激增，城市公共事务日趋复杂，高房价、道路拥堵、噪声污染、雾霾等“城市病”越发严重，给城市高效运行和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与挑战，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也亟须转型与变革。

智慧城市建设推动了大数据技术的迅速发展，通过采集、整合城市各类要素运行数据，动态监测城市发展现状，为城市治理过程中的决策和部门协作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撑。本文在梳理我国当前城市治理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从城市风险监测、发展情景预测以及多元主体共治这三个大数据在城市治理过程中的关键应用方向出发，选取芝加哥、新加坡和纽约这三个大数据应用的代表性城市为案例，从已有的成熟经验中梳理适用于我国城市发展现状的应用模式，重点从城市运行动态监测、城市发展情景预测以及城市多主体协同共治三个核心方面分析其实际应用模式与方法。

具体来说，几个案例城市在大数据应用上有以下共同特征：（1）数据层面，强调统一的城市大数据信息平台建设，加强各部门数据的整合与实时更新，提供开放的对外接口，保障各部门对数据的实时调用；（2）技术层面，开展针对城市具体问题的分析模型研究，利用大数据关联分析和模拟预测的功能，在各行业推行与已有业务系统的对接应用；（3）机制层面，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大数

据在不同主体中的开放共享，厘清政府边界及各职能部门间的关系，提升不同主体在城市治理过程中的自主性与参与力度，以满足城市发展实际需求为出发点，促进治理工作的多元参与和高效协同。

在此基础上，将国外成熟的经验模式与我国自身发展现状相结合，重点提出了大数据支撑下智慧化城市治理的创新模式与具体应用架构，并深入阐述了大数据在掌握城市运行现状、辅助城市治理决策、监督城市治理过程以及扩大公众参与渠道四个方面的结合应用思路，以期为我国智慧化城市治理的实践工作提供理论指导与方法借鉴。具体来说，提出了以城市问题“识别—分析—处置—反馈”闭环过程为基础的城市智慧治理创新模式。通过问题识别与演化模拟，支撑管理部门制定决策方案及事件应急处置，最终在经验总结的过程中促进长效机制的制定。

需要指出的是，应用大数据进行城市运行状态描述时，存在着数据结构多样、数据来源有偏等问题与挑战。这就需要传统调研统计数据的补充与印证，从而构建多源的数据支撑体系。此外，也需要时刻注意不能“唯数据论”，城市治理工作需要各方面的协调与配合，包括组织体系与运行机制等。因此需要理性对待数据，建立完善的数据使用边界与权限，重视数据应用过程中知识规则的建立与优化，使大数据更好地为城市治理提供服务。

城市的正义：西方“社会公正”思想的意识形态根源

周恺 董丹梨 潘兰英

摘要：“社会公正”问题进入我国城市规划学者视野后，在多种现实问题的折射下，已经成为城市话题讨论中的热点。事实上，对“公平”和“正义”的哲学思辨贯穿了中西方社会、经济和政治理论发展的整个历程，积累了厚重且影响深远的思想遗产。本文追溯了“公正”理论发展的三个思想源头：（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并从意识形态根源出发，梳理学者、立场和观点的视角差别和承继关系。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基于“道德个人主义”和“底线福利保障”所倡导的分配正义观，成为被全球化世界体系（包括中国）逐渐接受的“普世价值”；另一方面，研究者也试图将社会公正探讨从“解放个体自由”转向“发掘集体生活中的道德标准”。植根于传统家国伦理的社群主义思想在不断提醒个人主义者，不应脱离个体在群体中的“社群责任”“集体义务”“归属感”和“荣辱感”来谈公正价值观。“差异政治”学说进一步发掘出，社会公正还涉及由于群体间的“主导”和“压迫”权力关系构成的不公平社会制度。在以上“求同、存异”的思想倡导下，共同构建一个多元、包容、和谐的城市社会成为都市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所推崇的理想城市图景。此外，（新）马克思主义者将社会不公正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矛盾的产物，“城市权”成为其分析当前城市社会中资本“积累”“循环”“剥削”和“危机”的核心概念；同时，“城市权”也成为新左派挑战资本制度的旗帜，激发了一系列社会抗争事件。通过以上梳理，本文希望能为澄清我国城乡规划价值观立场，重塑行业道德，提升规划师职业道德修养奠定讨论的基础。

关键词：社会公正；城乡规划；正义城市；城市权；空间正义

引文格式：周恺，董丹梨，潘兰英. 城市的正义：西方“社会公正”思想的意识形态根源[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3): 78-86. DOI: 10.22217/upi.2018.166.

城市空间资源分配是应当“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城市公共服务（例如教育和医疗）应当惠及所有人还是应该鼓励能者多得？城乡规划决策应当坚持精英主导还是尽可能扩大公众参与？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当前规划界在社会公正价值观上是存在认识分歧的。这些分歧折射出的是来自多种意识形态根源的中、西方价值观对我国四十年社会变革产生的交叉影响。本文将西方社会公正价值取向回溯到了当前理论思想的三种来源：“（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差异政治”“（新）马克思主义”。希望从价值观层面呈现这三类主要思想的演进脉络，并辨析诸多学说/学者之间的视角差别和承继关系，更好地理解当前城市正义研究中各种立场和观点的内涵，进而将其作为理解我国规划界价值观分歧的参照，并为构建我国城乡规划中的社会公正理论奠定基础。

“（新）自由主义”思想是当前全球资本主义世界运行的基本伦理。一方面，基于自由主义思想的正义道德立场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普世价值

观”，即正义既不只是“福祉最大化”，也不是“倡导社会美德”，更不是仅为满足物质欲望的“市场自由”，而是理性的、会思考的、有独立人格的、值得被尊重的人经过慎重思考后，追求“个人自由”的道德选择。另一方面，在推崇的“道德个人主义”下，尊重人追求各自“美好生活”的权利，维护有限权力的政府，同情弱势群体，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正义价值观。尽管受到了来自多种学说流派的批判和质疑，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思想仍然被认为是“……政治哲学研究在创建公平社会领域中最有说服力的理论”。在我国的当前发展背景下，虽然还是存在一些绝对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原则的信奉者，但大多数人还是更能够接受罗尔斯的分配原则，这是我国当前社会的现实。

“社群主义者”对群体道德美德的重新阐述，以及“后现代主义”研究对群体差异下的政治权力关系的考察，西方社会公正研究出现了从个体自由向集体义务的价值回归。社群主义者认为：“正义也是一种社会美德”。“正义”不仅仅是用正确的方法

分配财富，同时也体现社会倡导什么样的价值观，它必须致力于培育社会美德，并守卫“公共的善”。社会非正义的代价不仅是损耗社会福祉，更严重的是侵蚀了将社会凝聚在一起的市民美德。差异政治学者指出，“社会公正”还涉及由于群体间权力竞争构成的不公平社会关系，他们主张城市社区应当推行“包容性政治”，必须推动“异质性”公共社会的理想图景，即个体差异即使其不能被所有人理解，也应该被充分地承认和尊重。社群主义者提出的社会公正性在于“求同”，其倡导的正义伦理在于守护、践行和弘扬共同的集体价值观。差异政治倡导的社会公正性在于“存异”，公正的社会应当尊重差异，使各群体拥有公平的权利，并彼此认同、肯定和存留各自差异。基于此，共同构建一个多元、包容、和谐的城市社会成为当前大都市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理想城市图景。

“（新）马克思主义”基于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进行批判性分析，形成对诸多社会不公平现象的解释视角。列斐伏尔提出近代城镇化发展是工业生产不断侵入城市生活的过程，城市由人类文明的“作品”，转变成商业生产的“产品”，由创造了丰富“使用价值”的社会生活，转变成积累“交换价值”的工具。让城市人陷入了“日常生活”的卑微与困苦中，是现代社会最明显的不公正。他呼吁寻求城市生活的回归和再造，通过宣扬“城市权”来启动对城市生活的变革，让“城市”的生活方式（即相遇的场所，使用价值优先，用最优越的资源将时间在空间中留下印记）找到新的空间形态和物

质实现方法。哈维继承了“城市权”，并赋予其更深刻的革命性。他认为资本循环是解释城镇化空间生产的关键，也是大部分城市社会不公平的结构性根源。他提出“城市权”不仅是个人获得城市资源的权力，也是群体通过改变城市而改变自身命运的权力。任何摆脱当前困顿生活的努力最终都将归结到夺取“城市权”的斗争中来，只有通过改变城市才能进而改变自己。新马克思主义者用其鞭辟入里的政治经济分析一直在警示城市决策者，资本主导下的城镇化也有另一极其残酷的面相。虽然其言辞激烈，却有助规划师冷静地认识城市兴衰罔替中的资本逻辑，进而超越利益追逐，为城市谋定长远前途。

本文追溯了西方“社会公正”价值观的三个主要流派：主流（新自由主义）、右派（社群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左派（新马克思主义）。我们梳理这些思想的根本目标在于理解中国当前。上述三种正义观在当代中国社会中都有广泛的信奉者，因此，当前各种渠道的社会讨论中存在社会公正认识上的价值分歧，这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一方面，为了有效地弥合规划界中的价值观分歧，有必要从思想本源来认识和思考社会公正问题。另一方面，城乡规划作为影响城市决策者的主要力量，我们需要认识到这是关乎规划者内心本质的关键问题，应将“平等”和“公正”作为保障我国城市包容性发展的核心价值观，本文希望能成为澄清城乡规划价值观立场、重塑行业道德的出发点，也为提升规划师职业道德修养奠定讨论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乡村复兴与重构

范冬阳 刘健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在“光辉三十年”中经历了经济的腾飞、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同时遭遇了乡村地区的人口外流、老龄化和空心化，社会各界对乡村的未来一度非常悲观。然而自1970年代开始，法国乡村地区出现人口回流、经济复兴、社会重组以及空间提升和城乡关系改善的新局面。本文梳理了20世纪后半叶法国乡村复兴与重构的过程，总结出其总体趋势：城市人口回流使得乡村地区的社会结构与城市趋同，甚至面临更加严峻的老龄化趋势；土地整理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发展，中小企业兴起不仅提升了乡村地区的经济活力，同时带动了乡村地区的旅游业、服务业和地产业的增长；人口和产业的变化塑造了新的乡土空间，一方面空间组织呈现就业集中化、居住分散化和服务等级化的特点，另一方

面国土功能以农业生产为主向居住、休闲旅游、环境保护和景观遗产兼备转变。文章认为，乡村复兴与重构意味着人、产、地等生产要素的全面重组，既需要以开放的市场环境和公平的制度环境为前提，更需要有公共政策的积极干预，并且要重视包括小城镇在内的中小城市的作用。凡此，均可为我国即将到来的乡村复兴与重构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法国乡村；乡村复兴；乡村发展；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

引文格式：范冬阳，刘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乡村复兴与重构[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3): 87-95,108. DOI: 10.22217/upi.2018.189.

1 乡村概念：从“小农乡村”到“低密度国土空间”

法国在 1950 年代之前的乡村人口主要由小农组成，围绕传统农业活动进行家庭式生产和生活，由此建立起乡村的社会组织形态。二战以后城市崛起，乡村的定义随着城乡关系的变化和乡村自身特性的变化而演进。从 1970 年代开始，乡村意味着多功能的空间，表达出重构的内涵；而在 1980 年代，乡村概念则与地方性和环境、社会等方面的各种指标相联。2017 年，法国国家科学院发布的乡村研究成果倾向于将所有低密度城市化地区视为乡村地区；其中，乡村聚落细分为镇(bourg)、村(village)和自然村落(hameau)。这种演变隐喻了城乡之间越来越小的差异，这源于自 1970 年代后期开始至今的乡村地区的全面复兴和人口、产业、空间的重构。

2 乡村复兴与重构之人口变化

二战后的“光辉三十年”是法国高速城市化时期，也是乡村人口外流、乡村凋敝最严重的时期，以至社会各界对法国乡村的前景一度做出过悲观预期。然而乡村地区的人口自 1970 年代开始明显回升，且这种回升增长率高而且分布广泛。在人口回流的过程中，距离城市较近、初始规模较大的乡村增长开始的最早也最显著。

随着传统农民的流出和新村民的迁入，乡村居民的职业分布出现变化。新迁入的村民平均年龄更小、平均受教育程度更高，迁入的原因包括“选择更好的生活环境、职业需要、家庭需要、原有住宅废弃、退休”等。新村民既带来资源和活力，也引发了新的问题，诸如乡村绅士化带来的乡村治理权力博弈与地方文化延续问题，规模化农业生产与文化旅游业的空间功能使用冲突的问题，外国外地人的社会融入问题，当然也包括老龄化问题。

3 乡村复兴与重构之经济变化

法国的产业结构在二战之后以农业、工业为主，21 世纪初期已基本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乡村地区的产业一方面表现在农业的规模化，另一方面则体现为非农中小企业的重建，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二战以前，除农业之外，法国乡村地区存在一些传统的内生型中小企业，主要从事纺织、皮具加工、制鞋、冶金、钟表制造等生产活动，其生产空间和组织相对稳定。然而 1960 年代开始的国家计划主义经济政策对原有的乡村企业造成巨大冲击，直到 1990 年代初期传播技术和通讯基础设施的发展终于让中小企业曾经的缺陷成为相对优势，同时国家政策鼓励中小企业入驻乡村地区，给乡村地区带来了发展机遇。同时，大量法国北方人和周边国家人在法国自然和气候条件较好的区域购买农业土地，建造第二居所、旅游住宿设施、休闲景观等。

4 乡村复兴与重构之空间变化

伴随人口和产业的演变以及时代与政策背景的变化，国土资源与空间利用出现了新的格局。始于 1960 年代的农业土地整理政策主要影响了巴黎周边的大平原和北方地区，这里形成的农业景观以开敞大田为主。而南方丘陵山地地区，包括阿尔卑斯山、中央高原、比利牛斯山周边，以及海滨景观地带和具有相对独立文化的布列塔尼地区，在原有传统农业的基础上发展特色农业，仍保留或少量改造了原有的农业景观。土地利用的主要的趋势是农业用地收缩、人工空间用地【指包括建筑物及其附属空间(如交通空间、花园、草坪、池塘和其他活动用地等)在内的空间】显著增加、林地扩大的同时荒地减少。

在此基础上，乡村地区的空间组织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新结构。二战后，现代生产体系、基础设施、消费观念同时融入城乡时，乡村由自然地理差

异造成的空间组织多样性也逐渐被现代体系所同质化和结构化。“新农村”呈现出的发展趋势是就业的集中化、居住分散化以及服务设施的等级化，服务设施就成为结构性的要素将国土重新组成为单元。法国统计部门2004年提出对国土进行“生活圈”的划分，其定义是“在其中的居民能够获得一定等级基础服务设施的最小国土范围”。

5 乡村复兴与重构中的政策干预

乡村复兴与重构既是要素流动变化和重新组合的现象，也是国家和公共力量干预的结果。法国在1970年代之后以推动乡村复兴与重构为方向，通过不同部门颁布和实施了各类乡村政策，其共同目标是推动各种要素向弱势乡村地区流动，依据当地资源状况转换发展模式以实现国土空间的均衡发展，包括（1）对人的流动的促进，例如对年轻农民进入乡村从事现代农业的扶持政策，对外来人口进入乡村地区进行旅游开发建设的财税扶持，对手工业等小型企业入驻乡村的信息咨询和财税减免；（2）对产业要素流动的推动，例如企业的去中心化政策和农业土地整理的政策；（3）对乡村空间资源

的保护，例如大区公园的建立和自然景观的遗产化管理；（4）国家和大区政府对贫困乡村地区的扶持，例如“乡村复兴地区”规划和“地区协约”等。

6 启示：即将到来的中国乡村重构？

- 我国2015年已跨过城市化拐点，乡村的复兴也成为学术和社会热点。法国乡村发展从衰败到复兴与重构的历程为我国提供启发和借鉴如下：

-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地区发展的滞后和衰败难以避免，而衰败之后的复兴与重构在一定的社会发展趋势下也成为必然；

- 乡村地区从衰败到复兴的过程中，城乡关系也从对立趋同，城和乡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空间利用结构的差距不断缩小，因此未来需要重新建构对于乡村概念内涵的认识；

- 乡村复兴与重构意味着人、产、地等生产要素的全面重组，这需要公共政策的积极干预；

- 乡村复兴需要借助多方面力量有针对性的完成，对于贫困薄弱的乡村地区，应着眼于其周边区域性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完善，从整体性和结构性的发展中让乡村受益。

“胡同”空间形态对住区开放的借鉴意义

刘悄然 赵鸣 徐放

摘要：“胡同”可以被看作一种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政府规划与自发改造共同形成的街区制住区，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仍有其独特的生命力。胡同具有分级的网状、灵活多样的交通组织形式，并且具有与之相应的空间分级。这种空间形态具有系统的规划体系以及经验性的开放程度，对于实践国家倡导推广的住区开放政策有很大启发。本文着眼于解读住区开放与封闭，指出住区的“开放”不仅仅是拆除围墙，而是一种空间重组。文章分析了胡同如何通过建立道路系统和活动空间，来满足居民交通、交往等活动需求。最后提出借鉴胡同的空间形态并融合现代住区优势的住区开放策略。

关键词：胡同；住区开放；封闭型住区；空间形态；街区制

引文格式：刘悄然，赵鸣，徐放。“胡同”空间形态对住区开放的借鉴意义[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3): 96-102. DOI: 10.22217/upi.2017.401.

封闭型住区的概念自1990年由美国引入中国后迅速发展，为居民提供了充分的安全感、归属感和隐私。但同时，封闭型住区也存在尽端式道路多，居民出行距离长，城市内外空间分离，部分空间私有化，安全性不确定等问题。

2015年底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贯彻“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目的是将城市公共界面和公共空间解放出来，促进住区与城市

的有机融合。“开放”的实质不仅仅是拆除围墙，而是居住形态的变革：“打开”封闭型住区，是通过住区空间形态的重组，达到打破住区与城市的隔离，合理释放住区空间，恢复城市多样的文化、生活交流，促进城市发展活力的目的。

研究选取北京市瀚庭(2 hm²)、静淑苑(4 hm²)两个不同尺度的现代居住区，与白塔寺周边面积相同的胡同区域(2 hm²与4 hm²)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胡同”作为一种街区制的开放型住区，具有以下三方面优势：

(1) 网状的分级道路系统。胡同各位置步行出行距离差距较小，步行出行距离更为公平。胡同网状分级的道路系统，使步行与机动车和谐相处，隐私与开放更为平衡，又通过适宜的尺度创造出了可以共享的空间。

(2) 灵活多样的道路形态。胡同道路每20~25 m有所变化转折，或者呈现出有节奏感的重复，将一条路线打破为不同路段，丰富了穿行体验，使空间感受更加紧凑，实际感觉距离缩短。胡同中鱼骨状、斜线和折线形的道路，结合了网状、分级与蛇形、锯齿形道路形态，形成慢行机动车道路系统，可以减少外来车辆对住区的影响，有利于和谐、平衡地达到城市微循环交通的需求。

(3) 多层次的分级空间组织。胡同空间中，道路的分级划分了交通方式、流量和交往的尺度。再配合相应的设计元素与尺度，就可以形成开放、半私密、私密的等级层次。适宜步行的交通系统，也在对机动车进行一定隔离的同时，将“人气”带入各个空间。

有鉴于此，在开放型住区的新建和改建过程中，结合胡同和现代住区的优势，既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封闭住区的优势，还可以创造更加合理的空间。借鉴胡同空间形态的住区开放策略应包括以下三点：

(1) 在网状道路街区制的推广过程中，要注意道路分级体系的建立，以道路宽度来区分车行与人行。保障住区内有完整的步行道路系统，增加小尺度道路的路网密度，以小尺度道路连接建筑与活动

空间。步行道路系统可以参考胡同的尺度，分为<4 m、4~7 m两个等级，或按照住区实际情况进行设计。由于小尺度路网不再由胡同中拥挤的居住建筑围合，而多由绿地围合，所以可通过隐形消防通道的建设来兼顾住区的消防要求。住区中机动车道路应当同时结合所在片区与住区的规划，并与建筑和一些较为私密的活动空间之间保持一定距离。

(2) 在道路的形态方面，以减慢车速为目的，可以根据建筑或者场地的其他条件，更加自由地设计机动车道路形态，增加曲折程度。在非机动车道路的设计上，有了独立的小尺度路网，就可以不局限于在机动车道路两侧设立便道的方式，可以综合场地状况，设计有宽度和节奏变化的道路系统，使路网除了交通功能，同时承担住区聚落活动。一方面满足居民的“自然运动”，即由空间结构本身决定的人们运动分布与行为模式；另一方面促生适当的“迷宫系统”，即充满控制力、安全感、归属感的空间状态。

(3) 在具体的外部空间设计中，可以结合不同住区的需求，在小尺度路网骨架中增加各种形式的私密与半私密空间。要注重空间的私密度与分级的结合，保障私密、半私密空间的私密性。同时以私密、半私密空间的过渡和围挡，为建筑创造安宁的环境。例如，可以在每栋居民楼下增加一定围合的私密院落，不但是邻里关系形成的场所，也是住区开放后保护安全和隐私的方式；小尺度路网作为住区最具活力的空间，两侧应当增加一些半私密活动空间，为路网吸引到的人流提供活动空间，在保护传统邻里关系的同时为新的交往活动提供空间。

总的来说，借鉴胡同的空间形态，主要是借鉴其规划体系以及开放程度经验。完成住区开放目的和要求的同，尽可能地调节人车关系，维持居民需要的安全感和私密性，保护住区的环境，减小管理难度。立足于住区开放政策的本质和精神内涵，剖析住区封闭的优势与劣势，研究胡同的外在形式和深刻内涵，采取扬长避短的方式推广胡同的住区外部空间形态蕴含的理念，对于稳步实现住区开放有很大的帮助。

纽约滨水区域综合评估体系研究及借鉴意义

周广坤 庄晴

摘要：进入 21 世纪以来，滨水区域越来越成为城市的重要发展资源。如何有效引导滨水区域建设，实现对建设质量的有效监督和管理，成为许多城市面临的难题。本文首先深入研究了纽约滨水区域综合评估的经验，对其评估历程、评估对象、评估机制、评估指标、评估认证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总结；然后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我国滨水区域综合治理的问题，提出若干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一是建立水陆一体的滨水区域空间分类体系；二是加快滨水区域精细化建设管理模式转型；三是构建科学的滨水区域评估框架和技术路径；四是实现滨水区域建设质量的动态认证。

关键词：纽约；滨水区域；综合评估；指标体系；精细化管理

引文格式：周广坤，庄晴. 纽约滨水区域综合评估体系研究及借鉴意义[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3): 103-108. DOI: 10.22217/upi.2017.577.

笔者有幸参与了《黄浦江两岸地区公共空间建设设计导则》和《上海市河道规划设计导则》的编制工作，为了导则编制的科学性和前瞻性，笔者与同事开展了国际滨水区域综合评估的案例研究工作。

纽约编制新一版纽约城市总体规划——《纽约——规划一个强大而公正的城市》的过程中，为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前瞻性地提出了城市韧性建设的思路，成为纽约滨水区域规划的总体纲领。在总体规划的要求下，2010 年纽约市开始修编《愿景 2020：纽约城市综合滨水区域规划》，滨水联盟和绿色港口工作组提出了编制《纽约滨水区域设计导则》（WEDG: Waterfront Edge Design Guidelines）的提议。滨水联盟工作组开始编制纽约滨水区域设计导则，为加强设计导则在建设过程中的实际应用，纽约市逐步形成了滨水区域综合评估的体系。2012—2016 年，导则第一版和第二版相继发布。在此期间，滨水联盟参与了一系列滨水建设项目，并将综合评估的方法应用到这些项目的规划设计、建设管理、运营维护的过程中。为更好地完成综合评估工作，纽约市成立了滨水区建设委员会，并对通过综合评估的项目颁发认证证书。经过数年的努力，纽约滨水区域综合评估促进了政府部门、非营利组织、专业人士和其他滨水区域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明确的滨水区域规划设计、建设管理、运营维护的核心价值观，逐步实现了“创造最好滨水区域”的愿景。

文章全面分析了纽约滨水区域综合评估体系

的主要内容：（1）对滨水区与进行划定和分类，根据滨水区域周边建设项目或用地不同功能属性，将所在滨水区域划分为三种不同的功能类型：社区商业型、绿化公园型和工业海运型。（2）制定评估流程、确立评估部门，纽约滨水区域综合评估的流程是按照自愿原则，由建设单位提出评估申请，由滨水联盟对该建设项目的全生命周期展开评估，涉及项目的规划设计、建设实施和运营维护等重要环节。（3）明确评估指标体系，将评估指标汇总成为 7 个专项内容，分别为：选址和规划、公共联系、韧性岸线、生态与栖息地、材料与资源利用、运维管理和创新措施。（4）评估认证，结合实际项目，通过指标计分的方式，开展评估工作，每种类型的合格标准如下：社区/商业型，合格分为 130，满分为 401；绿化公园型，合格分为 130，满分为 357；工业海运型，合格分为 100，满分为 317。对评估通过的项目由滨水区建设委员会颁发证书，评估认证不是行政许可，但是认证过程体现了政府部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截至 2017 年底，已经有 6 个项目通过了评估认证，这些通过评估认证的项目为纽约市其他滨水区域的开发建设项目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纽约的实际经验对我国滨水区域综合评估工作有着重要指导和借鉴意义，文章最后提出了加快建立水陆一体的滨水区域空间分类体系，加快滨水区域精细化建设管理模式转型，构建科学的滨水区域评估指标框架，实现滨水区域建设质量的动态认证等一系列针对性的建议。

健康影响评估及其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探讨——以旧金山市东部邻里社区为例

丁国胜 黄叶琨 曾可晶

摘要：在应对健康挑战及建设健康中国背景下，如何将健康理念融入城市规划正成为我国规划学者关注的前沿问题之一。国际上已有探索表明，健康影响评估为规划师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条创新途径。我国目前已认识到将健康影响评估应用于城市规划的价值，但已有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基于此，本文首先阐释健康影响评估及其应用于城市规划的内涵。然后，以旧金山市东部邻里社区区划健康影响评估实践探索为例探讨健康影响评估应用于城市规划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比如评估目标、原则、程序、过程、工具及机制等。在此基础上，从评估技术研发和评估机制设计两方面进一步讨论健康影响评估应用于城市规划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最后就我国在城市规划中发展健康影响评估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健康影响评估；评估内涵；评估技术；评估机制；ENCHIA 实践

引文格式：丁国胜，黄叶琨，曾可晶. 健康影响评估及其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探讨——以旧金山市东部邻里社区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3): 109-117. DOI: 10.22217/upi.2018.009.

改革开放 40 年来，人民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不断提高。然而，城市化、老龄化以及生活方式变化等因素正带给我们全新的健康挑战。比如，我国两周患病率【被调查居民中两周内患病人次 / 调查总人数】及慢性疾病患病率不断攀升，心脑血管疾病、肿瘤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这“三座大山”正困扰着我们整个社会。为此，我国确立了健康中国战略，并通过《“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全面建立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制度，系统评估各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政策、重大工程项目对健康的影响，以促进健康的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

作者在学生时代有机会参加了健康影响评估培训，并考察了部分城市健康影响评估探索具体经验，这在我心中种下了探究健康影响评估的种子。城市规划的制定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人们生活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并最终通过各种途径影响人们的健康状况。因此，城市规划一直是健康影响评估应用的重要领域。我国已有研究已注意到探讨城市规划健康影响评估的重要意义，但总体上仍然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对健康影响评估及其应用于城市规划的内涵及面临的许多具体问题均缺乏深入探究。基于此，我们写下这篇文章以进一步推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文章首先阐述了城市规划健康影响评估的内涵，认为它是运用一系列手段分析和评估城市规划项目和决策对特定人群健康的潜在影响及其在该人群中

的分布，并提出健康促进建议的框架、方法、工具和实践。具体来说，它分析、测度和评估城市规划决策和项目涉及的各个要素对人群健康决定因素、人群健康结果以及人群健康公平的潜在积极或消极影响，并探讨这些潜在的健康影响在人群中的分布，最后从公共健康的视角提出管控这种潜在影响的建议。同时，文章还就健康影响评估应用于城市规划的目标、程序、性质、方法、成果和对象等进行了探讨。

在此基础上，文章以旧金山市东部邻里社区区划健康影响评估实践探索为例，探讨健康影响评估应用于城市规划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比如评估目标、原则、程序、过程、工具及机制等。进一步，从评估技术研发和评估机制设计两方面，对健康影响评估应用于城市规划需解决的关键问题进行延伸讨论。文章认为，评估技术主要解决健康影响评估应用于城市规划面临的一系列程序和方法等问题，涉及如何确定评估目标和原则，以及如何研发评估工具等；评估机制则主要解决健康影响评估应用于城市规划面临的制度保障和参与机制等问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设计。文章最后就我国在城市规划中发展健康影响评估提出一些建议。本篇文章是作者以往文章的延续，如果感兴趣可以检索相关文献。让我们积极响应“共建共享、全民健康”的国家号召，积极推进健康影响评估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和实践吧！

日本利益衡量理论对我国城乡规划实施制度的启示

文超祥 何彦东 朱查松

摘要：通过深入分析日本民法解释学中的利益衡量理论，指出我国城乡规划实施制度对于利益衡量忽视造成“失效”的现实根源，并从规划许可、规划执法、规划交易等三个方面探讨利益衡量理论对城乡规划实施制度建设的启示。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制度建设策略：构建为国民提供便利服务的规划实施制度；提升规划部门和公务人员积极行政的能力；关注法律规范中的“影响利益条款”。

关键词：利益衡量理论；城乡规划；实施制度；规划许可；规划执法；规划交易

引文格式：文超祥，何彦东，朱查松. 日本利益衡量理论对我国城乡规划实施制度的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3): 118-123. DOI: 10.22217/upi.2018.253.

利益衡量理论是日本民法解释学的重要学术流派，其思想价值有三点。一是市民实用法学的立场。规划师不能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普通市民，而所谓的专业技术标准也应当经得起常识的检验，不能够违背常识。二是妥当配置利益的社会观和裁判观。不能机械地套用现有的规划文本和法律法规，简单判断问题和处理纠纷，而是具有积极追求实质利益的精神，重视现实社会中相关各方的实际利益，对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切身利益进行精确分析，合理解决纠纷。三是积极的裁判者形象。规划部门和公务人员应当成为积极的裁判者和实施者，主动预防、化解各种类型的规划纠纷，而不是只会机械地“照章办事”。

规划许可作为规划主管部门的日常性工作，经常会面临直接的利益冲突。在规划许可中，应当对直接利益关系人和间接利益关系人进行利益权衡。当然，协商与妥协有一定的适用范围，所达成的合意不能损害公益或他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必须有相应的程序性制度作为保障。日本利益衡量理论在实践中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发展了基于容忍义务的容忍限度理论，作为规划许可的利益衡量手段。

规划执法中的利益衡量更为直接，反映在行政处罚、规划纠纷、行政强制等方面。行政处罚或者因力度过大而实际无法实施，或者处罚力度过小而

缺乏威慑力，甚至成为违法建设的鼓励。规划纠纷往往并非“黑白分明”的关系，争议各方都可能存在一定责任，并没有绝对正确的一方，而是处于一种混合的状态，利益衡量同样是解决规划纠纷的重要工具。此外，行政强制手段也需要进行利益衡量，一方面要避免强制手段超过与违法行为的危害性相应的程度而产生负面效果，另一方面也要有足够的力度保障公共利益。

区域性行政协议或具体行政行为中，利益衡量指导下的规划交易都是重要的手段。只要不违背法律，其内容可以十分广泛，形式也可以多样。在规划交易中，某一方的代价，正是另一方所得，但对于不同方而言，其价值并非一定相等。例如，某一方放弃的权益，可能使另一方获得成倍或更多的收益，而这恰恰是规划交易的价值所在。

日本的利益衡量理论，是在法治建设基本完善之后，进一步向精准化发展的表现。我国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初级阶段，其主要任务还是“立规矩”。而今，我们已经进入新时期社会主义，就不能满足于基本的规矩，而需要促使这些规矩更合乎情理。在构建为国民提供便利服务的规划实施制度、提升规划部门和公务人员积极行政的能力、关注法律规范中的“影响利益条款”等方面，我们仍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香港郊野公园阶段特征与管制机制研究

阎凯 沈清基

摘要：香港郊野公园发展对我国城市绿色生态空间建设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其形成发展及管制策略与贯穿

全港的历次规划战略及政策文件息息相关。文章试图对其在规划政策影响下的阶段特征及自身管制机制展开分析。首先,文章将20世纪中叶以来关键性规划政策对香港郊野公园的影响过程总结为四个阶段:1945—1970年咨询研究阶段、1970—1980年规模化兴建阶段、1980—2000年小微增长与局部调整阶段、2000年以来用途优化和扩展再规划阶段。影响的维度主要集中在郊野公园的空间分布、功能内涵、形态组织及规模拓展等,但不同阶段的影响维度有异,影响的力度也存在差别。其次,从机构设置与权力配置、法律法规变迁与内容、多主体参与管制过程三个维度阐述了香港郊野公园的管制机制:一是法律保障下的专门机构设置与赋权,二是建立了覆盖全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三是开展社会组织与经济团体的参与性管制。本文希望为我国城市制定相应的绿色生态空间管制政策,渐进式地优化绿色生态功能配置及空间组织提供借鉴。

关键词: 郊野公园; 阶段特征; 管制机制; 规划政策; 香港

引文格式: 阎凯,沈清基. 香港郊野公园阶段特征与管制机制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2019(3): 124-131. DOI: 10.22217/upi.2017.289.

绿色生态空间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基底,维护生态空间服务价值、建立与城市社会的和谐互动,是下阶段我国城市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目前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实践还比较薄弱,尚需借鉴国内外经验指导实践。在城市及区域环境危机频发的当前,绿色生态空间有效维护与管制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

香港郊野公园发展对我国城市绿色生态空间建设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其形成发展及管制策略与贯穿全港的历次规划战略及政策文件息息相关。自1976年8月《郊野公园条例》颁布起,迄今香港已建成24个郊野公园。这些公园在抑制城市蔓延、平衡开发与保护、提供康乐场所等方面发挥了有益作用,是绿色生态空间建设的样本。但对于香港郊野公园发展过程中如何受到相关规划及政策文件的影响,采用了何种管制机制,相关研究尚不充分。对此,本文试图从“空间规划与政策对香港郊野公园的多方面影响”,及该影响下的“管制机构设置、法律法规变迁、多主体参与管制”两个维度,探究规划政策影响下香港郊野公园的阶段特征与管制机制。

笔者研究发现,香港郊野公园的发展非一蹴而就,其在空间分布、功能内涵、形态组织及规模拓展等层面深受多个空间规划与政策文件的叠加影响,自20世纪以来关键性规划政策对香港郊野公园的影响过程可为四个阶段:1945—1970年咨询研究阶段、1970—1980年规模化兴建阶段、1980—2000年小微增长与局部调整阶段、2000年以来用

途优化和扩展再规划阶段,不同阶段郊野公园的空间分布、功能内涵、形态组织及规模拓展等在影响的力度与维度方面存在差别。

郊野公园建设之初,香港政府即构思了完整的机构框架,并在法律保障下不断更新完善。如今,在机构配置和行政赋权上均取得了良好成效。伴随着郊野公园保护工作的推进,管理机构与法律依据也在不断更新。

首先是建立了完善的郊野公园管理体系。不仅包括专门法定咨询组织(郊野公园委员会),更建立了专职管理机构(郊野公园及海岸公园分署),以《郊野公园条例》为行动纲领及依据。政府渔农处更名为渔农自然护理署,下设郊野公园及海岸公园分署,管理相关工作,渔农自然护理署与郊野公园及海岸公园管理局的最高权力集于一人,同时有郊野公园及海岸公园委员会提供决策建议,保证宏观与微观层次管理统一,确保内部组织高效运转。

其次,建立了一整套覆盖全面的法律法规体系推动郊野公园持续发展,笔者研究发现,截至2018年末,与香港郊野公园管制较为密切的保障法例包括:1项基本约束法例、3项补充约束法例、若干协同约束法例。包括《郊野公园条例》《海岸公园条例》的专门化管制法律法例,也包括《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官邸管理条例》等相关管制条例及《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的第四章及第十章等其他技术性条例,实现多层面管制。

最后,公众参与作为制度化的民主形式,保障政策正确执行、公众意识得以贯彻。社会组织机构

的参与式管制赋予城市管制新活力，不同主体的监督式合作促成了郊野公园管理升级。

郊野公园建设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工作。反思我国刚刚起步 20 余年的城市郊野公园建设和管理工作，还较为广泛地存在着基础研究不够扎实、格局框架尚不稳定、用途及设施配置缺乏精准、法律法规存漏洞少层次、机构设置与职权范围不清晰、

公众参与主体与渠道不完善等多方面的问题，需要在依法治国战略、地方部门改革、多中心治理、自然资源统筹配置、城乡规划改革等语境下予以系统调节，促进我国城市郊野公园的更好发展，以期为我国城市制定相应的绿色生态空间管制政策，渐进式地优化绿色生态功能配置及空间组织提供借鉴。

台北市城市设计制度构建经验与启示

姜涛 姜梅

摘要：历经 30 年的发展，台北市已基本构建起一套较为完善的城市设计技术与管理工作并重协同的城市设计制度。本文在梳理台北市城市设计制度演进脉络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其城市设计准则、城市设计审议两项特色制度工具，并结合信义计划案例分析了其运用与成效。最后，文章从政策目标、配合机制、发展趋势三个方面，总结了台北市城市设计制度的经验启示，并向国内正在力推的城市设计改革推荐参考。

关键词：城市设计；制度；准则；审议；台北市

引文格式：姜涛，姜梅. 台北市城市设计制度构建经验与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3): 132-141. DOI: 10.22217/upi.2017.270.

在台北市的整个空间规划管理架构中，城市设计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向上，弥补城市规划专注于二维空间的不足，通过城市设计准则的拟定，引导并控制城市开发形式；向下，则尝试克服建管法令无法规范联系单个建筑基地之间公共空间的缺失，以城市设计审议控制个别开发案的质量”。

台北市城市设计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信义计划地区城市设计阶段（1970—1980 年代）、扩展至台北市城市设计阶段（1980—1990 年代）、整合城市设计审议与土地使用管制审议的阶段（1990 年代至今）。因此有台湾城市设计始于台北、台北城市设计始于信义之说。历经三十年的发展，台北市已基本构建起一套较为完善的城市设计技术与管理工作并重协同的城市设计制度，其中尤以“城市设计准则”（urban design guideline）、“城市设计审议”（urban design review）两项管控工具为突出。

为维护优良的公共环境质量与生活空间，并营造地域性的地区特性与风格，首先需要制定城市设计准则。台北市城市设计准则一般包括土地与建筑

物、开放空间、都市纹理、街道景观、服务系统等 5 类 33 项管控内容，表现形式多样，有经市议会通过的地方单行法规，如《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自治条例》，有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依据行政授权颁布的行政命令，如《台北市综合设计公共开放空间设置及管理维护要点》，也有经台北市都市设计及土地使用开发许可审议（下称“都审”）委员会审议通过的特定地区城市设计，一般会纳入该地区的详细规划中，同步公告，同步检讨和修订，如《台北市信义计划特定专用区细部计划案都市设计》。三种城市设计准则建立成本不同，但对于开发商而言其实质效力并无大差。

如果说城市设计准则是一种空间的基础管制，那么城市设计审议就是一种开发的协商咨询，是明文规范和裁量管理交互运用、不可或缺的两个工作阶段。在台北，约有 1/3 的建筑开发案需要经过城市设计审议，它们是城市规划说明书中载明需经审议地区，以及那些达到一定规模或条件的开发基地。2015 年都审新制后，台北市要求城市设计审议应“以公共议题有关的开发与公共工程建设案件为主要有限范畴”，且“以行政审查为主、专家咨询为

辅”，以进一步提升审议效能。具体来说，第一阶段，各公部门主办机关在案件招标前，即应将后续开发的设计准则提都审委员会审议后，纳入招标条件；第二阶段，开发商中标后制定的建筑设计方案应再提送都审委员会审议。在第二个阶段，为简化行政流程，分为简化流程（民间开发一定规模以下的案件）、专案流程（民间开发一定规模以上的案件）、一般流程（公共建设开发及公共工程规划）三种情况开展都审，每种流程都包含了干事会的行政审查、

委员会的专家咨询、市政府的核定。都审案申请人被要求提交标准化的都审报告书，以利设计成果表达的完整以及信息平台操作的顺利，进而提高效率并推动审议的透明化。都审报告书一般包括项目基本情况、基地及周边现状情况、设计说明、相关法令检核、附录五个部分，其版面大小、页数、图文布局、文档格式以及不同审查审议阶段应提交的份数等等，也都有着明确的规定。

国外视觉景观规划设计方法比较

吕圣东 陈静

导读：视觉是人类感知世界的重要维度，视觉美学法则的建立源自人类对美好生存环境空间视觉的经验抽象。为此，国外在人居环境的视觉规划设计方法上，应对人类活动对自然空间的破坏以及人居建设对城市环境的不和谐作为，产生了不同主体、差异目标的设计方法。本文围绕视觉景观的规划设计类别，分析比较国外各个方法在理论基础、目标对象、关注重点等方面异同；揭示各方法对特定视觉景观空间的可见性、和谐性、美感性等方面的提升、维持、改善有着共同目标。

引文格式：吕圣东，陈静. 国外视觉景观规划设计方法比较[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3): 151-154. DOI: 10.22217/upi.2018.145.

正如曾经我们在长途车或高铁沿线间歇性地看到由于建设、采伐等原因造成沿线景观不协调时不免有所联想；也正如我们行走在历史城市中试图发现壮丽的历史建筑却因近代建设的遮挡而难觅其踪。对此，虽然诸多改善在推进，但似乎诸多痛点仍存在。“颜值”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关注“美”的评价在大众社会的热度达到空前高度。如何能在既有空间状态下做出“美”的改善，正是本文研究的起源。

关于“颜值”，学术的说法叫作美学评价研究。在人居空间领域，先发的欧美国家根据自身发展特点在自然风景、建成环境中对于“美”的守护，很久以前就已经形成了具有自身特征的方法与体系。不同的生存条件让各国对空间的“美”的追求不一，迥异的人文风俗又让他们对“美”有着看似不同却殊途同归的喜好，进而有了不同社会规则下帮助改进空间“美”的实践方法。

本文围绕欧美国家追求“美”的规划设计方法，研究了基于自然要素维度的以下方法：英国对砍伐后林地再种植美化的“主动设计途径”法；加拿大对于同样森林砍伐造成的不良景观提出了更为细致的“视觉质量目标”法；美国的视觉管理系统；以及日本富士山的可见性管理。基于人工要素控制维度的以下方法：德奥对于建筑和谐性的建筑等级制；法国、英国对于战略性城市标志物的可见性、和谐性控制的纺锤形控制、战略眺望景观等方法。由于各国所处时期面临问题的特殊性，因而在方法建构的目标和控制要素上存在系统性差异，但对于取得更具美感度、协调性、整体性、可见性的空间意图上趋于一致。在我国城市双修的理念指引下，对国外理论与实践方法进行研究比较，可以从根源理清脉络，系统认知，深化应用，以期更系统、更美丽地展露中华大地的绿水青山名筑。

英格兰历史地区评估方法

郭璇 崔燕宇

导读：为了应对不断加速的城市化和保护历史环境，英格兰提出了历史地区评估（HAA: Historic Area Assessment）体系，并将其作为重要实践工具，用以保护地区的历史环境。本文对HAA展开研究，首先介绍其发展演变背景，阐述其由来；其次，对历史地区评估三级评估法的内容、实施方法进行研究和分析；最后，总结了历史地区评估方法的五个主要特点。

引文格式：郭璇, 崔燕宇. 英格兰历史地区评估方法[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3): 155-158. DOI: 10.22217/upi.2018.018.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际上出台了一系列历史地区、历史城区的保护宪章。面对工业化、城市化给文化遗产带来的“建设性破坏”问题，1982年我国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建委等部门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并于1986年12月首次提出保护历史地区的概念。时至今日，“建设性破坏”仍然广泛存在，国内已有许多专家学者在遗产价值、评估种类、流程等方面给出了积极的建议。本文聚焦英国历史地区评估（HAA: Historic Area Assessment），并简要解释HAA的三级评估法，以期对我国历史地区评估的实施有所助力。

1 HAA 是英国历史地区评估实践不断总结的宝贵成果

早在1967年，英国就经过评估依法划定了4个保护区。到2005年，仅在英格兰地区，保护区的数量已增长至9374个。历史遗产评估的重点也转移到了历史建筑群、城市景观和建筑环境。因此，英国一直奉行的“保护性修复”的凝固保护方式并不适合多样性的历史地区。合理使用保护理念和评估手法成为共识，英国历史地区评估体系也有待完善。

起初，英格兰建筑遗产保护者探索针对不同的评估对象和情况采取不同类型的评估方法。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区域评估、特点评估、密集评估、广泛评估、快速评估，甚至旋风评估等。这些评估往往内容重叠，致使评估结果混乱。可见，过于求全的评估方法并不适合规划周期和自发更新的迫切需求，譬如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细节评估对伦敦连绵历史地区的意义并不大。因此，英格兰遗产委员会（English Heritage）认为急需找到一套恰当的评估方法，投入适度的精力，达到最好的效果。于是，他们耗时十年研究评估体系，于2010年6月出版了HAA的指导性文件。

2 什么是 HAA 三级评估法？

英国历史地区评估的编写历时十年，在实践中将评估方法进行调整归纳，明确界定了评估层级：

（1）一级概略评估（outlook assessment）。这是快速果断的评估，属于定性评估。适用于区域大、时间有限，或者现状不需要更精深评估的情况。（2）二级快速评估（rapid assessment）。提供及时、快速的评估，但比概略评估更详细。快速评估涵盖了概略评估的功能，并需要表述该区域的起源及变革动力。（3）三级详细评估（detail assessment）。评估成果结合定性和定量评估。在相对小而建筑密度高的区域，需要对个别建筑和地块呈现的特点进行详细审查。

3 HAA 三级评估法的优势——灵活的系统

历史地区评估的三个级别由简入详，评估者可根据现状、区域性质和重要性、规划需要评估的区域面积来选择评估级别。三层级别都适合特定的情况，可独立使用，也可隔级搭配或连续使用，因此能够避免不必要的时间和资源浪费，较全面快速地覆盖评估对象。

历史地区评估的程序根据所选择的不同级别而有不同。评估团队将由具有互补技能和经验，熟知规划、历史、历史地理学、建筑学、景观学、考古学，以及地区评估方法的人员组成。但是出于健康和考虑，历史地区评估认为实地调查评估者可以由具有综合素质的至少两位专家或志愿者组成。评估要求的设备包括数码相机、笔记本、历史地图、录音笔和手持GPS等。人员和设备需根据所选的评估级别作出调整。

我国历史地区评估可直接借鉴HAA三级评估的方法和程序，尤其针对评估周期较长而难以落实导致加速历史地区的拆除这一问题。例如，第一个

级别的概略评估非常适合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对许多濒临拆除的历史地区进行抢救性评估。因此，针

对不同的评估要求采用不同的评估级别，对评估的程序选择有计划和针对性的技术方法非常必要。

2019年第4期文章目录

本期主题 国际视野下现代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

孙施文 / 解析中国城市规划：规划范式与中国城市规划发展

张京祥, 陈浩, 王宇彤 / 新中国 70 年城乡规划思潮的总体演进

罗震东, 崔功豪, 乔艺波 / 阶段、思潮与行动：

国际视野下现代中国区域规划理论与实践的演进

林坚, 赵冰, 刘诗毅 / 土地管理制度视角下现代中国城乡土地利用的规划演进

赵冰, 林坚, 刘诗毅 / “外引”与“内消”

——国际经验对中国城乡土地利用相关规划的影响探析

沈清基, 彭姍妮, 慈海 / 现代中国城市生态规划演进及展望

马林 / 新中国城市交通规划的探索与发展

毛其智 / 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的理论与实践

城乡研究

楚金华 / 从“被动接受”到“合作共创”：基于演化视角的智慧城市理论发展框架

方彬, 石飞 / 道路网连通性度量方法的研究进展和展望

——从规范制定的角度探讨如何在中国推广街区制

规划研究

杨宇振 / 危机应对：理解中国城市化与规划的第三种视角

汪军, 陈曦 / 英国规划评估体系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刘泉, 潘仪, 赖亚妮 / 滨海城市山海眺望景观规划控制的日本经验

王洋, 于立 / 国外“人—地情感”的标绘研究引介：

作为规划决策制定的辅助工具和公众参与途径

实践综述

王耀武, 许霖峰, 戴冬晖 / 走向城市设计继续教育：伦敦城市设计中心的经验与镜鉴

祝贺, 唐燕 / 英国城市设计运作的半正式机构介入：基于 CABE 的设计治理实证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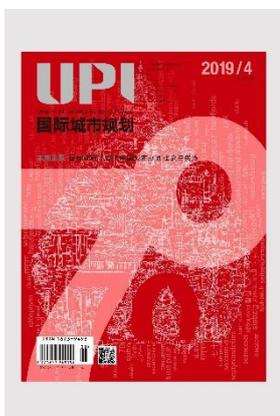
谭佩珊, 黄旭, 薛德升 / 世界城市中跨国文化消费空间的演化过程与机制

——以柏林克洛伊茨贝格街区为例

刘程 / 基于减贫与包容性增长的路径探索——以莫桑比克区域发展走廊战略为例

专题研究

陈立群 / 多方共治的商业改进区



2019年 第4期

解析中国城市规划：规划范式与中国城市规划发展

孙施文

摘要：在对世界各国城市规划的主要范式类型进行概括总结的基础上，详尽追溯了中国城市规划从建设规划起步，到建立发展规划框架，再到融入规制规划的形式，由此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体系的历程。中国城市规划体系吸收了各类规划范式中最具特色的形式和内容，在中国城镇化发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 20 年来，针对中国城市规划体系存在的问题，出现了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市县全域规划以及“三规合一”“多规合一”等探索，但在承续既有规划认识的情况下，建设规划的观念本底并未改变，甚至仍在不断强化。本文深入剖析了中国城市规划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下，城市规划体系及其内涵的发展演变，揭示出中国城市规划体系的构成及其发展路径的独特性与深层次原因，也指出了城市规划体系改革不仅具有迫切性而且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规划范式；建设规划；发展规划；规制规划；城市规划发展；中国

引文格式：孙施文. 解析中国城市规划：规划范式与中国城市规划发展[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4): 1-7. DOI: 10.22217/upi.2019.305.

新中国 70 年城乡规划思潮的总体演进

张京祥 陈浩 王宇彤

摘要：文章采用“一个环境观、两个主脉络”的分析框架，阐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乡规划思潮的总体演进，将其划分五个阶段，分别为：(1) 落实生产力布局的城乡规划；(2) 极左思潮下的城乡规划；(3) 科学理性主义思潮下的城乡规划；(4) 增长主义导向下的城乡规划；(5) 国家治理体系重构中的城乡规划。70 年来中国城乡规划思潮的发展演进历程体现为“变与不变”的统一：变化的是规划的属性与价值认知、规划的理论与方法等，而不变的则是中国式的规划实用主义思维。

关键词：城乡规划；社会思潮；国家治理；历史演进；中国

引文格式：张京祥, 陈浩, 王宇彤. 新中国 70 年城乡规划思潮的总体演进[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4): 8-15. DOI: 10.22217/upi.2019.26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也在发展演进中谱写了一部鸿篇巨制。透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规划思潮的演进，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城乡规划的历史与现实，判断城乡规划的未来发展趋势。而观察、理解、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 70 年来中国城乡规划理论、思潮的演进，本文以为可遵循“一个环境观，两条主脉络”的视角。所谓“一个环境观”，就是必须置于国际国内大环境、中国总体社会经济形势大背景之下，才能深刻理解城乡规划的角色、功能，以及相应的规划思潮；所谓“两条主脉络”，脉络一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演变；脉络二是政府、市场、社会间关系的演变，不同的治理格局从根本上影响着中国城

乡规划的角色、思潮与实践。

据此，本文将七十年中国城乡规划思潮的演进历程划分为五个大的时期：

第一个阶段：1949 年—1960 年代初。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规划属于地方事务，传统文化影响颓废，规划理论深受西方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受国际政治环境所迫，全面倒向苏联，停止引用西方规划理论，全面学习苏联规划理论与模式。城市规划被纳入计划经济体系，以生产力布局为中心任务，规划思维体现出强烈的自上而下、计划性、指标性、工程技术性等色彩。

第二阶段：1960 年代初—文革结束。1960 年代西方世界经济的现代化以及丰裕社会的形成，促进

了西方城市规划思潮的多元化发展，并愈发呈现出人本主义规划特质。这一时期，我国正经历极左的社会思潮阶段，“斗、批、改”政治运动席卷全国，城市规划工作全面停滞，城市规划被认为是“扩大城市差别”的“修正主义”而受到了批判。文革十年间城市建设和管理基本呈现无政府状态，直到文革后期，城市规划工作才开始缓慢复苏。

第三阶段：1970年代末—1990年代初。改革开放带来思想解放、体制变革，城市规划事业全面恢复。城市规划的理论学术研究蓬勃发展，大量引进、学习西方的规划理论与技术手段，这一时期规划研究与实践工作呈现出崇尚科学、尊重技术、重视规律的思想特征。这一时期，城镇体系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创造性的实践，体现了西方规划理论与中国本土实践的有机结合。

第四阶段：1990年代中期—2012年。在全球化、分权化和市场化的多重影响下，我国城市形成了以增长为中心的战略与政策架构。作为地方政府完全掌握的政策工具，城市规划呈现明显为增长主义特征，即所谓的“为增长规划”。2000年代初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城市规划也在理念和技术层面进行了创新与更迭，如从城市规划发展为城乡规划，规划中愈益关注城乡统筹、公平正义，强调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但规划实践中的增长主义思维惯性难以扭转，城市规划基本上成为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工具，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围绕规划展开了博弈。

第五阶段：十八大以来。全球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增长主义模式走向终结，中央作出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判断，提出深化改革、创新发展等一系列新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从治国理政的高度来认识城乡规划，城乡规划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规划思潮从增长主义转向生态主义，作为这一思潮的体现，城乡规划实践层面呈现全面加强自上而下规划管控与生态环境保护优先（如增长边界划定）的趋势，从多规合一的探索到建立全面统一的国家空间规划体系的转变，越来越注重内涵发展、高质量发展。

基于以上五大发展阶段的详细阐述，本文总结

了中国城乡规划思潮发展演进的一些基本逻辑和规律。

逻辑 I：对城乡规划功能属性认知的不断进化。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城乡规划在功能角色、思想方法和内容方面的变化，明显受到国际国内经济与社会环境、国家治理理念与模式、中外规划思想碰撞等状况的深刻影响，对于城乡规划功能属性的认知也经历了不断发展、提升、转变的过程，呈现出强烈的时代响应性。

逻辑 II：中国城乡规划思潮呈现渐进融合式演进。相比于西方规划思想的批判性演进，中国城乡规划思想更讲究传承、延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规划实用性地借鉴了当代西方许多规划思想理论，与中国城镇化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杂烩式”规划思想、理论和方法体系，理性规划思想与精英主义乌托邦、倡导式、市场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想和理论元素杂糅在一起，而非相互排斥，这构成了中国城乡规划思潮演进的一大特色。

逻辑 III：中国城乡规划不变的实用主义路线。在西方国家的语境中，城乡规划主要职责是作为市场机制的对立面、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公共政策。而在中国，城乡规划总体上很好地实现了理想主义、理性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中国的城乡规划紧密地跟随政府的大政方针调整而变化，在改革开放后40年的发展历程中，很大程度上遵循市场（或“企业化”）逻辑的发展，而不是与市场为敌。在规划理论与实践虽愈来愈强调扩大公众参与，但始终坚持上下制衡的精英主导范式。由此可见，中国的城乡规划并非简单囿于某种固定的价值观基础，这就是中国城乡规划思潮遵循实用主义路线的重要体现。

在构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背景下，城乡规划（或“国土空间规划”）的发展未来影响如何？将如何深刻改变国家、社会、规划人对于空间规划的认知与思维？70年实践探索积淀的城乡规划经验与体制，哪些是历经岁月磨砺之后仍然需要延续、传承、发展的？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

阶段、思潮与行动：国际视野下现代中国区域规划理论与实践的演进

罗震东 崔功豪 乔艺波

摘要：中国区域规划是世界区域规划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区域规划理论与实践的演进需要在更广阔的国际视野中发掘、比较。区域规划作为国家进行区域治理的重要工具，必然具有鲜明的国家特色和时代特征。区域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必然是与具体国家、地区的特定发展阶段相匹配的结果。建国70年来，中国区域规划在接受国际规划理论与实践影响的过程中，存在着发展阶段与规划思潮、行动选择之间的持续调整过程。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阶段认知不断清晰，利益博弈日益激烈，行动选择更加多元，中国区域规划的演进趋势和规律也逐渐清晰。尝试识别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在全球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阶段中的对应区段，为分析70年来中国区域规划思潮和行动选择的适当性确定参照体系。进而针对中国不同阶段的区域规划理论与实践，剖析不同规划思潮在中国的响应程度，构建发展阶段与规划思潮、行动选择之间的对应关系。结合对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趋势判断，提出中国区域规划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可能方向。

关键词：区域规划；发展阶段；规划思潮；实践；中国

引文格式：罗震东，崔功豪，乔艺波. 阶段、思潮与行动：国际视野下现代中国区域规划理论与实践的演进[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4): 16-22. DOI: 10.22217/upi.2019.195.

土地管理制度视角下现代中国城乡土地利用的规划演进

林坚 赵冰 刘诗毅

摘要：作为一切生活和生产活动的载体，土地是各类规划的基本对象，土地利用是各类规划的核心内容。土地管理制度直接决定城乡建设用地供给、土地利用效率、土地增值分配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从而影响规划的发展理念与编制实施。我国城乡土地利用的规划具有多类型、多部门管理的特点，伴随土地制度从建国初期的无偿划拨与计划分配，到改革开放后转向有偿使用制度，引入土地市场，逐步形成了国土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多类型规划格局，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展了构建统一空间规划体系的探索。而规划的演变则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从国家直接支配土地，到“两权分离”下的地方土地发展权管理，再到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央—地方两级土地发展权分级管理，进而到当前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两级土地发展权归口管理的历程。本文在回顾建国70年来我国城乡土地利用的规划演进基础上，探析中国特色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变迁及其对城乡土地利用规划的影响。针对土地利用规划关注点的更替，阐释我国城乡土地利用规划的演进路径，解析“建设管理—资产管理—资源管理—生态管理”这一关注重点渐次演化以及相应的职能逐步叠合的过程。

关键词：城乡土地利用；规划；演进；土地管理制度；土地发展权；国土空间；中国

引文格式：林坚，赵冰，刘诗毅. 土地管理制度视角下现代中国城乡土地利用的规划演进[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4): 23-30. DOI: 10.22217/upi.2019.226.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包含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国土规划在内的城乡土地利用规划体系。结合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经济特征和土地管理制度，文章选取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城镇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订确立土地用途管制制度）、2008年（《城乡规划法》实施）作为时间节点，将建国70年来城乡土地利用的规划演进分为四个阶段，详细回顾了我国土地管

理领域的重大政策和事件，探析了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对城乡土地利用规划的影响。

建国初期，城市土地通过划拨无偿使用，土地管理服从于国民经济统一管理，体现出鲜明的计划配置特征。城市规划辅助经济计划落实生产建设空间，土地利用规划主要为农村生产提供适宜的土地条件服务，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对发展生产的保障作用，具有明显的工程技术属性，侧重建设管理。

土地的无偿使用忽视了市场机制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导致土地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拉开了城镇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序幕。《土地管理法》的修订确立了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国家实行所有权、使用权“两权分离”，退出对土地利用的直接支配，通过发挥土地的资产属性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对城市土地结构和利用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城乡土地利用规划体系和理念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土地资产管理的驱动下，城市规划管理通过“一书两证”控制规划区内土地开发性质和强度，隐性的土地发展权管理开始出现。

对土地资产权利的争夺导致耕地资源大量减少，生态环境逐渐恶化，引起了国家的高度关切。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明确要求土地资源的保护、利用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强化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的效力，对保护耕地、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和保护生态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用，土地的资源属性得到凸显。并且，首次在国家层面确立了以用途管制为核心的新型土地管理制度，强调“调控新增建设用地总量的权力和责任在中央，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的权力和利益在地方”，从而产生了对土地发展权的两级管理体系。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各类规划都加强了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2008年《城乡规划法》正式实施，为城乡土地规划管理带来了新变革。城市规划的指导理念向精明增长、紧凑发展和混合用地转型，并把“生态”和“宜居”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土地利用规划由注重耕地保护向注重社会经济生态综合效益的可持续发展转变；国土规划的着眼点也从生产力布局转向资源的合理开发保护。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背景下，以建设用地管控为主的土地用途管制转向山水林田湖全域、全类型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中央大力推动多规合一，组建自然资源部负责构建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实现了对两级土地发展权的统一归口管理。

综上所述，伴随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城乡土地利用规划的关注重点渐次演化以及相应的职能逐步叠合，由为生产建设服务为主，到逐步关注土地的经济效益和资产管理，再到发挥规划的宏观调控作用加强对土地资源的综合管理，进而到生态文明建设时期强调对土地的生态功能管理，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不断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外引”与“内消”——国际经验对中国城乡土地利用相关规划的影响探析

赵冰 林坚 刘诗毅

摘要：现代中国城乡土地利用规划不断引进借鉴国外规划理念，并与中国特色土地管理制度和本土规划实践相互交融，发展演进。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在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城乡土地利用的规划工作也不无例外地走上“苏联模式”道路。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在市场化 and 全球化共同推动下，其他国家的规划思想和理论不断涌入，大大突破了原先单一向苏联学习的模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城乡土地利用规划体系的发展。本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发展阶段，国际理念和经验的引介对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国土规划和主体功能区规划发展的影响，并阐释相关规划在演进过程中借鉴与独创相互交融，逐步形成适应中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规划体系。最后尝试对当前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提出启示性建议。

关键词：城乡土地利用；规划；演进；国际视角；国土空间规划改革；中国

引文格式: 赵冰, 林坚, 刘诗毅. “外引”与“内消”——国际经验对中国城乡土地利用相关规划的影响探析[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4): 31-36. DOI: 10.22217/upi.2019.227.

我国城乡土地利用的规划演进, 离不开引进借鉴国际先进的规划理念。而对于这些“舶来品”的消化吸收, 建立在与本土制度和规划实践充分融合的基础之上。文章重点选取与城乡土地利用较为密切的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国土规划和主体功能区规划, 分析了国际经验和本土实践对于规划发展的影响, 并对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提出了相关建议。

新中国城市规划工作的启动整体参照苏联模式, 以计划体制下的空间安排职能为重点, 为土地资源配置和空间战略部署提供实施性保障, 有效配合了工业城市建设。1980年, 美国土地分区规划理念引入中国, 结合城市建设用地出让和转让工作, 控制性详细规划雏形开始出现。随后, 经过温州、深圳等城市的实践探索, 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措施。

土地利用规划是在建国初期由苏联传入的, 当时称作“土地整理”, 主要针对农村和国有农场的规划设计和土地整理, 受到了苏联专家的直接支持。市场经济转型后, 耕地急剧减少等问题得到中央高度关注, 借鉴发达国家的用途管制手段, 我国开始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 逐步形成了自上而下逐级控制、以土地供给制约引导需求、以耕地保护为基本出发点的规划编制体系和以土地用途管制为核心的规划实施制度。

有别于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 我国的国土规划最初受到荷兰、日本等国家的国土开发整治经验启发而来。在总结以往国土开发利用经验教训的

基础上, 开展国土规划试点, 提出全国性的国土开发整治战略和生产布局构想。近十年来, 我国的国土规划已经发展成为推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环境保护、国土综合整治举头并进的战略性、综合性规划。

主体功能区规划则是充分借鉴欧洲空间规划的理念和经验, 吸收国内国土规划编制经验, 确立了主体功能区的发展思路, 立足大规模工业化、城镇化开发活动的适应性, 调整完善主体功能区的区域政策, 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总结上述四类规划的发展, 从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时期全面学习参照苏联模式, 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借鉴不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规划经验, 我国城乡土地利用的规划理念和方法既有“拿来主义”, 在本质上与本源国家有一致性, 又顺应了不同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多元、实用的城乡土地利用规划体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国土空间规划作为指导和调控城乡土地利用的基本依据, 应立足于生态文明建设, 构建分工明确、衔接有效的“五级三类”体系。规划层级与行政管理体系高度契合, 上位规划强化责任约束, 下位规划体现权益维护。三类规划之间紧密联系, 总体规划通过指标、边界、名录等管理手段自上而下调控, 统筹指导特定区域或领域的专项规划, 详细规划既要落实总体规划的需求, 又要体现专项规划的主要内容, 确保要素落地管控。

现代中国城市生态规划演进及展望

沈清基 彭姗妮 慈海

摘要: 文章将1949年以来的中国城市生态规划演进过程分为初始萌芽期、缓慢发展期、启动建构期和全面发展期四个阶段。将社会经济环境与城市生态规划予以关联考察, 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归纳了中国城市生态规划的演进特征, 分析了中国城市生态规划存在的主要问题。在认知中国生态环境发展趋势的大背景下, 从主动适应空间规划体系改革、提高城市生态规划的应需性水平、多向度拓展城市生态规划的生态位、探

索城市生态规划体系创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生态规划理论与实践体系五个方面对未来中国城市生态规划的发展进行展望。

关键词：现代中国城市生态规划；演进分期；理论演进特征；实践演进特征；未来展望

引文格式：沈清基，彭姗妮，慈海. 现代中国城市生态规划演进及展望[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4): 37-48. DOI: 10.22217/upi.2019.327.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以来，新中国的城乡规划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各类规划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城市生态规划”无疑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的规划类型之一。但对于生态规划在我国如何肇始、发展和演进，却鲜有系统性的研究探索。近十年来，随着全球生态问题的爆发和我国对生态文明的日益强调，“城市生态规划”开始以其丰富而庞杂的形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并日益引起重视和关注。因此，在建国70周年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对新中国成立至今的我国现代城市生态规划演进进行系统梳理、分析及未来展望，无疑对生态文明时代人居环境的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成果概括如下：

其一，将中国现代城市生态规划演进分成四个阶段：初始萌芽期（1949—1977年），缓慢发展期（1978—1989年），启动建构期（1990—2000年），全面发展期（2001年至今）。

其二，梳理阐述了中国现代城市生态规划各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环境背景和相关动态。包括：国内城市生态规划影响因素、规划及实践动态，国际生态环境研究及实践动态等，为理解、描述和分析现代中国城市生态规划演进构建了一个宏观框架。

其三，梳理、归纳并提出了现代中国城市生态

规划理论和实践的演进特征。其中，理论演进特征包括：从“拿来主义”到“中国特色”、从“另起炉灶”到“体系融合”、从“技术理性”到“价值融合”；实践演进特征包括：从“单一形式”到“多元载体”、从“宏观愿景”到“全域视角”、从“刚性控制”到“弹性管治”。这些特征集中体现了现代中国城市生态规划从起步至今的探索、演进及完善过程的多个侧面。

其四，在充分肯定建国70年来中国城市生态规划成就的同时，分析并提出了我国现代城市生态规划若干有待完善的议题，包括：理顺与上下位规划的关系，构建全面的规划目标，加强规划编制与实施的连接，统一技术规范，提升人文情怀等。

其五，基于生态文明建设与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背景，对中国城市生态规划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提出了若干设想和建议，包括：主动适应空间规划体系改革，构建与现有各类规划以及空间规划体系下新兴规划的恰当关系；提高城市生态规划的应需性水平，提高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多向度拓展城市生态规划的生态位，使城市生态规划能够持续产生不可替代的、良好的规划绩效；探索城市生态规划体系创新，结合国家的大政方针和不断变化的生态环境发展形势，探索创新之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生态规划理论与实践体系，为中国城市生态规划的世界化做好准备等。

新中国城市交通规划的探索与发展

马林

摘要：中国现代意义的城市交通规划形成于1970年代末期，在40多年的研究和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汲取了社会、经济、管理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逐渐形成了具有多学科融合特色的城市交通规划技术方法和面向实际需求的多层次专项规划编制体系。城市交通规划的演进与城市交通研究相辅相成，规划理念、规划技术的更新既有国外经验的借鉴，也离不开国内实践的检验与验证。本文梳理了我国城市交通规划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对城市交通规划发展具有影响的人才培养、规划研究、技术研发等方面；阐述了城市交通

规划编制体系的发展演变，以及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的编制内容；针对未来城市交通发展的不确定性和交通规划实施管理多元性，讨论了四个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城市交通；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城市综合交通规划；交通规划编制；历史回顾；中国

引文格式：马林. 新中国城市交通规划的探索与发展[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4): 49-53, 71. DOI: 10.22217/upi.2019.199.

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的理论与实践

毛其智

摘要：人居环境科学是研究人类聚居及其环境相互关系与发展规律的科学。中国的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与实践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文章分为理论与实践两大篇章，首先叙述了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的发端与成长历程以及人居环境科学的核心内容。吴良镛作为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采用发展整合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等核心学科的方法，为实现人居环境有序空间和城乡宜居环境的目标提供了理论框架。在实践层面，从联合国的“人居一”到“人居三”大会，从《人居议程》到《新城市议程》，国内外人居运动密切交流，互动促进。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在吴良镛指导下，以问题为导向，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意识地寻找城乡人居环境发展的“新范式”，不断推进人居环境建设的发展。

关键词：人居环境；人类聚居学；人居环境科学；联合国人居署；新城市议程；吴良镛

引文格式：毛其智. 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的理论与实践[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4): 54-63. DOI: 10.22217/upi.2019.198.

2018 年 1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表彰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的决定”，授予 100 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时年 96 岁高龄的吴良镛先生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以“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的贡献接受了党和国家“改革先锋”的表彰。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与实践成为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吴良镛是至今为止城乡建设领域唯一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改革先锋”表彰的获奖者。吴良镛的获奖，是学术界对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等相关学科领域和科技事业的认同，是党和国家对以吴良镛为代表的中国建筑规划园林学者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所作出杰出贡献的表彰和奖励。

吴良镛是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他建立了以人居环境建设为核心的空间规划设计方法和实践模式，为实现有序空间和宜居环境的目标提供了理论框架。吴良镛发展了整合建筑学、城乡规划

学、风景园林学等核心学科的方法；针对实践，提出了区域协调论、有机更新论、地域建筑论。组织科学共同体，发挥各学科优势；成功开展了从区域、城市到建筑、园林等多尺度、多类型的规划设计研究与实践。

1981 年，吴良镛当选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学部学部委员后第一次参加学部会议，深感有必要对建筑理论进行基本的探索，以应对改革开放后迎来的中国城乡规划建设新时代。他认为，为了阐明建筑学的真谛及其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积极地适应时代的需要，建筑学应从广度上和深度上加以展拓，应在认识上有所突破，把建筑从房子的概念延至聚居（settlement）的概念。吴良镛指出，多少年来，建筑学者们一直宣传建筑的两重性，强调艺术的属性，等等，但总是就房子论房子，非专业者难以理解。一旦联系到聚居，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整个聚居环境不是房子与房子的简单叠加，而是人们多种多样的生活和工作的场所。从一幢房子到三家村到村镇到城市，以至大城市、特大城市等，都属于聚居范

畴，这样便很自然地将建筑与城市融合在一起了，也就需要融入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等观点，去分析研究实际问题。“聚居论”是一个基本的理论，从此出发，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认识到建筑的地区、文化、科技等特性。

在“人类聚居”概念启发下，吴良镛首先进行的是“广义建筑学”的思考。1989年，《广义建筑学》一书出版，全书共分十章，即聚居论、地区论、文化论、科技论、政法论、业务论、教育论、艺术论、方法论和广义建筑学的构想。之后，吴良镛又将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上升到创建美好人居环境的高度。

1993年，吴良镛邀约周干峙和林志群，共同分析了中国城乡建设发展的形势和问题，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人居环境科学”设想，将其作为一种以人与自然的协调为中心、以居住环境为研究对象的新的学科群。1994年，吴良镛等合著的《中国建设事业的今天和明天》一书出版。在该书的直接影响下，清华大学于1995年成立了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先后资助了四次关于“人居环境”的学术会议（昆明1994年、西安1995年、广州1996年、重庆1998年）。此外，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相继开设了有关“人居环境”的课程，重庆大学召开了有关山地人居环境的国际学术会议。学术界从事人居环境研究的组织与活动逐步增多。从1990年代后期起，“人居环境”一词开始被社会普遍接受和沿用。

吴良镛认为，人居环境科学这一新的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将有助于从新的角度，多层面地揭示当前人类聚居环境中存在的问题，高屋建瓴地解释我国由于城镇化进程加速发展所出现的种种现象，科学预测人居环境建设中的重大前景趋势，充分利用现有的科研成果着手解决某些有关人居环境建设发展的复杂矛盾。同时，我国城乡建设的丰富实践将使人境科学的研究有可能获得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好的条件和更具操作性的成果。在这样一种新的学术观念和开放的学术系统中，原有的各相关学科领域将得到丰富、拓展、交叉与重新组合，并能为我国建设实践中提出的具体问题，找到一些更加综合、全面和实际的解决办法。

2001年，吴良镛专著《人居环境科学导论》出版。他说：“人居环境科学尚在初创之中，现在只是粗略勾勒其轮廓，以有助于人们的思考。总目标是通过理论研究与建设实践的努力，探索一种以研究改进、提高人居环境质量为目的的多学科群组，融贯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科学中与人居环境相关的部分，形成一新的学科体系——人居环境科学。”

2015年1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城市工作指导思想不太重视人居环境建设。现在，人民群众对城市宜居生活的期待很高，城市工作要把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作为中心目标，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

从“被动接受”到“合作共创”：基于演化视角的智慧城市理论发展框架

楚金华

摘要：针对智慧城市理论研究存在的概念多元化、研究脉络不明显和对市民参与问题认知深度不够等现象，论文以“市民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为视角对智慧城市理论典型观点进行了演化分析。然后从“ICT成熟度—城市发展需求—建设任务”三个维度构建了智慧城市理论整合模型，提出：（1）人的认知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动力源；（2）智慧城市是一个散系统；（3）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连续体；（4）智慧城市建设内容需经历基础设施建设、制度转型和大众创新三个阶段；（5）以市场为主体的商业模式是智慧城市建设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等观点。接下来，结合演化分析和研究观点指出了智慧城市理论发展趋势并提出了以下建议：（1）学术界应主动对接相关政府部门和ICT企业，提升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2）创新研究视角，按“自下而上”建设模式构建智慧城市理论体系；（3）创新数据获取方法；（4）

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市民参与上来；(5) 多关注智慧城市建设的商业模式创新。

关键词：智慧城市；数据；市民参与；自下而上；民众外包

引文格式：楚金华. 从“被动接受”到“合作共创”：基于演化视角的智慧城市理论发展框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4): 64-71. DOI: 10.22217/upi.2018.237.

据统计, 到 2050 年全球将有约 66% 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大量人口涌入城市, 在为城市发展创造价值和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包括交通拥挤、环境恶化及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系列“城市病”, 为此人类不断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治理模式, 智慧城市就是其中一种。作为一种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 (ICT) 的新型城市治理模式, 智慧城市理念自被提出之日起就备受关注和争议。迄今为止, 学术界和实践界都未形成统一的智慧城市定义。究其原因, 学者们关于智慧城市持有不同态度的原因主要源于人与技术的关系及智慧城市本身所具有的城市复杂系统属性。本研究基于人和 ICT 关系视角, 提出梳理智慧城市理论的 4PC 方法、构建智慧城市理论整合框架, 并基于智慧城市的城市复杂系统属性对理论进行了解释。

首先, 梳理智慧城市理论的 4PC 方法较以往的城市领域文献梳理方法更能体现出人与 ICT 关系的发展。该方法旨在说明随着 ICT 技术发展、人与技术的交互性不断增强, 人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由最开始的“被管理者”逐步演化成“内容共创者”, 这说明人类对智慧城市的认知是伴随 ICT 发展而不深化的, 这也是后文构建的智慧城市理论整合框架的主要观点之一。因此作为一种解决“城市病”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模式,

不可能存在一成不变的智慧城市定义, 其会随需解决的具体问题而呈现出不同的表征。

然后, 论文综合人在智慧城市建设中角色的演化和智慧城市所具有的复杂系统属性构建了智慧城市理论整合框架, 该框架主要观点包括: (1) 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连续体; (2) 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散系统 (system of systems); (3) 人的认知是智慧城市建设动力源和 (4) 智慧城市建设内容需经历基础建设、制度转型和大众创新三个阶段, 即“3I”(infrastructure, institution, innovation)。与以往的研究观点相比, 该理论框架不仅综合了智慧城市的人本属性、技术属性和发展属性而且还给出了智慧城市建设的具体逻辑方案——“3I”。“3I”逻辑方案的理论基础是基于信息价值链的智慧城市工作逻辑, 这也是本研究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创新点之一。

在阐述完整理论框架后, 论文接下来提出了基于前述理论的智慧城市理论发展趋势, 其实这也是智慧城市理论发展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它们具体包括: (1) 凸显智慧城市建设中“人”的核心地位; (2) 关注智慧城市跨学科及其复杂系统属性; (3) 解决智慧城市建设的“市民参与”问题; 和 (4) 数据立法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地位。文章在最后针对这些关键问题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道路网连通性度量方法的研究进展和展望——从规范制定的角度探讨如何在中国推广街区制

方彬 石飞

摘要：中国街区制的推广, 意在通过打通城市的毛细血管, 提高道路网的连通性。充分而全面地掌握道路网连通性的度量方法能够有效指导建设施工活动, 是在实践中提高道路网连通性的前提。为全面了解国内外关于道路网连通性的研究进展, 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相关文献, 对当下城市规划中常用的道路网连通性度量方法进行归纳和总结, 探讨了其中的不足, 并对今后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 认为“街区单元法”在指导规范制定的过程中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基于我国街区制推行的初衷和落实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强调了出台相关规范、设定阈值指标的必要性。本文选取南京的两个地块, 运用“街区单元法”对道

路网连通性的改善进行了演示，进一步探讨了在“改造”和“新建”两种活动中如何通过设定阈值指标的方式高效地保证城市道路网的连通性。

关键词：道路网连通性；街区制；度量方法；街区单元法；规范制定；阈值指标

引文格式：方彬，石飞. 道路网连通性度量方法的研究进展和展望——从规范制定的角度探讨如何在中国推广街区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4): 72-78. DOI: 10.22217/upi.2017.544.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城市中被行政、军事等机关部门圈起的“大院”和大规模建设的封闭住宅小区一直是非常常见的建设形式，这两种形式的大型“团块”对交通通行的负面影响在十几年前并不显著，但随着近年来我国人口城镇化率和私人汽车拥有量这两项指标的“双高”态势日益显现，这些“团块”对城市交通问题的“贡献”日益突出。

为了应对上述问题，学术界和城市交通管理部门可谓是使尽浑身解数，研究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拓宽道路、单双号限行、错峰出行、公交优先发展……实践证明确实起到了较好的缓解效果。国外的建设实践和相关研究表明，如果将城市中的街区尺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就能够有效打通城市的“毛细血管”，显著提升路网连通性，使得城市中的车辆有更多的路径选择，在拥堵时段能够快速疏解车流，从而缓解交通拥堵。2016年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在我国推广“街区制”，如此一来，“如何打开小区和大院”以及“打开到何种程度能够使得效果最优”就成为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带着以上疑问，笔者在研究生期间进行了一些思考，一次在“城市与区域交通规划研究”的课程上与石飞老师进行了交流，最终决定从路网连通性度量方法入手进行研究。以上两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有一个“标尺”进行衡量，而路网连通性度量方法正是这样一把可量化的标尺。在后续的资料搜集和案例研究中发现，美国各地区的“交通条例”等

法律法规文件和我国成都的“小街区规制”对我国街区制的推广很有借鉴意义，这种将“度量方法”和“阈值指标”运用到规范性文件中的做法能使得大型“团块”的改造和小街区的新建成为一种有法可依、有据可查的建设活动。

连通性度量方法的选择也很有讲究，最重要的就是要适应我国“不规则路网普遍存在”的国情。笔者对这一国情的认知，部分源于对南京城市路网的切身感受——学校周边的路网形态可谓千奇百怪（每次穿行期间都会暗想，若是外地司机来这，不扣点分可能是休想离开的）。中国的很多城市与南京一样，有着较为悠久的建城史，且不同地区甚至同一片区内都可能存在较大的地形差异，因此路网的形态并不规整。此外，一些历史遗存较多的城市出于保护文物古迹的考虑而采取的退让措施，对道路的线形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城市的路网常常呈现出不规整的状态，甚至有些地区还出现了看似“不合常理”的路网构造。

目前常用的连通性度量方法有很多，但绝大多数都只适用于北美城市的规整方格状路网，此时若奉行“拿来主义”，必然出现“水土不服”。因此在我国推广街区制的过程中，亟须选择一种能够适应不规则路网的度量方法，本文通过对比研究，认为“街区单元法”堪当此任，并进一步论证了如何将该方法运用到规范制定中以助力街区制的推广。

危机应对：理解中国城市化与规划的第三种视角

杨宇振

摘要：理解中国城市的变化，需要将其置放在后发的民族国家与全球关系的格局、中国城乡社会演变，以及更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中来观察。文章先简要回顾和论述约翰·弗里德曼的《中国的城市变迁》、黄鹭新等的《中国城市规划三十年（1978—2008）纵览》，再提出“竞争与危机”作为理解中国城市变化的一种方法，

解释历史过程中的路径选择。认为当代中国的社会日渐进入资本过度积累的社会，规划需要从之前的计划型范式、生产型范式，转变为以空间为手段的更具有能动性的、结合其他学科共同应对和处理复杂多变的城乡社会问题的新范式。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就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

关键词：约翰·弗里德曼；黄鹭新；危机与中国城市规划；规划理论创新；中国城市化

引文格式：杨宇振. 危机应对：理解中国城市化与规划的第三种视角[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4): 79-85. DOI: 10.22217/upi.2017.351.

现代社会是在全球与国家、城市与乡村、城市之间、城市内部的地段与地段之间等等不同地理范围的空间层级中，经由持续的经济、文化、信息、人员、商品等的往来、互动而逐渐形成的。过去的四十年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这一变化既与国际、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格局的变化有关，也与中国自身的历史、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有关。任何单方面强调完全受制于外来力量的影响，或者强调完全内生性发展的观点都有失偏颇。

弗里德曼谈到，城市化是不均衡的空间发展过程，将不可避免地生产社会张力、社会冲突，爆发民众的抗议。他提出了理解中国城市变迁的内生发展演化视角，认为将“全球化”作为研究城市的分析框架，有赋予外来力量特权的倾向，可能忽略了地方内在的远见、历史过程和路径，以及内生的各种能力；其次，全球化的视角强调经济而排除了地方社会文化与政治的各种状况；第三，对于中国而言，“内”与“外”并不容易分辨。弗里德曼最后判断，前进的路径上要避免出现导致僵化的极权主义、无政府主义两种极端，需要在两者间找到一种平衡。黄鹭新等则阐述 30 年间中国城市规划变迁的方式是“分期+现象”，根据历史进程判断分析其变化的子阶段，阐述在各子阶段内城市规划从机构、法规、实践、知识与技术以及社会过程等层面的现象与变化。这些方式方法分析了历史过程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和现象，以获得概览性的面貌和理解；其中的难点在于选择哪些而不选择另外的一些。

在马克思看来，周期性的资本积累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冲突的结果。理解危机的产生过程是洞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必要途径。从 1970 年代末以来，中国日益成为全球资本积累循环的一部分，“危机与危机的应对”是理解中国城乡社会、城市以及城市规划变迁的一种视角。20 世纪以来的后

发民族国家普遍存在竞争中的焦虑感：一方面需要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在追赶的现代化进程中又面临着自身内部的结构转型。危机的产生，是一种主动性生产过程的结果，它既存在于与各国（特别是与各超级大国）的关系（历时的变化过程）之间，也存在于自身的城—乡社会关系、城市内部、农村内部的尖锐矛盾中。

从危机的类型上看，从早期现代化中的一般商品生产的资本积累危机，越来越演化为金融危机、社会公平正义危机和环境危机。每一次的危机都是对社会秩序的冲击，某些社会组织解体或进行结构性调整，同时可能产生对权力合法性的质疑。危机的应对，就是通过对自身能够控制的资源（政策、财政、空间、劳动力等）进行调节，来减少危机的猛力冲击，以维持地方的秩序和日常生活状态。城市规划是应对危机的一种空间工具。危机具有空间地理属性，在某一地区的危机会向其他地区转移或转嫁（如东部到西部，城市到乡村）；危机也具有产业属性，在某一产业中的危机会向其他的产业转移或转嫁（如金融部门到房地产部门等）。因此，危机的应对具有时空特征。

城市规划作为中央与地方政府手中的工具之一，同时具有政策属性与技术属性。这一工具必须同时与其他工具共同使用，才能够完成具体的物质空间实践。比如，要将某一空间转变为商品，需要法律许可和确权、金融信贷体系、空间的划定和属性赋予、市场交易体系等一系列的商品生产要素和交易要素，城市规划是完成这一交易过程的必要构成。在经济形势总体向好时——在中国的政治与行政格局状况下，也意味着地方城市政府之间激烈的经济竞争——城市规划成为地方城府发展主义的一个重要工具。城市规划的作用，很明显地可以在多次的危机应对中找到发展的脉络，进而获得浮现

的各种空间现象及其时空变化的可能解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关联着社会公平正义危机，关联着环境危机，关联着日常生活意义的危机。由于资本积累周期的加速和网络社会的浮现，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大大小小的各种危机频发，使得规划作为应对危机的一种工具，越来越多出现各种应对危机的专项规划（也因此出现对综合规划的高度需求），越来越多的各种指向特定内容的“某某规划”，正成为普遍现象。

危机是创新之母。创新往往出现在不同生产方式转变之间——生产方式的转变是最大且持久的社会危机。从计划主导的社会向市场主导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规划作为一种空间实践的工具，本身就必须经历转型，从生产空间的使用价值为主向生产交换价值为主转变。从资本稀缺性社会向资本过剩型社会的转变，同样面对库恩指出的“范式”的转

变。当代中国社会日渐进入资本过度积累的社会，规划需要从之前的计划型范式（并未完全消失）和生产型范式，转变为以空间为手段的更具有能动性的，结合其他学科共同应对和处理复杂多变的城乡社会问题的新范式。

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就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其中的一种，是将空间现象与空间生产的机制更紧密和有效地结合起来。作为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一种工具，规划需要处理日常的、短时段“冲击一应对”式的具体事务。但规划的创新存在于理论创新与日常实践的相结合，基于对城乡社会中长期的观察与思考基础上。从这一点上说，弗里德曼的《中国城市的变迁》提供了一种更加宽阔的视野；规划创新还存在着目标的指向，从这一点上说，弗里德曼提出的“个人自主空间的扩展”始终是规划实践的核心要义和基本目标之一。

英国规划评估体系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汪军 陈曦

摘要：随着规划评估工作在我国逐渐展开，对于评估理论方法和实施机制的研究越来越受重视。本文在系统介绍英国规划评估体系的发展及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对英国在不同阶段所采用的评估理念和方法进行了论述，提出了其在评估机构的设置和职能、评估主体的权力和责任以及其在典型的评估指导政策文件领域都具有较明显的特点，对我国全面建立规划评估体系具有显著的借鉴意义。基于这些论述，本文提出我国要在责任机制、技术指导、保障架构、结果使用等方面入手，建立完善的规划评估体系。

关键词：英国；规划评估；体系研究；评估机构；评估主体；评估指导

引文格式：汪军，陈曦. 英国规划评估体系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4): 86-91. DOI: 10.22217/upi.2017.228.

英国是现代城市规划的起源地，也是现代规划评估体系最完善的西方国家之一，其规划评估体系最终被欧盟采用，形成了欧盟框架下的区域规划政策评估体系。

英国建立规划领域的评估制度始于1960年代，当时的评估本质是在实现目标和使用资源这两者之间建立起最为合理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用最经济的预算最有效地达到目标。基于这一思想，建立了包括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规划平衡表及其衍生的一系列评估方法。1970年代中期，政府报告都强调

3E原则，即经济（economy）、绩效（efficiency）和效率（effectiveness）。随着1980年代末撒切尔政府的自由化深入，许多政府职能分化给社会机构来承担，但是在政策评估领域则诞生了独立的检测和评估机构。1997年布莱尔的工党政府执政后，英国政府的规划评估机制趋于稳定，评估方法向动态的、多方参与的形式转变。

按照典型的规划流程来看，一项规划包含三个主要阶段——规划编制、规划实施中以及规划实施后。英国的规划评估在这三个阶段中都有所体现，

分别为规划编制评估、规划实施评估和规划回顾。

而从执行评估的机构设置上来看，对于不同层面的规划评估工作，政府的机构也有所不同，主要分为中央、区域、地方层面。中央政府层面，涉及规划评估的机构主要有财政部（HM Treasury）、社区与地方政府部（Department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以及贸易与产业部（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区域层面的主要评估事务由区域开发办公室（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ies）和区域委员会（Regional Assemblies/Local Authority Leaders' Boards）主导，而地方政府中的评估机构大多数由各个项目参与方组成的委员会来主导。

英国规划评估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一套系统而专业的文件指导，使得各类规划评估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开展工作。1997年颁布了《地方政府法》，该法案规定了地方政府必须实行政策绩效的评估制度。1999年发布了专门针对政策制定的评估文件——《为21世纪制定专业化政策》，其主要目的是检验怎样的政策决策才算是真正的专业化决策，并整理现行的政策决策领域中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2003年发布了《绿皮书：中央政府的评估》，该文件首次提出了政策循环全过程（ROAMEF cycle）的重要概念，将一项政策的全过程概括为缘起（rationale）、目标（objectives）、方案评估（appraisal）、过程监测（monitoring）、评估（evaluation）和反馈（feedback）。2006年发布了用以指导区域开发办公室项目评估工作的文件《对英国区域开发办公室的评估：建立评估的框架和方法》。文件专门论述了对各类开发项目进行评估的方法以及衡量开发项目是否实现其预定目标的方法，着重在评估框架的建立、评估方法的运用及评估流程的设计方面作出了指导。

从英国进行评估的经验来看，我国要真正建立起规划评估体系，还需要从理念、方法、体制、机制等方面着手。树立正确的评估理念，关系到评估工作的发展方面和动力源泉；正确的方法关系到评估的有效性；相关的机制和体系的完善是评估实施的保障；而行之有效的操作模式是评估工作开展的技术依据。

滨海城市山海眺望景观规划控制的日本经验

刘泉 潘仪 赖亚妮

摘要：山海眺望景观的规划控制对于滨海城市的空间特色塑造十分重要。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建设，滨海城市山海眺望景观普遍存在景观遮挡、风貌混杂、绿化减少及断崖裸露等问题，从而影响眺望的观感。对于这一问题，作为海岛国家的日本，在山海眺望景观的规划控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日本相关城市为例，对其山海眺望要素和类型进行分析，并将相关规划控制方法总结为五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参照眺望对景边界特征界定眺望范围，依据眺望距离进行层次划分，保障眺望景观的建筑高度管理，风貌景观引导和建设行为控制相结合，以及通过行动计划进行分解落实。这些方法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能够为我国同类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思路。

关键词：滨海城市；城市景观；眺望景观规划；城市设计；规划管理

引文格式：刘泉，潘仪，赖亚妮. 滨海城市山海眺望景观规划控制的日本经验[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4): 92-101. DOI: 10.22217/upi.2016.416.

对于亲山、近水、滨海或历史建筑资源丰富的城市来说，景观眺望是市民欣赏城市风光和感知风貌特色的重要方式，而针对眺望景观开展的规划设计与管理控制则是塑造城市特色工作中十分重要

的内容。英美法等欧美国家已从1960年代开始在这一领域开展了相关研究实践，并取得了丰富经验。近年来，我国部分城市的景观眺望系统规划工作也越加受到重视，如北京在最新一版的总体规划

(2016—2035)成果中也提出构建“看山、看水、看历史、看风景”的景观眺望系统规划。

景观眺望系统规划工作虽然重要,但具体目标如何在规划设计管理中落实却缺少相对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在总体层面的城市设计工作中,是仅仅按照特定的宽度画出一条廊道,提出建筑高度控制要求就能形成很好的效果?还是需要更加复杂的设计细节和保障手段去进一步深入安排?这些技术环节需要通过相关实践进行更加充分的研究。特别是对于滨海城市,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建设,山海眺望景观普遍存在景观遮挡、风貌混杂、绿化减少及断崖裸露等问题。不仅影响眺望观感与风貌形象,也破坏了环境资源。通过搜集相关案例可以发现,对于此类问题,作为海岛国家的日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方面,日本滨海城市数量众多,相关城市的景观规划以《景观法》为指导,开展了划定景观规划区域、提出目标方针、管制建设行为、保护重要建筑及树木以及对重要空间要素进行规划引导等诸多工作。另一方面,日本海岸地区的规划建设也面临着与我国城市类似的景观塑造、灾害防治、生态保护、岸线空间及资源的管理与利用等各类要求及问题,长期的规划研究工作针对上述问题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本文选取鹿儿岛市、神户

市、南城市、石川县、松岛町等具有山海景观特色的县市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解读和研究。

笔者对山海眺望要素和类型进行分析,并将日本滨海城市的海山眺望景观规划控制总结为五个主要方面的内容:(1)参照眺望对景的边界特征界定眺望区域的宽度和范围,以保障片区景观控制的整体性;(2)依据眺望距离进行层次划分与分段控制,有利于增加规划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3)结合用地功能、强度、密度等要素进行建筑高度控制,以便向法定规划落实;(4)建筑风貌控制和建设行为管制相结合,对具体开发行为提出明确的要求,有助于从静态管理到动态修复的整体管控;(5)将眺望景观规划控制落实到行动计划,使这一具体问题纳入城市整体景观规划体系,有利于从城市整体特色塑造视角推进相关工作。

上述经验以景观规划为主要载体,构建了山海眺望景观的整体管理体系,具有过程控制的特点,切合我国当前提出的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的“城市双修”工作思路,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既能够促进城市景观风貌的优化,也能服务于滨海地区生态环境的提升。对这些方法进行总结,有利于我国城市在进行滨海地区山海眺望景观规划工作中进行借鉴和尝试,以便增加规划管理实效,进一步保护和塑造滨海空间特色。

国外“人—地情感”的标绘研究引介：作为规划决策制定的辅助工具和公众参与途径

王洋 于立

摘要：有关人—地情感的研究近年来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国外学者对人—地情感的标绘研究。这些研究以对情感的操作化定义为理论基础，通过社会调查收集情感数据；运用 GIS 分析将收集到的情感数据与空间数据相结合，在地图上予以呈现。这类标绘研究不仅可以提升人—地情感的理论和数据在土地利用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等方面的规划决策制定中的实用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普遍采用了 PPGIS 的调查方法，为我们打开了思考和实践人—地情感标绘作为公众参与规划决策的有效途径的大门。文章最后提出了未来情感标绘研究在理论、应用以及和公众参与理论结合方面的可能发展方向。

关键词：人—地情感；标绘；规划；决策制定；公众参与

引文格式：王洋，于立. 国外“人—地情感”的标绘研究引介：作为规划决策制定的辅助工具和公众参与途径[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4): 102-110. DOI: 10.22217/upi.2017.091.

人对特定地方的情感依附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人—地情感连结”是社会科学领域里众多学科的研究议题。其中，环境心理学领域中的地方依恋研究是当代“人—地情感连结”研究的核心。这一概念在 2006 年被引入中国，虽然迄今为止的相关研究集中在旅游学界，但其对历史城市保护的相关实践具有的理论意义值得规划师重点关注。

这篇文章的写作在 2016 年。当时，对于将地方依恋研究用于历史城市保护的想法还处在理论构想层面。因此，文章的论点完全是基于既有的文献，而非实证。相关的实证研究将会在日后逐步发表。

地方依恋的文献中，一些研究表明：“历史”（相对于“非历史”/“现代”）作为某个地方的“质性”环境属性通过不同的维度（主要是“地方认同”和“文化归属”）影响了人—地情感的形成（详细的理论论述，请阅读下面的全文）。而遗憾的是，这一点在当代城市保护的实践和研究中并没有获得关注。

文章提出：结合地方依恋研究，发展一套关注

历史城市环境情感意义的城市保护理论，并最终成为保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决策依据设想。例如，文章提出，在保护实践中借鉴地方依恋研究中的情感调查，让人们依据情感需求，自己决定最重要、最需要保护的历史地方和投入，并参与其中。

历史环境不仅具有“质性”情感意义，而其情感本身还有“量性”差异，即强弱之分。文章作者后续的实证研究将是结合这二者的情感调查。

文章提出的主张不同于基于专家对历史价值的评定选择保护对象、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区域这样的传统范式；突出的是构建一个开放的历史城市环境及保护体系，以及城市保护的目标与人们情感诉求的一致。可以推测，人们选出的场所中，有些也许因“历史或遗产价值不高”或因“等级不够”而未被认定为保护对象，有些重建或改建后的历史环境可能已经改变了原初的历史形态，但依然在人们的地方认同感和归属感等情感需求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

走向城市设计继续教育：伦敦城市设计中心的经验与镜鉴

王耀武 许霖峰 戴冬晖

摘要：伦敦城市设计中心经过 15 年的发展，带动了伦敦城市设计整体水平的显著提升。本文回顾了该机构产生的背景，发现技能赤字是推动伦敦城市设计继续教育发展的主要原因。通过分析机构的运营模式、运行框架、服务内容与形式，提出了机构得以长期发展的四项运作经验，分别是政府引领、用户为先的“政用产学研”模式，兼顾时效性与实效性的培训内容，借助调查评估以实现持续改善的过程，以及突出交流与共识的培训形式。在新常态与新需求下，这些经验值得我国城市设计继续教育工作借鉴。

关键词：城市设计；继续教育；培训；伦敦城市设计中心；运行机制

引文格式：王耀武，许霖峰，戴冬晖. 走向城市设计继续教育：伦敦城市设计中心的经验与镜鉴[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4): 111-119. DOI: 10.22217/upi.2017.296.

2000 年左右，城市设计的“技能赤字”问题在英国的规划体系中备受关注。多家机构的调查研究均表明，无论是与建成环境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管理者还是基层从业者，都存在城市设计认知和技能方面的缺口。为此，英国在中央政府的倡导下，借助行政体制外“支持机构”的力量，逐步开始了城市设计继续教育的实践与探索。伦敦城市设计中心（UDL: Urban Design London）作为这次继续教育

发展大潮中的佼佼者，为伦敦城市设计整体水平的显著提升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UDL 是一个非营利继续教育机构，以“帮助从业者创造和维护设计精良的高品质场所”为目标，主要从事专业培训，构建行业关系网络，辅助提供设计咨询与信息分享服务（包括研究报告和资料集等）。它主要面向伦敦行政管理体制内部的政府和建成环境相关职能部门提供培训服务，但并非体制

内部的辅助机关或事业单位，而是体制外的独立运营机构。因此，其服务对象也包含各类企业、组织和个人。其长期运作得益于“一核三驱”的组织架构设计，由政府、企业和高校先以独立板块的形式与 UDL 进行“点对点”的双向配合互动，再以 UDL 为核心，展开各主体间动态的“板块联动”。

除了对运作架构的巧思以外，UDL 在培训内容、流程和形式的安排上也独具特色。培训内容的设置注重城市设计“整体观”和“过程观”的知识建构与理解，在多样的培训主题中渗透对设计和管理双重能力的培养。培训流程严谨而连贯，利用调查评估实现了对过程的“持续改善”。培训形式丰富多元，根据培训对象在从业背景、层次和需求上的差异，采取工作坊、同行交流会、领导人简介会、疑难问题讨论会、实地考察和在线教育等多样形式。

基于对 UDL 运行情况的全面“摸底”，可从中提炼出其获得成功发展的运作经验：首先是采用“政用产学研”一体化的合作模式，形成“自上而

下”的顶层战略输入，以及相应知识与技能的转译和输出；其次是注重培训内容的“时效性”与“实效性”，在传递最新政策、研究和实践的同时，透过“两横两纵”的知识结构保证培训的实际效用和效果；再次是在过程中融入调查与评估，定期面向受训学员了解培训效果，并以评估结果为据，对课程内容、培训方法和管理手段做出调整改善；最后是利用多种培训形式下蕴含的沟通平台，丰富从基础交流到价值共识之间的沟通渠道，促进城市设计“共识观”的建立。

我国的城市设计继续教育刚刚兴起，目前主要依托于各级规划管理部门以短期培训班的形式展开，因培训周期所限，仍主要采取传统课堂式教学模式，以现实问题的分析和应对为导向，针对少数关键性和通识性议题进行“散点式”的知识技能补足。伦敦城市设计中心作为一个在长期发展中不断成长并取得佳绩的案例，可为我国城市设计继续教育当下和未来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思路。

英国城市设计运作的半正式机构介入：基于 CABE 的设计治理实证研究

祝贺 唐燕

摘要：设计治理作为新兴的城市设计运作理念，近年在英国提出并应用于指导大量城市设计实践的开展。理念主张以政府为核心，建立专家、投资者、市民等多元主体共同构成的行动与决策体系，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治理工具来优化城市设计运作过程。本文以英国非政府公共组织“建筑与建成环境委员会”(CABE)为实证对象，回溯了过去近 20 年中 CABE 基于政府首肯对城市设计领域的介入行动及其设计治理贡献，通过剖析 CABE 的组织架构、工作内容、设计治理工具库和具体业务案例等，揭示 CABE 对英国城市设计运作产生的影响及其相关经验，以为政府管理人员和相关研究者提供城市设计运作镜鉴，为我国未来城市设计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变革提供思路参照。

关键词：城市设计运作；设计治理；非正式制度；非政府公共组织；英国

引文格式：祝贺，唐燕. 英国城市设计运作的半正式机构介入：基于 CABE 的设计治理实证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4): 120-126. DOI: 10.22217/upi.2018.156.

本文的写作，缘起于 2018 年与伦敦大学学院马修·卡莫纳教授的交流，我们一致认为全球范围内的城市设计活动在经历了 20 世纪末以来从技术手段向政府管理（设计控制）方式的转型后，正在经历另一次更加深刻的变革，进而迈向空间的多元治理。马修·卡莫纳教授基于英国建筑与建成环境委

员会（CABE）的实证研究初步建构了设计治理的理论框架，并呼吁将其作为城市设计的子领域加以研究。

这次交流后，本文作者得到卡莫纳教授和出版社的授权，开始着手翻译他的著作《设计治理：CABE 的实验》，向国内引介其理论体系。卡莫纳教

授指出：“虽然各国的政治经济体系有所不同，但设计治理的基本逻辑是相同的，相关治理工具是可以相互借鉴的”，这也道出了我们研究英国城市设计治理的初心。

本文以卡莫纳教授的“设计治理”理论为出发点，在大视野梳理 CABE 及其发展历史的研究基础上，对 CABE 的运作模式、英国半正式机构制度创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做出多维度诠释。

论文首先回顾了从“设计控制”到“设计治理”的理论演进历程，指出“设计治理”体系的建立以国家认可为前提，政府是体系的主导者，并通过正式的制度政策来明确和保障其他主体介入设计领域的权利。促进和保障不同主体合法、合理、可持续地参与城市设计过程，可以更好地发挥多元优势来填补单一政府管理的行动失效。在理论梳理的基础上，论文分析并回顾了 CABE 的三个发展阶段及其所处环境，评述了影响半正式机构运作的经济、政治因素。其后，通过对 CABE 各年度报告的文献研究，论文还原了 CABE 的内部组织架构与工作内容，探讨其中心化运作模式的利弊，分析其如何通过核心职能部门与地方机构的合作形成全国性的城市设计第三方参与网络。

之后，文章转入对于设计治理工具的具体研究，

总结了由英国政府实施的三类城市设计管理工具的先天不足，分析了 CABE 为应对城市设计从“决策环境”到“实施管理”全流程运作而发展出的五层级治理工具。论文探讨了五层级工具是如何通过互促共进，在多元设计治理中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在经济上产生独立的“造血”功能以保证自身的独立性等。在此基础上，文章聚焦设计评价、建设认证、技术建议、研究报告、活动倡导与教育培训这五项代表业务及实践案例，具体阐述了它们要达成的目标、依托的主体、作用的环节和应用的具体情境等。最后，文章基于上述分析指出在设计治理中，半正式机构可以发挥监督、促进和协调三种作用，CABE 参与设计控制过程的意义不仅在于通过自身的专业储备提升政府管理水平，更在于凭借第三方的独立特性起到协调公私双方的作用。

CABE 的经验表明，半正式（或非正式）机构凭借自身角色特点与专业技能优势介入城市设计运作，可以有效填补政府管理的空缺，该类参与主体所作用的领域正不断拓展，并大大超出了过往的认知范围。当前，我国正处在城市设计制度建设与变革的关键时期，“设计治理”理念及 CABE 的相关探索无疑是极具借鉴价值的“他山之石”。

世界城市中跨国文化消费空间的演化过程与机制——以柏林克洛伊茨贝格街区为例

谭佩珊 黄旭 薛德升

摘要：文化是世界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激烈的城市文化竞争过程中，城市内部产生多种类型的文化空间，而自下而上的跨国文化消费空间是城市独特文化的空间载体。本文以柏林“贫困但性感”的克洛伊茨贝格街区为例，探究具有丰富跨国亚文化特征的文化消费空间的演化过程与机制。该街区原本具有深厚的跨国文化积淀，新世纪以来，其在柏林经济文化转型与后现代文化消费转型双重作用下，形成了跨国文化消费空间。具体的空间作用机制包括：以全球个性文化体验消费为先导；由多级政府政策引导、国内外资本投入以及社区协调为支撑；最终得以激活街区经济、文化与社会活力，从而使得该街区成为柏林对外宣传与全球营销的城市文化热点。本研究丰富了对世界城市文化动力的认识，也对城市内部跨国、跨地方文化街区的可持续、多方互动协同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跨国文化；亚文化；文化消费空间；社区参与；柏林；世界城市

引文格式：谭佩珊，黄旭，薛德升. 世界城市中跨国文化消费空间的演化过程与机制——以柏林克洛伊茨贝格街区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4): 127-133. DOI: 10.22217/upi.2017.170.

世界城市发展动力具有多样性，文化是世界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城市通过积极塑造地方文化形象，力求在激烈的竞争中提高知名度，从中产生的城市文化消费空间具有多样性。随着现代消费者审美偏好的转变，出现了一些基于地方的、草根的、跨国多元的文化消费空间。

“贫穷但性感”是柏林全球知名的城市名片，这里汇聚了媒体、时装、现代艺术等领域的全球文化先锋，各种丰富的亚文化也根植于此，并在这片热土上繁衍滋长。强有力的先锋文化、创新精神、开放多元且与众不同的文化魅力，不断深化柏林的“世界城市”之路。本文以柏林极具跨国亚文化特色的克洛伊茨贝格（Kreuzberg）街区为例，采取质性研究方法，一探跨国文化消费空间的演化过程与作用机制。

克洛伊茨贝格位于柏林中心、前东西柏林的交界处，反主流文化、反传统的叛逆性格是这里的主基调，目前已经成为国际音乐先锋、时尚达人、创客、追求个性体验的年轻人所青睐的潮流街区。这里没有现代建筑和国际连锁的消费场所，吸引年轻人的是这里“小伊斯坦布尔”的异域风情、保存完好的历史工人住区以及随处可见的街头多元另类文化场景。

克洛伊茨贝格的跨国文化消费空间主要经历了跨国文化历史积淀和千禧年之后跨国文化消费空间塑造的两大过程。街区的跨国亚文化主要起源于冷战时期，土耳其劳工移民迁入，城市边缘汇聚

的大量政治左派、艺术家、学生等形成独具一派的亚文化风气，柏林墙倒塌后地下电子音乐亦逐渐兴起。随着柏林城市经济文化转型，街区的跨国文化空间得到复兴，并融入了全球消费、创意文化元素，街区空间属性不断丰富，从地方走向了国际，吸引来自全球的年轻人。

不同于自上而下的城市旗舰项目、明星建筑和城市更新，克洛伊茨贝格的跨国文化消费空间是消费者、政府、市场与社区多方主体互动作用下形成的。新都市消费群体偏好有所转变，更注重个性文化与城市原真的体验，对主流大众文化产品需求下降，促使街区的文化消费场所不断丰富；街区内文化产业与空间发展离不开多级政府文化政策的扶持，大环境下认可多元文化价值；市场资本参与推动消费空间的更新，廉价航空的普及扩大了消费市场的辐射范围，国内外房地产资金、创新企业逐渐渗透进社区，实现空间功能的转换；而具有高度自治传统的社区则在变化中抗衡，积极寻求多重力量间的平衡，并保护街区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提供了一个可参考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后现代文化消费转型的背景下城市多元文化价值何在，自下而上的跨国、跨区域本地文化空间同样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之下，我国城市内部的文化消费空间营造受到行政干预和资本寻租影响较大，过度商业化、高档化和网红化的趋势容易打破基于本地化的社会文化网络，挑战着深度文化体验的需求与地方文化的可持续。

基于减贫与包容性增长的路径探索——以莫桑比克区域发展走廊战略为例

刘程

摘要：消除贫困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重要社会经济问题，在东非国家莫桑比克——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显得尤为突出。尽管莫桑比克在过去 20 年中通过不断吸引外部投资，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但这种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相脱节，并未带来普遍公平与可持续的居民收入增长的机会。为破解减贫困局，实现包容性增长，莫桑比克以国内主要交通运输廊道为基础，确立了若干条区域发展走廊，作为空间层面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旨在最大限度地加强外部投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联系，确保走廊地区有充分的能力和机会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本文对莫桑比克减贫问题的现状及其区域发展走廊战略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与解读，对我国学界理解莫桑比克的区域发展，以及我国与莫桑比克在中非友好交流广阔前景下的进一步学术与实践合作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减贫；包容性增长；区域发展走廊；经济特区；莫桑比克

引文格式：刘程. 基于减贫与包容性增长的路径探索——以莫桑比克区域发展走廊战略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4): 134-141. DOI: 10.22217/upi.2018.221.

多方共治的商业改进区

陈立群

导读：随着城市公共空间对精细化、专业化管理的要求不断提高，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等多方主体共同合作的都市空间治理成为许多城市重塑活力、提升空间质量的手段。起源于加拿大、发展于美国的商业改进区（BID: 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就是这样一种快速成长中的空间治理方法。本文从商业改进区的基本概念出发，研究了纽约、伦敦、汉堡等城市的商业改进区发展模式，总结了商业改进区在都市空间治理领域的发展成就和国际经验。在我国，与商业改进区具有相似特征的街区治理组织正在快速发展，相关经验梳理对都市空间质量的进一步提升具有借鉴作用。

引文格式：陈立群. 多方共治的商业改进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4): 154-158. DOI: 10.22217/upi.2017.181.

2019年第5期文章目录

特稿

许皓, 李百浩 / 从欧美到苏联的范式转换——关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源头的考察与启示

本期主题 多尺度与跨学科: 可步行城市的理论研究与测度方法

关成贺, 迈克尔·凯斯, 安迪·洪, 著; 王元钊, 译 / 大数据时代步行城市和社区的设计

西蒙·马尔温, 杨俊宴, 郑屹, 乔纳森·拉瑟福德 / 关联·机制·治理: 基于微气候评价的高密度城市步行适宜性环境营造研究

冷红, 郑春宇, 鲁钰雯 / 老龄人口健身出行视角下的寒地城市公共空间可步行性研究

杨俊宴, 吴浩, 郑屹 / 基于多源大数据的城市街道可步行性空间特征及优化策略研究——以南京市中心城区为例

顾浩, 周楷宸, 王兰 / 基于健康视角的步行指数评价优化研究: 以上海市静安区为例

城乡研究

李凯, 王凯 / 新马克思主义视野下中国开发区空间生产的内在逻辑

张立, 王丽娟, 李仁熙 / 中国乡村风貌的困境、成因和保护策略探讨——基于若干田野调查的思考

毕波, 林文棋, 许俊萍 / 美国学区格局形成的动因概述及其对我国的规划启示

王阳 / 德国住房租赁制度及其对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培育的启示

杜騫 / 从罗马“古迹区”百年保护历程看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冲突及共生

黄经南, 敖宁谦, 谢雨航 / 国际常用发展指标框架综述与展望

规划研究

杨跃龙, 韩笋生 / 功能整合与战略规划: 高速铁路车站建设与城市发展研究评述

夏正伟, 张焱 / 从“5D”到“5D+N”: 英文文献中 TOD 效能的影响因素研究

卢峰, 杨丽婧 / 日本小城镇应对人口减少的经验——以日本北海道上土幌町为例

黄林琳, 王一 / 美国民间非营利机构管运城市公共空间的模式研究

刘冰冰, 王泽坚 / 新加坡和纽约特色风貌地区规划管理经验及对深圳的启示

邱连峰 / 城乡融合视角下中澳规划管理的制度性差异与启示



2019年 第5期

从欧美到苏联的范式转换——关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源头的考察与启示

许皓 李百浩

摘要：20世纪国际城市规划理论具有显著的跨文化传播特点。1949年后城市规划的“苏联模式”经自上而下推介来到中国。与此同时，近代都市计划的“欧美经验”并没有就此退出。本文通过搜集的历史文本与档案资料，考察1949—1952年间“苏联模式”与“欧美经验”之间理论的对立与实践的博弈，结合“除旧布新”的概念阐释范式转换的深层逻辑。回溯这段历史，能够反映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多个层面上的初始设定，也更容易理解今日城市规划成败得失的内在因素。这一颠覆性的范式转换及其蕴含的丰富历史信息，亦可为当下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提供历史维度的关照。

关键词：中国现代城市规划；苏联模式；欧美经验；范式转换；规划史

引文格式：许皓，李百浩. 从欧美到苏联的范式转换——关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源头的考察与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5): 1-8. DOI: 10.22217/upi.2019.449.

时值新中国70年华诞，新时代的辉煌与荣誉激励着各行各业不断完善自身的历史书写。就城市规划行业而言，一个值得注意的现状是，既有的规划历史研究对“一五”时期、“三年不搞城市规划”时期，乃至“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均已有了较为丰富的述评，然而关于“三年恢复时期”（1949—1952年）却始终缺乏充分的讨论。各地城市规划志书，谈及的几乎都是战后修复性的城市建设，或是该阶段某些城市编制的畅想式规划。因此，如果将新中国初期的城市规划发展看作一部纪录片，那么作为中国现代城市规划逻辑起点的1949—1952年，呈现的是相对模糊的影像。

该如何看待并解释这段规划史呢？自2015年底笔者博士学位论文开题，1949—1952年间的城市规划问题便成为摆在我面前不得不逾越的一道关口。迷茫之际，幸得导师李百浩教授点拨：“历史是前后承继的，不能割裂地看待1949前后的城市规划理论问题。”与此同时，档案资料与历史文本搜集工作，使我能够近距离地观察这段早已消逝的“他乡异域”，获得一种身临其境的在场感。

如此，一条隐含的线索开始在我眼前清晰地展开。那就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所带来的政治体制变化，并不能引发城市规划理论与技术方法的一夜突变，近代源自欧美的都市计划经验仍有很大程度

上的延续。与此同时，苏联城市规划已走过摸索阶段，而进入范式输出的成熟期。新中国面临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困境，以及对先进城市规划理论的诉求，使得苏联模式能够畅通无阻地引入。基于此，城市规划的欧美经验与苏联模式之间就形成了理论的对立与实践的博弈。对立与博弈的结果，必然会导致城市规划行业“除旧布新”式的范式转换。

于是，我决定从外来影响的角度，利用范式转换的概念，阐释1949—1952年间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的颠覆性转换过程。这一时期的一些重大规划事件，亦能够在此分析框架下得到较好的解释。当然，理论史研究不能止于对既有历史叙述的丰富，或是对思想演变的整理，回溯历史的同时，还应关照现实。反思与启示的相关内容在文章结语部分。期望笔者一些不成熟的感触，能够让规划工作者更容易理解今日城市规划成败得失的内在历史因素。

最后，我想引用彼得·霍尔爵士《明日之城：一部关于20世纪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一书序言中的一段话，提醒自己不忘初心，也期待更多的人关注并参与规划历史理论研究：“诚然，规划师应当去做规划，而不应当只停留于回忆。但我们往往不能认识到，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别人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了。我们应该认清自己的根源，这就是我的出发点”。

大数据时代步行城市和社区的设计

关成贺 迈克尔·凯斯 安迪·洪 著 王元钊 译

摘要：本文在数字化和城市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以城市规划与设计的角度探讨适宜步行的城市。我们首先简要回顾历史上的可步行城市设计，然后讨论什么是可步行城市以及可步行城市的空间要素是什么，接着对新兴的主题及其实证方法进行了探讨，以衡量可步行城市的空间和城市设计特征。本文的第一部分着眼于城市设计的关键命题，以及它们是如何被提出以促进步行性。第二部分论述了步行性的概念，这是设计步行城市的基础。我们强调可步行城市的物理元素（走道、邻近用途、空间）和感知元素（安全、舒适、享受），然后我们研究构成可步行城市的各种空间元素。第三部分着眼于可步行城市和社区设计的新兴主题。我们讨论了由不断增长的计算能力以及相关的经验方法和跨学科的合作（包括空间规划、城市设计、城市生态和公共卫生）带来的城市大数据的应用前景。本文旨在为理解城市设计和可步行性提供一个整体的方法，重新评估构建可步行城市的空间要素，并讨论未来的政策干预。

关键词：可步行城市；步行社区；时空尺度和指标；计算能力；城市大数据

引文格式：关成贺，迈克尔·凯斯，安迪·洪. 大数据时代步行城市和社区的设计[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5): 9-15. DOI: 10.22217/upi.2019.389.

关联·机制·治理：基于微气候评价的高密度城市步行适宜性环境营造研究

西蒙·马尔温 杨俊宴 郑屹 乔纳森·拉瑟福德

摘要：适宜步行的城市环境不仅仅包含连续、优美且尺度宜人的步行空间，适宜的温度、风速同样深刻影响着人们在城市中的行走体验。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以伦敦、巴黎、布鲁塞尔、巴塞罗那等为代表的高密度欧洲城市出现了过于炎热、寒冷或强风等不适宜的城市微气候，严重影响甚至迫使人们减少或避免在相关城市空间中的步行等户外活动。同时，针对可步行城市的大量既有研究侧重分析城市步行环境中的物质要素及其内在机制，如景观、步行道宽度、休憩设施等，对影响人们户外活动时生理感受的城市微气候要素的研究较少，如温度和风速等。因此，在具体讨论和衡量人们在城市中的步行体验以及提升城市步行适宜性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一种新的微观气候治理逻辑值得探索。针对该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城市物质空间与城市微气候之间的交互影响，归纳总结出了两者之间的关联机制。进而提出一种行人尺度和以步行适宜性为导向的城市微气候管控策略及治理逻辑，来提升高密度、高强度城市建成区中人们步行时的生理感受，从另一角度优化高密度城市中的步行适宜性，促进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

关键词：步行适宜性；城市微气候；高密度建成区环境；城市规划；管控策略

引文格式：西蒙·马尔温，杨俊宴，郑屹，等. 关联·机制·治理：基于微气候评价的高密度城市步行适宜性环境营造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5): 16-26. DOI: 10.22217/upi.2019.387.

在当前国际主要大都市里，高密度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空间特征之一。虽然高密度的城市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功能的集聚和城市效率的提升，但是高密度城市空间中不合理的建筑布局，过高的建筑密度和高度，以及围合形式对城市微气候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不合理的

建筑高度和密度所产生的“街谷”效应往往在街道层面产生强风和近地表湍流，导致人们难以步行；而由于不合理的建筑围合形式所产生的静风区，也会导致近地面空气污染物的堆积和热岛效应的产生，从而对人们的步行舒适度和健康构成威胁。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城市街道物质空

间与城市微气候之间的交互影响，总结出两者之间的关联机制，进而提出步行适宜性导向下的城市微气候管控策略，提升高密度城市空间中的步行环境舒适性。

1 城市微气候与城市空间的影响关系

高密度城市空间中，不合理的街道高宽比和建筑布局会在城市街道行人高度处形成静风区、强风区，从而降低街道的步行舒适度。同时，高密度、窄通道、高高度的城市形态，使得城市建设强度进一步增加，城市公共及绿化空间逐步被挤占，在对城市通风廊道造成阻隔的同时，也打破了城市空间内的热辐射平衡，严重影响城市空间中的热对流散热，导致热岛效应的产生，使得步行者在此类空间中步行时会感觉到闷热和不适，直接影响人们步行舒适性。针对上述负面效应，本文截取典型的高密度城市街区形态单元作为研究测度对象，分析步行尺度下高密度城市空间中的城市微气候特征，以及微气候与城市形态之间的关联机制，并基于研究结论对城市规划建设提供可能的优化建议。

2 步行尺度下的城市微气候分析

通过对城市中的步行行为的观察发现，当行人在街道上行走时，步行生理舒适度受到其所在空间温度、风速等影响而产生不同的步行体验感受。因此，本文先选用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 CFD 软件 scSTREAM 对步行尺度下高密度城市空间的风环境进行测度，分析不同城市空间形态指标影响下的街道空间行人高度处风环境的特征；同时，本文也选择目前被广泛使用的热环境计算机模拟软件 ENVI-met 来测度步行尺度下高密度城市街道空间的热环境表征。测度结果指出，城市的空间形态对于街道空间中行人高度处的风、热环境均有较大的影响，并通过微气候进一步影响人们在城市中的步行舒适性。通过对风、热环境各自的测度发现，热环境与风环境是紧密关联的。一方面步行活动直接受到机械风速的影响，即风速过强会导致人们难以

步行，并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另一方面，风作为城市散热的有效途径，不同的风速同样也会影响城市的热环境，当风速过低，会产生不良的街道通风环境，对步行舒适度造成负面影响。基于此，在以步行适宜性为导向的优化过程中，风、热环境作为组成城市微气候的主要部分，需要被看作一个整体进行考虑。

3 面向步行适宜性的城市微气候优化与环境营造策略

基于上述对步行尺度下城市微气候的分析，文章认为对城市微气候的优化需要结合构成微气候的风、热环境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从主动干预和被动优化两个方面来营造具有较高步行适宜性的街道空间。

主动性优化策略：在城市建设或更新过程中，合理地优化街道峡谷的断面，避免不合理街道高宽比的形成；同时，科学规划街区形态，合理管控街区整体的密度、围合度和建筑物平均高度，避免阻隔通风廊道；另外，通过优化高层建筑裙房的设计，可以主动避免因不合理的建筑形态而导致的强风区和无风区，将行人尺度的风速控制在合理范围，进而提升街道的步行适宜性。

被动性优化策略：在既有的微气候现状条件下，以营造步行适宜性的空间为导向，通过人为介入和借助相关基础设施等途径，对步行尺度下的微气候进行优化。实施途径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将微气候人为控制系统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进行设置，对过热或通风较差的现状城市空间，可以在城市基础设施层面，通过构建微气候人为控制系统来直接改善和提升行人尺度的步行舒适性；二是结合景观营造，人为调控街道空间微气候条件，通过增加街道绿化植被的覆盖率，结合沿街建构物立面进行立体绿化，提供遮阴的软硬质空间等措施，改善步行过程中的人体热舒适度。

老龄人口健身出行视角下的寒地城市公共空间可步行性研究

冷红 郑春宇 鲁钰雯

摘要：中国正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的健康问题日益得到公众关注，坚持适当的体力活动对于维

持老龄人口的健康有着重要的意义。良好的可步行性可以提升城市公共空间的使用效率，促进健身行为的发生。然而对于寒冷地区而言，气候条件是影响城市公共空间可步行性的重要因素。尽管当前中国关于老龄人口以及可步行性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但这些研究对于气候因素的关注度仍比较低，寒地气候背景下的相关研究更为有限。本文分析了寒地气候对可步行性的诸多影响，进一步以东北地区典型的寒地城市哈尔滨市为例，对有健身习惯的城市老龄人口的健身行为特征以及健身出行特征进行随机问卷调查，从老龄人口冬季健身出行的视角出发，对严寒地区城市公共空间可步行性现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参照渥太华等北美寒地城市的经验，充分考虑寒地气候的特点，结合中国寒地城市的步行现状问题，从合理优化城市公共空间布局、优化城市步行系统以及优化城市步行环境三个方面提出提升及优化城市公共空间可步行性的策略。

关键词：可步行性；寒地城市；老龄人口；公共空间；健身出行

引文格式：冷红，郑春宇，鲁钰雯. 老龄人口健身出行视角下的寒地城市公共空间可步行性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5): 27-32. DOI: 10.22217/upi.2019.396.

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老龄人口健身出行的重要目的地和活动空间载体，而步行则是老龄人口前往城市公共空间进行健身活动的重要出行方式。寒冷地区冬季气候条件、冰雪覆盖路面会成为城市老龄人口步行出行的重要障碍，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整体可步行性产生负面影响。寒地城市公共空间可步行性的提升对城市居民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

哈尔滨市是中国东北地区典型的寒地城市，每年有 5 个月的平均气温在 0℃ 以下。本文以位于哈尔滨市中心城区的南岗区为例，从老龄人口冬季健身出行的视角出发，使用基于日常服务设施使用和步行衰减的步行指数测度和基于网络分析法的城市公共空间步行可达性评价，研究寒地气候背景下的城市公共空间可步行性现状。分析表明：

冬季可步行性整体差且分布不均衡。冬季可步行性为“较差”和“差”的区域面积比重高达 75.02%。城市公共空间步行可达性较高的街道与可步行性较高的街道有较高的一致性，这在验证步行可达性是影响城市公共空间可步行性的重要因素的同时也反映了该地区中心区域城市公共空间的步行性明显优于周边区域这一现状。

寒地气候对冬季可步行性产生负面影响。寒地城市的步行环境在冬季暴露于寒风与降雪之中，无法在冬季为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的步行体验。与其他

年龄段人口相比，老龄人口身体机能和灵敏程度相对较差，缺乏气候防护的步行环境不仅无法为老龄人口步行出行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甚至会影响其步行出行的意愿。

步行景观环境影响冬季可步行性。寒地城市冬季气候寒冷，可利用的绿色植物品种相对较少，视觉景观单调，城市呈现出相对灰暗的景象，步行趣味性明显减弱，也影响了街道生活和城市活力，导致步行环境吸引力下降，对于公共空间可步行性产生负面影响。

近年来，北美地区渥太华、埃德蒙顿、明尼阿波利斯等寒地城市以提升城市公共空间不同季节整体的可步行性为目标，制定了步行规划及相应的城市设计导则，其中针对步行设施的冬季气候防护以及老龄友好步行环境优化的重点关注十分值得学习和提倡。

基于现状问题，结合国际相关经验，以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冬季可步行性为目标，提出符合中国寒地城市特点的建议，包括合理配置城市公共空间、构建完善的城市步行系统、优化步行环境等规划策略，以及建立清雪机制和步行管理系统等管理策略，力图减弱寒地气候对老龄人口出行的负面影响，为寒地城市老龄人口营造安全的步行条件，实现寒地城市公共空间可步行性的有效提升，进一步鼓励老龄人口冬季日常的健身出行活动。

基于多源大数据的城市街道可步行性空间特征及优化策略研究——以南京市中心城区为例

杨俊宴 吴浩 郑屹

摘要：街道作为城市重要的公共空间，承载着市民日常通勤、生活、游憩和交往等重要功能。然而，随着城市的急剧扩张，城市中的街道空间也遇到了品质下降、步行适宜性降低、安全性不足和活力低下等诸多困境。因此，如何从人本的视角提升城市街道可步行性，引导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成为相关研究领域关心的重要论题。然而，以往的诸多关于城市街道的研究都侧重于将街道作为交通功能属性的城市空间，去研究和探索街道如何提高城市街坊可达性以及城市人流移动便捷性等。城市街道作为供市民进行公共活动的功能，以及其人本尺度下的街道空间品质被大多数研究所忽视。因此，本文首先对前人研究及相关测度方法进行反思与分析，进而选取城市街道可步行性作为本研究对象，选择南京市中心城区内的街道作为研究案例；利用城市空间三维形态数据、城市业态 POI 大数据和百度街景照片大数据，建立城市街道可步行性定量研究的基础数据库；并基于所建构的多源大数据库，综合城市街道可步行性测度指标体系，对南京市中心城区的街道可步行性中的通畅性、便利性、舒适性和安全性进行定量的分析测度。研究结果表明，南京中心城区街道可步行性在通畅性、便利性、舒适性和安全性四个基本领域呈现出扇形圈层放射、中心多核连绵、外围点状分散等特征结构，并根据街道可步行性的影响机制进一步提出优化策略。

关键词：街道空间；街道可步行性；大数据；量化研究；城市设计

引文格式：杨俊宴, 吴浩, 郑屹. 基于多源大数据的城市街道可步行性空间特征及优化策略研究——以南京市中心城区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5): 33-42. DOI: 10.22217/upi.2019.388.

街道是城市空间中最广泛存在的公共空间，其承载着人们日常通勤、生活、游憩和交往等重要功能。而步行作为街道活动的重要行为方式，一直是街道相关研究关注的重点。在过去的十多年间，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增大，以效率优先的机动车快速出行成为城市中主要的通勤方式。在这一背景下，街道的步行功能被逐步弱化，占道停车，功能单一及景观破败等问题使得街道越来越不适宜步行。面对目前城市街道所广泛存在的可步行性问题以及城市发展转型所带来的新契机，本文从人本尺度出发，基于城市多源大数据对城市街道的可步行性问题展开研究，分析街道可步行性的空间特征，并进而提出对应的优化设计策略。

文章首先从人的基本需求出发，从多学科领域构建城市街道可步行性测度指标体系，将其归纳至通畅性、便利性、舒适性和安全性四个基础领域，并进一步细分为 8 个二级指标和 16 个三级指标，用以测度业态、环境、心理等因素对街道可步行性的作用机制。

继而通过爬虫程序对城市街景图片数据，POIs 业态数据，城市基础矢量路网数据构成研究所需的

基础数据库。在此基础上，首先对城市步行网络的拓扑范畴进行测度；同时，采用全卷积神经网络（FCN）和包含建筑、绿视率、步行道、天空可视域等在内的基础要素数据集对百度街景图片数据进行要素语义分割识别，分析街道要素的分布和构成情况；最后与 POIs 城市业态大数据进行叠合分析，全面而透彻地理解并测度城市街道本体的三维空间。

基于此研究方法及数据分析的结论，本文进一步的选择南京市中心城区为研究案例，对街道可步行性的分维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街道通畅性：在城市空间中呈现扇形圈层放射状的整体结构，受长江等自然地理要素影响，步行网络重心较城市建设强度重心和形态重心向东部偏移；测度数值呈现出南高北低、内高外低的分布特征，且与街道等级和城市中心体系布局正相关；

街道便利性：呈现出中心多核连绵、外围点状分散的整体结构，这说明街道服务便利度受到南京城市单中心体系布局的影响作用明显，覆盖度数值在老城区域较高；丰富度则与道路等级、周边用地性质公共性正相关；

街道舒适性：其分布特征在自然环境及人工环境中呈现差异，自然环境舒适度受城市山水要素和建筑环境影响较为明显，呈现出内低外高的空心化整体结构；人工环境舒适性则呈现出内部核心与孔洞连绵、外部指状延伸的空间分布特征；

街道安全性：呈现内部高值震荡、外围环状割裂的空间分布特征。这说明城市内部风貌破碎和外围的切割性要素不仅影响人工环境品质，还对空间安全感也产生了破坏。

根据对街道通畅性、便利性、舒适性和安全性四个基础领域空间分布特征的分析结论，进一步对影响街道可步行性的内在机制和影响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研究，并根据影响要素之间的关联逻辑将街道归纳为以下三种导向类别：

通勤导向型街道：此类街道密度较大，道路等级较高，道路距离山水等自然景观要素相对较远，具有更高的可达性和较强的通行能力，其功能属性更偏向于通勤。

景观导向型街道：此类街道的街区建设强度较低，距自然景观要素相对较近，多有公共绿地分布，具有优质的自然环境和幽静的空间氛围，适宜步行者进行休闲运动类的活动。

生活导向型街道：此类街道有较强的服务能力，较高的人群活力和优质的人工环境，适宜步行者在其中进行购物消遣类的活动，为增加行人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功能。

针对不同导向类型街道可步行性进行的精准诊断结果，本文进而对上述三种街道导向类型在现实城市空间中出现的现实问题提出了相应的优化设计建议：其中通勤导向型街道需要对其风貌进行整治，并通过打通街道交通等分流的方式减少流量过多或过低带来的安全性问题，适当降低街道宽度不足处商业，保障步行空间本体的通过能力；对于景观导向型街道则需要针对性地增加沿街POI数和公共性质用地以提升该类型街道周边的业态活力，继续加强沿街植物的种植和维护，隔离快速交通中其他交通方式对于步行行为的干扰，但加强其与城市中心的快速交通联系；相对于前两类导向型街道，生活导向型街道主要通过增加建筑退界距离、适当拓宽人行道面积、增加沿街的小广场节点来有效提高步行空间本体的通畅性，并提升完善业态类型、进行建筑沿街立面整治以提升街道界面的环境安全感和步行舒适度，从而营造尺度宜人，美观舒适的街道步行空间。

基于健康视角的步行指数评价优化研究：以上海市静安区为例

顾浩 周楷宸 王兰

摘要：可步行性是城市步行友好程度的重要表征，也是健康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当前可步行性评价方法中，步行指数是研究和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之一。针对人体健康，本文探讨从环境和社会两个维度，进一步优化步行指数的测评方法。在环境维度建议考虑空气污染与步行活动的关系；在社会维度考虑人口对潜在步行出行的影响。本文提出选择这两个维度的具体指标和数据类型，主要增加交通污染数据、人口密度和年龄结构数据，建构纳入路径和计算方法。在此基础上，选取上海市（原）静安区为研究对象，对其整体路网按路段进行评测，比较纳入新要素后的测度结果与原有测度结果的不同。通过分析新要素纳入的必要性和显著性，本文对道路的可步行性进行深入分析，为提升步行活动和促进公共健康提供基础。

关键词：可步行性；步行指数；交通污染；人口结构；公共健康

引文格式：顾浩，周楷宸，王兰. 基于健康视角的步行指数评价优化研究：以上海市静安区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5): 43-49. DOI: 10.22217/upi.2019.382.

已有研究表明，步行友好的城市建成环境有利于促进市民的体力活动，进而减少慢性非传染性疾

病的发病率，促进公共健康水平提升。针对建成环境步行友好水平的评价从 1990 年代已经开始，可

步行性(walkability)是用来描述步行友好水平的专有名词。欧美各国根据其自身特点开发了针对步行友好水平的评价方法与评价工具,作为改善步行环境的依据。步行指数(walk score)是当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步行性评价方法,以此方法为基础出现了非常丰富的优化及应用的研究,我国也已有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本土化应用及改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希望能够在步行指数评价之中拓展健康这一维度。

之所以关注步行活动中的健康因素,一方面是因为步行活动是居民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体力活动,促进体力活动则是践行健康城市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步行活动中空气污染暴露水平直接影响步行者的健康水平。所以,步行性的评价不仅应关注设施、道路等物质空间对于步行的支撑水平,同时应考虑空气污染等影响因素;而考虑不同年龄人群的出行特点及活动范围,可以对特殊人群集中的路段进行识别。

基于健康城市发展的理念,本研究选取街道作为评价的空间单元,通过环境和社会两个维度优化步行指数的测评方法。在环境维度考虑空气污染与步行活动的关系;在社会维度考虑人口对潜在步行出行的影响。

在具体方法上,研究选取上海市(原)静安区

为研究对象,对其整体路网按路段进行评测。从传统的步行指数计算开始,逐步将交通污染、人口密度和年龄结构的影响加入步行指数的计算过程中。比较纳入新要素后的测度结果与原有测度结果的不同,揭示在健康城市的理念下,新要素纳入可步行性评价的必要性和显著性。对于功能完善、设施齐全的上海市(原)静安区而言,在基于功能导向的步行指数评价中,各个街道的评分区分度不高,但当加入交通污染的影响后,区域内一些交通性为主的道路得分出现下降,说明虽然具备较好的设施吸引,但从交通污染暴露角度而言,这些路段可步行性有所降低。在此基础上,通过纳入居住密度与老年人口密度来识别针对特征人群具有高步行需求的街道,进而用以指导后续的道路设计。

步行活动是居民日常进行的必不可少的体力活动方式之一,而街道可步行性的提升将显著促进人们的体力活动。所以街道空间的步行性设计也是健康城市的重要方面。街道的规划设计不仅需要考察街道空间的功能性内容,同样需要考虑出行过程中的人体污染暴露,同时根据空间使用者开展具有针对性的设计优化。步行指数计算方法中纳入污染和人口结构,将有利于全面评估街道的可步行性,提出更加精准的设计要求或改造目标。

新马克思主义视野下中国开发区空间生产的内在逻辑

李凯 王凯

摘要:基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与资本的三级循环理论,文章在中国语境下对其提出了批判性思考,并结合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现实发展历程实证分析了开发区工业生产主导、建成环境生产主导、科创生产主导的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作者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博弈关系出发提出了中国开发区空间生产的理论分析框架。在由增量开发逐步向存量更新转变的城镇化“下半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资本市场以及原权利人在开发区空间再开发过程中的利益博弈会更加复杂,以开发区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为代表的规划治理制度如何更好地协调土地利益分配格局,重构开发区空间秩序,是未来实现开发区高效、有序和创新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 开发区; 新马克思主义; 空间生产; 资本的三级循环理论;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引文格式: 李凯,王凯. 新马克思主义视野下中国开发区空间生产的内在逻辑[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5): 50-58. DOI: 10.22217/upi.2019.285.

现代意义上的“开发区”概念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早在 1547 年，意大利就在其西北部的热那亚海湾建立了雷格亨（Leghoyh）自由港，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自由港，也是西方开发区建设的雏形，其本质上是人为地切出一块封闭独立的空间，并给与其特殊的贸易和税收政策，从而促进出口产业。之后开发区的概念内涵被不断扩充，包括中国在内的 130 多个国家先后建立了各种类型的经济特区（Special Economic Zone），作为实现经济增长、增加出口和就业、综合改革、政策实验等不同国家意志的政策工具。

其实，通过对新空间的赋权激发城市脱离旧制度的“开发区”思想早已在中国埋下了萌芽。1894 年，为了改变清王朝积弱积贫的现状，张謇在南通“办实业、救中国”，创造性地建立老城区、工业区和风景区的“一城三镇”格局，“以强毅之力行其志”开启了南通现代化的历程，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与同时期西方的霍华德经营“田园城市”，探索社会改革道路一样，张謇建设的南通，在 20 多年间从一个封建的县城过渡为一个现代城市，被吴良镛先生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兰州、洛阳、包头、武汉等城市先后建成 30 个各具特色的工业新区，这些都是中国开发区的最初探索。

1984 年 1 月，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后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之后设立“以利用外资为主，以发展工业为主，以出口创汇为主”的开发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是在行政分权的框架下引入市场机制，通过权力下放即行政分权推行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既表现为中央对地方的分权，也表现为地方政

府对城市内部的分权。而将城市的引资、开发、建设、税收等事权下放到开发区就是行政分权的重要体现。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开发区迅速成为中国城市空间扩张和制度空间赋权的重要平台，但同时也是城市蔓延、产城分离等空间问题的集中体现。以开发区为代表的新城新区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土地资本化和空间（再）生产的最佳例证。以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和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方法论，将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对空间进行研究，形成独具特色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和社会—空间辩证法的方法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前沿，也为理解中国开发区空间生产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视角。

然而，中国开发区建设不同于西方，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开发区空间开发的过程更为复杂且更具特点，是政府、资本与空间三重因素交织作用的产物。西方经验对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论有参考价值，但我们不能囿于其理论框架，也不应仅止于用它来解释中国的开发区空间开发，就资本空间生产的内在机制而言，中国开发区在空间生产主体、资本循环动机以及利益主体关系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中国的语境下，这一基于西方经验事实的理论框架仍然需要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对中国开发区空间生产的解释应该从中国独特的制度、历史及其内生演化逻辑出发。

只有深刻理解中国开发区空间生产的内在逻辑，规划治理制度才能更好地引导开发区在城镇化的“下半场”实现高效、有序和创新发展，才能完成新时代国家赋予开发区的新使命。

中国乡村风貌的困境、成因和保护策略探讨——基于若干田野调查的思考

张立 王丽娟 李仁熙

摘要：乡村风貌建设和保护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推进过程中的重要议题，但是中国近 40 年快速的城镇化对乡村风貌产生了较大的冲击。本文基于全国 13 省 480 个村庄的调研以及近年国内外的乡村考察，对当下中国乡村风貌面临的危机进行梳理和总结。结合相关研究，首先阐释了乡村风貌的四大构成要素：地域

特色、场所景观、田园环境和社会人文；继而分析了这四大方面所面临的困境，诸如地域特色的差异化渐失、城市表征显著，场所景观杂乱化和人工化明显，田园环境去乡土化和去生态化特征，村庄社会逐步解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以接续等。进一步解析其成因，总结为：交通连接的便利性加速了城市工业文明的入侵，政府的不适当干预导致场所景观受到破坏，村民和基层政府认知能力低导致田园风貌被忽视，现代化与传统的割裂导致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迷茫，村民的认同感出现分化、传统的风貌资源不被认可，村民积极参与的缺位导致乡村风貌维育缺少支撑等。最后，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若干应对策略，具体包括：重建文化自信、传统传承要与时代相融，突出村民主体、充分发挥民间社会团体的作用，统筹分散的资源、体系化支援扶持，立足国情、立法保护乡村风貌，强化乡村规划理论研究、服务风貌维育。

关键词：中国乡村；风貌困境；成因辨析；立法；保护策略

引文格式：张立，王丽娟，李仁熙. 中国乡村风貌的困境、成因和保护策略探讨——基于若干田野调查的思考[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5): 59-68. DOI: 10.22217/upi.2018.408.

本文为同济大学张立老师主持的住建部 2015 年“农村人口流动与安居性研究”课题研究成果。同济大会同华中科技大学、安徽建筑大学、苏州科技大学、沈阳建筑大学、山东建筑大学、深圳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成都理工大学、长安大学和西宁市规划设计院等共计 10 所高校及研究单位，对全国 13 省 480 村开展了调查，面对面访谈了 7 578 位村民并完成问卷。同时，张立老师与韩国釜山大学李仁熙教授的研究团队在 2015—2017 年共同承担了韩国社科基金支持的关于传统村落的研究。这些工作作为作者全面理解中国乡村风貌问题和成因并提出对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乡村传统空间和文化的传承正不断遭受冲击。西方国家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亦经历了乡村风貌建设的种种问题，可以说乡村风貌的维育和建设是国际性议题。本文以乡村风貌构成要素为指引，分析乡村风貌面临的危机，探究危机产生的深层次成因，结合若干发达国家的经验探讨了加强中国乡村风貌保护的若干策略。

结合调研，发现当前中国乡村风貌面临的若干困境如下。

(1) 地域特色渐失，城市表征显著。主要表现在建筑风格的同一性和城市化，或表现出“半城半乡”的混沌之象。部分村庄被经济利益驱使或追求现代建筑材料的便捷、省力，乡村风貌愈加脱离传统（图 2）。或是迎合游客而忽视当地特征，建设各

类体量夸张、同质化休闲度假区；拷贝西式建筑或是国内其他地区中式和乡土建筑，植入所谓的情怀和乡愁。

(2) 乡村场所景观杂乱化和人工化凸显，田园环境的去乡土化和去生态化趋向明显。钢筋混凝土的普及进一步冲击着田园乡土风貌，道路沟渠快速硬化、建筑材料迅速取而代之等问题随处可见。在南方某省的村庄，原地域特色的传统村居形式以传统黑瓦白墙、木结构为主，由于木结构容易受潮和受虫，目前已基本被水泥砖房取代。

(3) 村庄社会逐步解构，村庄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均难以接续。传统的乡村社会正在解构，村庄的老龄化和空心化导致了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接续困难，也造成乡村物质环境维护的艰难。

而造成当下乡村风貌困境的成因主要在于：一是交通连接的便利性加剧了城市工业文明的入侵。交通设施快于乡村建设导则、观念的完善，也为城市的工业文明向乡村的快速导入提供了条件。

二是政府的不适当干预导致场所景观受到破坏。近年来，国家充分重视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但在某些地区却带来“建设性破坏”。

三是村民和基层政府认知能力低导致田园风貌被忽视。村民和基层政府对乡村风貌保护的认识不足，缺少审美和文化遗产的认知。

四是村庄传统的割裂导致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迷茫。经历了“破四旧”和“文革”之后，基于血

脉宗族的中国农村传统文化逐步被贴上了封建和落后的标签，村民自鄙心理逐步显现。

五是村庄的认同感出现分化，传统的风貌资源不被认可。年轻人对于村庄普遍缺乏认同，留守人口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识不足，乡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困难。

六是村民积极参与的缺位导致乡村风貌培育缺少支撑。村民空有建设热情，长期缺乏参与机会，之前政府大包大揽的快餐式的建设行动导致村民对政府投入愈加依赖，被动接受成为惯性

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要重视对乡村风貌的建设和保护，且有必要融合对国际经验的借鉴。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重建文化自信，传统传承要与时代相融。我们走访过韩国、日本的一些村落，他们由于挖掘了当地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资源，以资源特点为基础，在很多地区成功塑造了独特的乡村风貌。

(2)突出村民主体，充分发挥民间团体的作用。放眼日韩，乡村地区的民间团体非常多，用以填补政府职能的空缺。例如，我们考察过的韩国釜山市近郊的甘川文化村，通过“政府+居民+专家团体+艺术家团体”的协同方式，把一个破败落后的城边村演化成为韩国有名的艺术文化村，很多知名韩剧在此取景。

(3)统筹分散的资源，体系化支援扶持。韩国

政府早先的农村支援工作同中国类似，条块分割严重，效率低下。但是韩国政府积极总结经验，2000年将原分属不同政府的主管部门整合，改变推进方式，触发村庄的内生改造机制。

(4)立足国情，立法保护乡村风貌。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要尽快立法名曲“乡村风貌是公共财产”，立法保护乡村风貌是传承中华文明的必然路径。

(5)强化乡村理论研究，服务风貌培育。避免再出现以城市规划手段建设乡村的现象，而非“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为目标编制乡村规划”。

2017年底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至2018年底短短一年时间各地的乡村建设和投资如火如荼，正在极大改善着农村人居环境。但是笔者担心的是，在巨量投入之下，我们的乡村是否已经准备好，我们的乡村传统风貌承受外力冲击的能力到底如何？大量已经发布和即将发布的乡村振兴规划能否充分重视乡村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国家各部门职能分工的重新划分是否会对乡村风貌保护形成积极的合力？社会各界是否已经认识到传承乡村传统风貌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种种问题仍然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不仅仅是在科学研究，也在具体实践和宣传上。

从国际经验来看，乡村风貌保护的工作永远在路上。

美国学区格局形成的动因概述及其对我国的规划启示

毕波 林文棋 许俊萍

摘要：就我国学区制改革中的学区划分依据问题，有必要从地理学视角出发考察一个学区格局是如何形成的。以学区体系成熟的美国为鉴，本文从国土尺度上概述其18世纪以来学区制的雏形、学区的扩张与合并，以及当代学区类别体系与格局特征；并从物业财税保障、就学体制变革、人口规模分布和种族隔离历史四方面总结了美国学区格局的形成动因。从中得出：美国学区制起源于自下而上的社区自治传统，而非国家制度产物；学区格局的形成是分权化体系下的政治地理过程，而非行政划分，体现出社会经济分异的不平等；除了种族隔离影响之外，学区格局的形成以物业税为基础，体现出规模经济的主导作用。对比我国国情，规划研究需要在政策层面延伸，厘清概念、因地制宜，综合论证构建学区的可行性。

关键词：学区；格局；分权；自下而上；美国

引文格式：毕波，林文棋，许俊萍. 美国学区格局形成的动因概述及其对我国的规划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5): 69-76. DOI: 10.22217/upi.2017.344.

当前,我国大中城市“学区制”改革仍处于“摸石头过河”阶段。从学区房热、入学权纠纷现象来看,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学区的划分依据问题。由于对学区的概念、功能、形成的基础认识不一,学区在现实中的空间界定往往模糊,技术性的学区划分方法实际应用也不多。因此,有必要从地理学视角综合考察学区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对比思考我国规划师在学区制改革中的作用【中文语境中的“学区”可对应英文的学区(school district)和学校招生范围(school attendance zone)两个概念。本文主要介绍前者作为覆盖全美的地方政体的格局形成过程和动因,厘清学区制改革的内涵。学区下各校划分的招生范围与地方政策环境有关,不作具体探讨】。

以学区制闻名的美国为例,本文从国土尺度概述学区格局的形成过程及影响因素,获得规划启示。除了南方学区多依附于市县政府部门,美国学区大部分是提供公立学校服务的独立政府(governments),具有选举本质和公共财政途径。

一般认为,美国学区制是伴随“公立学校运动”和学区合并潮形成的国家制度;而另一种观点则持有鲜明有力的自下而上观点:美国学区制基于自下而上的分权化体系形成,是地方自治传统而非国家制度的产物【如本文主要参考的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家威廉姆·菲谢尔(William A. Fischel)的著作《成绩:美国学区制的经济演变》(Making the Grade: The Economic Evolution of American School Districts)】。这意味着,讨论学区制的空间化,规划师作为政府、学校、市民之间中介的治理角色可能相当重要,而非仅仅执行技术配套。

首先,从形成历程来看,美国学区起源于殖民地时期的教区自治:私人捐资和学田(school section)的公地税收奠定了学区的制度雏形和扩张基础;在就学规模化的客观需求助推下,自上而下的国家干预才实质性显现。而我国历史上私学的存在也表明教育是地方性事务,但缺乏与美国类似的自治土壤;在自上而下的改革语境中,学区一般指教育部门统筹划分的管理单元,或划片入学范围。

实际上,中美“学区”内涵的本质差异在于是否具备自主的财税权力。在我国城市地区,政府公共服务投入并沉淀于不动产市场无法正常回收是

一大问题;是否应当形成明确稳定可行的学区税收边界,需要自下而上形成社会共识。

其次,从地理格局来看,美国学区的形成、扩张和合并是复杂的政治地理过程,而非简单的行政划分。越是经济发达、人口密集、自治需求强烈的地区,学区分隔越密集,越符合市场竞争特征。越是经济不发达、人口稀疏、地方控制力薄弱或种族隔离地区,学区分隔越大且独立性越低,教育行政权力也相应集中。与此同时,分权化体系也将经济社会的不平等强化显现:教育的市场化映射为空间的市场化,贫富分异和种族隔离的空间不平等通过教育循环加强。

可见,学区空间化存在权责对等与教育分异的两面性。权责对等问题也是空间匹配问题,改革趋向集权化还是分权化需要因地制宜。对于优质资源密集的城市地区,应当考虑赋予学区权责统一的自主性及学区空间化;但同时也应在避免强化教育分异上未雨绸缪,结合多方面因素综合探讨。

最后,从动因来看,财税分权是美国学区形成的根基。除了南方受种族隔离历史影响之外,学区合并本质上体现规模经济的主导作用,并响应人口税基的变化。但这种体系下,学区效率与教育公平、教育产出、额外成本等问题之间的外部性矛盾需要不断权衡:大都市学区蒂伯特模型本身的“效率—公平”悖论典型;而农村学区合并过度则存在规模不经济的负面后果。

对比而言,我国自上而下的学区制改革劣势势截然不同;“以区县为主”的教育行政架构与美国南方类似,尽管损失资源配置效率,但能发挥权力相对集中的优势,缓解体制遗留问题,如城乡二元的入学权利不平等。以美国学区制问题为鉴,城市学区构建需要兼顾财政效率和社会公平,满足就近入学和社区诉求多重目标,促进本地与外来人口的学校空间共享。农村地区则需要顺应人口变动趋势、弹性确定中小学配置标准、慎重撤点并校并保护小规模学校,考虑校车、远程教育等多种均等化措施。这都将极大考验规划师平衡矛盾的智慧。

总之,美国学区格局形成过程中自下而上的痕迹相当深刻,并非“划分”而成;除了种族隔离影响之外,以物业税为基础,体现出规模经济的主导

作用及社会经济分异的不平等。我国城市的学区制改革也绕不开教育行政区划调整问题，并非简单的分区划片能解决。对于学区空间化，规划应当从技

术到政策层面延伸，厘清概念、因地制宜、通过治理途径兼顾效率公平，立足于学校和社区综合论证。

德国住房租赁制度及其对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培育的启示

王阳

摘要：德国的住房租赁市场成熟，制度完善。租金控制依托市场机制，运用反映一个地区市场租金水平的“租金明镜”，结合法规严控租金增长；租赁法规立足于共赢，对合同期限、驱离租户限制、驱离租户通知时间要求、住房押金等规定细致明确；户籍、金融、住房保障等相关制度确保租购同权，使租房与购房各具优势。我国住房租赁市场的培育与发展，应以租售均衡为目标：首先使租房与购房的居民享受均等户籍与社会福利政策，实现租购同权；其次，应创建租金控制工具，稳定租金增长与收益，促进金融机构在住房租赁市场的信贷盈利；再次，应健全法规，细化住房租赁管理。

关键词：德国；住房租赁制度；租金控制；租购同权；租售均衡

引文格式：王阳. 德国住房租赁制度及其对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培育的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5): 77-85. DOI: 10.22217/upi.2018.373.

2016年年底，我再赴德国做博士后。去德国之前就有朋友告诉我，说现在和十年前上学时不一样了，随着“难民潮”，德国大多数城市租房都很困难，而我当时不以为意。一开始，我按自己理想需求的区位、价格、厨房和家具设施等等条件在德国最大的住房出租网站“房地产侦察兵 24” (<https://www.immobilienscout24.de/>) 挑选房源，然而符合自己需求的出租房出乎意料地少。于是只好降低要求，好不容易找到了较为中意的房子，没想到联系房东时却被告知已有很多竞租者，仅预约同一时间看房的意向租户就有几十人。大家肯定疑惑，为什么房东不直接涨房租，用提高租金的方式轻而易举地筛选租户呢？这就需要从德国独具特色的住房租赁制度谈起。

德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唯一的住房租赁市场超过销售市场的国家，有着十分成熟的住房租赁体制。2014年德国住房自有率为45.5%，住房租赁家庭占比54.5%；同时，租住人口近年一直呈增长趋势，占总人口的比例已从2010年的46.8%增长至2016年的48.3%。健康稳定的住房租赁市场体现在合同租金控制、租金增长控制、诉讼难易度、押金要求、驱离租户限制、驱离通知时间要求、合同期

限等多方面，核心在于租金控制。德国对租金控制严格，控制力度跻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前三名。现行的租金控制工具为“租金明镜” (Mietspiegel)，即显示一个地方住房的平均、最高和最低租金的租金参照表。具体包括“简易租金明镜” (einfacher Mietspiegel) 和“合格租金明镜” (qualifizierter Mietspiegel) 两种类型。“租金明镜”可以针对一个或多个城镇或者城镇中的一部分区域编制，一般使用前四年的住房租赁价格中的“冷租”，即不包括水、电、气、暖、网、电视费、垃圾处理费、物业费 etc “额外费用” (Nebenkosten) 的净租金统计计算而成，每两年调整并向全社会发布一次。

以位于德国图林根州的著名文化小城魏玛为例。魏玛设置的“简易租金明镜”由“住房交易网” (<https://www.wohnungsboerse.net/mietspiegel-Weimar/9408>) 统计发布。根据这一“简易租金明镜”，租户和房东都可以清楚自己所在区域的房租概况。如果需要进行单个住房查询，可以根据“住房交易网”上的链接输入住房的地址、邮编、类型、建设年代、面积、设施状况等信息，便可准确查询出单个住房的当前市场合理租赁价格。

“合格租金明镜”一般在租金较快增长的城市使用，具有法律效力，是法院解决租金争端的重要依据。“合格租金明镜”和“简易租金明镜”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编制过程上。“简易租金明镜”主要调查统计的是依据住房类型、区位、建筑面积等分类的租赁合同中的租金；“合格租金明镜”则调查的是住房类型、区位、建筑面积、房间个数、设施状况等住房的真实指标，然后将这些指标量化为后续计算的数据。

以柏林为例，其设置的“合格租金明镜”根据住房类型、大小、基础设施、建设年代、位置等计算编制租金参照表和租金浮动影响因素表。如果需要单个住房查询，可以根据相关网站的链接准确查询住房详细区位和合理租金。

德国的租赁法规以“租金明镜”为支点，对住房的旧约租金和新约租金及加租和减租的方式、程序和要求进行具体规定。一般情况下，德国的住房租赁合同为无限期合同，房东无权随意驱离租户。租户退租，只需提前三个月书面通知房东即可。德国住房租赁市场的长期稳定，还与注册型户籍管理制度、政策性住房金融体系以及补贴式住房保障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德国户籍注册只与实际住所直接关联，与住房所有权无关，这从根本上确保租赁和购买住房同权同责。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住房市场总体以销售为主，租赁市场发展较缓慢。目前，我国家庭住房自有率偏高，这在一定程度已反映出我国住房租赁和销售市场发展失衡，租赁市场发展严重不足的问题。在我国，很多人宁愿一生当“房奴”，也不愿长期租房，最核心的问题在于租购不同权。大量居民购房不是因为居住的“刚需”，而是不得不因为落户、上学等社会基本福利的“刚需”而购房。因此，政府需要在户籍、义务教育和公共服务供给以及住房保障方式上下更多功夫。同时，应抓紧探索具有全国统一评价体系的可用于立法和司法评判的、地方自治的、大中小城市分类的租金控制工具，增强居民租住的稳定性。

住房市场并非租住比例越高越好，科学发展的根本是实现租售均衡。德国虽然有着欧洲最大的住房租赁市场，但从制度发展与历史变革角度来看，德国住房制度一直旨在维护住房市场的租售平衡，并不强调租房或买房的特定权属形态，持有不偏不倚的“权属中立”的政策取向。现阶段，我国住房租赁市场的整体发展较为缓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我国特定的文化背景相关。但是，只有尽快建立健全适合我国制度环境与国情的住房租赁制度和政策机制，加紧培育住房租赁市场，促进租售均衡，我国住房市场才能持续向好发展。

从罗马“古迹区”百年保护历程看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冲突及共生

杜骞

摘要：考古遗址在面对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建筑用地扩张时极其脆弱。近年来我国遗址保护与城市化存在诸多矛盾，而城市化水平已比较稳定的西方国家早年也有类似情形。意大利罗马“古迹区”保护始于 19 世纪早期，保护区划形成于 19 世纪末期，后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与城市化的影响逐渐碎片化，自 20 世纪后半叶开始进行内部肌理的织补。该案例充分体现了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对我国当前遗址保护规划颇具参考价值。

关键词：考古遗址；城市化；保护区划；遗址保护与利用；罗马

引文格式：杜骞. 从罗马“古迹区”百年保护历程看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冲突及共生[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5): 86-93. DOI: 10.22217/upi.2017.571.

考古遗址在面对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建筑用地扩张时极其脆弱，近年来我国遗址保护与城市化存

在诸多矛盾，而城市化进程已经结束的西方国家早年也有类似情形。意大利罗马“古迹区”保护始于

19 世纪早期，保护区划成型于 19 世纪末期，后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与城市化的影响逐渐碎片化，自 20 世纪后半叶开始进行内部肌理的织补。

罗马，怎么理解这个城市？

亚平宁半岛中部，当今意大利首都。在这片土地上历时性地叠加了三种文化。最早是古罗马文明，时间跨度从公元前 753 年建制，到公元 330 年古罗马帝国迁都。在这期间，台伯河东岸的“七丘之城”发展成了古罗马帝国政治、经济、行政与文化中心，人口过百万，城市规模在前工业时代的欧洲首屈一指。

西罗马灭亡后，帝国原有领土陷入无主状态，在基督教会的组织下逐渐形成了教皇国，它的中心也位于罗马，成为叠加在古罗马之后的第二层文化。那时的城市规模较之前小了很多，奥勒良城墙（Mura Aureliana）所围合的区域就是教皇国的核心。这颗心脏跳动了超过 15 个世纪，但在拿破仑侵略后就处于半瘫痪状态，终于在 1921 塌缩到了梵蒂冈城墙内。

最新的一层就是现代文明，罗马自 1870 年开始成为意大利的首都，目前城市面积 3 倍于帝国时代的首都，15 倍于教皇国首都，人口 280 万。

罗马的历史太厚重，这导致它运行得并不轻松。但它并没有意愿卸掉这一重担，而是在寻找着保存历史记忆与城市发展的平衡点。其中最棘手的要数考古遗址保护，做一个形象但可能会引发不适感的比喻——在城市中心进行考古遗址的发掘与保护犹如一场外科手术，掀起表皮，保证组织不坏死的同时其他部分还要正常运行。在罗马，这样大大小小的创面不计其数，如何处理这些创面，甚至让它

们成为这个城市的荣耀？

在论文中，我无意泛泛而谈罗马文物古迹的保存状况与保护实践，或是介绍意大利考古遗址的保护理念有多成功。相反，我想探讨的是漫长保护历程中的某些崎岖与可商榷之处，尤其是罗马城市发展进程中与中国当下城市化颇为相似的一段。我的研究对象是罗马三个文化层中最深那层——古罗马时代遗迹，它分布在罗马市中心多个角落以及城郊东南方向的阿庇亚大道。篇幅有限，我的关注点将聚焦在罗马市中心考古遗址区的发展演变，涉及斗兽场、古罗马广场、帕拉蒂尼山、马克西姆竞技场这一系列密集的古迹群。

这块遗址不同于庞贝。庞贝独立于那不勒斯市，整个小镇依托古迹旅游而发展；它也不完全等同于欧洲其他老城的历史中心，因为它的逻辑不是从已经发展好的城市内部划定保护边界。实际上，古罗马遗址的保护远早于城市化，然而它却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被围剿，最终嵌套在了当前城市的格局中，甚至遭受着缓慢的解体。古罗马遗址何尝不想封闭、安宁一些，只可惜它与这个城市纠缠得太深。

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我参考了意大利当代学者的著作、历史地图、罗马市自 1870 年以来的城市规划方案及其他图像资料。由于古罗马遗址的重要性，对它的研究不在少数，我尽可能组织有用的信息去还原这一历史进程。可以说，古罗马遗址的保护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更多体现的是遗址保护与城市化、与政治之间的博弈。希望我的文章能为关注此类问题的人提供具有一定价值的材料，或为后期更具深度的研究做些许铺垫。

国际常用发展指标框架综述与展望

黄经南 敖宁谦 谢雨航

摘要：发展指标作为评估人类环境质量、城市发展、社会公平与进步等的重要工具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指标体系的构建不仅要体现指标要素的完整性，更要反映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发展的动态过程。不同的指标体系构建方法对指标评价的结果具有不同影响。本文介绍了目前国际上常用的五大发展指标框架，包括 PSR、要素主题、资本核算、流量存量、人类福祉的产生过程、内涵、适用情况及各自的优缺点；并总结了发展指标的最新趋势，包括复合化、目标化、绩效化和公众参与；最后提出对我国城市规划工作的启示。

关键词：压力—状态—响应；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人类福祉；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引文格式：黄经南，敖宁谦，谢雨航. 国际常用发展指标框架综述与展望[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5): 94-101.

DOI: 10.22217/upi.2017.290.

随着城市规划学科不断发展，大众及各学者对城市发展的认知和探索也从定性感官认知转向定量理性判断。发展指标作为评估人类环境质量、城市发展、社会公平、社会进步等的重要工具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如 GDP、GPI，生态城市指标、城市繁荣指数、生态足迹等。这些指标成为衡量发展进程和状态的标尺。我国关于城市发展指标体系构建的方法可以归纳为“主题—层次”法。该方法简单易操作，能够很好地反映当下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但同时也存在指标分散，无明晰的内在逻辑和联系；无法反映过程的变化；此外，该方法过多关注物质层面，未将人类活动和城市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考虑在内。基于此，本研究希望通过介绍国际常用的发展指标框架，归纳被大众广泛接受的经验和结果，总结发展指标研究的新趋势，为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新思路。

目前国际范围内常用的发展指标框架可归纳为 PSR（压力—状态—响应）框架；主题分类框架；资本核算框架；存量与流量框架；人类福祉—生态系统健康。

PSR 框架源于 PR（压力—响应）框架，用于描述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该指标体系根据压力、状态、响应的循环过程进行分类。

基于要素或主题的框架能够与政策制定的过程和目标产生联系，为决策者和公众提供一个清晰

和直接的信息沟通桥梁，并使相关问题获得社会舆论的关注而被广泛使用。能够辅助判断城市或地区某一关键问题或领域的发展现状，为决策者针对相关问题作出决策提供直接明了的依据。

资本核算框架着重强调对自然资本、制成品资本和人力资源总价值的表达。目前国际上比较认可的是 GPI，主要用于适用于评价一个国家、地区或者城市的在经济、社会及环境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存量和流量框架与资本核算框架同属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着重研究整个系统的动态过程。存量表示系统的状态，流量指的是变化率，该框架较适于对某一地区或者国家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作出判断，并分析环境资产的存量和流量变化，且便于和国际接轨。

人类福祉/生态健康评价框架是评估可持续发展的结构化分析程序，在该系统中人类和生态环境同样重要，清楚地表明了人类及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依赖性。

随着时间变化，这些指标框架朝着复合化、目标化、绩效化和体现公众参与的方向发展。在未来构建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时应注重指标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在整体框架的指导下构建符合实际的指标体系；与规划管理体制相结合，创新规划管理体制和法规，增强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以人为本，增强公众参与。

功能整合与战略规划：高速铁路车站建设与城市发展研究评述

杨跃龙 韩笋生

摘要：伴随高速铁路建设发展，高速铁路车站在城市中的作用逐渐显现并日益多样化。国内外经验表明，高速铁路车站对站点区域的土地利用、城市品质产生影响，并会影响其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空间形态。注重功能整合、规划过程和多方参与的战略性规划有助于实现高速铁路车站对城市发展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高速铁路车站；城市发展；城市空间变化；战略规划；车站功能

引文格式：杨跃龙，韩笋生. 功能整合与战略规划：高速铁路车站建设与城市发展研究评述[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5): 102-108. DOI: 10.22217/upi.2017.235.

伴随高速铁路的建设和发展,高铁车站在城市中的作用日渐明显。同时兼备“连接交点”(connector)、“交通节点”(transportation node)、“会面场所”(meeting place)及“城市中心”(urban centre)多重属性的高铁车站,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正发挥着多样化的功能。国内外经验表明,高铁车站不仅对站点区域的土地利用、城市品质产生影响,而且会改变其所在城市整体的经济结构和空间形态。但是,车站建设并非带动当地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注重其功能整合、制定重点突出的战略性规划将有助于实现高铁车站对城市发展的积极影响。

作为同时具备“节点”和“场所”属性的高铁车站,既是城市外部资源汇聚的节点,也是城市内部多种经济社会活动集聚的场所。在城市不同区位上,高铁车站影响城市的方式以及发挥的作用各异。能否优化高铁车站的区位、将城市最需要的功能最大化,是对城市管理者和规划师的挑战。此外,如何将站区的规划与整个城市的发展规划进行战略性的整合,以一种综合的战略视角来协调和整合车站各种功能的实现,也是规划创新的重要方面。

实践表明,高铁车站及相关城市建设项目的确影响当地的土地利用、空间形态、城市品质、企业运营以及居民生活。在站区层面,车站及相关建设

项目影响土地利用和城市品质。目前,大多数高铁站区规划都提倡多功能土地利用,因为这是影响站区活力、吸引力和安全性的重要因素。而以政府为主导、多方参与、有弹性的规划过程则有助于保证城市品质的提升。在城市整体层面,高铁车站建设影响城市的经济结构和空间形态。既有研究表明,若想利用高铁车站建设带动当地经济增长和城市更新,还需同时满足经济环境、资金投入以及政策制度等前提条件。

高铁对城市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参与者组织利用高铁所带来的资源的能力。如果缺少对规划建设过程有效的内外部管理,缺乏对各参与者的有序组织,开发项目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带动相关区域的发展,还会导致各层级利益相关者的摩擦与冲突,最终影响建设效果。这些是有关高铁车站战略规划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对高铁车站建设与城市发展的研究和分析,总结出了功能整合与战略规划的重要性,即:基于车站的多功能属性和多方面影响,在对高铁车站这种大规模、高投入、长周期的项目进行规划时,应注重规划尺度的细分、综合以及与其相关的多功能整合,注重包括多方参与的规划过程、利益协调以及对重点问题有前瞻性考虑的战略规划。

从“5D”到“5D+N”:英文文献中 TOD 效能的影响因素研究

夏正伟 张烨

摘要:“5D”维度指标来自赛维罗等关于美国建成环境对交通行为影响的研究,是 TOD 建设与研究的重要参考。随着更多国家对 TOD 效能评价展开相关研究,尚需结合更多的实证案例研究结果验证其适用性,以更好地指导 TOD 的建设与研究。本文对 TOD 效能研究的英文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对影响 TOD 效能的建成环境指标及其关联性特征进行了分析,总结了需要重点关注的 6 个维度 37 个指标,并进一步从“5D+N”维度探讨了轨交站点区域 TOD 建设的策略建议。

关键词: 5D; 公交导向发展; 效能; 建成环境指标; 文献研究

引文格式: 夏正伟,张烨.从“5D”到“5D+N”:英文文献中 TOD 效能的影响因素研究[J].国际城市规划,2019(5):109-116. DOI: 10.22217/upi.2018.256.

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TOD: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旨在通过大运量的公共交通

工具、混合土地利用、较高强度开发等构建生态、宜人的社区环境。TOD 的效能主要体现在城市的交

通、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所获得的收益。然而，将 TOD 理论概念成功地付诸实践却非易事，不同 TOD 项目的效能发挥程度也不尽相同。“5D”维度指标来自赛韦罗等关于美国建成环境对交通行为影响的研究，是 TOD 建设与研究的重要参考。随着更多国家对 TOD 效能评价展开相关研究，尚需结合更多的实证案例研究结果验证其对 TOD 交通效能，以及对经济、环境与社会效能是否具有适用性，以更好地指导 TOD 的建设与研究。本文对 TOD 效能研究的英文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对影响 TOD 效能的建成环境指标及其关联性特征进行了分析。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成果概况如下：

分析了 TOD 效能指标与建成环境指标的关联性特征。不同的建成环境指标对 TOD 具体效能指标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影响，其中到轨交站点距离、人口密度、土地利用多样性对 TOD 的交通、经济、环境与社会效能均呈现出重要的影响作用；广泛的实证案例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赛韦罗等所提出“5D”原则框架的总体有效性，交通换乘距离（到轨交站点距离）、多样性（土地利用多样性）、密度（工作岗位密度、人口密度、容积率、住宅密度）、设计（宜步行环境）四个维度的 7 个关键性指标对 TOD 综合效能的影响获得了较为广泛的支持。

总结了影响 TOD 效能的 6 个维度（5D+N）37

个指标。由于建成环境的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关联性，通过多影响要素的组合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作用，因而那些与到轨交站点距离、土地利用多样性、人口密度、宜步行环境等七个关键性要素直接相关联的建成环境指标，也应成为轨交站域 TOD 建设与效能优化关注的重点。获得的 37 个指标中除了“5D”维度的指标外，还包括站点交通网络可达性、到 CBD 距离、站点的接近中心性、站点的中介中心性等四个表征轨交站点特征的指标，故将这四个指标定义为“站点特征”（node characteristics）。因而，轨交站点区域影响 TOD 效能的建成环境要素从“5D”扩展为“5D+N”，形成了 6 个维度，即在原有的“密度”“多样性”“设计”“交通换乘距离”“目的地可达性”的基础上新增加了“站点特征”这一维度。

从“5D+N”维度探讨了轨交站点区域 TOD 建设的策略建议。“站点特征”与“密度”“多样性”“设计”这三个维度指标之间存在着关联性，揭示了轨交站点差异性对 TOD 建设的影响。并且，七个关键性建成环境指标之间以及与建成环境指标之间存在着跨越不同维度、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联性特征。因而，结合“5D+N”中各建成环境指标对 TOD 效能影响及相互之间的关联性特征，可为轨交站点区域 TOD 建设与效能优化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基础。

日本小城镇应对人口减少的经验——以日本北海道上士幌町为例

卢峰 杨丽婧

摘要：如何发展欠发达地区小城镇一直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当前很多小城镇面临人口外流、城市活力下降的问题，而日本北海道地区村镇的此类问题由来已久，本文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阐明其具体应对策略及借鉴意义。除财政产业措施外，地方政府还进行了一系列面向人口减少时代的规划措施，包括利用公营住宅使人口从郊区向中心区迁移、减少和利用空置房策略、紧凑型中心区构想等一系列试图将摊开的城市“精明收缩”的措施，这种积极适应人口收缩、提高城镇活力的理念和策略，对于我国类似欠发达地区小城镇的存量优化有一定启示，我国小城镇也应注重城乡一体化发展，提高城市的紧凑度，提高城市的可居住性。

关键词：小城镇；人口减少；日本公营住宅；城乡一体化；存量优化

引文格式：卢峰，杨丽婧. 日本小城镇应对人口减少的经验——以日本北海道上士幌町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5): 117-124. DOI: 10.22217/upi.2017.258.

当前我国城镇化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同时也面临很大压力。中小城市（镇）成为我国城市体系的核心，但由于产业和劳动人口向大城市快速集聚，中小城市（镇）缺乏发展动力，成为我国城镇化由量变到质变过程中最大的瓶颈。研究城镇化水平高于我国的先行国家的城镇化历程，及其遇到过什么问题，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效果如何，借鉴其经验并避免先行国家的一些失误，对于我国现阶段城镇化发展有重要意义。

日本在 1960 年代—1970 年代进入城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时，其城镇发展显示出了巨大的地区差异，小城市收缩严重，主要为单一产业衰落型小城市和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市、町。日本北海道地区的城市收缩问题被国外学者长期关注和大量研究，形成了较丰富的实践与研究成果，但当时国内还较少涉及。笔者在北海道大学交流学习期间，参与了该校主持的应对城市收缩的部分调研与实践工作，对日本北海道地区的城市收缩问题和应对经验有了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其中，上士幌町属于由于区域不均衡发展及自身动力不足造成的欠发达型收缩，对于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小城镇（如中西部地区大量人口流出的乡镇）有很大借鉴意义。

小城市（镇）收缩的类型有很多种，因篇幅有

限，本文仅针对欠发达地区进行了典型案例分析，阐明其具体应对策略及借鉴意义。

本文首先概述了日本经历经济高速增长后，出现的大城市“过密”和村镇“过疏”的问题及其自然、社会因素，以及日本应对地域过疏化的相关对策。基于这样的背景，文章聚焦于日本过疏化最严重的地区北海道的上士幌町，上士幌町人口的减少，不仅给地方财政带来压力，也进一步造成公共设施运行低效、社区感消失等社会经济问题。接着，文章简要介绍了上士幌町人口减少的原因，并将其归纳为区域发展不均衡以及产业结构问题、人口生育率低、快速城镇化等方面。

文章主要研究了上士幌町对此问题的应对机制和策略。在财政产业方面，主要在于精简基础设施、转移投资重点，并利用高原空间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在规划设计层面，本文归纳了上士幌町在中心区的规划策略，如通过整合设施功能，使中心区更紧凑，并在运营管理上实现公共设施的协同化运作。在住房方面，推出了一系列精细化利用空置住宅，以及保障特殊人群的政策。

通过分析研究日本的先例，未雨绸缪，关注我国深层次的人口变化，在规划设计、产业、制度等方面加以完善，提升小城镇的核心竞争力。

美国民间非营利机构管运城市公共空间的模式研究

黄林琳 王一

摘要：城市公共空间作为城市管理部门为居民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其规划管理运营通常由地方政府全权负责，一旦缺乏资金的投入便会疏于维护、管理，慢慢衰败直至丧失其基本的公共服务功能。以 40 余年来美国民间非营利机构管运城市公共空间的两个主要模式为例，分析、研究其作为政府管控模式的重要补充，如何积极有效地提升城市公共空间的综合品质，并进一步促进美国城市中心区的复兴。以拓展我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多元管运模式为研究目的，采用文献研究与案例调研的方法，基于理论及社会背景研究，结合纽约布莱恩公园及圣路易斯森林公园两个案例，对当前美国非营利组织管运城市公共空间的两类影响较大的模式进行概括性梳理，分析其适应性及管运目标，为我国城市更新过程中公共空间的差异化管运提供借鉴。

关键词：非营利机构；城市公共空间；商业改良区；城市公园管委会；美国城市

引文格式：黄林琳，王一. 美国民间非营利机构管运城市公共空间的模式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5): 125-131. DOI: 10.22217/upi.2018.278.

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总量在经历了三十年持续走高后，开始面临其他欧美国家均经历过的

空间管运问题。后者自 1970 年代中期开始探索由政府主导、多渠道参与的城市建设、管运模式，迄今四十余年渐趋完善并形成范式，在城市公共空间的更新建设、管运方面收效显著。其中，民间机构尤其是非营利组织（NPO）因为受“非分配约束”及“合理性补偿约束”的双重制约和影响，成为一个“天然而高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不但能够帮助地方政府减负，提高公共支出的使用效率，还能有效规避差异性社会在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失灵问题，进而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美国大量管运实践证明，非营利组织非常适合参与到城市公共空间的供给链中。

美国参与公共空间管运的非营利组织类型多样，但受到运营资金来源的影响，商业型的 BID 模式以及捐赠型的 UPC 模式发展最为成熟。

BID 模式的全称是 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s，通常被译为商业改良区或商业发展区。这一模式因运营经费全部来自改良区内业主额外缴纳的地块税（district-specific tax），因此会更加重视改良区与其他城市公共空间的差异，强调商业活力与城市社会活力的结合，尤其重视零售商业的社会价值。以纽约布莱恩公园为例，在非营利组织布莱恩公园改造公司的运营下，不但布莱恩公园的空间品质获得了提升，该改良区也实现了商业复兴，并为公园的持续发展带来了稳定的管运经费。经过二十年的管理，来自政府的补贴以及业主的地块税赞助逐年递减。至 2007 年，布莱恩公园管运成本的 86% 已经能够基本实现自给自足，最终实现了公园与改良区、市民与街区居民的多赢。

UPC 的全称是 Urban Park Conservancy，可译为城市公园管理委员会，同 BID 这一有着清晰且明确学术界定的模式不同，conservancy 只是对美国一类私营的、非营利的、不依赖政府资助、以公园利益为导向的组织管理机构的概括性表述。因为运营资金基本完全依赖社会捐赠，所以 UPC 模式不但强调不同社会群体、社会阶层广泛参与决策，还鼓励不同形式的志愿者群体参与公共空间的日常管理和维护。以美国中部城市圣路易斯的森林公园为例，其管运机构“永远的森林公园”经历三十余年的持续成长，不但助力圣路易斯市市政府完成了森林公园总体规划的颁布，扭转了公园日益衰败的管理困境，对该总体规划的落实以及公园全面升级后持续保持高品质服务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更通过积极有效的募集资金计划为公园的后续日常运营筹措到稳定的经费，使得森林公园成为“全美最酷”的十个公园之一。

不可否认，中美两国的城市公共空间在产权属性、资金来源以及城市管理制度等诸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本文对这两个主要范式的研究对当前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管理运营依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譬如对于旧城中日益衰败的老商业街区，BID 模式可以通过激活其邻近的城市广场、街角公园、商业步行街等公共空间重新提振周边商铺业主及居民的积极性，进而提升该街区的经济及社会活力。而对于一些位于新城、尺度巨大的城市公园或城市广场，UPC 模式则有利于借助民间力量的参与，在减轻地方财政负担的同时，确保公共空间设施的日常维修和养护，使其依然能够成为备受市民喜爱的公共生活场所。

新加坡和纽约特色风貌地区规划管理经验及对深圳的启示

刘冰冰 王泽坚

摘要：独特的城市文化与特色风貌是建设优秀城市的重要支撑维度，在全球化建设空间趋同的趋势下发掘和保持城市的地方性，对提升城市竞争力意义重大。新加坡和纽约是两个典型的具有多元文化和独特风貌的国际城市，其本土文化和特色风貌的留存得益于及时建立了特色风貌保育体系，并通过有效的技术手段、管理手段、差异化的管理政策进行精细化的管控引导。深圳处于全面进入二次开发的存量规划阶段，目前保护制度的缺位、对具有风貌价值的地区认同感不足以及管理技术的不完善，对整个城市特色产生的外部影响已不容忽视，因此本文总结新加坡和纽约的成功经验，为深圳建立风貌保育体系和管理策略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城市风貌；特征地区；规划管理；经验；纽约；新加坡；深圳

引文格式：刘冰冰，王泽坚. 新加坡和纽约特色风貌地区规划管理经验及对深圳的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5): 132-138. DOI: 10.22217/upi.2017.267.

受“年轻城市”和“文化沙漠”的标签化影响，深圳的城市特色常被固化为速度和效率，城市风貌也以现代化的高层楼宇为特征。相比于纽约的先锋与经典、巴黎的艺术古典与现代时尚、上海的外滩腔调和弄堂故事，深圳缺乏能够传承和孕育历史文化、人文内涵、彰显城市气质与传统生活特色的多元空间载体。在步入存量时代的过去十年，深圳的城市更新探索了独特的市场化路径，虽然在促进城市空间再生、产业经济发展、人居环境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反映城市发展历程和集体记忆，具有社会、人文、场所等内涵的公共价值地区也在不断消失。“湖贝 120”“莲花山上的公厕”“深圳体育馆”无一不被升级为“事件”，引起巨大反响，规划师和建筑师们一直在期待着“拆”与“留”、“保”与“育”能够渐入平衡。而保护制度的缺位、对具有风貌价值的地区认同感不足以及管理体系的不完善，是深圳在特色风貌地区管理方面的突出问题。

独特的城市文化和特色风貌是建设优秀城市的重要支撑维度，在全球化城市空间趋同的趋势下发掘和保持城市的地方性，对提升城市竞争力意义重大。纽约、新加坡是两个典型的具有多元文化和独特风貌的国际城市，其本土文化和特色风貌的留存得益于及时建立了特色风貌保育体系，并通过有效的技术手段、管理手段、差异化的管理政策进行精细化的管控引导。

新加坡具有本土特色风貌并进行规划管理的地区主要指“保育地区”(conservation area)。这一类地区的保护对象和内涵并不是从初始建立至今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新加坡城市发展战略的转变而不断扩展和延伸，从狭义的“历史保护地区”逐步扩展为广义的“对本土文化和特色风貌具有重要价值的更广泛地区”。在定义保护对象方面，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历史建筑的保护，而是逐步拓展至对特色地区整体风貌的保护，由于空间管理方式相似，目前已将 1980 年代管理体系中建立的“历史保育

地区”和 2001 年之后提出的“特征地区”合并管理，统称为“保育地区”。扩大后的保护类型不仅保留了新加坡地区历史发展的印记，还大幅度避免了城市景观遭受拆建循环最终可能呈现的趋同性，避免城市在快速发展中失去辨识度及历史特征。在保育规划管理方面，主要从规划设计导则、开发申请程序以及特殊政策的制定三个方面进行引导和管控，其中特别强调发挥城市设计在保育地区更新再开发方面的突出作用，确保地区特色空间品质的维持及提升。

纽约的特色风貌区管理始于 1969 年。为了避免纽约各区同质化、标准化发展，纽约城市规划委员会将具有特色风貌特征的区域划定为特定意图区，并在这类地区强调“城市设计”和“开发政策”的引导。截至 2017 年已有 68 个地区被纳入管理。纽约的特色风貌地区基本涵盖在历史街区/地标建筑以及特色意图区两套管理体系管理范围内，但分属不同部门进行管理。与新加坡相似的是其管理手段：包括：(1)对特色风貌地区采用保育式的管理，鼓励功能活化和建筑再利用，不允许拆除重建的再开发模式；(2)在管理过程中城市设计起到了突出作用，每一地区/街坊分别编制城市设计来识别管控要素、制定管理要求，而不是通则式的管理；(3)城市设计导则具有法定效力，在城市设计导则的引导下开展城市更新工作；(4)制定了相应的开发申请程序；(5)为促进片区的风貌保护和城市活力，实行差异化的政策管理。

总结其经验，对深圳建立特色风貌保育体系具有如下启示。

一是应尽快建立深圳特色风貌保育体系。以“超越历史、超越空间、超越现有价值”为视角，除了传统定义的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还应尽快将能够反映和记载一定时期发展记忆、具有建筑风貌特色、承载特色文化内涵、提供特色生活体验的地区纳入保护范畴，建立特色风貌保育区名录并制定相应管理规定，以划线的方式确定保育管理范围，

并实行动态准入机制；

二是应倡导永续再生的有机更新模式。在特色风貌保育区内应避免大拆大建，有效控制更新成本，营造更多的低成本、多元化、个性化的特色空间，以动态发展和精细化营造的方式来创新城市空间供给模式；

三是增强空间管控和城市设计引导。加强街区层面城市设计管理对特色风貌保育地区的管控和

引导作用，兼顾“高质量的空间增容”与“本土风貌特征维系”，在城市设计导则的指引下开展以市场为主导的更新单元规划，加强空间管控；

四是创新保护管理机制和配套政策。制定特色风貌保育区的管理程序，限定并引导风貌保育区内的城市更新方式，以试点的方式探索规划/建筑标准突破程度以及创新政策试验。

城乡融合视角下中澳规划管理的制度性差异与启示

邱连峰

摘要：在新时期，规划被赋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目标的职责，参考国外成功经验成为有益且有效的渠道之一。本文应用制度性理论，建立包含管制、规范、认知的概念性模型，系统比较我国与澳大利亚的城乡规划管理要素，揭示了两国在城乡划分标准、规划管理内容、地方行政主体设置、规划体系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财政支持等方面存在的明显差异及其原因。由此，首先可以弥补国内相关文献的空缺。其次，有助于廓清我国与澳大利亚乃至英联邦国家规划管理的制度性差异，避免因此而产生的认知错位，并加深对国外建设成果的理解。最后，澳大利亚城乡平权等值的基本观念，也为我国城镇化路径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城乡融合；规划管理；制度性差异；认知误区；城乡等值

引文格式：邱连峰. 城乡融合视角下中澳规划管理的制度性差异与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5): 139-144. DOI: 10.22217/upi.2018.487.

澳大利亚不仅拥有全球知名的宜居城市墨尔本、悉尼、阿德莱德等，而且其全国城乡统筹的宜居指标一直位于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之宜居国家前列，可以作为考察发达国家城乡规划管理的一个代表性样本。

其外显的规划建设成果与其内在的政策、制度等紧密相关。因此，运用制度性理论，从影响规划管理的法制层面、规范层面、社会和公众的认知层面分别着眼，通过管理的主体、客体以及方式这几大公共管理逻辑要素，系统地构建中澳规划管理的制度性差异比较模型，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样本分析方法。

从城乡划分标准看，我国原则上以设市、建制镇为主体的城镇与乡村作为划分标准；而澳大利亚的城与乡的划分，主要是根据人口密度，并不涉及行政区划的概念。

从纳入管理的规划建设活动内容来看，澳大利

亚要求城乡全面覆盖，相对细致。相比之下，我国城乡规划法对建设活动却没有详细的界定，某些具体的建设活动纳入其他法规管理或者无须行政许可：如农村房前屋后树木的采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条管理，不必纳入行政许可。

从规划的管理主体上看，澳大利亚除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地方政府均为同一个层级，其“城”“乡”性质，根据辖区人口密度，可能每年都会变化，不存在我国的城市管辖乡村的地方政府行政隶属关系。另外，澳大利亚“市”“镇”或“区”的地方名称，是根据习俗和州政府法取定，并没有人口规模和城镇化程度的内涵，也不反映任何行政层级。

从规划管理的方式来看，首先，澳大利亚所有涉及用地的规划都纳入环境规划（environmental planning）体系内，不存在类似国内从规划管理办法到规划标准，再到规划编制成果文件的城乡区别。

在规划建设管理过程和审批文件上，澳大利亚的行政许可及审批证书统一应用于城乡；而中国在城市实行“一书两证”，村庄实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管理文件上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

从国家对地方的基础设施投入来看，澳大利亚以实现城乡居民同等水平为准，即在合理的工作投入的前提下，考虑到不同的城乡地方政府在发展环境、管理难度方面的差别，联邦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的分配应能保障任一地方政府为当地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不低于该州其他地方。

中澳两国城乡规划管理制度差异性的比较，可以提供一个观察问题的视角，有助于避免可能会产

生的认知错位。无差别化的城乡规划管理、地方政府城乡平级，以及联邦基础设施专项财政资金分配的目标平等原则，反映出澳大利亚城乡平权、等值的深层次观念。这样的制度性差异也带来一个启示：我国城镇化的路径，可否突破现有的农民必须从行政层级最低的农村迁徙到更高行政层级的建制镇及以上城市这样的单一标准和方向，通过财政向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倾斜，改善乡村人居环境，达到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相当，实现就近就地城镇化？至于其可行性，澳大利亚的城乡规划管理可以作为一个支持的例证。

2019年第6期文章目录

本期主题 日常都市主义：面向美好生活的城市发展范式

玛格丽特·克劳福德, 著; 陈焯, 译 / 日常都市主义的现状

龙元 / 日常的输入

陈焯, 玛格丽特·克劳福德 / 日常都市主义理论发展及其对当代中国城市设计的挑战

何志森, 著; 杨薇芬, 译 / 大地之上：基于人的尺度的图绘

刘昭吟 / 泉州美丽古城家园共造：人本主义城市化范式的底层设计

吴文媛 / 消极规划：直面城市加密的日常生活

陈焯, 袁涛, 杨婕 / 街边市场的多目标协同规划治理：以美国波特兰街边市场建设为例

城乡研究

李丽梅 / 城市革命：一个理论概念的嬗变研究

杨舫 / “过渡使用”在国内外的发展及相关研究——一个城市研究的新视角

孙洁, 谷浩, 余思奇 / 国外学生化研究评述及其对本土化研究的启示

刘倩, 王缙宪, 李云 / 面向可持续的城市停车管理：国际比较与借鉴

许红, 李玉涛, 郭湛 / 从管制到市场：市场主导型停车政策的文献综述

规划研究

王德, 殷振轩, 俞晓天 / 用地混合使用的国际经验：模式、测度方法和效果

孙佩锦, 陆伟, 刘连连 / 促进积极生活的城市设计导则：欧美国家经验

赫磊, 戴慎志, 解子昂, 陈琦, 胡群芳, 刘飞萍 / 全球城市综合防灾规划中灾害特点及发展趋势研究

齐君, 董玉萍, 提姆·汤森 / 可供性理论在西方环境规划设计中的应用与发展

秦波, 陈筱璇, 屈伸 / 自动驾驶车辆对城市的影响与规划应对：基于涟漪模型的文献综述

实践综述

朱静宜 / “自由之境”的自由与规则——荷兰奥斯特沃尔德“法治规划”实践研究

专题研究

万涛, 吴纳维 / 英格兰乡村保护委员会及乡村保护运动

运迎霞, 马超 / 美国国家备灾框架研究及相关思考



2019年 第6期

日常都市主义现状

玛格丽特·克劳福德 著 陈焯 译

摘要：“日常都市主义”这个概念涌现于一个特殊的环境，源于我们自身对洛杉矶迷人城市景观的日常体验。洛杉矶不断地被居民以新的方式重新居住、重新创造——人们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参与其中，挑战作为设计专业人员和学者的我们。周围城市生活的活力，加剧了我们对主流城市设计话语局限性的不满。无论从事规范的专业实践还是前瞻性的策划，城市设计师似乎常常无法欣赏周围的城市，对居住其中的人们也几乎不感兴趣。相反，他们主要以抽象和规范的方式认知城市。我们将“日常都市主义”构想为一种将城市研究及设计、普通人和社会意义重新联系起来的新方法。本专辑希望能在中国打开一个讨论日常都市主义的空间。与其他城市设计学派往往将某种特定思潮设定为目标，然后创建一种方法来不断强化这种世界观不同，日常都市主义欣然接受生活的多样性。

引文格式：玛格丽特·克劳福德. 日常都市主义现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6): 1. DOI: 10.22217/upi.2019.506.

日常的输入

龙元

摘要：城市中存在着日常与非日常两个相辅相成的世界，非日常领域的扩张导致日常的压缩，生存的场所和家园毁坏，城市趋于同质、封闭和孤立。日常世界原本是丰富的、复杂的，更接近存在的本质，日常和非日常之间也不存在清晰的边界。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条件下，有必要通过日常的输入和日常的设计，构筑共享和连接，重塑城市空间的社会性和公共性。

关键词：空间；日常生活；本质；共享；城市设计

引文格式：龙元. 日常的输入[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6): 2-5. DOI: 10.22217/upi.2019.507.

城市是由日常与非日常两个世界构成的，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资本与权力欲望下的大规模现代城市开发和再开发，与力图摆脱刻板和平凡日常的普遍社会心理及欲望一拍即合，上演了一部非日常世界的、急剧扩张的时代大剧。但是离开剧院，我们还得直面另一个现实：到处都是“普通城市”（generic city），都是同质、封闭、孤立的高楼和异化而虚幻的空间，每个人都在成为自己城市的观光客和购物者，市民被从日常生活中连根拔起，在地的历史性和场所感消失，日常空间的经验被忽视，社会紧张与分离加剧。

现实促人反思：为何非日常世界让人分离？什么是日常？日常生活对城市到底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

海德格尔、列斐伏尔等哲学先知们早早开启了对人存在意义的扣问和对日常生活的观照。日常虽

然平凡、琐碎、单调、重复，却被视为现代文化和社会的关键舞台，有潜力成为创造性抵抗和能量释放的场地。日常生活是人的存在方式、认知、个性及意义的安放之处，人的日常聚集赋予城市空间以秩序和连续性的基础。对普通人而言，比非日常空间所带来的短暂刺激和快乐更重要的，是日常空间持久的包围和温情。所以现代主义的英雄般“建筑”中反而难觅日常生活踪迹，普通的“房子”里恰恰时刻上演着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即便是非日常空间也开始出现借用日常生活场景去取悦大众的新苗头。由此可见，空间的本质存在于日常之中，回归日常就是回归本质。

不幸的是，专业精英们可能已经基本丧失了发现日常、解读日常、欣赏日常的能力。我们不仅要仰望星空，还要关注市井生活。

现代人对日常生活的经验是辩证的，人类需求

中永远存在着两重性：人们努力逃离日常又时刻期盼着回归日常，在寻找他乡乌托邦的同时忍受着乡愁之痛。其实，日常和非日常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清晰的边界，两者间存在相互运动和动态融合。现代的非日常是过去的日常，自己的日常成为他者的非日常；在这两种不同的时空中穿梭往返并保持平衡，也许是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和基本需求。在当下这个非日常趋于饱和的时代，城市需要反思日常的价值，需要日常的输入。纽约高线城市公园和首尔清溪川再生改造都是拆除机械的工业化地标，将空间还原为市民日常生活场所的经典。而上海、成都、广州等城市自下而上的社区营造、居民参与多方合作的

微改造等，则可以视为在中国特定社会背景下回归日常的宝贵探索。

城市设计是日常性的计划而不是摆脱日常的惊奇喜剧，日常固然平凡，却埋藏着复杂性和丰富性，包含着惊人的美丽和愉悦。所谓非日常，往往也是日常的集合与延伸。本文提倡建立一个共识：通过切入日常的细微处并把握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在日常中创造非日常，在非日常中体验日常，在日常与非日常的共享和连接中，追求空间与空间、空间与身体连接的欢乐，获得丰富的城市体验，实现空间的社会性、公共性和地域性。

日常都市主义理论发展及其对当代中国城市设计的挑战

陈焯 玛格丽特·克劳福德

摘要：现实中的城市设计是渐进的，其形式在城市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的过程中呈现。当代中国城市设计的技术理性框架源自早期西方城市形态学理论，经过多年实践，在管控方法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然而区别于技术理性，西方城市设计中人文内涵的意义表达和创作一直未能得到实质性的关注，导致设计一味追求纯粹、抽象的概念，与丰富、具体、多样的现实生活形成巨大反差。这也成为中国城市设计的一个基本矛盾。针对这一点，“日常”与“都市主义”这两个词——一个普通常见，一个抽象晦涩——被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通过城市生活来接近城市设计的新起点。本研究结合文献分析和实践案例调查来探讨日常都市主义在美国的发展和在中国实践的现状，试图将日常都市主义理论与中国城市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结论指出中国蕴含了大量而丰富的日常实践知识库，这些知识远远超越现有专业技术知识的研究范畴，值得欣赏和分析。日常都市主义是对当前中国城市设计框架的补充，为现有城市设计提供灵感的同时也提出了新挑战。

关键词：日常都市主义；城市设计；城市人文；日常生活；公共空间

引文格式：陈焯, 玛格丽特·克劳福德. 日常都市主义理论发展及其对当代中国城市设计的挑战[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6): 6-12. DOI: 10.22217/upi.2019.508.

现实中的城市设计是渐进的，是城市经济、社会、文化活动过程中所呈现的形式。当代中国城市设计的技术理性框架源自早期西方城市形态学理论，经过多年实践，在管控方法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然而区别于技术理性，西方城市设计中人文内涵的意义表达和创作一直未能得到实质性关注，导致设计一味追求纯粹、抽象的概念，与丰富具体、多样的现实生活形成巨大反差，这也成为中国城市设计的一个基本矛盾。针对这一点，本研究

剖析了日常都市主义理论在美国的发展和在中国实践的现状。“日常”（everyday）与“都市主义”（urbanism）这两个词，一个普通常见，另一个抽象晦涩——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通过城市日常生活来接近城市设计的新起点。它区别于早期库克（Cook）、林奇（Lynch）、本特利（Bentley）、威尔士（Wales）亲王等依据其视觉和体验展开的城市设计，也不同于新城市主义实践者寄希望于以回归传统来解决公正问题的“社区混居”规划模式，更不

同于因日益脱离公众而屡遭失败的后现代都市主义。直至1999年由约翰·蔡斯(John Chase)、玛格丽特·克劳福德(Margaret Crawford)、约翰·卡利斯基(John Kaliski)所著的《日常都市主义》出版,日常都市主义、新城市主义、后现代城市主义共同构成了西方对现代城市设计的批判路径,回应了政治经济导向下的美国城市化问题。这三种城市主义学派分别代表着城市发展的必经阶段和固有的几种类型——非正规地方的、正规经典的、前卫革新的,它们分别激发了人们对于人文、传统文化以及差异的关注。

对“日常”概念的理解可以从以下三个基本维度展开:(1)平凡和现代的二元关系下潜在维度的挖掘;(2)差异性和模糊性的呈现;(3)时间的动态切换。但列斐伏尔又警告我们日常生活的本质是模糊性,它难以被解读。日常生活的实践场所常包含多主体的参与;没有固有边界,可通过适时的积累重组操作;是重复性潜在意识活动,可通过行动进行呼吁。尽管如此,美国已有大量的相关实践经验,中国更是有着大量且丰富的日常实践的知识库,这些知识远远超越现有技术专业的研究范畴,值得我们城市规划设计者关注、欣赏、分析。从“上

帝视角”转向“蚂蚁视角”,基于人本主义的城市设计要求其能反映城市在地域文化、风土民俗、生活习惯上的差异,而这些内容如何通过城市设计实践来完成,需要我们加强对日常都市主义的理解。

日常都市主义是对当前中国城市设计的重要补充,可为现有的城市设计提供灵感,同时也提出了新挑战。在中国,本研究的目的不是简单地指向一项学术研究或评论工作,而是希冀借此发出对城市行动的呼吁:理解在过去和当下一直以矛盾的、不稳定的方式发生,至今仍未定形甚至难以察觉的空间类型,接受视觉的“无序”性;积极面对被社会行动和被社会想象力激活的空间。从这一点来说,日常都市主义可能比其他任何形式的当代城市主义都更有远见,因而也更加迫切地需要被引介,尤其是通过对空间“人文”的关注,在实践创作过程中寻找设计项目的特殊含义并为使用者赋权。这需要设计者发挥人的能动性,在中国找到比现有的城市设计方法更为灵活的实施机制,允许其在一些地方不受限于原有规划、建筑形式、条例等规范性规定。因为当代中国城市设计所发生的一切故事都告诉我们,灵活性和模糊性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运行的根本需要。

大地之上:基于人的尺度的图绘

何志森 著 杨薇芬 译

摘要:传统地图作为一种客观的传统表现手法,抹杀了场所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文章通过对一些学者和艺术家作品的讨论,分析了图绘作为一种可替代的场地表现方式在当代复杂的语境下遇到的问题,并归纳了两种自下而上的图绘方法——近距离观察和跟踪。通过这两种图绘方法,我们可以对场所产生更为系统化的、跨越边界与尺度的理解,并帮助建构出场所与场所之间新的关系和连接。

关键词:图绘;人的尺度;日常;自下而上;近距离观察;跟踪

引文格式:何志森.大地之上:基于人的尺度的图绘[J].国际城市规划,2019(6):13-20. DOI:10.22217/upi.2019.509.

在已有的城市设计和空间地理相关文献中,任何地图都是对现实的抽象描述,是场地现有或可见元素的汇总。地图简单地把一个时间段发生在某个地块上的变化和活动概括为一套传统意义下标准的图形符号。这样的地图没有能力反映日常生活和个人的空间经历,往往也和最后的设计没有太大的

关联。

与客观描述场地可视元素的地图不一样,图绘(mapping)是一个发掘场地的隐藏特征并且真实呈现我们所居住的日常生活空间的过程。它强调的是从看见和注意,到发现和介入的过程的形成,并为设计师提供了一种通过层层挖掘场地复杂性

和丰富性来理解场地真实特性的方式。同时，图绘的过程也在揭示和可视化聚集于一个日常空间里的各种无形力量，而这些力量正好勾勒出了一个丰富和杂糅的现实生活图景。所以如何进行图绘，也反映了今天建筑学的表现技法面临的一个挑战——如何让图纸或者电脑里抽象的图形符号更有广度和深度地呈现我们身处的日常空间以及空间内的生命。

笔者于 2018—2019 年间在香港油麻地长期跟踪了 35 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发现大部分老人为了可以每天走更长的路，都收藏着一张油麻地社区的“凳子地图”。在地图上清楚地标有凳子的位置和凳子数量，如果没有凳子的地方，老人会在那里放置一张凳子并用锁拴住。而这些凳子就变成了老人行走在这个社区里的小小“加油站”。作者观察到，老人一般走 5 分钟休息 5 分钟。很多时候，凳子多的地方聚集了更多休息的老人，凳子变成了一个微观的邻里交流点。

图绘推动者之一的景观设计师詹姆斯·科纳（James Corner）指出，图绘的目的是发现和构建离散事物之间的隐形关系，进而产生新的社会空间组织体制，而不仅仅是由此生成的一张地图。问题是，习惯自上而下解读世界的科纳怎么能够捕捉场地里这些不可见的微妙关系？带着对科纳的质疑，我开始探讨如何通过“跟踪”（following）来可视化这些分布在巨大城市系统中的各空间之间的关联性，以及人在空间营造（place making）中的参与。当以人的尺度观察城市、空间以及人的生活时，制图者可以更好地记录空间内随时可能涌现的关系。

如果说观察发生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那么“跟踪”这一图绘方法进一步摆脱了场地物理边界的限制。换句话说，“跟踪”是某个时间周期里的连续观察。随着时间的推移，意想不到的事件会经常发生，有助于制图者解读被跟踪者以及他们不可预知的活动。偶然性因素在跟踪中是很重要的。

为了进一步讨论偶然性因素，我借助了情境主义者居伊·德波（Guy Debord）所提出的“漂移”（dérive）这一概念。漂移的目的是通过连续观察来解读城市，而不是仅仅依赖对空间、建筑及其功能等诸如此类的先入为主的概念。在漂移的过程中，

行走者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欲望和意识是如何被不同空间所吸引或者抵制的，这些感受引导着行走者漫无目的地、随机地漂流过一个地方。换句话说，漂移是一种没有特定动机（agenda）的空间参与和实验行为模式。

然而，与德波眼中的“漂移”相比，我对“跟踪”的理解有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跟踪有一定的目的或特定的动机。跟踪这一行为的中心始终存在一个目标对象，而跟踪者的工作是长时间的观察、记录、整理、筛选、分析、发现和呈现。跟踪一定会带来偶然性和意外，但其主要目的是理解一个特定的人或物是如何与一个由各种碎片、人群和日常事件形成的更大的城市网络之间产生关系的。

2017 年新年前夕，笔者在 6 个礼品盒里安装了微型跟踪仪，并把这 6 个礼品盒分别送给了即将回家过年的 6 位亲戚。在福建县城的新年习俗里，到亲戚家拜年不能空手，礼品盒经常是用为拜年的必需之物。收到礼品盒后亲戚也很少会打开礼品盒，而是立马转送给下一位来拜年的人。借助跟踪仪，笔者开始记录 6 个礼品盒在 2017 年整个春节期间“被转送”的次数和它们悲情的一生。

在跟踪过程中，跟踪者需要时刻面临尺度的转换——从在人的尺度（scale of body）上近距离观察事物，到以一个更大的尺度，城市尺度（scale of city）理解被观察的事物与其所在的场所、城市乃至国家之间的关联，这种转换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个跨越场所的角度理解一个很微小的物体是如何逐步影响城市里不同区域及区域内人的生活，而并不被所谓的“建筑红线”或场所的物理边界所限制。

许多当代艺术家也经常把“跟踪”当成一种参与到公共空间的在地创造。他们跟随的对象可能会因他们的动机或目的而有较大差异。透过跟踪这些日常生活中微小普通的事物在空间中的活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城市空间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以及普通人如何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反抗权力的规训。这些艺术家像街头游荡者一样生活与工作，将自己的创作代入到当下日常生活的语境，利用自己独特的叙事方式和他人的经验重新绘制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空间领域。而这种重新绘制（remapping）最终导致了新地图的形成。

因此，跟踪的目的不仅仅是绘制被跟踪对象及其活动的地理范围，还可以揭示隐藏在这个地理范围内的关联和关系。这一行为可能帮助制图者创造一幅从未被绘制（unmapped）的或者不可绘制（unmappable）的地图。另外一方面，跟踪地图应该既是故事叙述性的又是可被操作的。“跟踪”作为图绘的一种方式，其扩展了一种能够使不同事物融合在一起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跟踪可以为个人体验指明方向，并使其直接参与到被跟踪者变化的场所和生活环境里。它可以从对单个对象的个人解读中跳出来，转向对城市和日常生活的更系统的解读。它全盘理解地点、人物、事物、日常事件关系的特殊性，是对传统制图术霸权的挑战。

笔者于2018年6—12月期间在香港油麻地跟踪警察，试图透过警察的视角和巡逻路线描绘不一样的城市地图。通过跟踪，笔者观察到警察巡逻时经常穿过屋顶天台、地下通道、无名小巷、私宅的后院、不正规集市等法规地图上无法标记的地方；而这些本来相互毫无关系的场所通过行走（walk）不断使用和互动，形成了警察眼中的油麻地地图。

如何呈现跟踪过程及其所产生的新关系？正如科纳所指出的，这需要制图者在传统建筑表现之外寻找一种新的图形标记和符号。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发明和创造新图形语言的时代。但不管怎样变化，图绘最终的功能不能只作为一种安全可靠的情报分析手段，而是尽可能地成为一个可以进行批判性对话和真实体验的舞台。在这种理解意义上，制图者扮演了一位社会活动家（social activist）的角色。

以上提及的“跟踪”这一自下而上的图绘方法显然已经超越了常规的建筑学表现，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仅仅是汇总场地内现有或可见元素的地图。这种移动的图绘方法的重心是为制图者（或设计师）创造一个从一开始只是看到（look at），到注意到（notice），到看见（see），到发现（discover）和呈现（represent），最后到介入（intervene）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种过程可以让设计师更好地通过“现场破案”的方式来层层挖掘场地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也为设计师发掘场地的隐藏特征并真实呈现我们所居住的日常生活空间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手段。

泉州美丽古城家园共造：人本主义城市化范式的底层设计

刘昭吟

摘要：基于实践者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作者试图在实践中研究和构建社区营造对于城市化范式转移的意义及社区营造的范式化挑战。相对于资本导向或政商联盟的城市化范式，作者认为社区营造是人本主义的城市化，是“使有温度、有责任心的市民产生和再生的‘底层设计’”。受惠于托马斯·库恩、皮埃尔·布迪厄和克里斯托夫·亚历山大的启发，作者指出社区营造是在“自上而下”命令式城市化范式的危机下寻找“自下而上”的契机。但其实践的真正挑战并非来自于意识，而来自于习性这一身体化实践逻辑的自动性和固执性，因此实践者创造“开始的开始”路径使新习性脱胎于旧习性，并通过制度化使新习性得以重复练习而固化。社区营造从社会实验到城市化新范式候选者，城市规划是首个回应的学科领域。作者提出赋能是城市规划新理论、新技能的关键内涵，并且是降低范式化内在矛盾的出路。

关键词：社区营造；范式；实践；习性；底层设计

引文格式：刘昭吟. 泉州美丽古城家园共造：人本主义城市化范式的底层设计[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6): 21-26. DOI: 10.22217/upi.2019.511.

作为“日常都市主义”专辑的组成成分，《泉州美丽古城家园共造：人本主义城市化范式的底层设计》一文的书写有意是个实验——使写作本身反映“日

常都市主义”特性。根据已知的为数不多的读者样本数，社会学背景读者比较欣赏我的写作实验，城市规划背景读者则评价不知所云而堪称实验失败。

要向读者解释我究竟在做什么实验，首先必须提出我理解的“日常都市主义”是什么。我打算跳过玛格丽特·克劳福德（Margret Crawford）基于空间生产视角的权威性定义，回归社会学领域关于“日常”和“都市主义”的基本认识。就我的理解，“日常”是社会学本体论的主要研究内涵，即日复一日的重复行为形成的时间—空间—社会这一三角结构的本质是什么。关于日常重复行为的理论，我深受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吸引，因为他的重复行为分析中闪耀着主动行动的光芒与挑战，犹如地质层积淀的稳定结构中透着隐隐躁动的地壳能源。布老指出日常的重复行为的实践逻辑有一连串的效应：重复行为—习以为常—行礼如仪—身体实践胜于大脑追问—无意识主动迎合支配目的一不识一去历史—日常魔法，而社会学的使命就在于对日常魔法揭秘除魅。另一方面，最早界定都市主义的大概是芝加哥学派的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那篇著名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沃老提出，都市是一种社会实体，因此都市社会学值得作为社会学的一个领域，从人口规模、居住密度、异质程度等面向，研究城市化背景下的家庭、人际关系、习俗、种族、社会流动、集体心态等群我关系的社会学大哉问，此即研究都市生活方式。

从这两位学者的视角来思考“日常都市主义”一词，我倾向于在找到普遍性定义前，先放在特定历史和地点的脉络中来界定。即：中国城市化脉络造就了何种日常生活方式？日常都市主义的提出具有何种进步性？过去 20 年我们经历的国家公司主义的快速城市化，使得与城市开发有关的行业都成为了“风口上的猪”，最为典型的是房地产商只需吹嘘梦想无需真做即可达到利润最大化。这样的一种城市发展方式也对我们的生活方式起到一连串效应：忽悠—空手套白狼—三角债—无契约精神—言行分裂—形式主义。那么，当日常都市主义（或

社区营造作为一种日常都市主义）提出时，它必须事关伦理，而不仅是一个中性技术，更不应是一种巧言批判。

基于对当前都市主义的批判，基于日常都市主义的语境，我将社区营造界定为：人本主义的行胜于言的城市化生活方式。人本主义对立于资本垄断和权力支配，意图追求体现为“有温度有责任心市民”的公共性；行胜于言对立于忽悠和象征操弄，并且唯有行、显化人本主义的行，才有重建日常美好的可能。

由于“行”之于日常如此重要，又由于布老提醒我们行的无意识本质，改革性的社会行动便是除魅—重建—除魅—重建的循环往复。这意味着，行动即是当下——不可逆、不可测、瞬时即过的因缘和合。与行动的当下性相对立并形成挑战的，是日常实践的身体记忆的持存性，这正是我在泉州社区营造中的最深体察，也是我试图作为该文探讨的主题。再者，研究对象的实践逻辑值得被客观分析，而当我既是研究者也是行动者时，当写作本身也是一种行动时，我如何通过写作策略使作者—行动者的“行”跃于纸上？这是我在该文中有时刻意采用第一人称的原因。基于同样的理由，我甚且刻意回避理论回顾，既不在理论脉络中考据理论，也避免滑入去历史的理论对话；而是在行动脉络中以行动为论述主题，引用我喜欢的理论来支撑我对于行动的阐述和分析，使既有理论成为行动的养份，从而诱发在地理论之育种。

把作者—行动者的主体性显露出来，是我起笔提到的“使写作本身反映‘日常都市主义’特性”的企图。但也许，凡是带有自省性的文字都免不了具有呓语性质——在此出版之际，时间导致的自我距离终于使我自己成为读者时，我也觉得该文可读性很低——只能自我安慰：手艺人的用心之作至少具有彼时之当下价值吧。

消极规划：直面城市加密的日常生活

吴文媛

摘要：城市规划是对当下的干预，建成区更新自不待言。即便农业用地或荒地的城市化开发，也不能忽视

过去的日常状态所积累的人地关系，并需警觉现在的干预对未来日常使用所造成的积淀作用。基于此，作者通过城市实践案例的比较研究提出“消极规划”，以回顾过去数十年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以“积极规划”为导向的先验原理，并以出发点现实导向取代愿景导向，总结实践提出“消极规划”应该被重新审视并作为资源分配的规划技术方法，提倡规划者应实事求是地直面规划蓝图达成过程中城市密度不断增加的现实。这个加密的过程是通过日常的社会文化、经济活动形成的，研究需重新思考规划在什么时候被需要的问题，其具体实践可通过四个操作性原则完成：存在优先原则、维护成本优先原则、端源解决问题优先原则、弹性优先现状原则。究其根本，“消极规划”提倡以实事求是的追问精神直面不可回避的两大主题：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分歧与共识。

关键词：积极规划；消极规划；存在优先；出发点导向；城市密度；社会连接

引文格式：吴文媛. 消极规划：直面城市加密的日常生活[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6): 27-33. DOI: 10.22217/upi.2019.514.

街边市场的多目标协同规划治理：以美国波特兰街边市场建设为例

陈焯 袁涛 杨婕

摘要：街边市场以基本相似的临时流动形式充斥在全球的每一个国家。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770 BC—221 BC）的著作《周礼》中已有关于“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的记载，街边市场的特定空间和社群延续至今有着中国自身独特的形式和内容，但其生存境地一直堪忧。尤其是近年在单一目标式管理方法下，对街边市场实行了大面积的“取缔、驱逐、监控”等相关政策，导致一系列的“社会冲突事件”频频发生，摊贩治理问题反反复复一直困扰着地方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本研究聚焦于美国波特兰政府以多目标协同规划治理的街边市场，以及以此形成的都市生活文化，发现波特兰街市治理背后无不体现了其城市政府开放包容的价值观。结论指出，城市公共空间的管理政策需要更大的弹性和包容性，重新评估中国现行管理实施效果，而这首先需要肯定街边市场在城市发展中的意义，寻求地方政府多部门协同规划治理的系统整合方法；其次，公众应该关注草根街市文化。

关键词：街边市场；波特兰；摊贩；协同规划治理；草根文化；食物车

引文格式：陈焯, 袁涛, 杨婕. 街边市场的多目标协同规划治理：以美国波特兰街边市场建设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6): 34-40. DOI: 10.22217/upi.2019.515.

本研究缘于作者日常生活中对街边市场的观察以及对长沙市城市管理部门的多次访谈。一方面，大部分长沙市街边市场面临着“日日驱逐式”和“运动型管控式”的被管理挑战；另一方面，因未形成长效的城市治理机制，城市管理部门疲于应对，城市管理仅从视觉上取得了短期“成效”，管理部门也面临着巨大的工作挑战。与国内现状完全相反，作者在美国研究工作期间发现波特兰街边的食物车井然有序，欣欣向荣，其城市虽小但连续多年被评为“美国最宜居的城市”之一。相比美国其他以移

民为主的都市，波特兰市的常住人口以白人为主（据统计 2018 年波特兰的常住人口有 77.4% 是白种人），其人口结构与中国相似，因此，区别于美国其他城市多种族和国别的治理经验，波特兰的城市管理经验对人口背景相对一致的中国极具借鉴意义。

在梳理国内外关于街边市场治理文献基础之上，本研究以波特兰个案的方式推进，结论指出，波特兰街边市场是地方政府多部门协同治理的结果，其治理目标主要有三个部分：食品安全、经济

发展和特色社会文化的培育。为此，波特兰政府将食物车治理各阶段的具体责任落实到对应的职能部门，并开放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管理平台，为食物车主提供可靠、便捷的服务，既规范了食物车行业，也降低了其从业门槛。另外，政府管理部门的日常执法也是“弹性”的，在保证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等底线不被突破的前提下，会对食物车主的一些“小违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时，以居民投诉为导向进行的执法激发了食物车主的主观能动性，在无形中促进了邻里的和谐。

波特兰的食物车治理经验中，最具特色的是普通市民的积极参与。波特兰草根文化熏陶下产生了很多食物车爱好者，他们自发建设食物车网站、自费出版食物车书籍、积极向外宣传食物车等行为，大大提高了食物车的知名度，带动了学校、商场、社会组织、媒体等不同机构和个人的参与，形成了

一个社会共治的局面，从而逐步形成了特色的食物车文化。如今波特兰被称为“食物车的天堂”，食物车集聚区内的特色食物与环境吸引了众多游客，食物车集聚区被列入波特兰旅游必去的景点之一，成为波特兰的城市名片。

波特兰的食物车治理经验对中国的摊贩治理主要有以下两点启示：首先是要尊重底层营造的街市文化，以保护特色文化的心态尝试对其进行治理，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形成社会共治的局面；其次是政府管理部门需改变治理思路，将以往的单一目标式管理转变为多目标协同式治理，以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提升为治理目标，梳理不同地段、不同摊贩点的利益相关部门，由此将街市治理中的具体职责有针对性地赋予相对应的部门，制定协同规划治理程序、流程和细则，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精细化街市治理。

城市革命：一个理论概念的嬗变研究

李丽梅

摘要：自 20 世纪早期城市革命作为学术概念提出以来，其内涵经过跨国、跨科学家的论述不断发展充实，已成为城市研究核心概念之一。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于 1930 年代首先提出城市革命概念；1970 年代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的《城市革命》出版，预言性地提出全面城市化和星球城市化的理论与远景；美国地理学家大卫·哈维在列斐伏尔所论城市权利和城市革命的基础上，分析在 21 世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城市革命作为实现城市权利的手段和实践意义。本文综述三位学者对城市革命里程碑式的定义与论述，比较三者的联系与区别、继承与发展，梳理城市革命理论概念的历史脉络与演变，并提出当下亟须中国城市发展经验证据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城市革命理论。

关键词：城市革命；新马克思主义；柴尔德；列斐伏尔；哈维；批判城市理论

引文格式：李丽梅. 城市革命：一个理论概念的嬗变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6): 41-48. DOI: 10.22217/upi.2019.016.

联合国在《世界城市化展望》报告中宣布 2007 年人类有史以来世界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人类社会第一次进入城市社会，世界成为城市的星球，21 世纪是第一个城市世纪、城市时代，此后，城市革命一词频繁出现于媒体报道和流行读物，被当作现代化政策和城市增长战略的宣传口号，然而多数文章中却只字不提城市革命的来源与含义。在学术研究中，研究者常用城市革命指代不同区域快

速城市化现象，例如中国、印度、非洲和拉丁美洲等。

但城市革命最初含义并非如此，自 1930 年代考古学家柴尔德首次提出城市革命以来，经过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和在美国任教的英国地理学家大卫·哈维的不同阐述，发生了数次变迁，城市革命理论内涵和外延极为丰富，因此有必要对城市革命学术概念产生发展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批判性研究

其理论嬗变，并探讨它对今天城市研究与实践的意义。

1 谁最早提出城市革命？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城市革命一词最早由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Childe, Vere Gordon）1930年代开始使用。他所著《人类创造了自身》（*Man Makes Himself*, 1936）和《历史上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1946），均用“城市革命”作章节标题，将其作为划分人类文明发展历史阶段的标志之一。

1950年柴尔德在《城市规划评论》（*Town Planning Review*）发表论文《城市革命》，正式定义城市革命，归纳早期城市区别于农村的十个特征，奠定了现在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最根本、意义深远的社会转型的认识。

柴尔德提出的城市革命概念使用至今，成为所有关于早期国家和城市发展研究的基础。城市革命继而被其他领域包括哲学、社会学、地理学以及批判城市理论学者使用，对城市革命内涵的解释和应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2 列斐伏尔论城市革命

1970年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的专著《城市革命》出版，从三个层次阐释城市现象：城市本质、城市实践和城市革命。其英译本迟至2003年问世，对英语世界城市研究的影响在21世纪方才徐徐展开。

列斐伏尔的“星球城市化”预言直到最近才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现实，今天读来比四十多年前出版之初更有现实意义，对当前城市理论争辩、实证研究和城市实践的指导尤甚于前。这本专著启发了四十多年后城市研究的范式转移，并且持续为城市研究提供理论源泉，难怪卡斯特尔称列斐伏尔“可能是最伟大的城市哲学家”。

3 哈维论城市革命

1973年哈维的《社会正义与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出版，他对柴尔德城市革命相关论述进行批判性分析，并与列斐伏尔对话，比较彼此观点异同。哈维在该书末尾写道：“建立在剥削基础之上的城市是历史遗留。真正人性化的城市尚未形成。需要革命性理论，指明从基于剥削的城市

走向适合人类的道路；同时还需要革命实践，才能实现这种转变”。

2012年哈维的《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Rebel Cities: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出版，从列斐伏尔城市权利与城市革命理论出发，分析在21世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城市革命作为实现城市权利的手段与实践意义。哈维把城市权利作为动员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根本口号，建立不同的社会关系，改变与自然的关系，改变思考与生存的方式，从而“在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废墟上，集体地建设社会主义城市”。

本文述评城市革命概念近百年历史演变和学术嬗变，分析比较柴尔德、列斐伏尔与哈维三位学者对城市革命的论述。三位论述城市革命的学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绝非巧合。革命指突然的、激进的、彻底的改变，可以是政治组织、社会经济状况、观念或行为偏好的彻底改变，改变方式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非暴力的。

考古学家柴尔德最早提出城市革命，所论城市革命面向史前史，在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历史脉络下，用城市革命研究城市的起源、最早城市和早期国家的特征及其对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意义。列斐伏尔《城市革命》英译本正文和注释均无迹象表明列斐伏尔引用柴尔德，而列斐伏尔似乎是独立阐发城市革命的涵义。哈维明确引用、讨论并批判了柴尔德和列斐伏尔所论城市革命，补充阐述城市权利与城市革命的当代涵义。

城市革命经过柴尔德、列斐伏尔和哈维的论述，从考古综合到立足全球现状、指向未来，从理论到实践，从愿景到行动。革命的含义从比喻，到理论阐述，再走向实践。城市革命既是人类社会制度与组织根本性变迁的标志，也是人类社会变迁的手段。

三人所论城市革命都强调城市与城市化对于人类历史变迁的重要性，不过他们阐述的城市革命含义各有侧重。柴尔德的城市革命特指人类历史上最早城市的出现。列斐伏尔与哈维所论城市革命立足现在，指向未来，预言和探索区别于资本主义城市的另一种可能。

三人都关注城市化在人类历史变迁中的作用，但各自关注的时间节点不同。柴尔德受工业革命一

词启发，提出城市革命，农业剩余孕育了最早的城市。列斐伏尔与哈维都采用马克思的工具研究当代城市性。若按柴尔德的分析思路，列斐伏尔所论城市革命，应该属于第四次革命，从工业社会走向城市社会。换句话说，列斐伏尔提出了城市革命 2.0 版本，城市革命不仅以 1968 年巴黎五月风暴为出发点，更指向世界城市化的快速增长与转型，彻底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哈维把城市权利与城市革命结合起来，指出城市权利是目标，城市革命是手段，强调城市的革命潜力，号召通过斗争建设不同于资本主义城市的城市世界。

城市革命理论标志着批判城市理论的转折点，

打开思考城市的新思路，留给城市研究的遗产是指导实证研究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列斐伏尔和哈维的理论对城市化开始较晚、但正在快速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性有待深入探讨。因此，将城市革命理论应用于城市实证研究，置于不同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脉络之下，赋予新的维度，进行新的诠释，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

列斐伏尔的《城市革命》出版将近五十年，中译本《都市革命》姗姗来迟，应用列斐伏尔的理论检视中国城市革命现实将成为一个研究热点，甚至引领中国城市研究的革命。中国为发展城市革命理论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城市世界样本。

“过渡使用”在国内外的的发展及相关研究——一个城市研究的新视角

杨舫

摘要：我国城市已迈入存量更新阶段。在土地复合利用、存量更新研究、管控城市危机等方面，过渡使用的研究可以提供新思路，开拓新方向。文章首先梳理了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的过渡使用发展和研究状态；并比照欧洲城市例举了部分上海的过渡使用案例，梳理了国内常见的过渡使用类型及其相关研究。在此基础上，文章总结过渡使用的概念、特征和机制：将过渡使用定义为一种空间使用方式，时间上，它发生于某处空间原初设定的使用方式向新使用转变的过渡阶段，其活动类型没有明确界定，不一定与原初或新使用方式相关，且常处于法规的模糊地带；其特征包括临时性、不稳定性、空间空置状态；其发展机制取决于过渡使用价值与被使用空间预期价值的对比。文章最后总结了中国语境下过渡使用研究的意义及其必要性。

关键词：过渡使用；概念；特征；机制；城市设计；城市规划；方法

引文格式：杨舫. “过渡使用”在国内外的的发展及相关研究——一个城市研究的新视角[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6): 49-55. DOI: 10.22217/upi.2018.094.

“过渡使用”(interim use, temporary use) 也被称为临时使用，它本质上是一种城市非正规现象。过渡性或临时性的界定标准不在于持续使用时间的长短，而在于使用活动发生之初就被视为临时的、权宜的、过渡的这一事实。该事实与使用活动自身的非预设性、不稳定性、行动者与使用者是否拥有使用空间的处置权这三方面因素相关。现实中，过渡使用不一定与空间场所的原初使用和未来新使用相关，且常处于法规的模糊状态。

尽管过渡使用是一种非正规城市现象，但它有别于传统的城市非正规性。后者通常聚焦于第三世

界城市的移民、贫民等社会边缘群体的临时性就业活动。然而，这一范式已经无法覆盖当今类型与属性更为多元的城市非正规性。萨斯基娅·萨森就曾注意到，北美和西欧有许多高级企业服务业有明显的非正规化趋向。类似这样的新城市非正规性与旧城市非正规性区别之处在于前者的存在脱离了基本的生存需要。

在西欧和北美，过渡使用已逐渐发展成一种城市综合管治、规划设计、社区营造的复合型城市发展工具，在创建城市品牌、激发城市活力、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过去三十多年间,认知—文化经济的兴盛为过渡使用向城市研究和实践主流演化创造了两方面条件:

首先,由于无法匹配新经济模式,旧的土地利用模式使得大量“等待从形式上明确定义的”空地出现。这些空置地给城市发展带来了尖锐的挑战,但客观上也为过渡使用活动提供了空间。1980—1990年代的热点议题,如“模糊地段”、“城市墟空”等反映出欧洲空置地问题的尖锐。

其次,新兴的专业阶层(创意阶层、文化工作者、软件开放者)的成长壮大导致弹性的工作—生活方式成为一种社会潮流,这种生活方式需要更为灵活的时空安排。对于经济发展而言,非正规化经济活动与消除经济管制正规措施的效果一样,但前者的成本更低。

在欧洲,随着空置地问题愈发激烈,民间自发的过渡使用逐渐被纳入正式的城市规划体系。德国是这方面研究和实践较为领先的国家。除去经济结构调整,两德统一这一重大政治事件对于过渡使用在德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之下,整个东德地区和原西德鲁尔区的发展呈现出收缩状态。为此,德国政府一方面利用国际建筑展(IBA),自上而下地推动临时性文化项目,促进鲁尔区的长期发展;另一方面,城市政府适度放宽了土地使用规定,鼓励所有者将闲置土地让渡给公共使用,鼓励文化创意工作者以过渡使用来激

活赋闲空间,以此达成发展城市创意产业、利用闲置土地、创建城市品牌的多重目的。这种利用非正规活动来激发城市活力的空间策略随即从相对滞后的前东德和鲁尔区扩展到相对富裕的南德地区和瑞士、奥地利等国家,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创新土地利用和空间管制模式。其发展大致经历了“潜伏—生成—发酵—稳定—批判”的五个阶段。

在我国,类似过渡使用的自发实践已有一定雏形。以上海为例,文化创意型、科技创新型、日常生活挪用型、环境改造型的过渡使用都已有所呈现。但与之相关的系统理论研究还不多。类似的研究集中在城市非正规性、存量规划、工业遗产与景观改造再利用、旧城更新等领域。此外,城市规划管理部门主导的实践多青睐实施难度不高、容易见效的微更新实践模式,比如上海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所推行的“社区空间微更新”。但这些项目多为政府主导,尚未建立吸纳自下而上社会自发能量的有效机制,这一点或许是区别于西方国家过渡使用的重要之处。

对于正在步入存量更新阶段的中国,研究过渡使用现象有助于创新城市空间使用,加强土地复合利用;有助于拓展存量更新的研究方向,创新城市规划和设计的方法与实践模式;也可为城市危机管控,丰富城市发展策略,塑造都市品牌形象,增强城市竞争力提供支持。

国外学生化研究评述及其对本土化研究的启示

孙洁 谷浩 余思奇

摘要:随着大学生数量大幅增长及其对城市影响日益提升,学生化正成为西方城市地理学的新研究主题。本文首先概述了学生化的概念,其次总结了学生化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学生化空间的类型、空间分布特征、学生化现象的产生背景与机制、学生化的社会空间效应以及应对策略。文章指出,学生化研究是从大学生空间消费的独特视角,透视当前城市空间重构中日益加剧的居住隔离和阶层不平等问题。最后,文章结合我国学生化研究的尝试,指出我国开展学生化问题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并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

关键词:学生化;学生聚集区;城市更新;居住隔离;阶层不平等

引文格式:孙洁,谷浩,余思奇.国外学生化研究评述及其对本土化研究的启示[J].国际城市规划,2019(6):56-62. DOI: 10.22217/upi.2018.453.

这篇论文受到学生化概念最早提出者——英国城市地理学者达伦·史密斯（Darren Smith）教授的直接指导。史密斯教授是拉夫堡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也是英国社会科学院士，他从事学生化研究十余年，并且多次受邀为英国教育部、议会和当地政府提供学生住房、移民等方面的政策建议，曾获得英国学术研究最具社会影响力奖。

——作者的题外话

高等教育扩张是 20 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应对全球化竞争的重要战略。高等教育扩张的一系列政策不仅直接推动了高等教育机构和大学生数量的大幅增长，而且间接推动了大学校园扩张、大学城建设以及城市更新。大学对城市和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但是大学生队伍壮大之后，造成所在地区房价上涨、社区失衡、季节性空城等消极影响也日益突出。由于西方大学多为开放式，并且学生多为走读，自由选择住处，因而校园与城市（镇）高度融为一体。学生在城市（镇）特定社区聚集，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文化、经济和物质影响。

基于此，2002 年英国地理学者史密斯提出学生化（studentification）概念，包括四个方面内涵：（1）社会角度看，流动、年轻、单身的社会群体取代或置换原有居民；（2）文化角度看，具有相同文化、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年轻人在空间上聚集，引发特定零售和服务设施的增加；（3）物质景观角度看，物质景观的升级或衰退；（4）经济角度看，房价上升、住房供需平衡改变，导致邻里租户和合租房比例升高，拥有产权住户比例下降。

在该概念提出之后，学生化研究在全球范围大量涌现，成为城市地理学研究新热点。学生化研究不仅揭示了由学生群体引发空间重构的内在机制，而且从大学生城市空间消费群体的独特视角，透视了当前越来越突出的居住隔离、住房商品化以及阶层不平等问题。

面向可持续的城市停车管理：国际比较与借鉴

刘倩 王缉宪 李云

摘要：对停车进行控制和管理已成为国际上普遍采用的限制小汽车使用的有效措施。本文从路径依赖的视

一般，大学生择居考虑因素有：价格便宜，靠近大学和（或）市镇中心，交通、生活与娱乐方便；并且学生会选择靠近同伴，尤其是留学生。因而城市（镇）中心区，大学校园附近社区，以及大学到市镇中心的主要道路两侧是最主要的学生租房地点。并且，这些地点具有自我强化功能。

学生化虽然是一种微观的社会空间演变现象，但却是一系列宏观结构因素转型的结果。可以将学生化的动力机制理解为西方国家产业转型需求、去管制化、市场化作用下，高等教育机构愈发企业家化，与新自由市场积极响应大学生住房需求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阶层分化、隔离与再生产的空间投影。

大学生在特定地区聚集，不仅对地区物质环境造成了直接破坏，而且学生住房需求的增长显著推高了地方房屋价格与租金。其次，学生群体的生活方式对社区原住民日常生活造成干扰，还导致盗窃、犯罪增多，甚至改变了地区文化。此外，学生化还造成学生与非学生的居住隔离，加深学生群体内部分化与隔离。

当前我国大学校园周边学生日租房、合租房、学生旅馆不断增多，并形成了季节性、非正规的住房租赁市场；并且在特定时期（假期、考试等）有明显的学生聚集现象，对地区租金、物价、环境、交通、治安等产生较大影响，严重威胁社区可持续发展。

我国开展学生化问题研究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需要引起重视。一方面，学生化研究可以作为分析校园周边城中村、老旧社区这些相对贫困化地区空间重构的独特视角，也为大学城建设和社区更新规划提供一种自下而上的批判视角。另一方面，大学生是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大学生的社会空间处境关系到未来中产阶层队伍的健康成长。从空间视角反思大学生受教育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地位，从一个侧面观察我国社会流动趋势，为高等教育体制制度改革提供依据。

角,对欧美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可持续停车政策的实施情景进行分析,归纳了“被动限制”“积极管控”和“限制拥车与停车管理一体化”等基本类型,并从“供给紧缩”和“精细管理”两个层面,详述了纽约、伦敦和香港的停车管理措施。结合国际停车管理的实践,并结合中国城市的特征,文章第三部分从停车共享、价格机制、停车供给和土地利用的互动三个层面讨论了中国停车管理改革的可能路径。本文对国际停车管理经验的介绍和讨论,对推动中国停车管理改革,促进可持续交通的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 停车管理; 交通需求管理; 公交可达性; 停车共享; 价格机制; 可持续交通

引文格式: 刘倩,王缉宪,李云. 面向可持续的城市停车管理:国际比较与借鉴[J]. 国际城市规划,2019(6): 63-69. DOI: 10.22217/upi.2017.466.

停车管理作为交通需求管理的手段之一,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率先进入机动化成熟(或饱和)期的欧美等发达国家(或地区),也率先经历了小汽车过快增长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比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早在1920年代的美国、1950年代的西欧、1960年代的日本和1970年代的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停车就已成为阻碍城市发展的最棘手问题之一,引发学术界的研究和关注。1970年代左右,发达国家逐渐转变停车管理思路,传统以“需求为导向”的停车政策受到批判。1980年代,随着新城市主义等思潮的兴起,交通和规划学者开始探索如何通过对停车的控制和管理,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和环境目标,以促进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的第一部分从路径依赖的理论视角,比较和分析欧美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停车政策演变的历程,总结和归纳了三个类型。

(1) 机动化背景下的“被动限制”(passive constraint)

以北美城市为代表,在机动车拥有率已达到60%且居民已经对小汽车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强烈的环境和心理依赖的背景下,停车政策的转变面对各种阻碍。而在1970年代之前,美国充分停车供给的政策,事实上造成了大量土地的浪费和停车位过剩,这种充分停车供给形成的不适宜步行街区在迪拜也非常明显。因此,1970年代后,美国一些城市开始规定最大停车配建标准,或降低原有的最低配建标准,并鼓励片区的协同及车位共享,以及转换停车场用地性质等,旨在解决车位过剩带来的资源浪费和环境问题。在价格管理上,取消居住建筑车位捆绑租售,取消由企业提供的停车补助等,旨在将停车成本外部化,使公众逐渐改变“停车是政府必

须提供的免费公共物品”这一传统认识。

(2) 在机动化初期进行“积极管控”(proactive management)

与北美城市相比,欧洲城市停车政策演化的最大差异应该源于城市形态。1960年代之前,大多数欧洲城市与北美城市一样,努力增建更多的路外停车场,试图缓解车位供给不足的问题。政府允许机动车免费停放在公共广场、人行道及任何可用于停车的场所。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欧洲城市平均的机动车拥有率仅为8%,小尺度的历史街区、城市中心等更适合步行或非机动车使用的场所被少数机动车使用者占用,很快引发社会反思。因此,很多欧洲城市(尤其是老城和历史城区)并未经历因单纯增加供给进而过剩的阶段,反而是利用供需矛盾,将中心区的机动车水平控制在城市形态和交通容量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尽管在供给的具体措施上,欧洲城市和北美城市的差异不大,但其背后的逻辑明显不同。前者是以保护城市历史形态和重塑社区活力为出发点,以停车供需矛盾为契机对机动车使用进行的积极管控;而后者则是面对因长期需求导向带来的绝对过剩,而不得不进行的避免资源浪费的供给紧缩。

(3) 限制拥车与停车管理一体化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新加坡、东京和香港这三个城市受到空间资源限制,城市政府在一开始就认识到高密度的城市发展难以承受完全机动化导向的交通模式。限制机动车拥有和使用一直是其主导的政策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停车政策呈现出有别于欧美城市的特点。1) 使用最低配建标准,保证车位供给(尤其是居住地的车位供给)。2) 通过昂贵的停车价格管控增加

拥车和用车成本。3) 在 CBD 核心区减少甚至不提供路内停车, 按停车时长累积收费也是普遍使用的政策措施。

文章第二部分, 从“供给紧缩”和“精细管理”两个层面, 详述了纽约、伦敦和香港的停车管理措施。为了克服紧缩措施在实施中受到的各种阻力, 发达国家或地区制定了一系列的精细管理和制度安排。具体表现为四方面: (1) 建立自上而下的引导机制。停车政策从地方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 引导可持续交通的发展; (2) 设定差异化的停车配建标准。如考虑除用地性质外更多的影响因子, 并设定折减系数, 以减少停车供给, 鼓励公交出行。(3)

扩大管理尺度, 从单一尺度拓展到整个片区。考虑不同用地停车设施共享的可能性, 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4) 利用市场和价格机制调节供需关系。

文章第三部分, 讨论了新加坡学者保罗·巴特 (Paul Barter) 提出的“适应性停车” (adaptive parking) 五要素, 即 (1) 共享 (share); (2) 收费 (price); (3) 受益 (sweeten); (4) 解除管制 (relax); (5) 选择 (choice)。在此基础上, 对中国停车管理提出渐进式改革建议, 包括构建共享、开放和统筹管制, 逐步发展市场化和基于需求反应的价格机制和促进停车供给和土地利用的互动, 以供学界和业界讨论。

从管制到市场: 市场主导型停车政策的文献综述

许红 李玉涛 郭湛

摘要: 面对停车问题, 世界各国普遍采用政府配置停车资源的方式。实际上, 市场配置方式可以最有效地指导停车场所的规划以及相应政策的设计, 但这一方式仍未得到广泛采用。文章回顾了美国停车政策的演变史, 发现其“从政府管制到市场配置”的演变趋势。但是中国介绍美国停车政策的文献大多是从政府管理角度而非从市场配置资源角度出发。于是, 文章基于经济学视角对美国舒普提出的市场主导型停车政策的文献进行综述, 对其进行重点介绍和阐释, 同时分析政府主导型停车政策的弊端。希望能补充国内相关文献的空白, 并为中国停车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加广阔的思路。

关键词: 政府主导型停车政策; 市场主导型停车政策; 选择; 公平; 自治

引文格式: 许红, 李玉涛, 郭湛. 从管制到市场: 市场主导型停车政策的文献综述[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6): 70-78. DOI: 10.22217/upi.2019.008.

新加坡学者保罗·巴特 (Paul Barter) 把停车政策分为三类: 传统型、管理型和市场型。本文顺其思路, 回顾了美国停车政策百年演变史, 发现一条“从政府到市场、从管制到价格”的演变脉络, 进而将以上三类停车政策归纳为两类: 政府主导型停车政策 (包括传统型和管理型), 市场主导型停车政策 (即市场型)。两者的区别在于: 一是首要目标不同, 前者是为了贯彻城市和交通政策的目标, 后者是供求均衡; 二是工具不同, 前者的工具主要是管制 (包括政府定价), 而后者主要是市场价格; 三是方向不同, 前者是自上而下, 后者是自下而上, 后者强调只有局部市场均衡了, 一般市场才有可能均衡; 四是对待停车溢出的态度不同, 前者把停车溢出当作难题, 后者则认为它是创造

收入的市场活动。

美国停车政策的演变脉络随理念变化而变化。

美国最初采取的是政府主导型停车政策。这种停车政策的弊端集中体现于路外最低配建标准的负面影响。“最低标准”使路外停车资源大幅增加, 1955年后停车问题逐步缓解。但是其负面效应也开始显现, 不但路外停车资源供过于求, 而且还出现了与城市和交通政策目标相悖的效应。管制的低效和不公平表明政府难以自发地为个体捕获经济效益, 从而无法实现社会效益的帕累托最优。

美国几乎在每项停车管制推出后都会紧接着出台若干市场化政策, 以减轻管制对市场的扭曲, 直到2005年唐纳德·舒普 (Donald Shoup) 正式提出市场

主导型停车政策。其思路是：由政策保障路内绩效价格的实现，然后取消配建标准管制，在停车场与其他土地用途之间可以自由转换的前提下，路内停车的合理价格会自发地调节路外车位的供求数量，而停车溢出作为一种市场行为会被价格消化。所以，市场主导型停车政策内在地不需要配建标准。此类政策主要包括停车场代建费、停车位兑现（parking cash-out，鼓励公司把补贴雇员停车位的费用兑现给雇员）、路内停车绩效价格、停车受益区（把停车收费按比例返给收费区以改善其公共服务）、车位共享经济（利用互联网有偿匹配车与位），以及针对残障人士专用停车证滥用的双重停车咪表收费（two-tier）。停车场代建费旨在纠正“最低标准”的低效和位置约束；停车位兑现纠正工作地停车位补贴政策对停车成本的忽视；路内停车绩效价格和停车受益区是对路内停车时间限制和配建标准两项管制的替代，以及对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平衡，也是对停车溢出和停车漫寻现象的市场化消化；车位共享经济和停车位兑现可以减少停车需求进而降低配建标准。其中，停车绩效价格和停车受益区是市场主导型停车政策的主体。停车受益区源自居民停车许可证区和商业停车受益区，商业停车受益区的前身是商业改善区，它们都是自组织和自治方式。目前市场主导型停车政策在洛杉矶（ExpressPark 计划）和旧金山（SFpark 计划）试点，取得了初步成功。

从美国停车政策的演变总结出市场主导型停车

政策的制定原则和实施步骤。

制定原则有以下几点：政策基于资源，政策塑造市场，市场配置资源；政策应激励人及其行为而非资源本身（如价格、数量和位置）；政策作用空间须一致（即停车资源的成本、收入与其空间须匹配）；重视选择、公平和自治。

实施步骤如下：

- （1）路内停车治理方式可以采取路内绩效定价（如美国）或禁止路内停车（如日本）；
- （2）基于资源的政策塑造产权明确、定价自由的路外停车市场；
- （3）取消配建标准并撤销行业进出壁垒；
- （4）建立停车受益区。

通过比较北京与美国、日本典型城市的停车问题发展阶段和停车政策，为北京停车政策提出若干方向：

- （1）路内停车治理方式可以以美国的绩效定价为短期手段，以日本的禁止路内停车为长期目标；
- （2）路外停车政策应基于资源，由政策塑造市场、市场配置资源；
- （3）运用先进技术促进物信关系改善；
- （4）重视选择和公平。提供管制与价格的选项；强调“使用者付费，不使用者不付费；少用者少付，多用者多付”；
- （5）积极合理地运用自治方式。

用地混合使用的国际经验：模式、测度方法和效果

王德 殷振轩 俞晓天

摘要：城市用地混合使用被认为是激发城市活力，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目前我国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规划实践中对于用地混合使用的政策引导，对用地混合使用模式、测度方法和效果的探讨相对缺乏。本文梳理国外用地混合使用的概念内涵、类型、测度方法和效果实证，以期全面把握国际用地混合使用的研究前沿。在内涵和模式方面，用地混合使用的概念逐渐深化，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型、多尺度，强调与空间条件相互作用的研究框架；在测度方法方面，众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测度方法，并对比分析了各方法的优缺点；在效果实证方面，用地混合使用对慢行交通出行和居民健康活动具有较为显著的积极作用，对安全和房价的作用还受其他条件影响，而对城市活力的影响仍需进一步实证研究。

关键词：用地混合使用；模式；测度方法；效果；国外

引文格式：王德，殷振轩，俞晓天. 用地混合使用的国际经验：模式、测度方法和效果[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6): 79-85. DOI: 10.22217/upi.2018.312.

在规划理论和规划实践中，用地混合使用都被广泛提及，却缺乏对其概念的明确界定。针对用地混合使用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大量学者展开了广泛讨论，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用地混合使用的特性。最普及的用地混合使用定义由美国城市土地学会于1987年提出，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用地混合使用拥有三个或多个相互兼容且可以产生收益的功能；二是用地混合使用在空间上和功能上需整合形成高密度、高强度的土地利用模式，同时包含连续的步行通道；三是用地混合使用有一个连贯的土地利用规划指导开发建设，保证形式、指标等协调统一。

美国城市土地学会强调用地混合使用需要形成高密度、高强度的开发模式，并包含连续的步行通道，这也被认为是用地混合使用区别于多功能用地开发（“multi-use” development）的主要标志。不过随着研究工作展开，发现其并不是实现用地混合使用效果的充分必要条件，肌理（grain：街区的规模及划分形式）、渗透性（permeability：步行可达性）和交织（interweaving：一定范围内功能的分散程度）也逐渐受到重视，被认为是保障用地混合使用的重要空间条件。

此外，霍彭布劳尔（Hoppenbrower）和洛（Louw）提出用地混合使用包含四种类型（共享式混合、水平方向上的混合、垂直方向上的混合和时间维度的混合）和四个空间尺度（城市[City]、片区[District]、

街区[Block]和建筑单体[Building]）。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生活和生产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用地混合使用符合人们现代所需的综合要求，理论上有多重益处。首先，用地混合使用将不同功能聚集在一起，在较小的范围内满足人们不同的需求，在增加区域多样性的同时减少出行距离。随着出行距离的减少，人们降低了对私家车出行的依赖，更倾向于使用慢行交通方式，一方面有利于降低空气污染，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缓解肥胖等慢性疾病。同时，还可以有效解决职住分离、城市蔓延和交通拥堵等城市问题。其次，随着区域多样性的增加，满足了人们不同时间的不同需求，既增加了区域吸引力又提高了区域活力，最终营造了安全而又具有经济活力的区域。

总结相关实证研究，可以发现用地混合使用理论益处多数已被证明。第一，无论在居住地还是在工作地混入商业功能，都有助于缩短机动车出行距离和出行时间，促进慢行交通分担率；第二，用地混合使用可以增加活动时间和运动量，减少空气污染，缓解慢行疾病；第三，商务（businesses）与社交（meeting place），商业（shops）与社交用地功能的混合有助于增加城市活力；第四，商业与居住混合区域的犯罪率高于纯居住区域，但显著低于纯商业区域；第五，与公园或商业用地功能混合有助于提高房价，但支付意愿也受社会经济属性影响。

促进积极生活的城市设计导则：欧美国家经验

孙佩锦 陆伟 刘连连

摘要：积极生活是将体力活动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缺乏体力活动的现代化生活是导致慢性病迅速增长的直接原因之一。促进积极生活的城市设计导则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越来越普遍的促进健康的方法之一。本文对欧美国家现行的多部促进积极生活的城市设计导则进行了总结，对比分析不同类型与层级的设计导则。同时，通过对设计导则实例内容解析，提出对我国城市设计的启示，以期为国内促进健康的城市设计提供实践基础。

关键词：积极生活；健康城市；设计导则；城市设计；欧美经验

引文格式：孙佩锦，陆伟，刘连连. 促进积极生活的城市设计导则：欧美国家经验[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6): 86-91. DOI: 10.22217/upi.2017.332.

促进体力活动与健康的相关建议在应对公共健康的威胁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积极生活是将体力活动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促进积极生活的城市设计导则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越来越普遍的促进健康的方法之一。国际性组织机构和部分欧美国家的研究机构或者政府部门等都基于建成环境与体力活动的科研成果，出台了很多不同类型的促进积极生活的指南或设计导则。本文对欧美国家现行的 30 余部促进积极生活的城市设计导则进行总结，对比分析不同类型与层级的设计导则。同时，通过对设计导则实例内容解析，提出对我国城市设计的启示，以期为国内促进健康的城市设计提供实践基础。

根据颁布机构的不同，促进积极生活的城市设计导则控制范围与管理内容可以划分为 2 类：国际/国家层面颁布导则和城市/地方层面颁布导则。不同层级的设计导则中，部分导则同时包含政策管理和设计导则两方面，部分导则只包涵政策或者设计，也有部分导则关注市场投资或者专项规划。本文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梳理。

国际性研究组织或者国家级机构颁布的导则内容通常具有普适性，适用范围广泛，可应用于规划的不同阶段、规划系统的各个层次和各项目。导

则内容同时包括设计目标与原则，设计导则，宣传引导，操作实践与实施方法。导则应用类型广泛，包括全量开发、城市广场与社区公园、社区规划设计、娱乐设施、购物区、工作场所、学校、农村等。导则提倡多方参与，注重公众对体力活动与建成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同时强调创造健康空间和场所的实施机制。实施机制可根据个体项目、政策和地区的发展量身定做，并且可被应用于各种规模的战略规划、发展控制和社区参与项目。

地方政府或研究机构颁布的导则具有问题导向性，内容贴切当地城市建设与市民生活实况。通常来说，在积极生活规划理念的不同发展阶段，其相应的设计导则的内容及其侧重、深度等都会有差异。在城市规划决策对健康的影响常被忽略的地区，城市设计导则侧重更新改造的方式和最基本的社区环境设计；当积极生活理念已经在地区有较好的实施时，导则的内容则更为全面，包括健康的环境、食品供应和社会资本等。即，地方性设计导则的编制与表达结合了不同的城市体制与背景，具有一定针对性。例如，正文中并没有展开叙述的洛杉矶健康设计，通过给出具体的设计要素指导可步行的环境和社会资本等。

全球城市综合防灾规划中灾害特点及发展趋势研究

赫磊 戴慎志 解子昂 陈琦 胡群芳 刘飞萍

摘要：城市的安全防灾与韧性发展是全球城市发展的重要主题。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编制的首要问题是科学合理并前瞻性地确定未来面临的灾种、风险及其发展演变趋势。本文以 10 个全球城市的总体规划或战略规划为研究对象，围绕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编制中的灾种确定，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总结 10 个全球城市 23 种灾害的特点，挖掘灾种背后的孕灾环境和影响因素，并通过二者的交叉分析探究城市灾种的发展趋势。通过研究发现：全球城市面临的灾害种类日趋多样化和新型化，城市防灾问题越发关注“人”的健康与安全，新型灾种在全球城市中具有共性和普遍性，因此未来的灾种预测需更加全面化、精准化、核心化。在我国大城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的大背景下，期望通过本研究对我国城市总体规划修编中综合防灾规划的灾种选择提供参考。

关键词：全球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灾种选择；灾害特点；发展趋势；孕灾环境；影响因素

引文格式：赫磊，戴慎志，解子昂，等. 全球城市综合防灾规划中灾害特点及发展趋势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6): 92-99. DOI: 10.22217/upi.2018.437.

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编制的首要问题是科学合理并前瞻性地确定未来面临的灾种、风险及其发展演变趋势。文章以 10 个全球城市的总体规划(战略规划)为研究对象,围绕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编制中的灾种确定,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总结 10 个全球城市 23 种灾害的特点,挖掘灾种背后的孕灾环境和影响因素,并通过二者的交叉分析探究城市灾种的发展趋势。

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将 10 个案例城市相关规划中涉及的城市安全与综合防灾领域关注的重大灾害问题进行汇总。

将 10 个全球城市灾害问题产生的背景和原因进行汇总分类归纳为 9 个方面的因素,对各因素影响的城市安全和灾害问题进行汇总,统计每个因素

影响的问题个数,即频数。

按照安全与综合防灾问题出现的频次由高到低排列,对 10 个全球城市的安全与防灾问题和影响因素进行交叉分析。

分析预测城市安全与综合防灾问题,可以采取的方法为:首先,将新型的城市安全问题作为强共性的问题进行分析预测;其次,考虑传统灾害问题;最后,考虑一般共性问题。

通过研究发现:全球城市面临的灾害种类日趋多样化和新型化,城市防灾问题越发关注“人”的健康与安全,传统型灾害问题不再是城市中长期规划中关注的重点,新型灾种在全球城市中具有共性和普遍性,因此未来的灾种预测需更加全面化、精准化、核心化。

可供性理论在西方环境规划设计中的应用与发展

齐君 董玉萍 提姆·汤森

摘要: 可供性理论是实现实证型规划设计的生态心理学途径。本文厘清了可供性理论的基本概念及其历史发展;通过回顾自 1980 年代至今西方环境规划设计对可供性理论的开发运用,发现当前环境可供性研究主要呈现为环境使用者范式和环境功能范式,将主体行为、主体体验、主体个性以及环境属性作为考量可供性的代理概念;通过对当今主流研究方向的分析,发现了社会及文化可供性、负面可供性、潜在可供性三个方面的研究不足。本文希望为可供性理论在中国环境建设中的应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 可供性;生态心理学;环境与行为;人境交互;规划设计

引文格式: 齐君,董玉萍,提姆·汤森. 可供性理论在西方环境规划设计中的应用与发展[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6): 100-107, 114. DOI: 10.22217/upi.2017.435.

可供性(Affordances)是生态心理学中沟通物理环境与人类行为的一个媒介概念。一个环境的可供性是指环境支持人(或动物)开展某些特定行为的属性,同时又依据主体的不同而相应发生变化。如一个高大的椅子对于成人而言可以支持“坐”的行为,而对于儿童而言则可以支持“爬”的行为。

环境可供性具有典型的层级结构,其根据人与环境互动过程的不同阶段而依次划分为四个层次:“潜在的可供性(PoA, Potential Affordances)”、“察觉的可供性(PeA, Perceived Affordances)”、“使用的可供性(UtA, Utilised Affordances)”、“固定的可供性(ShA, Shaped Affordances)”。潜在的可供性

——PoA 指人与环境之间所存在的潜在的互动方式,由于其尚未人察觉,因而保持着抽象的哲学形式。察觉的可供性——PeA 指环境的特定使用功能已经被察觉,但由于某种原因,其所对应的行为活动并没有开展。使用的可供性——UtA 指人与环境之间已经出现的某种互动模式,但目前尚未成为明确的环境使用范式,故其行为活动没有明确的指向性,出现的频率相对较低。固定的可供性指——ShA 人与环境之间已经形成固定的、习以为常的某种互动模式,其表征通常是特定环境下发生的最为频繁的行为活动。随着人与环境互动过程的深化,四类可供性在正向次序上逐步转化,这一过程中,环境

可供性在形式上由抽象的哲学概念转换为具象的行为模式，故其又被定义为可供性的“实现（Actualisation）”，并且从 PoA、PeA、UtA 直至 ShA，其被实现的可能性依次加深。

在规划设计领域，环境可供性可以被视为是一种环境“资源”，其概念可以指导规划设计师对环境“资源”开展调查，寻求“资源”利用最大化——既以追求环境可供性的实现为原则的实践方法。近来，环境可供性开始被西方学者运用于城市设计、风景园林等领域，形成以生态心理学证据为支撑的“循证规划设计（Evidence-Based Planning & Design）”。

通过回溯 1980 年代至今的环境可供性研究可以发现，由于环境可供性本质在于维系环境及其使用者，故其研究范式也呈现出二种情况。第一种是环境使用者范式（Users Paradigm），即以人为出发点，首先关注环境使用者本身的行为特征，再将结果反映到环境的客观属性上来。该范式是环境可供性研究中较早出现的研究范式，由于其落脚于环境使用者在环境行为方面的共性，故在研究中需要率

先设定一个群体，如关注儿童活动环境、青少年活动环境、老年人活动环境等。第二种是环境功能范式（Functions Paradigm），即以环境场所为出发点，考量其所具备的或者应当具备的功能特征，提出规划设计的借鉴或整改依据。环境功能范式的研究并没有限定环境的使用群体，但明确了环境的使用功能，较为典型的是居住区的规划设计。近来随着健康问题的突出，该范式又被运用于研究健康环境的研究。

作为联系环境与行为的媒介，可供性理论涉及了不同环境功能以及不同使用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概念将环境的客观属性与环境使用者的个性、行为、体验几方面因素相结合，在人居环境的规划设计领域表现出了强烈的人本主义关怀。环境可供性的运用在中微观层面上能够优化居住区或者公共空间的环境使用体验，发展儿童、青少年、老年人等某一群体的友好型环境，更能在宏观层面上助力于宜居城市、健康城市的环境建设。其理论为循证规划设计的探索提供了一条生态心理学路径。

自动驾驶车辆对城市的影响与规划应对：基于涟漪模型的文献综述

秦波 陈筱璇 屈伸

摘要：近年来自动驾驶技术实现突破，将从根本上改变个体交通出行的方式，进而可能对经济社会各方面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聚焦于自动驾驶车辆对城市的系统影响与规划的应对，以涟漪模型为分析框架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展开梳理：在认识自动驾驶技术特点和发展现状基础上，依次剖析自动驾驶车辆对城市交通，土地利用，以及经济、社会、环境带来的影响，并提出可能的交通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以及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应对举措。通过文献综述，可以看到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对城市的影响有利有弊；而作为规划师，须密切关注甚至参与其发展，并对规划原则和技术进行相应调整。

关键词：自动驾驶车辆；涟漪模型；城市系统；交通规划；空间形态；社会公平；规划应对；文献综述

引文格式：秦波, 陈筱璇, 屈伸. 自动驾驶车辆对城市的影响与规划应对：基于涟漪模型的文献综述[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6): 108-114. DOI: 10.22217/upi.2018.387.

近年来，机器学习、图像识别、感应器件等领域的进展推动了自动驾驶技术的突破，大多数行业咨询和交通领域的专家相信自动驾驶车辆将在 21 世纪中叶实现大规模运用。毫无疑问，自动驾驶车辆的出现将对传统交通出行方式、城市土地利用与

空间布局 and 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显著影响。那么，作为城市研究者和规划师，我们做好相应的准备了么？

国内外已有大量文献探讨自动驾驶对城市的各方面影响，本文借鉴米拉杰斯等（Milakis et al,

2017)学者的文章,运用政策领域研究经常使用的涟漪效应模型梳理近年来关于无人驾驶的文献,试图系统地总结自动驾驶车辆对城市交通、用地以及经济社会体系带来的冲击。

涟漪模型第一层主要集中在交通领域,是自动驾驶车辆对城市最为直接的影响,包括可能导致出行时间成本降低但经济成本提高、出行总里程增加、交通拥堵加剧以及道路车容量增加和交通信号标志更新等。

涟漪模型第二层在于对城市空间形态以及土地利用模式的影响。这些影响有利有弊:自动驾驶车辆可以自由返航,使得中心城区大量的停车空间被节省出来,这部分土地可以再开发并创造更高价值的用途;但与此同时,人们对于通勤时长承受度的提高可能激励郊区开发,导致城市用地持续向外蔓延。

涟漪模型第三层在于对城市的经济、社会、环境带来的影响。经济方面,自动驾驶车辆可以为中心城区节省土地资源,提升单位时间和空间内创造的经济价值,从而促进产业发展;社会方面,虽然短期内自动驾驶车辆会使部分驾驶员失业,长远来看它使得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得以享受便利

出行,推动社会向更公平的方向发展;环境方面,自动驾驶车辆提升了燃料利用效率,但也会增加行驶里程,总的来看可能会降低总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

可见,规划师需密切关注新技术的发展,了解自动驾驶的发展特点和阶段,针对性地进行交通规划,为自动驾驶车辆的落地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同时结合城市整体发展规划的需要,充分利用城乡土地资源,让空间产生更高的价值。自动驾驶车辆将带来深远影响,规划师要未雨绸缪,思考与探索如何在规划的编制和实施中更好地应对,让科技发展成为城市美好生活的强大动力。

还有一点值得分享的是一一也是初稿评审专家所指出的——虽然既有英文文献中 *autonomous driving vehicle* 和 *autonomous vehicle* 的表述都存在,中文文献中也有“无人驾驶汽车”和“自动驾驶车辆”两种表述,但经过比较, *autonomous vehicle* 使用更多,而“自动驾驶车辆”应该更为精准。一来 *autonomous* 翻译过来就是“自动”,二来不一定是使用石油能源的“汽车”,未来更可能是电动“车辆”。今后文献中,使用“自动驾驶车辆”可能会比“无人驾驶汽车”更为精准。

“自由之境”的自由与规则——荷兰奥斯特沃尔德“法治规划”实践研究

朱静宜

摘要: 本文以荷兰阿尔梅勒—奥斯特沃尔德的“自由之境”规划方案为例,阐述了其“法治规划”的思路。法治规划的思路与以土地利用为中心的理性主义规划不同,强调利用分散的知识,将城市发展的自发性组织到以过程为导向的规则框架中,利用“模式手段”对个体行为进行约束。该思路建立在对理性主义规划和综合规划批判的基础上,以过程调控代替蓝图绘制,可以更有效地应对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案例分析中,着重分析了构成“奥斯特沃尔德自由之境”方案的规则要素以及土地开发模式等,提出案例背后的通过法治规划与私人规划激发“受控自发性”的思路,在弱化土地利用规划、强调更灵活的规划手段的今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治理; 规划思想; 法治规划; 复杂性; 受控自发性; 框架手段; 奥斯特沃尔德

引文格式: 朱静宜.“自由之境”的自由与规则——荷兰奥斯特沃尔德“法治规划”实践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6): 115-124. DOI: 10.22217/upi.2017.227.

“奥斯特沃尔德有足够的空间让你实现你的梦想与信念。你不仅可以决定如何建造自己的房屋,

还需要和你的邻居一起参与道路、绿化、水域与公共空间的建設。这是一个真正的DIY发展项目,除

了一些游戏规则，完全没有其他限制。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和你未来的邻居一起，塑造一个绿色可持续的生活环境。”

作为对现代主义规划模式进行反思的思路之一，法治规划（nomocratic planning）简单来说是用规则代替蓝图式的用地规划。具体而言，则是强调转变公共规划干预的方式，规划不再强调对未来发展图景的预测以及基于这些预测的政府公共行为对城市发展进行的详细控制，而是通过一系列规则框架对个体行为（体现为开发项目、住房建设等）进行过程上的约束，避免个体互动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在法治规划的视野下，城市规划的重点不在于制定引导未来城市空间和社会变化的确定方案，而在于创造一套稳定而简单、抽象而总体的规则，使空间和社会可以自行灵活发展；其关键并不在于简单应对变化、处理变化，而在于促成变化的发生。

一个可以用来阐释法治规划的案例是位于荷兰的奥斯特沃尔德（Oosterwold）。奥斯特沃尔德是阿姆斯特丹大都市区内阿尔梅勒市东部的一片最新开发区域，在该市战略规划中，奥斯特沃尔德将遵循有机发展模式，成为低密度的居住与工作社区。奥斯特沃尔德的发展策略基于 MVRDV 于 2012 年提出的“奥斯特沃尔德自由之境”（Oosterwold Freeland）的设想，其核心是地区的发展将完全由未来的居民决定，居民可以自由决定房屋的风格、土地的布局等，但必须遵守一些特定规则，例如遵守在建设面积与容积率等指标方面的约定、保证地块内的基础设施与都市农业的设置、共同负责城市道路的建设、在各自的地块内实现供水供能及废物处理的自给自足等。通过介绍法治规划的思路与奥斯特沃尔德这个案例，笔者希望对城市发展的自发性、个人自由、规划控制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

今天，距离奥斯特沃尔德开始实施“自由之境”

的设想以及笔者写就这篇文章已经过去数年。奥斯特沃尔德的开发建设仍然在缓慢进行。从卫星图可以看到，建设较多的区域集中于奥斯特沃尔德西侧角落，即临近阿尔梅勒的一片已开发社区。目前已经形成的城市形态有机而分散，以住宅为主，尚未出现商业或其他服务设施。

有趣的是，在追踪奥斯特沃尔德的发展时，笔者在网上读到一位博主讲述自己原本计划与一群朋友在奥斯特沃尔德建造自己的住房、但后续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暂时搁置计划的故事。她与朋友们的家庭背景类似，均为双职工家庭，在阿姆斯特丹找不到可负担的家庭住房，同时想拥有花园和自己设计自己居住环境的自由，奥斯特沃尔德似乎可以给他们实现这一理想的机会。然而，在实地考察与了解该项目之后，她观察到今天的奥斯特沃尔德新建房屋彼此距离很远，没有小尺度的社区感；地块之间相互隔离，居民因为不希望其他人走到自己的地块边上而使用了很多隔离措施；缺少公园、儿童游乐场等公共空间和学校等本应由政府负责的公共服务设施。同时，从承担建设方面来说，前期需要的土地开发成本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很高；另一方面，奥斯特沃尔德强调自给自足与都市农业（农业地块面积占地块总面积的一半），而普通的工作家庭很难承担这些经营管理工作。种种现象让她得出结论，“奥斯特沃尔德只是新自由主义的另一种表现，政府不承担应尽的责任，一切事务都需要市民承担”。

当然，这样的一家之言并不能完全代表奥斯特沃尔德今天的状态，这一地区仍在经历漫长的建设过程，未来还会有很多可能。但是，无论对奥斯特沃尔德还是其他城市而言，“规划”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永远不会过时的问题，而法治规划仅仅是继续深入思考的一个开端。

英格兰乡村保护委员会及乡村保护运动

万涛 吴纳维

导读：本文对起源于英国快速城市化时期的英格兰乡村保护委员会（CPRE）及其倡导的乡村保护运动进行了分析，旨在为我国乡村规划和发展提供相关政策建议。文章回顾了 CPRE 的成立背景、基本理念和工作

领域,成员构成及组织形式,从公众教育、立法监督、科学参与三个方面介绍了 CPRE 的工作模式和策略。本文认为,在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由量转质的转型过程中,乡村规划应当引导公众认知乡村价值,重塑社会观念;完善乡村保护法律体系,推动乡村法制化管理、常态化监督;重视非政府组织作用,引导其运用技术力量和公众影响力,科学化参与乡村规划过程。

引文格式:万涛,吴纳维. 英格兰乡村保护委员会及乡村保护运动[J]. 国际城市规划,2019(6): 142-148. DOI: 10.22217/upi.2016.173.

1 CPRE 简介

英格兰乡村保护委员会和乡村保护运动(CPRE: Council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Rural England, Council for the Protection of Rural England, Campaign to Protect Rural England)由时任卫生部规划主管大臣的内维尔·张伯伦在伦敦的一次英国皇家建筑师预备会议上发起倡议,之后由帕特里克·艾伯克隆比爵士(时任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学会主席)和盖·道伯尔(时任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主席和艺术委员会主席)于1926年共同负责建立。作为最早倡导绿隔政策的公益组织,CPRE在其成立后90年的历程中以“促进和强化乡村特色、保护乡村免受破坏性开发、汇聚和强化乡村支持力量”为目标,是英格兰最具影响力且受人尊敬的环保团体。

CPRE为营造美丽宜居(Beautiful and living)的乡村而开展运动,通过“提升英格兰乡村的美丽(beauty)、宁静(tranquility)、多样性(diversity)”,使城镇和乡村成为更理想的居住、工作和享受场所。CPRE始终秉持以下四点规划理念:(1)规划应当具有生态和社会双重方面的重要性;(2)都市和乡村的内部联系是平衡两者的关键;(3)乡村景观美丽、平静和陶冶性情的本质应当得到保护;(4)寻求区域的个性化发展以及土地的附加值。

CPRE早期的工作内容主要为:控制沿干道的带状发展、划定绿隔、新城建设以及在郊野和自然风景极佳的地区建立国家公园。如今,CPRE已非单纯重视“乡村保护”(Preservation改为Protection),而是领域广泛的公众运动(Campaign)。

CPRE经历了由精英阶层主导向平民化参与转型的过程。成立早期,CPRE成员构成有明显的“精英化”倾向(如爵士、议员),具有显赫地位和社会影响力。1960年代,CPRE的构成转为中产阶级主导,宣传保护理念、教育广大民众,影响各级规划

的制定逐渐成为工作导向。2015年,CPRE拥有约5.5万名成员和支持者,多级网络结构涉及英国社会各阶层。如今,CPRE设有国家办公室、区域和郡分支机构、地方工作小组,以便在英国行政体系的各个层级开展行动。

2 CPRE 的工作模式与策略

CPRE充分发挥了非政府机构的优势,传承英国公民社会传统,借助政治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条款,以专业角度切入,重构了“公众—议会—政府”的博弈关系。

CPRE一直活跃在公众视野,通过多样化的出版物传播乡村保护理念,引导公众参与规划决策。绿隔研究是典型代表:2009年,CPRE对1754位英国公民开展访谈,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了解统计公民对于绿隔的意识与态度、重要性认同、需求与发展建议等,为监测公众与绿隔的关系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其注明出版物包括2010年出版的《绿隔:一个更加绿色的未来》(*Green Belts: A Greener Future*)和2012出版的《绿隔:再开发的威胁?》(*Green Belts: Under Renewed Threat?*)。

CPRE地图(CPRE Maps)则是近年来推出的全新宣传媒介。CPRE选取公众关切且易懂的“宁静指数”和“暗夜指数”进行可视化表达,结合公众对自身生活环境的认知,介绍绿隔、国家公园、突出自然景观等保护政策。

将行动理念落实为政策立法是CPRE工作的核心。得益于英国代议制政治传统和成熟的民意表达渠道,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规划制度设计,CPRE的各级组织有了开展行动的法律基础和政策抓手,利用关键节点对议员本人和立法项目开展“游说”工作。如2015英国大选当中,CPRE发布《为乡村而战》(*Stand up for the countryside*)宣言,呼吁各竞选党派在竞选纲领中重视乡村保护,向选民承诺相

关政策条件。最终，参选的5个主要党派中，有4个都正面回应了CPRE的规划理念。

根据英国规划体系【2011年，英国颁布《地方主义法》(Localism Act)，国家规划政策框架(NPPF: National Planning Policy Framework)取代之前的政策指导文件(PPG和PPS)，区域规划(RSS)被取消，地方规划(LDP: Local Development Plan)被强化，新设立邻里规划(NP: Neighbourhood Plan)，精简了规划层级，增强了社区和地方自主性】，CPRE国家办公室主要“游说”议会(Westminster)和中央政府(Whitehall)，影响国家规划政策框架审议及投票。区域和郡分支机构，针对地方发展规划开展行动，同时监督国家和地方规划的实施。地方工作小组参与社区邻里规划的制定，同时审查规划申请，反对其中不合适的提案。

CPRE从专业角度切入的评估报告是说服公众和政策制定者最有力的依据。其主要手段是对规划方案进行综合性环境评价，为居民、政府参与规划决策提供技术分析。如，CPRE曾在1957年阻止了英国计划建造的第一条高速公路M1，保护了莱斯特郡(Leicestershire)查恩伍德(Charnwood)的大片古森林。当前，连接伦敦、伯明翰、利兹、曼彻斯特的高速铁路计划HS2是CPRE关注的重点。CPRE特别制作了专题网站，整合技术数据开展景观影响评估(Landscape Impact)、施工影响评估(Construction Impact)和运作影响评估(Operational Impact)，并以可视化地图界面展示。CPRE深度参与了该项目必要性、可行性的公众讨论，有力地影响了线路规划和其他关键决策。

3 CPRE对中国乡村规划和发展的启示

3.1 认知乡村价值，重塑社会观念

“生态文明”发展理念，“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基调，都包含中央政策对乡村价值的重新定位，是自上而下引导社会观念的尝试。可喜的是，“返乡”潮流逐渐兴起，乡村非政府组织逐渐活跃，他们奔走于城乡，宣传乡村价值、推动乡村保护。乡村规划应以乡村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综合物质、文化、生态空间规划，彰显乡村价值，重塑社会观念。

3.2 推动乡村法制化管理，常态化监督

我国乡村保护与发展有赖于相关文化保护、建设管理、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完善。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中人大、政协职能，以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为主体，拓宽意见渠道，人民代表真正代表人民，科学论证提出提案，加强执法监督。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借助第三方机构编制可行性报告、环境影响评估，避免“走过场”。设置科学合理的公众参与平台，增强群众与政府互信，让规划真正成为各方博弈和妥协过程的起点。

3.3 引入非政府组织，科学化参与规划过程

CPRE的经验证明了乡村规划与发展过程中，独立的NGO组织，能为提供独立的专业咨询、信息传达以及实施评估，担当公共代言人促成社会共识。我国掌握“政策制定者的语言”和“环保主义者的语言”的社会力量非常薄弱，其对立法及规划政策的影响则更微乎其微。在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仍需着重培养关注乡村、立足本地的NGO组织，有助于消弭政府与公众的误解，引导和动员社会力量。

美国国家备灾框架研究及相关思考

运迎霞 马超

导读：当前全球各国面临自然灾害、技术事故和人为灾害等重大威胁和冲击，需要构建备灾框架应对危机。美国针对灾害和突发事件制定国家备灾目标，通过防灾、保护、减灾、救灾响应及灾后恢复五大备灾领域，设立层次分明的备灾框架，依靠各框架相互协调系统地降低国家脆弱度，提升国家韧性。本文从指导原则及任务职责、核心能力、协调机构与整合以及操作规划四方面解读美国国家备灾框架，以期对我国防灾减灾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引文格式：运迎霞，马超. 美国国家备灾框架研究及相关思考[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6): 149-155. DOI: 10.22217/upi.2016.208.

欲了解本册更多详情，请联系编辑部。

《国际城市规划》集萃 | 2019